

LIVING AGE

動向

第一卷 第三期

目 要

俄國革命軼史	馬爾勞論	馬克思致柯格爾曼的信	中國近代的啓蒙運動與史實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文學的預測	德蘇協定引起了大戰	第二次大戰與中日戰爭	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	世界動向
--------	------	------------	--------------	---------------	-----------	------------	-------------	------

華盛頓印刷出版公司

The Alexander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mpany.

目錄

第一卷 第三期

世界動向·····	鳳岡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南冠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日戰爭·····	梁石生
德蘇協定引起了大戰·····	育才
關於德蘇協定的東鱗西瓜·····	木君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文學的預測·····	野老
中國近代的啓蒙運動與史實·····	江濤聲
伊里奇若在會說什麼？·····	達古
馬爾勞論·····	杜比作 小邨譯
馬克思致柯格爾曼的信·····	林超真譯
法蘭西內戰(書報介紹)·····	君衡
俄國革命軼史·····	維多·綏奇作 林伊文譯
讀者通訊·····	編者

動向

(每月三十日出版)

第一卷 第三期

民國廿八年九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者 動向社

發行者 白克孟

出版者 美華盛頓出版印刷公司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 零售每册一角五分
預定全年壹元五角

(本刊工部局登記證C五八四號)

世界動向

鳳岡

『不可思議』

這幾天，無論在街頭巷尾，茶樓酒肆，隨處都可以看見有人在搖頭嘆氣，大談着『這個世界的不可思議』。一般在報章上寫黨論宏議的先生們，也都因為事變的發展，往往立刻撕破了他們先知政論家的面具，所以也有擱筆太息的；也有裝着不好意思的神氣，隨和着大家慨嘆一下『不可思議』，以為他們預言破產之解嘲的。

然而世界真的『迷亂』得『不可思議』嗎？那也未必。世事誠然太複雜，不過本質上却決不會連一點規律和理由都沒有，某些人之所以要搖頭嘆氣，這倒並不能證明世界的動向已越出了任何因果規律，而只能證明這些人頭腦中從來用以解釋世變的規律是虛偽的，是不合乎實際的罷了。

一切『不可思議』中之最『不可思議』者，就是蘇聯的行動。德蘇協定已够令人糊塗了，忽然又來了一齣瓜分波蘭的全武行，這對於那些太相信『我們不要寸土，也不予人寸土』的口號的人，真是一個莫大的打擊。但是『不可思議』的還不止此哩，日蘇停戰協定宣佈了，接着還要解決日蘇間的一切懸案，而更離奇的是：據說咱們中國的抗戰，恐怕也將列入他們兩國的『懸案』之中，而欲試行解決了，這一點，讓我事先承認一下：小子也頗覺得『不可思議』的。

此外，還有許多叫人不能相信的事情，有如：

以反法西斯為戰號的民主國家，為什麼一開戰就『停止』了民主權利？美國的政治家口口聲聲要避免戰爭，為什麼實際上却在積極備戰？德意軸心據說是『鋼一般的同盟』，為什麼戰事一起莫索里尼便宣佈了中立？英法既然對德宣戰，援助波蘭，為什麼一月來簡直毫無動靜？其他如一生為印度獨立而奮鬥的甘地，到了大戰發生，即當殖民地解放的有利時機，却宣佈擁護『母國』；著名反戰的人道主義與和平主義的作家羅曼·羅蘭，現在竟一反素志，要求達拉第總理堅決對希特勒作戰！這一些至少對於某些淺薄者流，總覺得是『不可思議』的。

本文作者當然不敢以『深刻者』的神氣來從事說教，更不願以『先知』的態度來指導迷津。我只要撇開一切簡單的公式，先入的成見，根據事實，來把上述這些『不可思議』的現象，試作一點說明。凡已在本期專論中談及的問題，本文就此略去了。這裏請先談蘇聯。

蘇聯之『謎』

有一位名叫Boris Silver的社會主義者，在其所著：『一個俄國工人的自述』中，說道：『蘇聯初期的領導者惟恐外界不明白蘇聯的實情，目前的執政者，却惟恐外界明白了蘇聯的實情』。這真是一言道破了蘇聯的『謎』底。世界人士對於蘇聯的感情，曾經有過好幾個時期：當布爾雪維克初初奪

得政權，世界各資本國家聯合進攻，並資助沙俄遺孽進行內戰之時，全世界祇有極少數的革命者，才對這歷史上第一個工人國家表示擁護，至於其他人，那只是有意或無意地相信着一些荒唐的謠言，什麼布爾雪維克烹食小孩，妻子公有，以及諸如此類的胡說八道，這是第一期，其次是從內戰末期到一九二七年的聯共第十五次大會，那時蘇聯積極援助西方工人革命與東方的弱小民族，所以各國知識分子雖然對她都還保持一個疑忌的態度，但她在世界進步階級與進步分子中的影響却逐漸提高。不過正在這個時期內，隨着新經濟政策的採用，蘇聯內部已經開始了以小資產階級意識反對無產階級思想的過程；再加以各國革命之相繼失敗，『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逐漸抬頭，終於在一九二七年的冬天，把領導十月革命的革命者全數排除出黨。

蘇聯在國外威望之日益提高，國內情形之漸趨反動，這矛盾，便是蘇聯，現執政者『惟恐外界明了蘇聯實情』這種心理的根源。

第三個時期是從一九二八年起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那時蘇聯憑藉着十月革命的成果，即生產工具的公有制，實施了第一次五年計劃，她在普遍的世界恐慌中開放了一朵經濟繁榮之花。於是各國的知識分子都『轉向』到莫斯科了，一個個變成『蘇聯之友』；他們憑自己在『上等社會』中的固有地位，替蘇聯做着義務宣傳；結果蘇聯被美化成一個真善美結晶的『地上天國』，而史大林竟成爲上帝一樣的偶像了。無論誰對蘇聯或史大林作一點即令是善意的批評，都會遭到這些高貴的『同情者』之怒斥的。這和第一時期恰恰成了一個相反的對照。

但是不幸得很，正在這個時候，因為『經濟的繁榮』，蘇聯內部的階級矛盾愈加尖銳，資本主義份子愈加昂起頭來，工人階級中發生了極大的分化，少數貴族工人貼附於統治的官僚層，大多數則陷於悲痛的地步，官僚層得到了巨大『國富』的營養，且愈據於各階級仲裁人的地位，於是權勢突大，變成爲歷史上空前有力的個人獨裁制；牠不僅取消了一般民衆和蘇維埃的民主，而且還窒息了黨內的任何自由。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蘇聯的現當局及其國外的『友人們』，自然更不許『外界明了蘇聯的實情』了。

一九三六年開始的莫斯科審判，可說是世界人士對蘇聯所懷感情之第四時期的起點，蘇聯當局以一種叫人絕對難信的罪狀處決了十月革命的全體元勳，這才開始搖動了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對蘇聯執政者的友誼，他們對蘇聯的實情表示了懷疑。不過最多數的人士，却仍舊固信着『地上天國』的觀念，他們甚至附和着克林姆宮裏的誣控，幫同污蔑那蒙冤屈死的革命元勳們。

在這樣一種盲目崇拜蘇聯的空氣裏，突然見到了史大林竟與希特勒同盟瓜分波蘭，並將與中國的大敵——日本——妥協，那又怎怪得人們要大叫『不可思議』，並稱蘇聯爲一個『難解之謎』呢？然而真是謎嗎？誰叫你們長年閉着眼：始終不願認識一下蘇聯的實情呀！

蘇聯是怎樣的一個國家

那末蘇聯的實情究竟怎樣？將來的發展又將如何？這兩個問題太大大複雜，不過爲要解釋目前蘇

聯『不可思議』的行動起見，我還不得不簡略地作一些原則上的說明。

就本質上說，蘇聯還是一個工人國家，這就是說，牠還維持着由十月革命所爭得的生產工具的公有制。自從採取了新經濟政策，並實施了幾次五年計劃以後，俄國的生產力也確實表現了突飛猛進。但一方面正因爲生產力之相當提高，另一方面又因國外革命的不斷潰敗，這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工人國家，近幾年來經歷了一個可怕的墮落過程。這過程表現於政治上的，主要爲：世界革命理想之完全拋棄；布爾雪維克黨的消滅；以及一切龐大無比的國家官僚機關之形成，牠實行最野蠻的專政，並以『建設一國社會主義』爲唯一目的。

然而要在相當落後的俄國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勢非對國內外的敵人採取妥協政策不可。因此，目前的統治者就以殺盡布爾雪維克及獎勵私產這些代價，來購取國內資本主義份子的支持；在國外，則命令共產黨人放棄主張，或根本以『不干涉』各該國革命或解放運動的條件，來換得資本國家的『同盟』或互不侵犯的『諾言』。

如果懂得了蘇聯這一點實情，那末近幾年來，尤其近幾月來關於史大林在內政外交上一切『不可思議』的行動，都可明白理解了。

爲什麼要跟『不共戴天之仇』希特勒携手？很簡單，因爲在西歐方面，這位卅字牌的元首最能干涉蘇聯『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爲什麼要和東方的武士修好？在本質上也還是這個原因：由此可解除東方的威脅。但是這應講來，還有一件事情仍舊『不可思議』：爲什麼忽而把『一國』的疆界擴大到波蘭，要去拯救陷落的『同胞』呢？關於這，當

然還有其他次要的原因，請聽下節分解。

出兵波蘭的意義

自從蘇聯現當局以『一國自保主義』來代替了世界革命的戰略以後，『我們不要寸土，亦不予人寸土』，竟成爲蘇聯外交軍事方面的一個主要口號。但是明顯得很，在目前這樣的世界裏，這個口號祇是一種自欺的保守幻想罷了。實際上，你如果不要別人的『寸土』，別人就要你的『寸土』，天下事不進不退，萬物萬事都逃不出這個道理。所以在蘇聯開始建立的時候，當時的兩大領袖：列寧和托洛斯基的基本認識，就是俄國革命必須『侵略』到世界的其他部分去，否則，各國的資本制度就要來撲滅俄國的革命；但不幸蘇聯的現當局排斥了這個所謂『革命的不斷論』，採取了幻想的一國自保政策。結果事變的發展打破了這個政策，史大林便不得不採取希特勒擴充領土的辦法來『輸出蘇維埃制度』了。這可以說是蘇聯現執政者拋棄了列寧原則的一種報復。因爲自保主義的應急辦法，只有帝國主義式的軍事侵略。

蘇聯這次出兵波蘭的事實上的發展是這樣的；爲要保持『和平的孤立』，乃與最能破壞蘇聯和平的希特勒妥協；但要完成妥協，就得幫助他去進攻波蘭；但波蘭如果全入第三帝國的版圖，則納粹黨的雄師直逼邊疆，勢將危及蘇聯安全，故軍事上的需要，迫得史大林不得不以保護『同胞』的名義，向波蘭要求『寸土』，而與希特勒實行瓜分了。最近有許多，對於紅軍攻入波蘭這一件事情的本身，加以非難，以爲紅軍根本就沒有越過蘇聯邊界的『權利』，這意見，其實還是民族『社會主義』

的理論。根據列寧等人的意見，紅軍越過國界這件事情，揆之革命原則，那是完全可以允許的。何況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列寧還堅決主張要直搗華沙呢。那末爲什麼一九二〇年之進攻華沙是對的，而這次的進攻波蘭是錯誤的？

這問題最好拿具體的事實來答覆。一九二〇年，畢爾蘇次基鎮壓了波蘭工農的革命，得到了協約國的指使與資助，率兵進攻正在苦鬥中的蘇維埃政權，甚至占領了俄國的基也夫，紅軍於倉卒間集師迎擊，大敗之，追擊達六百五十基羅米達，波蘭乞和，但因當時波蘭工人的革命情緒尚高，列寧不主和，欲直取華沙，助成其事，後因紅軍憊甚，在華沙近郊反勝爲敗，訂立里加條約。

對於這次進兵，當時革命領袖的意見是這樣的：爲保護俄國的新制度並援助波蘭的革命，我們一定要進攻，不過軍事的進展必須與革命的速度配合起來，否則，進軍反而會於革命有害。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紅軍之越過『國界』是完全可以的，只要牠是爲了革命的目的，並且能與革命相配合。

但是這次進攻波蘭爲了什麼呢？當然不是爲了援助革命，因爲目前根本沒有革命。也不是爲了波蘭侵略蘇聯，因爲波蘭正在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紅軍這次之越過國界，僅僅爲了響應希特勒，僅僅以汎斯拉夫主義的名義去拯救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同胞！這還成什麼話！

日蘇協定是德蘇協定的補充

蘇聯既然和德國瓜分了波蘭，以後將怎麼辦？這當然不能加以詳盡的猜測；不過戰爭發展的邏輯，大概再不能讓蘇聯逍遙於戰爭之外了。在目前

前，希特勒雖然格外討好，大量奉送波蘭的土地，但西線的戰爭始終沒有認真地打起來，由希特勒授意的莫索里尼，又天天在高唱和平，那末誰能担保英法不會以寬大的條件，收買希特勒作反共十字軍的先鋒呢？史大林爲要避免這個可能，使希特勒與英法持久作戰，便不得不積極站在納粹黨方面，供給她以必要的軍需，甚至還得幫同她作戰。縱令在一時間蘇聯還能保持『中立』，但僅僅爲了鞏固新的西疆起見，也必然要爭取波羅的海諸小邦，以及羅馬尼亞的比沙拉比亞；因此，史大林今後要想求得西線之平靜無事，那是辦不到的。那末怎麼辦呢？事實已經告訴我們，他就和我們的東鄰結束諾蒙亨的戰事，並『調整』兩國關係。

關於日蘇的互不侵犯條約，我們中國的許多政論家，又像當初對於德蘇協定的態度一樣，在大喊什麼『絕對不可能』了。其實這是糊塗的。當然，我也並不說日蘇互不侵犯條件『絕對可能』，不過至少在目前這種情勢下，日蘇兩國都有簽訂這一種協定的需要與願望，那我們就不能預斷牠絕無可能，據我看來，倒還是可能的成分多些。

蘇聯之需要與日本妥協，既如上述。現在我們且來看日本方面的意思。自從德蘇協定成立之後，日本的外交政策真一度感到了極度的彷徨。利用軸心同盟的聲勢來壓迫英國和蘇聯，都因這一紙協定而失去了依據。武士們着了慌，一時摸不着頭腦，內閣更換了，反英運動立刻停止，赴德觀光的寺內大將等要取道倫敦歸國了。這都表示她想和英國徹底妥協，藉以結束侵華戰爭，並應付蘇俄的『東顧』。但歐戰爆發後的形勢迅速改變，英國在遠東無力兼顧，而蘇聯則破壞了『中立』，也捲進

了歐戰，並無對日強硬的姿態，於是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根據着這一點『確立』起來了。寺內重新決定赴德，陸軍將領大事更動，素來主張聯俄以對華的梅津做了關東軍的總司令，而華北各地的反英運動重新抬頭，上海的租界要求也更加緊張了。

據各方面的情形看來，日本在目前的對華政策，一方面要成立集中的傀儡政權，加緊中國政府中的政治分化，另一方面要完成對蘇妥協，以便抽調大批關東軍南下，實行新的進攻；同時恐將要求蘇聯停止對華援助，或甚至『調解』中日戰爭，藉以完成兩國間的不侵犯條約。究竟蘇聯會不會答應這個要求，那末有了德蘇協定和波蘭的經驗之後，我們就不敢担保了。

不過此種美夢能否實現，現在還要看美國的態度如何。

美日戰爭的可能

關於美日兩國在遠東的糾葛，我們在上期世界動向裏已經詳細地講過，重覆是不需要的。這裏將祇談一談最近的可能發展。

歐戰發生以後，英國事實上已經退出了遠東的競技場。再自蘇聯出兵波蘭，牽入歐戰，太平洋上的爭奪者簡直祇贖着美國和日本了。依常識推斷，這時自然是美國插足遠東的最好機會，她應該毫不遲疑，給這陷入泥淖的日本以一個嚴重打擊，藉以確立那以『美國經濟爲基礎的中國』。

但是美日戰爭爲什麼不立即爆發呢？要懂得這個道理，那就該把眼光放大到全世界去。目前換句話說，中國祇成爲美日兩國所追逐的鹿了。世界上有兩個戰鬥場：一個是歐洲，另一個是遠東；但前

者是主要的。因為誰坐定了歐洲的王座，誰就是世界的霸王，美國既是一個以世界霸王自居的國家，那怎能自外於歐洲的爭霸戰，而祇在遠東這個次要的戰場一顯身手？這是她目前注大部分精力於歐洲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經濟的。上次大戰以來，英法實際上已經是美國的經濟附庸。所以美國爲了本身的經濟利益起見，必須要『民治國』方面取得勝利。

還有，如果希特勒戰勝英法，則拉丁美洲將受到極大的威脅。這是美國必須要保證英法勝利的第三個原因。

現在歐洲的局面還很混沌，英法在戰爭中並不能必有必勝的把握，爲此，美國決不敢立刻在遠東對日作戰，以免束縛了自己的兵力。

那末日美戰爭可以避免嗎？這又不然。世界大戰之擴大到太平洋上，那是難於倖免的。如果意大利站在英法方面，如果蘇聯暫取靜觀，如果希特勒的形勢已經不利，那末花旗飛機恐怕就要在橫濱的上空出現了。

日本當然是懂得這一點的，所以她在對中國進行新的政治軍事的進攻的前夜，在日蘇談判妥協的時候，同時還要注意到日美關係的『調整』，但我們知道這種企圖是終於要失敗的。羅斯福總統的既定方針決不會因野村大使的舊誼而有所變更。日美戰爭遲早總要發生的。

日美戰爭發生，自然在客觀上會有利於我們的抗戰；但這戰爭一時還不會爆發，在牠沒有發生之前，中國的抗戰局面，如何才能不致因英國的撤退，蘇日妥協，日本的加倍進攻而終結，那是一切抗戰志士所急需思索的一個問題。

（寫到這裏，篇幅已經太長了，第一節中所提到的其他許多『不可思議』的問題，祇得等下次再談）。

九月二十五日

蘇聯外交政策應具的原則，歷史的實例，與連年來的轉變，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 *The Revealing Betrayed* 第八章中已有了說明與批評，那時正是追求民主陣線的時候。現在蘇聯所携手的雖然已不是達拉第而是希特勒，『和平的朋友』一下子換了好戰的法西斯，但在蘇聯的外交政策上同樣背叛了列寧規定的基本路線，那是一樣的。上述著作中說：

『外交政策無論何時何處都是內國政策之繼續與延長，因爲二者皆由同一統治階級所執行並追求同一歷史目的，必然要伴來外交政策的目的和方法之變更。……』

『在那些年中，蘇維埃政府與資產階級的國家締結了許多條約；一九一八年三月布勒斯特和約，一九二〇年與愛沙尼亞訂約，一九二〇年十月與波蘭訂立里加和約，一九二二年四月與德國訂立拉羅維條約，此外還有許多次要一點的外交協定。但是在那時候，整個蘇維埃政府或其中任何的一員都沒有想到把這些資產階級的外交對手說成『和平的朋友』，更沒有想到德國，波蘭或愛沙尼亞的共產黨投票贊成簽定這些條約的資產階級政府。並且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可以給羣衆以革命的教訓。蘇維埃不得已而簽定布勒斯特和約，正等於疲乏的罷工工人不能不接受資本家所加給他們的最殘酷的條件。但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虛偽的『棄權』形式之下投票贊成這個和約，被布爾塞維克斥爲幫助搶劫和強盜的行爲。雖然四年以後拉羅維條約是在雙方『平等權利』的基礎之上與民主的德國簽訂的，然而如果德國共產黨把這作爲口實，而表示信任資產階級的外交政策，那牠馬上會被共產國際開除出去。蘇維埃國際政策的基本路線是以這一事實爲根據的：蘇維埃政府與帝國主義所訂立的各種商業的，外交的或軍事的協定，當時是不可避免的，但決不能因此限制或削弱各該資本主義國內無產階級的鬥爭，因爲最後分析起來，工人國家的安全只能由世界革命的生長來保障的。當齊赤林準備參加日內瓦會議之時，提議爲着迎合美國的『輿論』起見，蘇維埃憲法之中可以作某些『民主的』修改，列寧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正式信中，急迫的提議立刻派齊赤林到某一療養院休養去。如果任何人在那些日子敢於提議，爲着博取『民主的』帝國主義的好意而參加空洞虛偽的凱洛格公約或削弱共產國際的政策，那麼毫無疑義，列寧會提議把這個新發明者送到某一瘋人院去，而且在政治局中，也一定不會有人反對他的提議的。』

『……當賴伐爾與蘇聯訂約的時候，左派責備：他表面上是連合莫斯科來恐嚇柏林，而其實是企圖與柏林和羅馬接近來反對莫斯科。這一論斷也許是稍微早了一點，但是決不與事變之自然的發展相衝突的。』

『不管一個人怎樣估量法蘇公約的利害，可是沒有一個負責任的革命政治家，會否認蘇聯有權利與這個帝國主義或那個帝國主義締結暫時的協定，以作蘇聯安全之輔助。唯一的事情就是必須明白的和公開的告訴羣衆，這種部份的和帶策略性的協定，在歷史勢力的總系統之中佔什麼地位，爲着要特別利用法德的衝突，一點也用不着把資產階級的同盟國，或把那些暫時躲在國際聯盟幕下的帝國主義者理想化。可是不僅蘇聯的外交界，連現時的共產國際也在內，都有系統地把暫時的同盟者描繪成『和平的朋友』，牠們用『集體安全』和『裁軍』等口號來欺騙工人，這樣一來，牠們在實際上就變成帝國主義者在工人中間的政治代辦了。』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南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現在已由希特勒的魔手揭開了！

驚慌，恐懼，憂慮……的氛圍，籠罩了整個大地。差不多每個人都帶着不安和焦急的心情去想或問：戰爭的前途究竟怎樣？今後怎麼辦呢？！

要想正確地解答這些問題，歷史是最可靠的顧問。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

當着大戰（一九一四——一八年）開始的時候，敵對的雙方都競相宣傳：戰爭爲的是『保衛祖國，文明，自由與正義等等』。但實際上却只是爲了『重新分割世界』，爲了搶奪對方的殖民地，爲了宰制弱小國家。換一句話來說，只是兩大強盜集團爲了分贓不均而起的一場大廝殺。而這種大廝殺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產品。

自從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壟斷就代替了自由競爭。新狄加，加特爾與托萊斯支配了全部的產業界，而高踞於這產業界之頂上發號施令的乃是銀行資本，財政寡頭。這裏表明現代的生產力已遠超過了民族國家的狹小圈子。因此，向外攫取商品和原料市場，特別是投資市場，便成爲維持資本主義生存之最迫切的最基本的政策了。

可是我們這個星球上的面積是有限的，以有限的面積當然不能滿足帝國主義無窮的慾望。於是列強中間爭奪市場和殖民地的衝突，便有如波濤相逐，前仆後起——一九一四年前幾十年內的全部世界經濟和外交史，都是充滿了這類衝突的紀載。經過多次衝突的結果，各列強便根據相互間的利害關係而逐漸形成了兩大互相敵對的陣營：『三國同盟』（德奧意）與『三國協約』（英法俄）。

一方面，以英國爲領袖，幾乎霸佔了全世界的一切市場，一切殖民地，并且堅決地不許他人染指；而另一方面，擁有龐大的最進步的生產力的德國，

却深深陷入殖民地的飢餓之中，因而只得用全力從事軍備，企圖以此衝破現狀，達到世界重分。在這樣的情形底下，在這兩大資本巨頭的相互爭霸之下，除了實行使用武力來解決以外，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所以結果，空前的大屠殺的慘劇，終於在一九一四年八月爆發出來了！

大屠殺經過四年又四個月，結果是英國所領導的集團最後地將德國集團擊敗了。他們在奏凱聲中，在凡爾塞的『和會』中，瓜分了德奧土耳其的許多領土及其一切殖民地，支解了奧匈帝國，解除了他們的武裝，沒收了牠們的交通工具（如德國的輪船及火車頭等），最後并將天文學上的賠款數字加在戰敗國的民衆頭上……這樣，戰勝的帝國主義國家，確然是『光榮地勝利』了！可是在人民方面的情形究竟是怎樣呢？

事實告訴我們：在戰爭中，戰勝國和戰敗國雙方所死傷的人口達三千萬以上；所損失的金錢和財產超過三千五百萬萬元；幾百萬的壯年男子變成了殘廢，幾百萬的青年婦女失掉了丈夫，上千萬的孩子們失掉了父親；無數的建築盡成灰燼，無數的田園淪爲坵壑；至於幾萬萬人口之經過長期的飢寒交迫的苦痛，那更其是餘事了。然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保衛祖國，文明，自由與正義』的美名之下所完成起來的呵！

但是，像這樣的大屠殺，這樣的慘劇，這樣的災禍，果真是無可避免的命運嗎？站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誠然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但如果站在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立場上，站在社會主義的觀點上，避免是完全可能的，至少是可以轉變的。怎樣避免或轉變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全世界的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聯合起來，以暴力答覆暴力，以革命答覆戰爭的手段去解除剝削者和壓迫者的武裝，建立自己的權力，把一切生產機關收歸公有，撤廢民族國家的藩籬，讓生產力從替少數資本魔王和財政寡頭的利潤的奴役下解脫出來，轉到爲全人類社會服務的坦途上去——這本是當時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歷史任務（這任務會爲許多黨綱，決議和宣言所規定）。但異常不幸，這

個國際絕大多數的領袖們，從德國的謝德曼，叔德昆，考茨基，奧國的鮑威爾，法國的格德，英國的亨德曼直到俄國的蒲列哈諾夫，波特列索夫等等，不但在戰前既從未認真地企圖執行這一任務，而且在戰爭發生後更以全力公開破壞了這一任務。

當戰爭一旦發生時，依社會民主黨的歷次決議和宣言（如斯都加特大會的決議案及巴塞爾宣言等），是應當準備以革命去結束戰爭，以國內戰爭去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的。可是那些機會主義的領袖們却公然背叛了馬恩的教訓，背叛了以前一切堂皇的決議和宣言，以狹隘的愛國主義代替了國際主義，以國內和平代替了國內戰爭，在『保衛祖國』的口號之下，同資產階級一道把勞苦大眾騙上殺場，無條件地去充當砲灰。甚至當勞苦大眾從戰爭的苦痛中覺醒過來反對戰爭，進行革命的時候，這班領袖們還要盡力去加以抑制，破壞，最後并把羣衆自動取得的權利也還給資產階級（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德奧革命），直到使之重新安渡着資本的奴隸生活而後已。

我們姑且不說大戰前，即在戰爭發生之後，如果德奧英法意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能採取比較正確的政策去對付戰爭，我們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完全不同的，也許歐洲的社會主義聯邦早已成爲歷史的事實了。這從俄國布爾塞維克領導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布爾塞維克與一切機會主義者，一切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之唯一的區別，就在於前者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遵守了巴塞爾的宣言，在大戰中提出了并實行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因此將無產階級提上了政權。

由此，我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便獲得了幾個最基本的教訓：（一）戰爭只是帝國主義爲了重分世界，其一切悲慘的後果必然落在人民大眾的頭上，如果帝國主義存在一天，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二）避免戰爭的唯一方法，只有全世界的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實行聯合，用革命的手段去摧毀資本帝國主義的統治，走向社會主義；（三）當戰爭爆發時，實行『國內戰爭』是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痛苦的唯一途徑；（四）戰爭必然產生革命，革命勝利的先決條件是與一切機會主義者，一切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實行決裂，并與之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五）在戰爭中，如果革命不獲得全般的勝利，而只是某一派帝國主義獲得勝利，新的大戰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到來，人類也不可免的要遭到新的屠殺。

戰後的兩個路向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有兩個路向排列在全體人類的前面：一個爲凡爾塞和約所準備，另一個是俄國十月革命所指示的。前者是走向更大規模的新的大戰，而後者則企圖掘毀這個大戰的基礎。

凡爾塞和約及由此所產生的國際聯盟（以英法爲領袖），都從四面八方收集材料，替未來的大戰敷設軌道：一方面，既以兇殘的魔手將由戰爭所產生的革命火焰逐漸加以窒息，并把戰敗國與戰勝國隔離起來，剝奪其一切生存發展的條件（尤其是對於德奧），并在東歐，中歐和南歐人工地建立了許多『民族國家』（不如說是超民族國家，因爲每一國家都包含有幾個民族），使之互相對立，互相衝突，永遠糾纏不清；而另一方面，則毫無限制地增高關稅壁壘，割斷世界的經濟聯繫，使每個民族國家，尤其是缺乏殖民地的國家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日趨於死巷；此外就是以不斷擴充軍備來互相威脅，來保持『均衡』（所謂武裝和平）。這一切都十分明顯地表明所謂凡爾塞體系，只是在製造國際間的衝突，加緊新的大戰的到來。那些形形色色的和平會議，軍縮會議，關稅會議以及世界經濟會議等等，都不過是準備進行這個新的大戰之掩護物，或因懼怕大戰速發藉以權作緩衝而已。

與凡爾塞體系完全處於對立地位的，是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體系——蘇俄與第三國際。這個體系，不但爲世界革命，爲消滅戰爭，在理論上及策略上建立了一般的正確路線，而且在實際上在組織上奠定了一個有力的基礎。如果不是中途發生變化，牠的勝利的前途是十分有把握的。但非常不幸，自從那個偉大的導師列寧逝世後，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官僚保守主義以及狹隘的愛國主義等，都在這個體系中重新抬起頭來，并在克里姆林宮內攫取了無上的領導地位，逐漸地排除了老的一代布爾塞維克，因而不斷地葬送了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德國一九三三年的革命，以及最近西班牙的革命等等。這些革命中之每一個的勝利，都足以影響整個世界局勢的轉變。尤其是德國革命的勝利，立刻可以給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及其所準備的戰爭以無可抵抗的威脅。反過來說，正因爲這些革命，也特別是德國革命的失敗，讓特別好戰的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獲得了凱旋，這不但替帝國主義戰爭清除了障礙，而且還給牠樹立了一個主要的營壘——希特勒的第三帝國。

最後，克里姆林宮更以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或民主陣線與法西斯陣線的烟幕，將帝國主義正在加緊準備的大戰的實質，在全世界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面前掩蔽起來，以便戰爭真正到來時叫他們手足無措，任聽帝國主義者的擺弄。

至於戰後整個的第二國際黨，表面上還沒有公開放棄社會主義的招牌，而實際上却已完完全全地變成了凡爾塞體系的傭僕。牠的主要任務是：一方面務使歐洲每一個工人革命運動都歸於失敗，另一方面則用各種各色的和平辭令，粉飾新的大戰的進行。但不管在那一方面，牠都是與克里姆林宮所領導的徒黨分工合作的。

這樣一來，凡爾塞體系，藉着克里姆林宮獨裁者及第二國際之助，其所蓄意培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便完全成熟了！

歷史的重演

歷史現在正大開其玩笑，把一九一四年的悲劇，又向我們人類重演起來。

此刻歐洲所開始進行的戰事，不但本質上完全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是帝國主義強盜們爲着重新分割世界的大火拼，甚至在形式上，在敵對陣營的主要角色上，也是一樣（英與德的爭霸），不過把威廉第二換上個希特勒而已。尤其有趣的是，莫索里尼竟然也採取了基沃利蒂（第一次大戰初意國首相）的政策（當時莫氏極端反對這種政策），向他的同盟者宣佈起『中立』來！此外還有無數的小國，特別是操有決定權的美國，也同在一九一四年一樣，宣佈了『中立』。最後是格林武同着巴利特，萊翁·卜倫同着多萊士，也和當年的亨德曼，格德和山巴等一樣，完全站在狹隘愛國主義的立場上，宣言願爲他們的『祖國效忠』。

這一切難道都是偶然的嗎？絕對不是，這只是表明了我們現在的世界，特別是歐洲，在某些基本點上又回到了一九一四年的局勢。一方面是英法據有地球上絕大多數的較一九一四年更多的殖民地，絲毫不肯放手；另一方面從凡爾塞體系下掙脫出來并擁有高度生產力和強大軍備的德國之需要殖民地，更比一九一四年來得迫切。在這樣的情勢底下，除了採用一九一四年的手段來解決外，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呢？現在莫索里尼的意大利比基沃利蒂的意大

利在許多方面，特別是軍事方面強固得多。但由於牠那軍事上和薄弱的經濟基礎間之矛盾及其在地中海的不利地位，仍然迫使牠在嚴重關頭不能不採取『審慎』的態度，以便將來看風轉舵。小國，特別是歐洲的小國，牠們今天所宣佈的『中立』，多半是到明天被迫加入戰爭之一道橋梁。美國今日的『中立』，其用意也大概與一九一四年無甚差別，爲的是待時而動。不過美國心目中今日的對手，不是在柏林，而是在太平洋的彼岸。格萊武和萊翁·卜倫們今番的舉動，原是根據他們一貫的政治邏輯，舊調重彈，毫無足異。至於巴利特與多萊士現在仍然以『布爾塞維克』的名義來幹狹隘愛國主義的勾當，這對於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實在是一幅最惡毒的諷刺畫！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表示出一種特異姿態的是蘇聯。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光輝的產品，現在又臨到最後決定命運的關頭了！如果按照蘇聯創立者的本意，牠與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不可調和的，牠應當領導全世界的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發動國內戰爭來結束這次戰爭。但現時克里姆林宮的主人翁，早已把蘇聯當作了他與任何帝國主義國家進行交易的籌碼。昨天還在同他所認爲和平陣線的朋友張伯倫討價還價，今天却與他一向所詛咒的侵略陣線的魔王希特勒一下就成交了。雖然，蘇聯由此購得了一個『中立』的地位，可是牠也就因此變成了這次戰爭的直接推動者（如果希特勒不得到史大林在東方的保障，他還是不敢立刻發動這次戰爭的）。而且只要戰爭繼續發展下去，戰爭不受到革命的干涉，蘇聯的『中立』是沒有任何保障的，無論戰爭的勝利屬於何方，她所能得到的將是不可測量的災禍。

至於日本，現在也宣佈了『中立』。但牠今日的『中立』與上次大戰中的參戰，其目的完全一致。牠過去如果是用『參戰』來搶劫中國，則現在却是企圖以『中立』來保持牠在中國所已攫得的贓品。不用說，日本的『中立』是英國所極歡迎的，因此企圖爲結束中日戰爭的英日東京談判，很有在最近將來重新復活之可能。但最後決定問題的鎖鑰現在是握在美國手裏。如果英日在互相讓步之後，并進而以同樣的『讓步精神』向美國求得『諒解』，那我國就得首先成爲這次大戰之犧牲品！不過跟着中國犧牲而到來的將是日美的戰爭，也許日美戰爭就是這次戰爭史之最末一章吧？

戰爭的前途

戰爭現在還只算是行了一個開幕典禮。戰爭也像許多革命一樣，在開幕時把過去的歷史覆演一下，是不足為奇的。但如果戰爭繼續發展下去，而且將不可避免地繼續發展下去，則牠的前途一定會發生無數的變化。未來的這些變化，我們現在雖然不能一一加以預測也不必一一加以預測，但有幾個主要傾向是可以估計的。

第一，這次大戰如果任聽其發展下去，其廣度與深度都將遠遠超過上次大戰。因而其對於物質的破壞，對於財富的損害，對於人命的犧牲，對於整個文明的威脅，也將比上次大戰劇烈得多。

第二，戰爭如果不受強有力的革命的干涉，不為革命所轉變所結束，必然是一個集團戰勝另一集團，並且失敗的，大概是在希特勒方面。但勝利的英法要想保其原來的地位，要想獲得像上次大戰後的那種特權，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整個的歐洲將倒退若干年，全世界將受美國財政魔王的殘酷支配，第三次世界大戰又將在新的基礎上被準備起來。

第三，如果大戰發展到東方，日美戰爭成為事實，那時日本的命運不是蹈襲上次大戰末的沙俄，就要追隨霍享索倫的德國。最後，或許美國也將被他自己的勝利所吞滅。

第四，但在另一方面，正由於這次大戰之破壞力特別鉅大，其可能加於人民大眾的痛苦和犧牲將特別深劇，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之反戰的革命運動，將跟着戰爭擴大，深入和延長的比列發展起來。起初大約是在失敗的國家，隨後將蔓延到勝利的國土乃至中立國方面去。到某一時期，革命戰爭與帝國主義戰爭，將交織成爲最奇異的畫圖，類似一九一七——一八年的局勢又將在我們面前顯現出來。

總而言之，這次的戰爭如果不爲革命的勝利所結束，便必然是一個營壘擊敗另一個營壘，再替第三次世界大戰留下基礎。所以現在擺在全世界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面前的問題是：革命是否在戰爭中有獲得勝利的可能，以及怎樣去準備和爭取這一勝利。

如果單就目前的現狀看來；就近十餘年來因各國革命運動不斷失敗所造成的反動局勢與羣衆的消沈狀態看來；就第二和第三兩國際之公然放棄國際

主義，自願爲『保衛帝國主義的祖國』而叫工人去流血，這種可悲的現象看來；最後，從蘇聯之可怕的墮落看來——革命勝利的前途似乎不可過份樂觀。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的腐爛已達到了極點；人民大眾的痛苦久已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不論是民主主義或法西斯主義，都被事實證明無法解決當前的歷史問題；廣大的民衆雖還停滯在消沉的狀態裏，但不滿於現狀和尋求出路的潛意識是在暗中生長，而這次戰爭的痛苦將更會助進這種生長；保衛祖國的毒素，雖在戰爭初期會在羣衆中佔着支配地位，但隨着由戰爭所必然產生的苦痛與犧牲之加深，將日漸消逝而形成一種完全相反的潮流；蘇聯的上層建築雖已墮落到了無可挽救的腐朽程度，但牠的下層基礎還包含着異常宏大的革命活力，這力量一遇到機會，便大有可能重新抬起頭來；兩個舊國際雖是澈頭澈尾地破產了，變成腐屍了，並正在妨礙活人的行動，但新的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已經建立起來了。牠手頭掌握有馬恩列的全部遺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切經驗，以及戰後一切革命運動失敗的教訓——這一切的一切，不但足以證明革命將在戰爭的狂潮中挺起，而且還給牠的勝利造就了最基本的條件。不過最後說來，一切問題將取決於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努力，尤其取決於其領導者的奮鬥精神與正確指導。

『敵人在你們的國內』（李卜克耐西），『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列寧），這是全世界一切被剝削者被壓迫者今後在戰爭中活動的唯一的指南！

『反對一切調解陰謀』，『反對任何妥協運動』，『把抗戰支持到底，把我們的抗戰同全世界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之反戰的革命運動緊密地聯繫起來，把我們民族解放的命運與整個人類解放的命運有機地聯繫起來』，這便是我國民衆今後奮鬥的唯一路向！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曾把羅曼洛夫，霍享索倫及哈布斯堡三個王朝釘上了十字架，並將俄國布爾喬亞的統治放進了歷史博物院，則我們相信：像這類的喜劇將有可能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更大規模地更生動地表演出來！

『嚴冬既屆，春天當不在遠！』這是我們對於現階段歷史的信條。
全世界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聯合起來！勇敢，堅決，奮進，用革命去答覆戰爭！

第二次大戰與中日戰爭

梁石生

第二次大戰已在歐洲爆發，這次戰爭在規模上將遠較上一次大戰為大，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都不能避免這次災劫，因為一九一七年後，整個地球各部分間的連繫已通過經濟的紐帶，來得更緊密了。遠東是世界列強衝突的第二中心，同時也是這次大戰的第二戰場，這個戰場上已發生了兩年多的前哨戰——中日戰爭，歐戰爆發後，究竟在地球上引起什麼可能的變化呢？尤其是，對中日戰爭的影響如何呢？這個問題，我相信是每一個中國人急於要知道的。我現在簡單的把這個問題檢討一下，首先我想談一談上一次大戰對遠東，尤其是對中國的影響。

第一次大戰與中國

我們知道，在前一次大戰之前及當中，遠東列強的主要衝突是英、日、俄間的衝突。當時沙俄利用她的跨越歐亞二洲的優越的地理位置，在西方向君士坦丁堡和巴爾幹各國伸手，在近東向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進迫，在遠東則極力經營滿蒙，甚至還侵入朝鮮。沙俄所採取的向外侵略的路綫，首先大大威脅了英國，因為英國一向便視近東和中國為印度的外府。其次便威脅了那個年富力强的日本，沙俄在滿蒙和朝鮮的活動簡直在掘毀這個東方小帝國的命根。至於英日中間的矛盾，當時還非常微弱，日本還沒有力量來和大英帝國相拮抗。美國也正在生長中。這樣便決定了英國的政策：她寧願培養日本來對抗威脅整個亞洲的沙俄。英日同盟的主要動機就在這裏。但自一九〇四年俄國戰敗以至一九一七年大戰爆發，英日俄在遠東的矛盾大緩和，英、德的矛盾已遠超過英、俄間的矛盾，而且俄國爲了對抗德國在巴爾幹的活動也迫得站到英法方面，結果，戰爭沒有擴大到遠東方面來。英日同盟固然使日本盡了英國看家狗的作用，但也給了日本飛揚跋扈的一個無上機會。

中國當時的處境是非常有利的，只須全體民衆武裝起來，把日本打倒，

中國便可順利地取得獨立，因為西歐列強絕沒有能力干涉我們。但中國的北洋軍閥政府一開始却宣布『中立』，結果日本利用英日同盟的密約，利用參戰國的名義，佔領了青島和膠濟路，并乘機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件。後來中國又在美國威爾遜的慫恿之下，放棄『中立』，參加戰爭。這件事引起國內輿論猛烈的爭辯。以段祺瑞爲首的北洋政府堅主參戰，他們認爲參加英美方面作戰，很有勝利的把握，因爲『公理戰勝強權』，只要『公理』一勝，中國便可以拿戰勝國的資格，與列強同儕平等，使中國得到公平的地位。這一派代表舊官僚軍閥的利益，他們想利用參戰來博得英美的借款，以便壓平國內的反對者，鞏固他們自己的地位。但以孫中山爲首的南方政府却極力反對參戰，主張嚴守『中立』，他們認爲中國正應利用這一僅有時機，埋頭建設工業及整飭內政，不應盲然捲入戰爭漩渦。這一派當然是代表一般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見解。結果，前一派勝利。中國參戰不久，歐戰便告結束。中國和英、美、法、意，日同儕於戰勝國地位。但巴黎和會立即打破中國的幻想，他們不但沒有同情中國，甚至還根據英日同盟的密約來措置一切。所有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通通加以保留，德國的利益簡單地移給日本。中國除了得到一塊公理戰勝碑外，什麼也沒有得到。但當時的『中立』論也不見得比『主戰』論高明得很多，日本爲了滿足她的野心，她早在一九一四年戰爭剛起時就破壞了中國的『中立』。可知『中立』的盾牌并不足以抵禦任何強國的乘機侵略，而且假如不讓民衆及時武裝起來，把一切壓迫中國的勢力肅清，又怎能保證我們將來不受人家更悲慘的壓迫和瓜分呢？要想真正從強人們的混戰中『中立』開來必須藉助於民族獨立的革命戰爭才有可能。

以上便是我們從上一次大戰中得出的悲慘的教訓。

戰後遠東列強勢力關係的變動

一九一七年大戰告終之後，遠東列強的勢力關係起了極大的變化，首先

是沙俄場合，產生了一個社會主義的蘇聯，她用另一種姿勢，另一種政策來威脅亞洲各帝國主義的利益；這種政策就是援助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其次在太平洋的彼岸又勃然生長出一個山叔叔（美國），他在上次大戰中的投機積累了無比的財富，一躍而成爲世界霸主，與英國這個老霸主作正面衝突。他之經營亞洲較之沙皇更可怕，更難忍受，因爲他用的是銀彈而不是沙皇的刺刀，歷史上往往證明，金錢比之刺刀還要厲害。英國在這種可怕的威脅之下，企圖保持英日同盟的武器來對抗兩個新敵人。但有兩個原因使英日同盟破裂。第一，美國絕不容許英日獨佔中國市場；第二，日本在英國的保姆政策之下已羽毛豐滿，她已不滿足英日同盟的舊限制，她要英國作更大的讓步：讓日本獨佔中國，亦即，獨霸遠東。而美國在華盛頓會議上之能够順利地拆散英日同盟，與其說是利用壓力，還不如說是利用英日間這種新的緊張的矛盾。

現在遠東各強國間的關係非常明顯：美日兩國都懷着犧牲英國，獨霸遠東的決心，因此從歷史的，終極的意義上說來，在太平洋上日美衝突佔第一位。英國出於自衛的本能必須在一羣仇敵間選擇較好的友人。她仍不忘情於日本。因爲日本雖然野心很大，但她的貧弱的經濟基礎限制了她的發展，而且亦是她不能不獲得一個富強的與國的原因。英國最近幾年來便一貫想賄買日本，想把中國一部分利益割讓給她，使她成爲英國反蘇反美的友人，換句話說，就是想重溫英日同盟的舊夢。但可惜由於上述兩個基本原因，英國的舊夢始終做不成，而且還助長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氣燄。蘇聯與帝國主義各國間的衝突是世界性的，但這個衝突的緊張性已給民族保守主義的外交沖淡了，她已逐漸從獨立的因素變成了附庸的因素，她先是隸屬於張伯倫——達拉第的『和平』政策，現在又隸屬於國社黨的戰爭政策。她在遠東正在日美之間找尋同盟者。

中日戰爭與列強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才能了解最近幾年來圍繞着中日問題，遠東列強間的關係以及這次歐戰在遠東引起的可能的變化。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佔滿洲不僅表示日本開始用武力爭奪中國的獨佔權，同時也表示她趕快造成未來日美戰爭的有利的戰略地位。美國當時的焦急，

主張援引九國公約制裁日本並堅持不承認主義，並不是偶然的。但英國却淡然置之，這件事後來證明原來日本之攫奪滿洲是首先得到英國默許的，這完全是英國反蘇反美政策的繼續。後來日本順利地佔領滿蒙之後，又進一步侵略華北，并向中國政府提出獨佔中國的條件，天羽聲明，就是日本想吞併中國的露骨表現。這個時候，蘇聯恰好已轉向國聯，美國受了上述的教訓，也改取了靜觀的態度，并埋頭於龐大的備戰計劃。現在英國直接遭逢日本的威脅了，她已知道這個羽翼豐滿的小帝國要向她索取無饜足的代價了。英國爲了對抗她，便一面加緊培養中國，幫助中國統一了金融，軍事和政治的機構，想加強中國政府來遏止日本的進攻，一面又派遣代表和日本講價還價。但在英國做這件工作的過程中，她不僅碰到美國競爭的障礙，並終於引起了中日戰爭。在中日戰爭中，英國迫得與日本處於正面對立的地位。但英國的唯一目的並不是想摧毀日本，相反的，她不過想藉助於戰爭來屈服日本，使日本減低她的野心和要求，以達到英日妥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解釋英國何以一面支持中國抗戰，一面仍不放過任何時機，希圖和日本重新談判。但每一次妥協企圖都因爲日本的過度要求和美國的強硬的干涉態度失敗了。最近張伯倫在歐洲受了希特勒的威脅，迫得對日本作空前未有的讓步，東京英日會議的初步協定已表示英國有犧牲中國以促成英日携手的決心，但跟着來了美國的廢除美日商約。美國這次干涉，不僅鼓勵了英國的輿論，而且還博得了中國莫大的同情，因此又使這次英日談判陷於停頓。

第二次大戰對中日戰爭的影響

英日談判剛受打擊，德蘇協定簽訂了。德意日的防共公約失去了根據，日本所唯一依賴以牽制英國的與國——德國也失掉了。這件事立即引起日本內閣的改組，并撤換了一批德意日同盟的外交官，穩健派打擊了少壯派。但日本在外交方面正開始轉換，歐戰又爆發了。一切的變化竟急激到這樣的程度：使整個日本的參謀部陷於極度焦急和苦悶的狀態。根據目前一般條件推斷，英國已被希特勒握着了雙手，她只有繼續對日本讓步，日本爲了解脫她的孤立的地位，爲了獲得一個喘息的機會，來應付一個迫近的危機，她此刻比之任何時候都渴望和英國妥協。但過去許多事實教訓日本，使她知道橫在英日妥協中間的最大障礙是美國，假如日英要想携手，她們只有互相向

美國低首，否則戰爭。英國憑上次大戰的經驗，她不能失去美國的幫助，因此她多份要首先求得美國的諒解才能決定她對日讓步的限度。現在問題歸結到日美能否取得暫時的折衷點。我們說『暫時』就是說日本的『東亞新秩序』與美國的『門戶開放』根本不能作長久的調和。而日本要想取得美國的『諒解』首先還要尋求有利的戰略根據地（多份要拉攏蘇聯）而且還要觀望歐洲戰爭的發展，她大致不會馬上發動戰爭，那末英日的暫時的妥協是很有可能的。但事變的發展却往往出乎帝國主義者本身的戰略上的計算之外，最近美國的緊張的戰爭狀態和屢次聲明『美國的重要權益在遠東』顯然又表示她不願意讓一分喘息機會給日本。假如日本不能爭得英國的善意的幫助，她只有採取第二等的後備政策：和蘇聯携手。

雖然現在遠東各國的外交關係仍是混沌的一團，但日美戰爭無疑的將構成這次大戰的第二階段。中日戰爭假如不受英日妥協的叛賣，牠就不可免要捲入這次世界的洪流中了。

中國抗戰的出路

在這樣的局面之下，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在這一次戰爭中，中國所處的地位較之前一次更危險。我們已受了日本兩年多的蹂躪，大半土地都已落入敵人手中，抗戰已轉入不利的局面。我們要脫出這個困難的危境，我們更應小心和勇敢。現在我們聽到許多人在談『中立』和『參戰』問題，這正如我們在上一大次大戰中所聽到的一樣。關於『中立』問題，現在只有那些最愚蠢的無出路的『和平』派才敢談得最起勁，這些人認為和日本妥協便可以取得『中立』的地位，埋頭於建設中國。這就等於托庇於敵人的屠刀下過生活，也等於在大屠殺中闢出一個樂園來。這不僅是有害的幻想，而且還是有意欺騙中國人民，讓他們於未來日美戰爭中作日本的砲灰。其實中國這一次比上一次更難守『中立』了。有些人隱約主張援助『民治國』，甚至主張參戰。這當然又是自甘重蹈段祺瑞的覆轍。這一次不過把『公理』換成『民主』吧了。有些人又對美國起莫大幻想，認為日美戰爭既然不可免，我們正可利用美國來打擊日本，可惜他們也忘記了第一次參戰的教訓了，當時美國威爾遜何嘗沒有說過援助我們獨立的話，結果怎樣呢？美國將來和日本作戰正是爲了爭奪中國，我們不能依賴於某一侵略者來反對另一侵略者啊！總之

我們有了上一次的教訓，便再也不應該上當了。我們并不反對利用人家的矛盾來取得自己的獨立，我們也不反對接受人家的幫助，但我們要想澈底解放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只有發動全民的武裝鬥爭，支持抗戰到底才是我們的出路。

窘態畢露

譯自密勒氏評論報

紐約泰晤士報駐華記者阿盆特君，最近在美國最流行的一本雜誌星期六晚報上撰一文，描寫日本的一般情形，頗可供一切想了解日本實情者閱讀的。

在開頭的一節裏，阿盆特君說：目前日本共有陸軍病院一百九十三家，每家有三百多張病床，『在那些日子，所有床鋪都躺滿了從中國前線送回來的傷兵。』

上海虹口有日本人四萬二千人，那裏的人揮金『如流水』，而日本則『禁止一切娛樂……舞場關門，私人跳舞或慈善舞都被禁止……住有七百萬人的東京，一到夜間十點鐘就死寂了。』

軋士林嚴格限制，每車每月祇准購買十二加侖——這並不是因爲難於買到這種燃料，而是因爲很難弄得外匯來付錢……威士忌酒二十四圓一瓶，較好的牌子還要貴些。至於外國貨的烟草，香烟，那即使出極高的價錢也還是不能買到。

在他的文章裏，阿盆特君說：雖然全日本祇有十七萬頭牛，但在六月間，我們已經見政府在計劃輸出牛油和牛酪了。雞蛋也出口，實際上全國已不吃這種食品了。後來他又告訴我們一位大學教授——極有學問的——家裏的菜單，他月薪祇有六十圓。這位特殊的教授有一妻兩孩。他們日常的茶單如下：

早餐：飯與鹽蘿葡

午餐：魚湯，跟手指差不多大的一塊魚，飯與煎白菜或類似的蔬菜。

晚餐：又是飯與鹽蘿葡。

德蘇協定引起了世界大戰

育才

九月三日，希特勒發表告德國東疆士兵書道：『德蘇兩國今已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是即歐洲兩大強國現已聯合一致，兩國民族不致發生敵對行為，此可告慰於吾東疆陸軍全體士兵者。』又告西疆士兵書道：『德蘇簽定互不侵犯條約，已使我國無東顧之憂。』

德蘇商務信用協定與互不侵犯條約之訂立，幾乎是與希特勒的侵略波蘭之軍事動員同時進行，這點事實本已使人相信德蘇協定是第二次歐戰爆發之促成者；現在由希特勒自己的話看來，他在字裏行間，對於德蘇條約成立所表示的慶幸與安慰，證明了該條約不僅是這次大屠殺的促成者，且是爆發牠的主要關鍵之一。

平時，一般人都認為莫索里尼是希特勒的可靠盟友，並且事實上他們也已訂定了德意軍事同盟的協定。但是當希特勒的砲車剛侵進波蘭走廊時意大利却以毫不客氣的口氣宣佈了中立。法西斯國家間的這種內幕關係，一般人事先容或不知道（我們早已指出，戰事一起，意大利不見得幫助德國。參看上期本刊『世界動向』），但希特勒與張伯倫是很清楚知道的。所以，假使史大林不與希特勒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則至少英法蘇三國聯盟對付德國一國的可能要一直懸掛在希特勒的想象中，這樣，具有準確敏銳的侵略本領的希特勒，就決不敢以一國冒險敵對歐洲三個最大強國了。然而史大林却竟與希特勒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使希特勒失去了『東顧之憂』，敢大膽地西邊敵對英法聯軍，而東方蹂躪波蘭，於是展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

不僅促成大戰而已，德蘇協定還在物質上援助了法西斯德國的侵略。德蘇商務及信用協定中，規定一方面德國給與蘇聯二萬萬馬克的信用放款，用以向德國購買各種工業機械，另一方面，蘇聯須以農林產物、原料、石油等售與德國。就前一方面說，該協定的訂立是史大林使法西斯德國獲得了一個橫跨歐亞兩洲的廣大市場，因而緩和了德國內部的經濟恐慌；就後一方面說，是史大林以蘇聯的農林礦產的原料加強希特勒的侵略力量。因此，在今後的長期歐洲戰爭中，希特勒豈但無東顧之憂，還可以依賴社會主義國家的原料倉庫來長期進行侵略戰。這樣物力援助，當然更增加了希特勒侵略的大膽。

而且，德蘇協定之幫助希特勒侵略，還有更甚於此的。互不侵犯條約的第四條道：『任何集團，凡不利於簽字國一方者，其他一方不得出而參加。』這一條的意義，引申之可以成爲：如果法國羣衆於此次歐戰中握得了本國的權力而威脅到法西斯德國時，蘇聯預先答應絲毫不援助他們，而只能援助侵略波

關於德蘇協定的東鱗西爪

木君

『據說是反動派的謠言』

『反動分子公開在造謠，說蘇聯爲要打擊張伯倫，彷彿可以和希特勒攜手的。但是蘇聯國內正在剷除叛國的希特勒的好細（即歷次莫斯科審判案的報告），使他們再不能從事破壞，間諜與轉向法西斯的工作。人們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即使那些仇視社會主義國家的人，也不會相信這個謠言。』

——勃勞特，美共黨首領，見其本年八月出版之『爲和平而戰。』

『神話』

『……尤其從李維諾夫辭職之後，一般人對於蘇聯外交，有意地或無意地作種種不正確的懷疑和推測，甚至像「蘇聯將與德國攜手」，「蘇聯不贊成集體安全制」這一類的神話都聽到有人說過……

『從莫洛托夫的演說中，是不是可以看出蘇聯外交有什麼新的轉變呢？一點也看不出來……

『一切對於蘇聯外交的懷疑……都由於對蘇聯外交立場的認識不足，或者是故意曲解……

『莫洛托夫演說中提到德蘇商業談判，這是給英法一個刺激。要是因此以爲蘇聯有與法西斯國家合作的可能，那就等於把侵略陣線與反侵略陣線完全無視，和蘇聯的外交的根本立場正相反對的。』

——胡愈之，見譯報週刊第十期，對於蘇聯外交應有的認識。

蘭亦即初步侵略蘇聯的希特勒！這難道與蘇聯建國的原則相符合的嗎？然而這是所謂『鐵一般』的事實呢。這條條文是蘇聯當局於促成了大戰，物質上援助了希特勒侵略之外，又保證了不參與任何不利於法西斯希特勒的革命運動！

二

對於這使一般人驚異並促成人類大禍的德蘇協定之締結，克蘭姆林宮的人們怎樣辯護呢？莫洛托夫，於八月底在蘇聯最高議會上，發表關於締結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演說云：『蘇聯之與德國締結此項公約，其最初決定係在英法蘇軍事談判因上述不能克服之爭執（英法談判態度不誠實所召致的）而陷於僵局之後。吾人因談判經過已表明互助公約之締結已屬無望，乃不得不探覓其他保障和平及消滅德蘇戰爭危機之可能方法……吾人之責任在於考慮蘇聯民衆及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之利益（持久鼓掌），尤其因吾人深信蘇聯之利益乃與各國民衆之基本利益相符（鼓掌）。』（塔斯社莫斯科電，中美日報所載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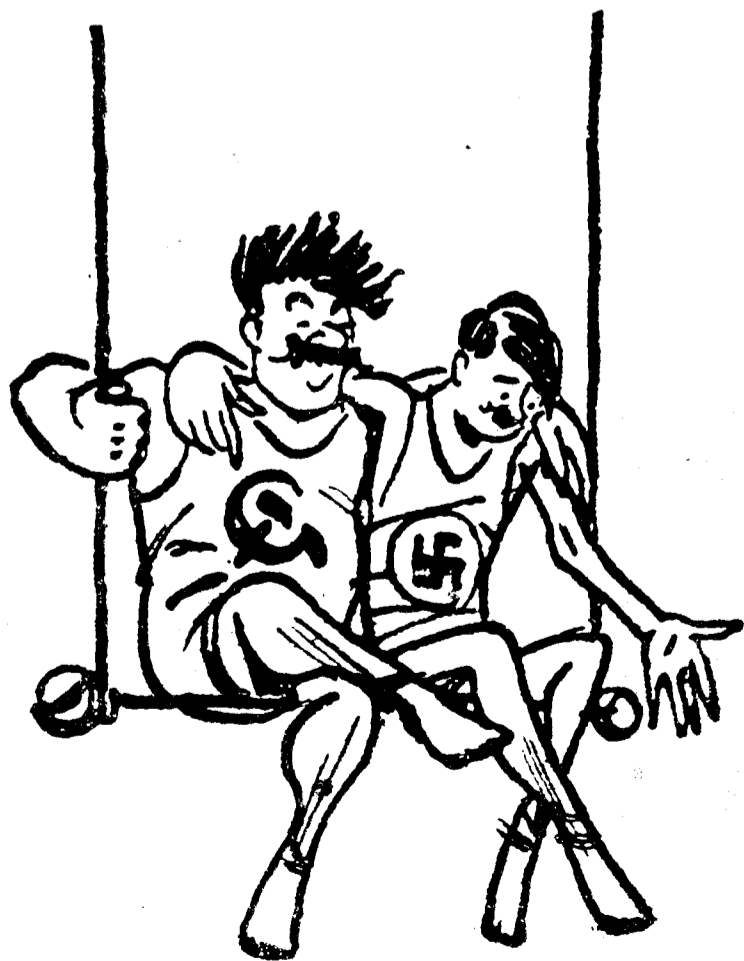
締結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最初決定係在英法蘇三國談判陷於僵局之後』。莫洛托夫是在說謊！事實上在三國談判還未開始之時，進行『民主陣線』外交的李維諾夫之突被撤職，就是表示克蘭姆林的外交政策之將由聯合英法而轉向聯德。再就五個月以前史大林的言論看來，也可以看出締結德蘇協定的最初決定，決不在於三國談判陷於僵局之後。

三月初，史大林在聯共第十八次黨大會上作長篇報告，詞句之間，就已充分表示出疏英法而親德的意思，他輕輕地把『侵略者』的帽子從希特勒頭上取下來送給張伯倫，把一向主張組織民主陣線以對抗侵略陣線的理論，拋棄得乾乾淨淨，而宣布了如下的蘇聯外交政策：第一，蘇聯主張和平，只要別國不侵犯蘇聯，蘇聯即與別國維持『事務性質的關係』，這就是說不管主義相差多麼遠，都無礙於關係之建立；第二，對於鄰國維持友誼關係，如果此類鄰國不侵犯蘇聯。這顯然是向希特勒求愛的姿態。就是後此五個月的德蘇協定之『最初決定』，也就是後此一個多月李維諾夫所以突被撤職的預告。所以，德蘇協定的成立，決不是由於英法蘇三國談判之『無望』，決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克蘭姆林宮的外交政策之有意識的轉變，是他們高唱了多年的陣線論，完全破產後的必然結果。繼續三四月之久的英法蘇三國談判，不僅不是德蘇協定成立的主因，反而是史大林遮掩德蘇談判秘密進行的幌子。

三

德蘇協定成立之後，一切陣線論者今後將怎樣去舊更新，以圖附貼莫斯科的新理論，這點我們在本文內暫且不談。這裏只談一點：莫斯科爲什麼一定要訂立德蘇協定？爲什麼不惜促成世界大屠殺而一定要訂立這個協定？

『誰說這是神話？』



——字林西報

『平常的事情』

『德蘇已訂不侵犯條約了。中國一部分淺狹的人，大家都奇怪驚愕起來，其實，這是一件政治上極平常的事情。』

『關於德蘇諒解攜手的預言，一二年以前托羅斯基輩早已撰文論及。』

——陳喬堂，見人世間第三期：從德蘇協定講起。

『必如何乃可並行不悖？』

（哈瓦斯社巴黎三十日電）法國共產黨領袖即該黨參議員加香（Marcel Cachin），日昨函達社會黨黨魁勃魯姆，聲明德國倘向法國宣戰，該黨黨員咸當起而保衛祖國。此函頃由社會黨機關報人民報予以轉載。內稱：『法國若果遭受侵略，共產黨黨員即當立于抗戰第一線，以捍衛國家。日來政府因保障邊境安全，並因幫助有受侵略危險及與我人締』

莫洛托夫依照史大林的意思而回答說，是爲了『和平』，爲了『消滅德蘇戰爭危機之可能』，又解釋說是爲了蘇聯人民的利益，亦即爲了各國人民的基本利益。但是任何國人民的最基本利益，莫過於生命的安全，而德蘇協定事實上是把歐洲，並且不久還要把全世界的無數人民送上互被屠殺的邊緣，這樣而說協定的締結是爲了各國人民的和平與利益，有誰能相信這樣的謊騙？

因此，根據莫洛托夫的回答，結論便剩了一個：德蘇協定的締結是爲了要保持蘇聯一個國家的『和平』，至於別國是否會因此而發生大屠殺，那並不在莫斯科當局的顧慮中；協定的締結是爲了要『消滅德蘇戰爭危機之可能』，至於世界是否會因此而引起大災難，那與莫斯科當局不相干。這才是合乎事實的答覆。這事實表明史大林除了利用別國民衆以圖保全他所統治的蘇聯外，其他一概不顧。在以前（一九二八年起），當歐洲各國的共產黨很有勢力可被利用時，他經過第三國際而命令牠們盲動，結果當然是個個都失敗了。等到德國共產黨，第三國際的第二個強大支部，被法西斯勢力摧毀了時，他便轉想與英法的統治者聯合來抵擋法西斯洪流，因而提出了組織民主陣線以對抗侵略陣線的理论，陣線論便成了神聖的指導。但這理論非但不能打擊法西斯，反而在西班牙絞殺了工農羣衆的革命，幫助佛朗哥上台，在法國替『二百家族』鎮壓了一九三六年可怕的罷工，結果請準法西斯達拉第來實行了獨裁。同時在國際的範圍內，讓希特勒的勢力駸駸日強，既吞併了奧國，消滅了第三國際在歐洲的重要支部之一，又吞併了捷克，消滅了牠在歐洲的另一個大支部，且已逼近了蘇聯的邊境。史大林這時候怎樣辦呢？要保持蘇聯一國的和平嗎？然最威脅蘇聯安寧的無過於希特勒了。要聯絡英法以對抗希特勒嗎？然幾年來得史大林的陣線論之助而鞏固了基礎，因而受不到革命壓迫的英法統治者，決不會真正援助蘇聯，並有唆使希特勒東侵，使蘇聯首被犧牲的可能。於是史大林祇有不惜犧牲蘇聯國外的一切，一切民衆組織，一切『神聖』理論，以與希特勒維持『和平』了。這就是莫斯科所以要訂立德蘇協定的原因。

造成莫斯科當局這樣地步步退出歐洲國際政治舞台，以至於成了埋頭駝馬的那個基本理論，就是一九二四年以來史大林所一貫奉行的『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論』。

四

現在，我們姑且再退一步來看，究竟德蘇協定能否保證蘇聯『一國社會主義』的和平？如果是能夠的，那總還不失爲一個自保的政策，然而事實就會證明，這不過是一種幻想吧了。在生產力業已發展到四海一家的時候，無論那一國想對大戰保持孤立的和平，實質上只是鴛鴦。在這方面，『社會主義者』史大林的見解甚至還不及帝國主義者羅斯福。

其實史大林自己又何嘗不知道此種和平之不足恃？莫斯科目前調動大軍四百萬，雲集西疆，在一方面固然有對波蘭作領土要求的意思，而最主要的，還是因爲希特勒大軍壓境，恐有轉變成西歐列強聯合進攻蘇聯的危險。

有同盟條約之國家所採取之措置，本黨加以贊同。……最後，我人宣佈，法國全體人民實有團結一致，以擊退製造戰爭者之必要。」

勃魯姆于函末綴以評論云：『共產黨此種莊嚴宣言，必如何乃可與德蘇兩國所簽訂之互不侵犯條約並行不悖，此乃該黨自身之事。但此函與其只公開於我人範圍內，不如兼公佈於法國國境以外之爲佳也。』

——見八月三十一日中美日報

『中共改變對德態度』

『中共著名領袖毛澤東，多年來第一次主張改言中德關係，惟以德國停止對日幫助爲條件。此種意見包含在毛澤東的一篇文章中，該文係評論歐洲戰爭及其對中國的可能影響者，載於重慶出版之新平日報上。』

『此時以前，中共雖不斷重覆政府以日本爲中國唯一敵人的意見，但他們繼續把德國當作『日本的幫兇』來攻擊。然自德蘇協定之訂立，此種攻擊已大大緩和，甚而已停止了，故毛氏言論實無足驚異。』

——譯自九月七日英文大美晚報

『德蘇協定打擊日本』

『今晨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對於德蘇間所締結之互不侵犯協定，表示滿意；然該報歷來乃攻擊國社黨德國之最兇猛者。』

『據該報云，此項協定乃蘇俄外交的一個最重大的勝利。一方面使俄國可免除德國的威脅……』

『另一方面，該協定予日本以嚴重的打擊，絕對』

那末他爲什麼明知不可恃而竟與希特勒簽訂協定，並供給他作戰的原料呢？這就所謂無可奈何，自食其果。是『一國社會主義』的必然結果。

本來根據蘇聯的一些創造者的意見：工人國家與資本國家是不能長期並存的，如果蘇聯不能盡其所能去援助並推動各國工人及弱小民族起來顛覆資本制度，那末各國的資本統治必然要從蘇聯的內外去顛覆工人的統治。但史大林却放棄了這個基本立場，以爲『社會主義並不是輸出品』，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繼續存在，也不會妨礙蘇聯一國內部之建設社會主義。結果則各國的革命先後失敗，而資本主義却從蘇聯的內外向十月革命的勝利品進攻了。在國內，老一代的布爾雪維克悉數被殺，代表資本主義分子的官僚層代替了工人的統治，唯一進步的生產工具之公有制，也正在遭受威脅了。國外呢，資本國家遇到了嚴重的危機，各自要從戰爭中去尋找出路，但在他們覓取解決方案的努力中，無一次不會提出犧牲蘇聯的計劃。這時，史大林在恐懼之餘，乃不得不對最直接或最強橫的希特勒屈膝，並以物質援助及精神上的聲援來換取不可必的『和平』了。所以我們說德蘇協定是史大林自食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之果，是無可奈何的一種自欺。

當客觀情勢迫切地需要之時，蘇聯自不妨，而且也應該與資本主義國家簽訂協定，這在蘇聯的外交史上，已經不乏先例。最有名的有如一九一八年對德國霍亨索倫訂立的布列斯脫的屈辱條約。但每次簽訂這樣條約的時候，如果我們稍稍研究俄國革命的歷史，那可以知道：蘇聯當局總要考慮到下列條件：（一）對國際革命有何影響？（二）是否於蘇聯有利？（三）條約的壞果能實現到何種程度？（四）如何可使蘇聯所持的主義不受影響？

就拿布列斯脫條約來說吧，關於上述四個條件，列寧是這樣地考慮到，而且做到了的：（一）爲要暴露帝國主義的貪婪兇惡，並使各國革命分子知道蘇俄新政府不得不簽訂屈辱條約起見，蘇俄代表團曾盡量利用和會的講台，從事反戰反軍國主義的宣傳，並竭力爭持至最後一瞬；（二）新生而疲乏的蘇維埃政權，由此可得一必需的喘息機會；（三）即令最壞的條件，也都無損於蘇俄，因德國的工人已在敲統治者的門，不久霍亨索倫朝倒台，那條約就會等於廢紙的；（四）簽訂條約後，更加緊反帝國主義的宣傳與行動，決不會把威廉第二描寫成『和平之友』。

但是現在德蘇協定的情形如何呢？對國際上的影響，牠驅英法工人至法西斯愛國主義的翼下，驅德國工人入希特勒的魔掌，並直接引起了大戰；對蘇聯的益處呢？只是使蘇聯和平更受威脅；至於協定的壞果，則完全幫助了各國的法西斯；最後，就牠對蘇聯所持的主義而論，那末牠竟使蘇聯立刻停止了反納粹的宣傳與鬥爭。

對於這樣的一個協定，每一個愛護蘇聯的人，大概都不得不爲之嘆息的！

九月十三日

於中國有利』。

——八月二十四日，路透社重慶電。

『原來又並不對日』

『據此間官方今晨宣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與日本大使東鄉茂德談判結果，蘇日兩國，已簽訂停戰協定。』

——九月十六日海通社莫斯科電。

『沉默的悲哀』

『今晨新華日報對塔斯社所發表之莫洛托夫宣佈蘇聯軍隊攻入波蘭之演說，竟未載一字，說者謂該報此舉，蓋恐登載後將引起華人尤其中國共產黨之不良印象……』

——九月十八日重慶電。

兩種相反的外交方式

木君

『政府廢除秘密外交，在全國之前，表示牠要在人民的鑒臨之下來進行一切談判的堅定的決心，而且立刻要把地主及資本家政府從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十一月七日簽訂的秘密條約，全部公佈。』

——列寧：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上關於和平的宣言。

『此次德蘇協定之簽訂，不僅出乎一般民衆的意料之外，甚至對於政府高級官員，事先似亦茫然。』

——見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路透社莫斯科通訊。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文學的預測

野老

先回憶一下上次歐戰中的作家

上一次的世界大戰，不但使地圖變色，也使文學變色：許多在歐洲著名的作家都跟着凡爾登底砲聲翻起了筋斗，不惜把自己原來的作品撕毀，而以另外的一種面孔出現。——那時最著名而又最典型的人物，在德國便是霍卜德曼和德美爾（Demmel）的一流，在法國便是艾兒委（Gustave Hervé）的一流。

霍卜德曼是誰都知道的偉大的『織工』的作者，而且剛在大戰的前一年給德意聯邦百年紀念寫了一篇祝祭劇，因為沒有歌頌愛國主義，還碰了政府底釘子的，然而一到了大戰爆發，却竟然搖身一變成了爲本國訴『正義』的巨人：他聯合了九十三個文學家，藝術家，思想家，發出署名的宣言，把德國『不能不作戰』的大道理向全世界吹了一通。德美爾是一向被稱爲『愛人類的詩人』的，他底象徵的詩歌確是沒有爲愛國主義做過喇叭，然而一到了大戰爆發，也竟然搖身一變，寫出了他有名的『戰頌』（「Schlachtenlied-er」）和『旗頌』（「Fahnenlieder」），同時也參加了九十三個的署名。艾兒委在法國一向的地位更加特別：他是轟動了很久的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反戰的老手，不但曾經使法國底各種刊物上流行了『艾爾委主義』（Hervéisme）一個新字，而且還爲了自己底思想被控告，被逮捕，被收監；可是一到了大戰，他却出人意料地成了一個固執的，頑強的，極端凶暴的愛國狂者了。

此外，集合在愛國主義下面的作家，那時真是多得叫人沒有法子統計。出名的人物，我們還可以舉出：在德國有擺佐爾德（Petzold），荷爾支（Arno Holz），諾陶生（Richard Nordhausen）等；在法國有巴萊士（Maurice Barrés），蒲西卡利（Psichari），保羅·亞當（Paul Adam），裴基（Charles Péguy）等——但這些人物，有的是一向便態度朦朧，本來

就沒有使人相信過他們會在大事變中不至於變蠢，有的則是一向便倡導着『國家高於一切』，或是早已由頹廢的和色情的方面向極右的圈子裏連續地轉着，不過現在表現得更加明顯而已。

這潮流在那時是勢不可當的。不過有一點却叫人不能不發生疑問，就是：那些作家都爲自己底國家喊『正義』，但到底『正義』是在那一邊呢？丹麥底文學偉人勃蘭德斯說得最對：『正義竟跟着每個國家而完全對立起來，真是奇怪之至！』就由於這種『奇怪』，纔使得許多作家走到另一種方向。於是，抵抗這潮流的另一種集團產生了。那便是在當時被人罵作『敵探』的反戰的一羣。

這一羣，仍是以德國和法國爲發源地。剛在大戰爆發前三星期脫稿了他諷刺德國軍國主義的大著『臣下』（「Untertan」）的亨利·曼（Heinrich Mann），是本能地站在反戰的一面的。赫塞（Hermann Hesse）也是一樣，他發表了要求歐洲作家援救和平的名文（「O Freunde, nicht diese Töne!」）以後，便實踐自己底主張，離開了德國，到瑞士去作了反戰的使者之一人。還有羅曼·羅蘭，是著名的這方面的領袖，他底非戰論在當時是具着火槍一樣勢力，全世界上都被他投射到了。

這一羣，越是到後來，便越是得到了多數的擁護。大家底瘋狂過去了，所得到的並不是原來所想像的『榮譽』而是現實的痛苦，於是纔明白在帝國主義者統制下的戰爭是怎麼一回事。像亨利·曼，像赫塞，像羅曼·羅蘭，有的是代表着資產階級底中間層，有的是進步的資產階級底左翼，但到後來這一陣線的擴大，許多小資產階級底份子便都湧了過來。那些份子起初多半是由於冒險性的驅使，都到戰場上爲自己底『祖國』去拚過命的，然而終於覺醒了，實際的體驗便把他們送到更左的一邊。那些份子：有寫『十一月九日』（「Der 1te November」）的克拉曼（Bernard Kellermann），有寫

『犧牲行』(「Opfergang」)的溫魯(F. von Unruh)，有寫『砲火』的巴比塞，有寫『夜』(「La nuit」)的馬丁奈(Martinet)。——特別是巴比塞和馬丁奈，不但在作品上說明了他們底志願，也在行動上說明了他們底志願。

上一次歐戰中作家的分化大概是這樣。這在文學上形成為主戰和反戰的兩派，也就是擁護帝國主義和反抗帝國主義的兩派。而這後一派在必然地趨勢上大部分都投到——不管是認真的或不認真的——當時前進國際底旗幟下面了。

那麼，這一次歐戰中的作家將是怎樣的情形呢？

這次歐戰中的作家是特別複雜的

要預測這一次歐戰中作家底動態，首先得看一看這一次戰爭開始時每個交戰國給人民的影響怎樣。說明白一點，便是：在戰爭的初期，那一國對於人民的向心力強，那一國對於人民的離心力強。

這一次戰爭徹頭徹尾地是上一次戰爭的重演，在表面上一般人底傾向也將和上一次不會兩樣：對德國是厭惡的，對英國和法國是同情的。希特勒登台以後儘管在本國底人民面前做了『復興民族』的大事業，但他用槍尖的統制，却無疑地給人民底心上種下了仇恨的種子，這種子將會跟着戰爭生出了芽來。而且照目前的形勢看來，德國比較是孤立的，『速戰速決』既成了空話，而軍事上又未必有希特勒所保證的那種順利；這將更促成社會上中間層以及下層底厭戰心理。在英國和法國情勢却恰恰相反。所謂民主制度對於人民一向便起着欺騙的作用，且不要說；最要緊的還是幾年來蘇聯所倡導的『民主陣線』，實在在客觀上給了這兩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不少的幫助，——使人民忘記了牠們底反動性，使牠們底統制階級分外地獲得了人民盲目的信仰。儘管張伯倫手訂了慕尼黑協定，但他在戰爭中所喊出的『反侵略』的口號却還能暫時地響亮一下的。這就是說：英國和法國方面，在這戰爭的初期倒會得到一般的擁護，國內的愛國主義倒會比較德國更要認真地抬起了頭來。要是這種看法不錯，那麼，在這戰爭中的作家一定也是跟着這種傾向往前走的。

傳統力量的不能否認，使我們可以斷定這次戰爭中的作家，依然和上次

一樣，最活躍的——不管是主戰和反戰——還是德國和法國，而且尤其是法國。英國文學的衰老，使牠底作家在大事變中很難表現出巨大的力量。蕭伯納算是英國作家中比較特別的一個，但他就是反戰罷，充其量也還是會和上一次戰爭時一樣，寫一篇帶着朦朧罩子的諷刺劇，再充其量被政府禁止，就完了。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威爾斯，他平常在指摘着帝國主義戰爭的恐怖，但他却又不止一次給國際聯盟做着廣告，以為那是為人類謀福利的機關，那麼，這一次國際聯盟底主人英國和法國正是為了履行這個機關底使命而戰爭的，威爾斯底態度怎樣，到實在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了。另外的一個文學有歷史的國度，意大利，雖然目前沒有參加戰爭，但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參加的，可是無論牠參加到那一面，牠底文學怕連上一次戰爭時的生氣也不會有。鄧南遮，皮藍得婁，可以號召的人物，都已經死掉了；未來派的一羣，也早就失掉了他們底權威，而且除了準未來派的蘇斐其(Ardengo Soffici)等人以外，他們根本便沒有作品，充其量不過多發幾篇煽動戰爭的宣言而已。在反戰方面，布拉哥(R. Bracco)是可能的，女作家黛利達(G. Deledda)也是可能的，但一個早已退隱得沒有了影子，一個却本來就是維爾加(Verga)的承繼者，在戰爭中怕也只有更加退隱之一法。只有住在國外的新進作家，『豐塔馬拉』底作者西龍，倒是一個絕對有保證的反戰的人物，但直到現在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也只有西龍一個人。——這些，都說明了這次戰爭中的作家，最活躍的還是德國和法國，而且尤其是法國。

要指定每個作家去預測他們底動態，這自然是冒險的辦法，因為一個人會在大事變中突然地轉變的，那只要看看上一次戰爭中的霍卜德曼，德美爾，艾爾委，便可以瞭然，但雖是那樣，我們却還得這樣做。一個人儘管能夠轉變，畢竟總有他所以然的根源在。我們從上一次的大事變裏面已經學會了觀察人的方法了。

我們已經斷定了德國將要更容易地受反戰思想的侵襲，這自然並不是說德國底主戰文學就根本看不見。主戰文學想來還是有的，但那發展，將簡單地是納粹黨底口號和標語。上一次戰爭中的主戰作家，有的已經不在世間了，有的却事實上已經進了養老院，而希特勒對於大批作家的驅逐，對於大批文學作品的焚燒，使得德國已經失掉了文壇。納粹黨就是要造出自己底文學罷，新起的作家已經沒有了承繼的遺產，已經沒有了他們底引路者。過去

的事實很明白地告訴了我們：納粹黨是沒有真正的文學的。上一次主戰的作家，還健在而且沒有聽說受納粹黨迫害的人像擺佐爾德，荷爾支，諾陶生等，或者又會寫出些鼓吹戰爭的作品罷，但實際上却怕難像上一次的起勁。就譬如荷爾支，即使依然安居在德國，要說他徹底願意作納粹黨底鼓吹手，却還是使人懷疑的。

因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斷定：這一次戰爭中的德國，決不會像上一次那樣，僅在戰爭的第一年便有一百五十萬的吟咏好戰的詩歌作品。德國國內只有火藥氣而沒有作家了，我們要找他們，還只有到國外去找。

那些成了亡命者的德國作家之羣，其實並不一定都是反戰的人物，他們有的是爲了簡單的反希特勒而被驅逐的，有的是爲了他們寫實的手法——描寫了性的問題——而被驅逐的，有的却是爲了猶太人而被驅逐的，這些作家在戰爭中的態度根本上怕就難得一致。譬如多馬士·曼(Thomas Mann)，雖然也是亡命者，可是他在上一次戰爭中却是一個主戰的人物：他曾經公開地宣言文化就是『入魔的昇華』(die Sublimierung des Dämonischen)，是和軍事分不開的。像這樣的人物，要說不再作一次戰爭的擁護者，誰也不敢來保證。依過去的經驗看來，大概反戰的中堅作家的名號，還不能不放在多馬上·曼底哥哥亨利·曼，以及上次曾經有真實表現的克拉克曼，溫魯等人底身上。亨利·曼底精力還沒有衰老，據他纔在兩個月前給巴黎『不朽叢書』(Pages immortelles)撰述的尼采的評論看來，他底態度總不會變到那裏去。克拉克曼，溫魯，都是受了上次戰爭實際洗禮的人，『十一月九日』與『犧牲行』已經成了反戰的豐碑，他們必然地會保持着他們不反顧的義務的。

在一些比較青年的亡命作家中，可以使我們相信對於反戰運動能有貢獻的，有阿爾諾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布萊赫特(B. Brecht)，夫赫特岡格爾(Feuchtwanger)等人。這中間，最有希望的是阿爾諾德·茨威格：他是溫魯正當的繼承者，曾經把上一次凡爾登堡壘戰的經驗很淋漓地寫給了我們。他底書都在柏林廣場上燒掉了，但大部分却都在巴黎出版了法文本。他堅苦，努力，而且和法國最前進的作家已經攜起手來了。

說到法國，自從上一次大戰以後直到現在爲止，一般的作家可以說都在社會上維持着一種極優越的地位的。那兒有極榮譽的學士會(Académie)，

是政府拉攏作家的最好的機關。作家受了政府底豢養了，要想再對政府表示反抗的態度，那怕多少總有些困難。在這裏，我們應該把那些學士會裏的老『學士』像保爾朵(H. Bordeaux)，法萊爾(C. Farrère)之流丟開不提，只說那般現代文藝大師的一羣，莫洛亞(A. Maurois)，雷尼耶(H. de Régnier)，莫朗(P. Morand)，連和紀德有過最深關係的窪勒利(P. Valéry)都在內，雖然平時在各種各樣的『文派』名目下面也講自由，講解放，更一致地在講和平，但他們底出路却只有跟在統制階級後面跑。這一羣，他們要一扯開平時的面具時，會成爲強烈的戰爭喇叭手的。上一次戰爭中最活動的巴萊士已經作古了，但他底『愛國者聯盟』(Ligue des Patriotes)並不是不能復興，領導者或者是保爾朵，法萊爾之流罷，但這一羣，有十二分的可能會都是積極的參加者。

比較難斷定的倒是維特拉克(Ch. Vidrac)和他周圍底一類人。以朱勒·羅曼(Jules Romains)爲中心的『一致主義』派，現在已經成了歷史上的舊話，杜亞美爾(Duhamel)似乎也早已和這個集團分手了，但維特拉克却還維持他底傾向，他甚至是這方面底一位叫得最響的作家。在上一次戰爭中，這個集團的人物是沒有特別替戰爭吹過喇叭的，他們並且在戰後還和法國底共產主義者發生過一個短時期的交誼。但作爲中派小市民的這個集團，牠始終是搖擺不定。從朱勒·羅曼到維特拉克所吟咏的『民衆』，其實只是威爾哈倫(Verhaeren)式的市民底羣集，他們也將和威爾哈倫一樣，終於湮沒在市民底羣集中。由於這次戰爭以前『民主陣線』的叫囂給了『民主』國家高揚的機會，由於戰爭中『反侵略』的宣傳使『民主』國家能暫時獲得人民盲目的擁護，這個集團會在這種聲勢中滾了下去的。維特拉克和他周圍的一些詩人會在某種的形態下替他們認爲是真的『一致』了的『民衆』說話。

剩下的還有一羣現在依然到處跳着的所謂超現實派的作家。但這一羣却是極容易斷定的：他們一向表示得極左，可是實在的行動上却分明是極右。他們談革命，但沒有目標，也沒有計劃，但又看不起個別的談革命，——他們曾經嘲笑了紀德的轉向。用佛羅易德發展着色情狂的佩雷(B. Péret)領導下的人物，在戰爭開始時一定是要歇斯特里一陣，而歇斯特里的結果却一定是大叫着擁護戰爭的。

照以上的說法，這次戰爭中作家底動態似乎也不能算怎樣，複雜的。然

而不然，實在有最複雜的現象在。最複雜的現象便在蘇聯一向領導的『左翼』裏面。

所謂『左翼』，這幾年來所做的主要運動便是反法西斯蒂運動。自從德國全體作家被希特勒驅逐以後，這運動便以法國作了中心，大批的作家都來參加了。但這次戰爭的爆發，却完全由於蘇聯和德國的妥協。這一來，『左翼』應該怎樣辦，實在是一個叫人够想的問題。但這還不要緊，大家可以騙騙人也騙騙自己，把過去的言論都藏起來，說是對戰爭取着杯葛的態度；可是一到了蘇聯也出兵和德國取了同樣的步調時，『左翼』怕就更加為難。現在大家要是還出來說話，那首先便得把從前在巴黎轟動世界的 A. E. A. R. (革命文藝家協會) 所發的宣言文件都丟到垃圾箱裏面去，同時自己就得做希特勒，把自己底作品統統燒掉纔行。

結果大概總不免有一場分化。像多馬士·曼一類人，其實本只是『左』的空言家，現在反希特勒的運動既已失掉了憑藉，他會等到這一天：倘是這次戰爭延長，納粹黨的統制有些不穩的時候，希特勒會改變政策，容許各派合作，以對付政治上的難關。——這決不是不可能的。倘是有這一天，多馬士·曼依然可以回國，他底幾個榮譽博士的頭銜恢復了以後，必然地會又拿出上一次戰爭中的態度，主張爲『文化』而戰爭了。羅曼·羅蘭是以反戰『起家』的人，在情理上應該依然沒有變化的，但他以一個反對『暴行』的人而竟也讚美了蘇聯黨案，那麼這次的態度也就極成問題，*除了他安心去養老，一句話也不說。其餘像倍赫爾 (J. R. Becher)，瑪爾洛，尼贊 (P. Nizan) 等一大批的作家，除了一部分會走到另一新的方向以外，大概有一部分愚蠢地會間接成了希特勒底同盟者，一部分便只有倒在英法帝國主義者底脚下，以使用過去『民主陣線』的死口號掩護自己，但到頭也還是成了戰爭的擁護者完事。

文學到底向那裏去

這樣子，混亂自然是混亂極了，但這混亂却無論如何是暫時的。要是人類退回到野蠻時代是不可能，那麼，代表人類文化最高峯的文學，必然地是向前躍進。牠底最高成就，一定不是帝國主義者底喇叭，一定不是侵略者底號砲，也一定不是叛變者底播音，牠必然地是代大衆控訴，呼籲的真實說明

和吶喊。爲帝國主義幫兇的文學就使壓倒了一切，但將來却不會留下一個字。上一次戰爭中德國一百五十萬的吟咏好戰慾的詩歌，現在還有誰再看見過呢？

代表全人類說話的文學是會勝利的，支持被壓迫階級鬥爭的文學是會勝利的，暴露帝國主義者底殘酷和指出叛變者底無恥的文學是會勝利的……在比上一次更可怕的這次戰爭中，文學將更煅煉出愈尖銳，愈嶄新的姿態，牠將更嚴肅地擔負起要求實現人類自由與解放的任務。

儘管暫時的作家似乎大多數是不可靠的，但依然總還有不少有保證的作家在。在法國，我們不能忘記紀德，杜亞美爾，杜·加爾 (Roger Martin du Gard) 一羣人，——但這還只是一些老作家，前更進的却還有艾爾巴爾 (Pierre Herbart)，季由 (Louis Guilloux)，馬丁奈，以及女作家瑪德蘭·巴茲 (Magdeleine Paz) 等：他們都必然地是這次大事變中爲真理奮起的鬥士。

若容許我們作些不幸的預測，這次戰爭中被犧牲的作家一定是不會少的。有些作家爲了盲目，或爲了強迫，到戰場上去作犧牲，自然是不待說；還有些作家爲擁護真理而受迫害，像上一次戰爭中朱萊士 (Jarvis) 所得的結果，也一定難免。這是沒有法子的，但却決不能阻止反戰爭文學的出現。作家的被迫害，勢必更引起反統制階級勢力的擴大，上一次朱萊士事件給作家的反應便是明證。戰爭儘管把作家趕到戰場上去，但總會有裴基那樣終於叫出了『有新的時代開始』而幸而不至於有他那樣結局的人：那將會是更進步的克拉曼，更進步的溫魯，更進步的巴比塞，他們底覺醒和他們底體驗，將產生出強有力的打擊這瘋狂時代的文學作品。

要是這次戰爭比上次更是瘋狂的，更是使民衆不可忍受的，那麼，這次作家底覺醒將更是徹底的，體驗將更是深刻的，切實的。同時，這樣的作家，人數也將更是多數的，他們底文學作品也將更是強有力的。

上次戰爭的結果，使前進作家都投到當時前進國際底旗幟下面了，這次，我們相信也決不會兩樣。——只有領導人類走向新時代的前進國際，纔可以幫助飛躍的文學長成，發展，高揚。

預測以外的測預

最後還有一個可以說是多餘的預測，但也不能說是毫沒有意義的預測。那便是：若是戰爭更擴大了下去時，歐洲怕有一個文學上的大批的移民。

由於這次戰爭和上次不同，文學作家，尤其是前進的文學作家將比較上次更要受着戰爭勢力底威脅。這次瑞士也將不是安全的逋逃藪，大家必然要另找一個可以託足的地帶的。——那地帶，將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國。

美國將來必然也會加入戰爭，但無論如何却不是現在。牠在某種情勢下，會容納這般逋逃客的。要是不到絕對的戰時狀態，美國大概會成爲歐洲許多有思想的人物底避難所。

但是有甚麼意義呢？

這意義，就一般的說來，正如歷史上許多大事變中的移民一樣，將是文

中國近代的啓蒙運動與史實

江濤聲

中流第一卷第三期登載有振慶君的『中國近代的啓蒙運動』一文，其主要的似在宣揚所謂新啓蒙運動。但其中最大部份是敘述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啓蒙運動的史實和批評。但異常不幸，振慶君所敘述的『史實』完全不是客觀的歷史事實，而是單憑腦子裏編造出來或幻想出來的。雖然每個人都有宣傳自己及其所屬派別的理想，發表自己及其所屬派別的主張之自由，但對於既成的歷史事實之敘述或引證，則都不能不受客觀歷史事實的限制，隨便編造或瞎扯是不可以的。單只振慶君一人犯這種毛病固無足輕重，但事實上振慶君不過是許多人中或一大羣人中的一個代表。因此我們爲了擁護真理，保存歷史的真實，對於振慶君的偽造便不得不起而加以指正。

振慶君說：

『……在民國四五年時，中國近代史上最優秀最前進的份子李守常，魯迅等曾向中國青年作廣大的號召，要求中國的再生。所以他們第一是公開地向着舊的禮教挑戰，第二是公開地宣告「古文」爲死文字，而提倡白話文學。這種活潑新穎的氣象，便是中國啓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誕生。』

從這一段的敘述看來，似乎在民國四五年時開始提倡啓蒙運動的主要代

化的移植或傳播。但特殊的意義却是：這世界上第一個強大的國家會從此收下許多禮物——新思想底種子，將幫助加速牠歡迎新時代來臨的社會底震動。

實：

*編者按：本文作者這一預測，已由九月十七日哈瓦斯社巴黎電證信中，表明了他誠心贊成並誠心擁護達拉第總理對於「希特勒主義暴政」之行動。按羅曼·羅蘭在第一次歐戰時是「和平主義」運動的領袖，近多年來是共產主義的信徒，這種情形使該信更有意義。」（九月十九日字林西報）

表是李守常和魯迅——這真是一個大膽的偽造！大家都知道，在民國四五年時『向中國青年作廣大的號召，要求中國的再生』的，是新青年軍（該誌創刊號出版於民國四年九月十五日），但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人及其思想言論的代表者爲陳獨秀。不但那時的魯迅毫未與聞，就是李守常也僅僅是個偶然的投稿者。這是有新青年的彙刊爲憑的。在民國四五年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上（第一卷一號至第二卷四號），我們不但看不到魯迅或周樹人的影子，就是李守常（即李大釗）的名字也只出現過一次（見二卷一號，論題爲青春）。在這時期內新青年的主要撰稿者是陳獨秀高一涵等。從思想的激進及其對於青年的鼓動說來，特別是陳獨秀最爲傑出。陳獨秀在那時所發表的敬告青年，抵抗力及反對孔教的幾篇文章，在當時的思想界都起了鉅大的影響，後來的五四運動的思潮即導源於此。振慶君所說『在民國四五年時中國近代史上最優秀最前進的代表李守常魯迅等曾向中國青年作廣大的號召，要求中國的再生』，未知根據何種文獻和事實？如果振慶君舉不出任何文獻與事實出來，那就顯然是用了『偷天換日』的手段，企圖以李守常魯迅等代替陳獨秀等，而有意偽造歷史了。

至於說到『公開地向舊禮教挑戰……公開地宣告「古文」爲死文字，是

倡白話文學』的人，也不是李守常和魯迅，至少在最初不是如此。『公開地向舊禮教挑戰』最激烈的是吳虞，而『公開地宣告「古文」爲死文字，提倡白話文學』最堅決的是胡適。這是我們從新青年第三第四第五等卷中可以明顯地看得出來的。

固然，我們不能否認李守常，甚至魯迅，在五四運動中有過若干作用，但絕不能說五四運動主要是由他們領導起來的。五四運動的領導者，無論在思想上，言論和行動上，都是陳獨秀。新青年不但是陳獨秀一手所創辦的，而且自始至終是由他所主編的（除了他被監禁的短時期外）。新青年中最基本的論文，也就是造成五四運動思潮，代表當時啓蒙思想傾向的論文，多半出諸陳獨秀之手。并且陳獨秀不但主編了新青年，而且還創辦了一個著名的週刊——每週評論。如果新青年是五四運動的宣傳刊物，則每週評論便是五四運動的鼓動刊物。這個鼓動刊物，在當時的青年學生及一般智識份子中會發生了絕大的影響。我們可以說，五四運動的直接鼓動者就是每週評論。正因爲如此，陳獨秀無論在思想的宣傳上和行動的鼓動上，都成了五四運動的中心，成了當時大多數青年學生和前進智識份子的偶像，也正因爲如此，他成了當時一切反動勢力所攻擊的箭靶，成了安福系的囚犯。

人們如果不談五四運動或啓蒙運動則已，若一定要談五四運動或啓蒙運動，陳獨秀的名字是絕對撇不開的。陳獨秀的名字之對於五四運動，恰等於康有爲和梁啓超之對於戊戌變法運動，孫中山之對於辛亥革命運動。然而振屢君追述五四運動的領導人物，五四運動的『功臣』時，竟然沒有提到陳獨秀的名字，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不但陳獨秀的名字應當列在五四運動領導者的第一位，就是胡適之也是五四運動的主要角色。如果你不提到白話文學運動便罷，一提及白話文學運動，胡適之的名字，不管高興與否，你無論如何沒有辦法把他丟開的。因爲他不但是『宣告古文爲死文字』，『提倡白話文學』的第一人，而且是實行創作白話新文學的第一人（至於他本人創作的成功與否是另一問題）。但在振屢君看來，胡適之在五四運動中是不存在的。

說到李守常（當時的筆名爲李大釗），無疑地他是中國近代的偉大革命家之一，及其他那純潔無我和堅決爲革命犧牲而從容就義的人格，實是後起革命家的模範。但從五四運動的思想領導說來，他所佔的位置是不甚重要

的。他在五四運動爆發前所發表的文字很少，而且不甚重要，如青春，今，新的舊的，Bolshevism 的勝利等。自然這最後一篇文章，對於引導當時青年去注意俄國革命一點上很有意義，但對推動五四運動的本身是沒有多大作用的。所以在五四運動爆發前，李守常並沒有起過什麼決定的作用。他在思想上所起的較大的作用，是在五四運動爆發以後。因爲他是中國第一個比較有根據地信仰馬克思主義并比較有系統地介紹馬克思學說的人（見其所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新青年六卷四號——五號）。正因爲如此，他成了後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之一，成了第二次革命的領導人物之一。

至於魯迅，在思想上對於五四運動的影響，可以說很是微弱。他不但不能與陳獨秀相提并論，就是比之李守常亦相差甚遠。魯迅之加入新青年是完全被動的，而且加入得很晚。不但關於『向中國青年作廣大的號召，要求中國的再生』，在『民國四五年時』他從未作過這樣的工作，就是一直到五四運動的前夕，他也沒有作過這樣的工作。他在新青年所發表的文字僅僅三個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和藥）以及幾個隨感錄而已。關於這一點魯迅自己說得很清楚：

『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指『五四』前一年），因爲所評論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

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份；其他大事，則本誌具在，無須我多言』（見熱風題記）。

魯迅在這裏所說的話，是比較誠實的。事實正如他所說的一樣，在五四運動中他『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份』，這就是說，他在五四運動的思想上只起了一些微小的作用而已。不用說，魯迅當時用白話文所創作的幾篇短篇小說，是相當成功的。若就後來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說來，他的影響和成績都很有可觀。但這是後來的事，不能因此就說是魯迅的思想影響了五四運動，相反，倒是五四運動影響了魯迅的思想和創作。如果以在思想上影響五四運動來說，魯迅遠不及他的兄弟周作人。

我們上面所指出的完全是有文獻作見證的歷史事實，是每個參加五四運動的人所親眼見到或親身聽到的事實。但振屢君何以偏要顛倒和掩藏這些鐵一般的歷史事實呢？惟一的解釋是振屢君不高興陳獨秀，而特別愛好李守常和魯迅，這是從他那篇文章中可以完全看得出來的。一個人根據他的特殊嗜

好與思想或政治傾向，特別不高興或仇視某些前輩，而特別愛好或崇拜某些前輩，本也是人們的『自由』。但從客觀歷史的觀點，尤其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上說來，『歷史應當還之歷史』，就是說，我們應當從客觀的歷史事實過程中如實地去理解歷史，批評歷史——只有這樣才能從歷史中獲得真正的教訓。如果根據一己的好惡或派別的利益，用特殊的主觀去觀察歷史，修改歷史，甚至偽造歷史，也許能一時獲得『好處』，但最後說來，只是在歷史上盡一些可憐的反動作用而已。

如果站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上，我們對於歷史上任何人物，都應從他在歷史上所起過的客觀作用（無論是進步的或反動的）去敘述他，評量他。就是一個人在前一時期所起的作用是進步的或革命的，而在後一時期退步了，或反動了，但我們還得以『進步』去評量他的『進步作用』，以『反動』去放在他的『反動作用』上。在這裏我們所須特別留意的便是他的『進步』或『反動』所代表的社會背景而已。列寧之對於蒲列哈諾夫和考茨基就完全是如此。即以我國的康有為梁啟超而論，前者後來完全變成了極端的自動派，後者後來在思想上亦完全代表布爾喬亞的反動意識。但在戊戌政變時期他們還是起了相當的進步作用的——不管戊戌運動在本質上是改良主義的，甚至反動的。尤其是梁啟超在中國文化運動上，在中國初期的啟蒙運動上，都會有過不可磨滅的功績。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梁啟超在時務報及以後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上的那些對於西歐民族民主運動及其他學術思想之初步的介紹，後來的五四運動未必能達到那樣的程度。作者以為對於陳獨秀，也應當用歷史的觀點去評判他。他現在的主張究竟怎樣，他將來究竟往那一方向走，我們姑且不說，但就他過去在歷史上，尤其在五四運動上所起的作用，無疑地是進步的，偉大的。他在五四運動前及在這運動的過程中（在新青年和每週

評論上所表現的）那種對反動勢力的不妥協精神，那種對舊思想，舊傳統的大膽批評精神，不但不應該抹殺，而且是值得我們後一代人效法的。

振慶君於敘述五四運動時作了一番偽造之後，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歷史事實也差不多是『如法泡製』的。這裏限於篇幅，我們不欲多加指責。但關於新啟蒙運動，還得說幾句。振慶君是一個『新啟蒙運動』的宣揚者，但究竟什麼叫做新啟蒙運動，以及牠與舊啟蒙運動有什麼區別，他並未曾明白地告訴我們，好像是故意含糊其辭似的。最有趣的是他說：『我們的先進份子毛澤東魯迅瞿秋白等，在最近數年中都是百折不撓地為着倡導新啟蒙運動而努力』。在這裏是把毛澤東當做新啟蒙運動的第一個領導者。但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在最近數年來所幹的不是什麼啟蒙運動，而是農民的武裝暴動或『蘇維埃運動』，這種運動的歷史價值我們姑且不談，但這很難扯得上是什麼新啟蒙運動。啟蒙運動，按照歷史上傳統的意義說來，乃是新興的布爾喬亞的民主思想解放運動，這是與布爾喬亞的民主革命運動大有區別的。例如法國十八世紀從福爾特盧騷到百科全書派所領導的民主思想解放運動是啟蒙運動，但法蘭西的大革命却不能稱之為啟蒙運動。同樣，中國的五四運動可以說啟蒙運動，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運動，却不能再稱之為啟蒙運動了。用馬克思的話說來，前者是『批評的武器』運動，而後者則是『武器的批評』運動，雖然兩者中間有不可分離的聯繫，並且後者多半是由前者準備起來的，但無論如何不能把兩者混為一談。而振慶君把毛澤東數年來所領導的農民暴動也算做新啟蒙運動，這證明我們的新啟蒙運動的提倡者或宣傳家，對於什麼是啟蒙運動的意義也是茫然的。但『茫然』或無知，還是有可以原諒處，而偽造歷史事實就應放在『口誅筆伐』之列了。

一九三九·七月廿日

進化呢，還是退化？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上，有一篇關於論舊道德的文章。茲摘錄幾句如下：『……我們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為中國和西洋的舊道德觀念都不澈底，不但不澈底，而且有助長人類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的部分……舊道德是我們不能滿足的了……種種悲慘不安的事，那一樣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舊道德造成的？現在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拋棄私有制度之下的一個人一階級一國家利己主義的舊道德……』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理論與現實雜誌上，載有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主筆潘梓年的一篇文章，也有幾句關於舊道德的話：

『要闡發舊道德中好的部分。這也是接受優良傳統的一方面。中國舊道德有不少好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應當加以闡發的；在抗戰過程中尤其看出有闡發的必要。』

伊里奇若在會說什麼？

達古

砲聲響了，全世界人民害怕了多年的二次世界大戰，列強爭奪殖民地的又一次大屠殺，真地落到我們頭上了。

砲聲一響，在參戰一方的民主國家中，各主要勞動政黨都宣言擁護戰爭。法國社會黨贊成對德開戰，法國共產黨也在『反對法西斯主義』口號下，擁護達拉第的作戰政策；英國工黨擁護張伯倫的政策，英國共產黨也在『反對法西斯主義』口號下，擁護政府對德國作戰到底，在參戰國另一方面的德國內部，各勞動政黨的態度如何，我們不知道，因為德奧捷克的第二第三國際的支部早已被希特勒消滅了，至少已壓到地底下了，但莫斯科的對德政策却給我們補了這個空——自從德蘇協定簽訂之後，地底下的第三國際的德奧捷克支部，大概會擁護希特勒這個『蘇聯之友』來對英法作戰了。

交戰國的共產主義者政黨竟而擁護本國資產階級進行帝國主義的戰爭，乍看起來很叫人驚異，但細按之這並無什麼可驚異的地方。就這種政黨本身說來，近幾年來牠所遵循的道路必然要叫牠走到如今的一步，再就歷史往事看來，牠今日的行爲不過是二十五年前社會民主黨的行爲之重演罷了。

這裏只談談歷史往事。

一九一四年八月，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砲響了以後，德奧兩國的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兩個最

A 馬爾勞論

杜比作
小邨譯

杜比 (F. W. Dupee) 爲美國有名的文藝批評家，現任 Partisan Review

主筆，本文即自一九三八年三月份之該雜誌譯出——譯者。

馬梭·阿爾諾德有一次談到拜倫，說時代精神幫助了他；但是談到昂德里·馬爾勞呢，因爲他把這許多近代史實收入到他的小說裏，那末最好還是說，他是替時代精神工作的。他最近一本小說（希望——著者）是關於西班牙那個尚未完結的戰爭的，馬爾勞是該國政府底空軍組織者，他親身經歷這個戰爭。這個題材是具有爭論性的：一個小說家很難把握着牠，除非他別具目的。希望（無論牠的戰爭的分析，牠的態度和價值都是含有黨派性的）赤裸裸是一種較高的派別的政論著作。但讓我們立即說，牠不是一個新聞記者的作品，牠是一本藝術家的書，這個藝術家并未捐棄他的獨特的觀念，情調和方法，他只是使牠們遷就於新的情況吧了。他是從某一點出發的，這一點，凡是熟識他以前底作品的人都可充分認識的。

幾年之前馬爾勞已部分的崇尚了革命的價值，從此以後他便不止一次地改變他的政治信仰。但死與行動 (Death and action) 這對學生的苦惱已深植在他的心上，在他底發展的每一階段中，都給他的觀念規定一種特殊的形式。他的第一部重要的小說『皇道』，是他這些苦惱的更真實的反映。牠的世界是一個死和暴力的無差別的空虛。牠的人物都是千篇一律的。而且這部小說雖然名義上是以二十世紀印度支那的莽林爲背景，實際上不管空間和時間都是很少固定的。但『皇道』底抽象的英雄不久讓位於另一種作風。在『征服』者裏，英雄的要素尙保留着，但牠已在當今的世界裏獲得一個基礎。但這個基礎大部分都是共產主義者喀林的一個臺座，喀林是一個孤獨的，無情的，對人和歷史滿懷輕蔑的人，他擯棄他那冒生命的危險而服務的那個運動：革命。一九二六年的中國，總同盟罷工和農民暴動的，帝國主義陰謀的，國民黨和共產國際的中國，在喀林看來，雖然他扮演一個職業共產主義者的角色，只是一個『奇景』而已。現在，馬爾勞設法把這一點在心理上描寫成這樣一種不可置信的情形，給喀林以一種仇恨的等級：假如他輕視無產階級，那末，他仇視資產階級還要厲害。但是他的區別並不含有社會的洞察力或價值。喀林內在的基礎是死的苦惱與迫得用絕望底勇敢的行爲來抗拒死亡的強制力。這確乎是走向自毀的一種推動；而革命呢，乾脆說來，牠是在一個世界裏儘可能英勇地自殺的手段，這個世界却受了一等階級底滲透的自滿而損害了莊嚴的。『皇道』的英雄是時間和空間的一個冒險家：喀林是政治上的一

強大支部，對於戰爭的態度怎樣呢？除過李卜克內西與盧森堡極少數人以外，都投票擁護帝國主義的戰爭。並且除了在宣傳上，在本國內作擁護活動，以欺騙勞動者使作資本家砲灰以外，許多社會民主黨領袖還到國外去，運動別國的勞動者也作德奧皇軍的砲灰。

德國的這種『社會主義革命家』所作的這種外交活動，最為顯著。他們派遣了瑞斯克（Noske）帶領皇軍去佔領比利時還不算，又派遣奧艾爾（Aigner）到盧白克與北非洲，運動那裏的勞動團體使響應威廉軍隊的侵略。穆勒爾（Müller）與謝德曼（Scheidemann）這兩個有名領袖，被派到荷蘭，以圖取得該國社會民主黨的擁護。許德昆博士（Dr. Südekum）到瑞典，羅馬尼亞與意大利去，結果據說使意大利在戰爭前一階段中保持了中立。法國社會黨員，為要擁護本國資本家的正義戰，當然不滿意於意大利的這種中立，他們攻訐意國社會黨，說他們之贊成意大利中立，是受了許德昆的運動，意大利社會黨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原受有德國黨的津貼，許德昆到了意大利以後曾威脅意國黨說，如果不採取對德友誼的態度，則津貼馬上就給停止云云。不管這裏攻擊的是否事實，然而德法兩國『社會主義者』竟如此對立，已污辱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了！

德國另一個有名領袖巴弗士（Pavus），即赫爾芳博士（Dr. Helphand），被派遣到蘇非亞去，在那裏他向保加利亞的社會民主黨講演，說如果保加利亞站到德國一方面作戰將怎樣有助於世界的民主主義的勝利云。他從保加利亞到了君斯坦丁堡，在那裏他發揮了他那援助德國軍隊的煽動天

個冒險家。

但喀林并不就是全部小說；馬爾勞的興趣也不在於他底重要人物的虛無主義所規定的陰謀。背景——廣州的總同盟罷工——這是以一種真誠的，（雖是誤入歧途的）歷史的好奇心而揭露的。陳達，有錢的自由派，和洪，恐怖主義者——這是馬爾勞所描繪的兩個深刻的政治輪廓。此外還有鮑羅庭，他代表他底『職業革命家』的理想。但鮑羅庭是一個抽象，而且在他和喀林的關係中，他完全是被動的。因此喀林代表傳統的虛無主義，而鮑羅庭則代表感情上不同流合污的馬克斯主義，這是作者身為一個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革命孩提的遺產。但馬爾勞至此就不能撮合價值的兩個世界了，因此，在『征服者』中，他們只是覷面於一道互相不了解的深淵之前；而這部小說雖極力在這個缺口上架一道橋，但仍裂成兩部分。

在馬爾勞的另一部小說中，英雄和奇景，共產主義和虛無主義已獲得較為滿意的關係。『人之命運』裏，革命已進入到而且已改變了死的概念。這個英雄現在把個人主義者底死寂的孤獨，和革命底集體性的友誼的推動，當做不可避免底事情的一個矛盾，結合在他一己的身上。他並不像喀林一樣，處於政治的冒險中，而是處於集體名義之下底行動中的一個人，他設法逃脫他的命運。這些人物因此便有了一種心理的統一性，而這部小說（具有組織嚴密的散文，緊湊的結構，幻夢與行動交替着的節奏，內在的模型和情調的差別，）也有一種戲劇式的統一性來配合。因為假如一方面帝國主義者，他方面革命黨人，都以他們不同的作用反映出馬爾勞關於歷史價值的意義，——假如，換句話說，喬這類人是『同情的』，維拉爾們是『非同情的』——則他們歸根到底，都是同一模型裏造出來的人物吧了，這模型就是人類『命運』的模型。

因此，馬爾勞在人之命運中完成了諸道德原則的一種意象的接合，而這些道德原則在真實的世界裏當然要拒絕連結的。那末人之命運與其說是革命運動自身底特殊心理的寫實主義的研究，還不如說是一個智識分子底境遇的戲劇化。而這一點，事實上，描寫了馬爾勞的整個作品，同時又規定了他和他這個時代底社會力量的關係。革命之所以是一個價值，在他看來，主要的還是因為牠影響着理想的世界——即智識份子的世界。他並不把他的命運寄托於無產階級，而像大多數作家一樣，把一雙腳踏在兩個陣營裏面。但革命並不是靜止的；牠與世界無產階級的運動及其政黨的命運一齊升沉。智識份子懸在兩個階級之間，在物質上依賴着資產階級，但精神上則傾向無產階級，他們隨着工人階級前進和退却的節奏而搖擺不定。馬爾勞的一生較之許多作家還要忠實地反映某一時期歐洲智識份子底週期的危機，在這一時期內革命運動（受共產國際操縱的）已在無常中，親自給全世界樹立了一個實例。

馬爾勞給我們以死亡——行動的對稱，他底浪漫主義的遺產，他好像已造出一個特殊的理由來辯護他和革命運動及其諸色黨派瞬息萬變的關係。在人之命運裏也可以找出牠的線索來，喬對共產國際代表說過這幾句：『在馬克斯主義裏含有一種宿命的意義，也含有某一種願望的高揚。每一次宿命並到願望

才，他又在高加索的革命者與民族主義者中間煽動說：『爲了俄國革命的利益』，現在是在高加索組織暴動以反對沙皇（德皇的敵人）的時候了。

巴弗士在土耳其的這樣努力，得到了他的奧國同志們的響應，奧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像包威爾（Otto Bauer）之類，不但會親到前線與沙皇軍隊作戰，並且還鼓動波蘭的反俄革命，支持畢爾蘇士基等波蘭民族主義者。另一領袖亞德拉（Victor Adler）曾說道：『我們奧國人是準備「佔領」波蘭與塞爾維亞的。這並不是併吞……而是爲的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只許發生在敵人後方的革命。本此革命「原則」他們在維也納幫助烏克蘭人組織了「烏克蘭革命社會主義者聯合會」，使爲「烏克蘭的獨立」而鬥爭。

德奧兩國社會主義者的這種「革命」運動，當然是得到了德奧皇帝的允許與資給的。但這並不奇怪，而奇怪的是他們還有「革命的理論」。他們說他們之擁護戰爭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甚而是「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立場上。爲了實踐這種「革命的國際主義」，他們說，他們德國社會主義者不能把他們的鬥爭只限制在德國之內，如果這樣就太以民族範圍自限了，他們的力量一方面必須用於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首領，英國，另一方面必須反對反動的沙皇主義。他們的軍隊必須攻入俄國的邊境，不然，哥薩克軍隊就要侵入德境，就要以反動的封建主義奴役德國工人，並毀滅世界最進步的那個社會主義組織，德國社會民主黨，云云。本此理論，所以謝德曼寫道（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四日給紐約人民日報的一封信）：『我們在德國有抵抗沙皇主義以謀自衛的責任，我們必須保護這個最高發達的社會

的時候，我便懷疑起來。』喬在批評共產國際時說這幾句話，因爲後者拒絕對蔣介石採取先發制人的措施，當時蔣介石顯然正在準備摧殘共產黨人。人之命運的政治事件因此好像是反共產國際的，而且好像就是對斯大林派和國民黨成立無原則底合作的政策而作的一種半托洛斯基派的批評，這種合作政策，馬爾勞在『征服者』中以那樣同情態度表現出來的。但是談到馬爾勞底政治上的故事則還有比這更多的事實。『人之命運』寫就於『征服者』五年之後。當時，政局已深刻的變動。受了中國災禍的影響，共產國際已走入牠的所謂第三時期，一個極端教派的時期，而牠的影響已不甚重要。但在這一個時期托洛斯基號召一個反法西斯主義的工人陣綫似乎對馬爾勞已有多少影響，大概他當時把『行動的願望』和那位被放逐的布爾塞維克並提，而『宿命論』則和株守不動的共產國際並提。但共產國際碰到希特勒上台而回到牠的舊政策，和宣布人民陣綫時，牠又好像對馬克斯主義的『願望』重獲牠的權利；而馬爾勞又重新撤回他的同情。托洛斯基現在成了『過去的一刻』，而那些繼續堅守革命底原則的人們都成了一批空想的道德家了。現在明白得很，馬爾勞只是把他自己的惶惑設想成馬克斯主義而已；『願望』或『行動』的概念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政治內容，相反的，牠們倒和強權政治，和爲了暫時底『勝利』而舉行的冒險行徑，一句話，和階級合作同一意義。可笑的是馬爾勞把勝利和階級合作等量齊觀，把他自己和那個莊皇而不出色的共產國際一視同仁，他實際上已寫了『一首失敗的史詩了』。

一九三五年，德累·拉·羅些耳，一個法國小說家，把馬爾勞和共產國際的關係作了一些聰明的觀察。他說，馬爾勞的共產主義史詩是一首失敗的史詩。牠從蔣介石的不穩固的勝利始，以目下德國共產黨人底悲慘的消極而終。現在呢，奉了斯大林的命令，共產黨『放棄牠底極端暴力的外來的夢』而宣布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綫了。馬爾勞將改變他的小說的內容嗎？羅些耳下結論說，人們等着民主保衛的第一部共產主義的小說吧。

『憤怒的日子』，嚴格的說來，不是民主保衛的小說，但牠却是一部過渡的產品。『憤怒的日子』直接受了一九三三和三四年事變——希特勒，集中營，國會縱火案，德米特洛夫——的激動，牠是共產主義掙扎者的一首抒情詩。英雄的概念又發生一次變更。假如喬把死的意義和行動的意志結合於一身，加士納只是意志的化身而已。在『人之命運』中的一切人物看來，死具有一種形而上的實在——代替原始罪孽的一種實在，牠是人類共有的財產，牠給個人行爲以基本的動機，牠把人類命運的模型加在階級鬥爭的模型之上。但現在，在『憤怒的日子』，死已集中在加士納受禁底監獄的純俗世的意象中；生命也集中在反法西斯派的同志感情中。那些人物不再專志於一種宿命的死；他們正在把死當作一種政治的刑罰而企圖逃避。使他們互相隔離的不復是他們底強烈的細分的個性，而是他們底監獄的牆壁。『憤怒的日子』因此是一種新觀念的代表：流產的斯大林主義的人道主義，牠之繁盛起來，充滿人類的新鮮希望，像夢一般的短促和光輝，就在那轉變的幾年：一九三四和三五——在第三時期結束之後和第四時期開花燦爛之前，在教派主義的黑夜之後和人民陣綫當權底強烈的，失望的閃光之前；在第一個五年計

民主主義國家使不受俄羅斯的奴役……德國人而受沙皇的奴役，就是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要倒退幾十年，不僅德國的運動要倒退幾十年已也。」

這樣高明的理論 這樣動人的戰號：『反對沙皇主義』，比較今天的甚囂塵上的『反對法西斯主義』戰號怎樣呢？在現時代的渾流中看來，好像前者不如後者的響亮，然而在二十五年前，前者或許比後者還要動人。可惜的是歷史的輪齒已表明：這些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家，無論口頭上說得這樣好聽，都成了本國統治者的奴僕，屠殺本國與外國人民的幫兇。

在陣壘的那一面，法國社會黨員們的戰號當然與這一面的不同（如果相同他們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的叛徒了），他說要反對德皇的侵略。爲了什麼？爲了『正義』與『和平』。他們也派遣比國的社會黨領袖德士特里（Jules Destrée）與法國的社會黨領袖加香（Marcel Cachin）到意大利去，作反德助法的活動。加香帶了不少金錢，他賄買莫索尼尼使幫助協約國，而莫索尼尼就用這筆錢辦了他在佛郎科費的意大利人民報，成了幫助他上台的喉舌。所以意大利及全世界的勞動人民，直到如今還享受着加香之賜哩！

帶住吧，無須多敘述了，無須再說英國麥克唐納之類擁護英國作戰之史蹟了。但現在德國的這些『過去領袖』在幹什麼呢？他們對於這第二次大戰採取了什麼態度呢？他們大都在流亡中，正在巴黎與紐約高唱對法西斯希特勒作戰而擁護美法的民主國家。這時他們的戰號已不是『反對沙皇主義』，而變成了『反對法西斯主義』。他們已有第三國際的英法美的各國支部成了他們的同志，他們，第二第

劃完成之後和莫斯科審判案之前。

假如『憤怒的日子』是一個過渡的作品，『希望』便是具有最成熟形式的『民主保衛的小說』。雖然牠僅包含戰爭的頭一期（以瓜達瑪拉一役爲終結），但『希望』究竟是一卷長書，牠的構造是綜錯的，如果不是複雜的；而且牠的人物之多，差不多和戰爭本身底各面一樣。第一章以暴動早期的馬德里爲背景，鐵路工會管理了北站的電話總局；馬奴哀爾，一個青年共產黨員，正逐個逐個的打電話給西班牙的重大城市。用這種方法，馬奴哀爾確定那些城市是盡忠於政府，又那些已投降於法西斯派；讀者立即便知道西班牙的軍事形勢……馬奴哀爾離開火車站，跑入馬德里的街道。那一晚擠滿了人羣，而且殺氣騰騰。到處都有 *Saind* 的么喝和國際歌的片斷歌聲。滿載民軍的貨車正以每小時七十里的速率開赴塞拉。政府許多星期來漠視那個危急的軍事叛亂，而羣衆却愈來愈緊張地等待牠，因此開戰那一晚的來臨，簡直就好像『一個廣泛的解放』一樣。工人和店東都統一在人民陣綫底『驚人的友誼』中……那末，政治局勢呢？『那些工人組織一面管理這個城（馬爾勞告訴我們），一面等着政府的訓令』。但政府本身被描寫得太癱瘓，太無法動作了，牠簡直好像在『等着』工人的『訓令』。

巴塞洛那不像馬德里，在那裏有了巷戰。包庇法西斯派的教堂燒掉了。哥隆旅館，暴動的大本營被無政府主義聯合會派來的臨時民軍包圍着。工廠的氣笛鳴示警，信鴿盤旋於障礙物的上空。馬爾勞應用很大的精確和抒情詩的能力來刻畫巷戰底特殊的恐怖，一個武裝了的無產階級的飛揚。但是，他告訴我們，飛揚是不夠的。我們碰到無政府主義者布易，他好像馬爾勞的一切代言人一樣，是一個領袖，一個負責者。他眼見他們的同志在哥隆旅館前面底放縱的英雄主義，他斷定他們死得毫無必要；他們的犧牲姿態是絕望底一代的遺跡，即『一切政治問題都變成了勇敢和品質問題』的那一代的遺跡。但今天有了希望了，而『問題已不是樹立榜樣而是取得勝利』。他覺得他的同志所需要的是『調協』。

布易的見解暴露了這部小說的主要目的——牠的課題將是共和軍的命令——同時那些無政府黨人的行爲，他們的宿命論，他們的英雄，他們對死亡和失敗的彰明的淡漠使我們想起陳和喬，且暗示和早期幾部小說的一種觀念上的聯繫。

馬爾勞既然以武裝力量的協調做他的課題，他便碰到共和軍西班牙的一個中心問題。但他却不能週到地來看待牠。這個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馬爾勞却把牠視爲一種純軍事的難題。牠包含了最活生生的革命原則：馬爾勞却把牠當做一個與空想的蠢事相反的常識問題提出來。牠促進了工人運動的致命的分裂，巴塞洛那底悲慘的五月事變達到了頂點，並把戰爭弄成長期的局面；馬爾勞在一個簡單對話中處置牠的主要爭點。

在這個簡單而重要的對話中，主要的爭論者是馬寧（國際縱隊的司令官）和加爾西亞，從前是一個人種學者，但現在却是一個情報部的官員，他在全部小說中，串着馬爾勞最親切的代言人的角色。加爾西亞指出德意送給佛朗哥底高度機械化的援助，他提議把進行戰爭的方法來一個劇烈的變動。

三兩國際，一道在『反對法西主義』擁護民主主義的共同口號下，擁護本國資本家進行屠殺民衆。

他們又製造了他們擁護大戰的理論。他們說，上次戰爭或許是帝國主義的戰爭，雙方作戰的口號或許都是騙詞。但是這一次可真實實地不同了。第二次大戰不是爲了要奪取勢力範圍，殖民地與市場，而是爲了一個偉大而高貴的目標：消滅法西斯主義。他們並不主張戰爭，然而戰爭已成了不可避免的現實。一個人不能到天空中去中立，而法西主義又是最危害我們的東西，再則，世界各國的民衆又是這樣無力不足以干涉戰爭，因此惟一可作的事便只有幫助民主國家，以加速對於法西主義的勝利——他們這種理論，本是第二第三國際在基本上所共同的，但自斯大林放棄了『陣線論』，對希特勒澈底投降之後，第三國際已經沒有共通的『理論』了，各國的支部，祇有跟着各國的統治者進行『同志』間的互殺。目前共產國際的結局，比二十五年前的社會民主國更加悲慘，更不光榮！

一九一四年八月，伊里奇和齊諾維也夫同住在加里西亞的山村裏，當他聽到德國社會民主黨真地贊成了德皇的戰爭時說：『第二國際死亡了！』

現在，假如他還在世，他未隨齊諾維也夫等成了斯大林手下的冤魂，那麼在他聽到德蘇協定之訂立與英法共產黨都贊成對德作戰時，他會說什麼？

『第三國際死亡了！』——他或許會這樣說吧。但亦未必，因爲第三國際並不是今日才死亡，不過在今日大戰開始時，這表現得更清楚，更無可辯駁，更表面化罷了。伊里奇若在，則多年以前他必已喊出：

『第三國際死亡了！』

『這次戰爭將是一個技術的戰爭（他說），我們將來一定得進行牠，不要談什麼感情。』他認爲我們不能期望那些工人階級領袖『藉巡視而變成專家』。

但是，馬寧反對說，保住塞拉的却是民衆。

『我的好先生（加爾西亞答說），我們同時受了兩三種很危險的神話所營養和毒害了。第一就是法國的：人民（具有一個大寫字母P）製造法國革命。就算這樣吧。但并不因此就斷定，因爲一百根尖頭杖能够戰勝幾枝鏑脚毛瑟槍，一百枝獵槍也能够戰勝一架好飛機。俄國革命把事情弄得更複雜。在政治上，牠是二十世紀的第一個革命；但是你要注意，在軍事的意義上，牠却是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個了。革命黨人有街道障礙物，但沙皇黨人却没有坦克車，也沒有空軍……西班牙今天佈滿了障礙物——來抵抗佛朗哥的空軍。』

加爾西亞的一個同伴附帶說，『從前民軍向來沒有和一支近代軍隊作過戰。華蘭格爾是被紅軍，并不是被遊擊隊打敗的。』

簡單講一句。到了目前的階段，革命就是『團結的天啓』，而組織這個天啓，也就是牠們起碼的機能。

談話終結了。馬寧再也不能想出什麼反對論調了。他當了一回爭論的陪襯物——好一個義務的陪襯物！——之後，他便回到他的本來角色，成了馬爾勞在空中的一個理想的觀察者。

加爾西亞底技術政治的妄想，無需花極大時間來論駁。據我們所知道，軍事技術與生產技術的發展是採取同一步調的；牠們的相互關係並沒有因爲法國革命一個半世紀以來的物質的進步而有所變動。我們也知道在我們社會中是誰來使用機器——及機關槍；事實上，確定的講來，工人們是非正式的技師。末了，假如無產階級的領袖不能期望『以巡視成爲專家』，那末，加爾西亞那樣熱心引證的紅軍又是誰組織的呢？……不，并不是俄國革命給加爾西亞們『把事情弄複雜』，而是西班牙革命。在這些場合中，往往要找一個『革命的救主』，而這個救主歸根到底又一定是資產階級的救主。加爾西亞底想象的工程師等級就是克倫斯基的副本，克倫斯基也許已挽救了俄國革命——爲了卡尼洛夫；同時又是諾斯克和謝特曼的副本，他們挽救了德國革命——爲了希特勒。在西班牙的場合中，一定要給軍略造出若干漂亮的修辭學的辯解，而軍事當局，多謝共產國際，却利用這種軍略君臨於工人軍之上並恢復了資產階級國家，加強這個不穩固的機構而剷除革命的命根——這一隊『技師的精兵』造得正和 *Deus ex machina* 一樣的精妙。如果現在我們參證一下紀錄，我們便知道，事實上在共和軍西班牙裏沒有一個團體反對一支集中化的反法西斯軍隊的。戰士們之斯大林派分裂是在統制權的問題上——即究竟牠應留在工人手裏，抑或應該交還資產階級政府。像馬爾勞所虛構的那種仁慈的和公平的工程師的同伴關係是不存在的。問題是資產階級政府抑或工人組織。馬爾勞的技師精兵使我們想起道德的精兵或革命的僧侶，這種僧侶是西龍在『麵包與酒』中提出來代替馬克斯主義黨的。無疑的，兩種觀念都反映着共產國際的失

(接第二十六頁)

其中一個喊：「我們不是給這些流氓殺死，就要殺死這些流氓！」我在五十六團軍營過夜。晚上聽到震耳的一聲：我們的砲兵在麻雀山上轟擊克臨靈宮……第二天，人們又放我們出來，約有四十人；我們想一定去槍斃的，但到了尼哥斯該耶門，人們就叫我們在步哨前面走過，出去了。在聖華西里教堂前面的赤衛隊，舉槍對我們描準，我們向他們大聲喊：我們是紅黨。以後我就到區蘇維埃去。人們要我休息一下。我跑回家去。我已有半個月不履家門了。我吃了飯，就到扎莫斯科伏列趣參謀部去……」

這事情距今有十九年了。穆拉洛夫和斯密諾夫都還活着，我寫這幾行字時，很感動地想着他們。(註四)這二個人在一九二七年都宣佈擁護反對派而反對史大林。這二個人都被開除了，被捕了。斯密諾夫關了五年，剛放出牢獄到了流放地沒有幾天，又被捕了，又判五年徒刑，甚麼罪名，沒有宣佈。他在蘇達爾監獄中差不多變成瞎子了。他現在在那裏呢？穆拉洛夫做了莫斯科軍區司令好久。人們把他充軍到塔拉森林裏去。他仍舊做他的農學家職業，差不多八年長久；最近人家又把他逮捕起來了，加以甚麼叛國，陰謀，勾結希特勒等大罪名，他一定是逃不出劊子手之手的。

(註四)譯者按——本文出版之後一個月，即一九三七年二月，穆拉洛夫也給史太林槍斃了。那一案十七人中，他是唯一未寫悔過書的。斯密諾夫依然不知下落。與季諾維也夫同時被殺的伊凡，斯密諾夫是另一個人。

敗，但西龍的觀念是胸無城府的，是直接反對官僚主義而走向羣衆的，而且是以一種偉大底隱瞞的光暈去照明斯大林主義底道德和社會的破產的，馬爾勞的學說則好像一種婉曲法，牠不僅給黨的官僚利用來反對羣衆，而且還模糊了西班牙的真正決擇，模糊了該國所造成底決擇的真正性質。

根據牠的前提，我們可以預想『希望』非常詳細的敘述軍事的事情，而實在確乎如此。真正的英雄是共和軍，牠從工人的民軍中形成，又逐漸逐漸聯成一個單一的大組織，放在『統一的指揮』之下，隸屬於資產階級國家。這部小說的構造是由戰爭本身的邏輯來決定的，人物大都是充當各種行動園地的觀察者和詮釋者而活動的。事實上，大部分時間，我們都感覺得好像我們在閱讀某一超然底，滿懷人民陣綫思想底報告者的回憶錄，一個海明威或馬蕭士的回憶錄，這個人搜集了幾百種印象記和軼事，便匆匆忙忙的把牠們錄入他的書裏——這次戰爭的所有戰役，著名的功勳，第一流的人物，繪聲繪影的詳情——從Las Pasionarias到聲震蠻荒的鼓動的廣播，從無政府主義聯合會內的法西斯奸細到愛爾·格累哥斯的救護。在這一堆驚人的例證中，『希望』的人物要素已變得渺小和灰色了，而且都好像某種陳舊底文學形式的被遺棄的殘跡。馬奴哀爾們和加爾西亞們只是這個或那個觀點的代言人，他們自身缺乏任何生命，以便利用這個生命來把一種親切的模型加在軍事的小世界上。但即在這裏，在道德論調的領域內（小說的人物就在這裏，衡量他們的價值），空氣還是緊密和受拘束的；而且那些哲學——特別是那些對抗時行戒律的——正好像人物一樣，最後分析起來，都無法現實化。自由派，無政府主義者，沒有一個很自由去發展他底觀點所派生的一幕劇；也沒有一個能像『征服者』中的洪，幾乎可以逆轉作者用以打擊他的同情的洪流；但歸根到底，他們都有木偶式的機械的連接，而這些木偶的可能性最後又由他們底能動的關節和腹語者的意志來限制的。

『希望』是願望的產品，這裏所謂願望，不是文學的願望而是行動的願望，這種願望已終於和馬爾勞一起，代替了文學願望的地位。假如我們把這部小說和『人之命運』一比（在人之命運中，一個藝術家的自覺在每一種形式和意義底情調的差別中都非常明白），我們見到他把革命的小說改變成爲微弱虛構底報告的傳達工具——確乎是生動和值得一讀的，但可惜沒有形態或統一，而且只有極微薄底人性的內容。『希望』所露出的缺點——草率結構的痕跡，抑制的象徵——一定是由於人民陣綫宣傳方面的緊急需要，這種緊急需要的壓力，世界作家馬爾勞和新羣衆雜誌上一個普通的評論者是一樣感覺到的。而在我們熟讀那小說之前，我們還要注意，牠包含了對流行底煽動說教的另一些更重大的讓步；馬爾勞的許多特有的觀念，都已經變質或降格去遷就牠的要求。（未完）

*

*

*

*

*

馬克思致柯格爾曼的信

林超真譯

這次登載的兩封信，是關於普法戰爭的。他的某幾點意見，似乎也可以適用於目前的中日戰爭（自然這兩次戰爭在性質上是不同的）。

——編者。

第四十二號信

倫敦，十二月十三日（一八七〇年）

親愛的柯格爾曼：

你可以原諒我長久不寫信，倘若你知道，這次戰爭把總理事會底大部分外國通信員都吸引到法國去了，差不多一切國際通信都要我寫，——而這不是一件輕巧的事情。此外，在現時瀰漫德國的『郵政自由』之下，尤其在『北德聯邦』，更尤其在漢諾威，那是危險的，——不是對於我，而是對於德國朋友，他們收到我的信，裏面寫了我的對於戰爭的意見，在這個時候，除了關於戰爭的話，還能寫些別的甚麼呢？

譬如你問我要我們的關於戰爭的第一次宣言。我已經寄給你了，顯然是被人沒收去的。我今天再寄去我們的兩篇宣言，訂成一本小冊子的，以及俾士萊教授的論文，登在兩週雜誌，還有今日的每日新聞。這日報有袒護普魯士色彩，這些東西大概通得過的。俾士萊教授是『孔德主義者』，以此資格他必然看重一切種類的幻想；他究竟是個能幹而有勇氣的人。他是倫敦大學底歷史教授。

人家把邦那巴，他的將軍和他的軍隊，俘擄到德國去，似乎還不滿足哩；人家還要把全部帝制連同牠的劣跡移植到那橡樹和菩提樹之國去。（註一）

至於德國資產階級，則牠的因獲得勝利品而歡喜若狂，是絕不足使我驚異的。首先『獨佔』乃是一切資產階級底生命原則，佔取了外國省份總歸是『佔取了』的。其次，德國資產階級忍辱負恥嘗了不少他們的王公拳打腳踢的滋味，尤其是霍亨佐倫家的王公，——現在牠看見外國人也嘗了這個滋味

了，牠一定是很開心的。

無論如何，這次戰爭替我們肅清了『資產階級共和派』。戰爭以其恐怖消滅了這個黨派。而這是一個重要的結果。戰爭給了我們那些大學教授以最好的機會，來向全世界人眼前表示他們是一些奴顏婢膝的學究。戰爭造成的條件，將做最好的宣傳，而利於我們的原則。

這裏，在英國，戰爭初起時，人們是極端袒護普魯士的。現在完全相反了。譬如，在咖啡館中，德國人唱守衛萊茵時給人家喝倒采，法國歌人唱馬賽歌時大家則和着唱。除了民衆同情於共和國之外，那些『可尊敬的』紳士們也氣憤於普魯士和俄羅斯締結同盟（今天是顯然的）的消息，氣憤於軍事勝利後普魯士外交的傲慢神氣，氣憤於作戰行爲：徵發制度，焚燒鄉村，槍斃游擊隊，綁票，以及『三十年戰爭』時其他種種暴行之再演，——這一切都激起了普遍的憤怒。自然，英國人在印度，在爪哇等地，也是這樣的；但法國人不是印度人，不是中國人，不是黑奴；而普魯士人也不是。『具有天賦權利的』英吉利人。一個民族，常備軍已經消滅了，還繼續抗戰，這在霍亨佐倫家的人自然認爲是罪大惡極的。事實上，普魯士民間反對拿破崙第一的戰爭，確是這個勇敢的弗德烈·威廉第三底真正『黑獸』。祇要翻翻配志教授獻給艾斯鬧的歷史書，就可以知道了，——艾斯鬧在其頒發的『大動員』令中把游擊戰爭立爲一種制度。弗德烈·威廉第三，看見了人民沒有上頭命令，但憑自己力量作戰，亦爲之慘然的。

但『未曾作戰之前不要唱凱歌』。戰爭還會轉到很不利方向去的。人家未曾把羅亞區底抵抗力算進去。德國軍隊之向左右分散，似乎是要恐嚇敵人，但結果祇有喚起各地方的防禦力量而削弱進攻力量。人家用砲轟來恐嚇巴黎，但這也是一個簡單的玩藝兒，對於這大城本身多半是不會有甚麼嚴重影響的。即使打毀了幾個堡壘，即使轟破了幾處城牆，但如果被圍者人數多過於圍城者人數，那有甚麼用處呢？倘若被圍者衝出城外來打，而圍城者躲在障礙物後面自衛，形勢倒轉，那又將發生甚麼事情呢？

斷絕巴黎的食糧，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但若原定的期限延長下去，足夠讓軍隊組織起來，讓各省實行游擊戰爭，則不過是轉移重心而已。巴黎即使

註一：橡樹和菩提樹之國 按指德國。

投降了，也不肯讓人家佔領的，而且以若干人保持其身份，則侵略的軍隊要有一部分被固定着不能動彈。

但不管戰爭結果如何，法國無產階級總因之而學會了使用武器，而這正是未來之最好的保證。

俄羅斯和普魯士對於英國的傲慢神氣，足以引起完全料想不到的而且很不愉快的後果。問題底關鍵就在這裏：由於一八五六年巴黎條約，英國自己解除武裝了。這是一個海上強國，牠在大陸上大強國之前，祇有以海上戰爭的手段才能舉足輕重。牠所能使用的有效手段，就是一時斷絕大陸國底海上商業。這手段主要地是依靠那條原則之應用，即：中立國船隻裝載的敵國商品，可以沒收之。由於巴黎條約附件底聲明，英國人已經放棄這個『海權』了（如同放棄其他類似的權利）。克拉楞頓奉了俄羅斯人巴默士頓底秘密命令，做這聲明。但這聲明並不構成條約底不可分離部分，也從未曾在英國合法批准過。那些俄羅斯先生們和那些普魯士先生們是想錯了，倘若他們以為英國王后（她與普魯士有親戚關係）和格拉斯東（資產階級底愚蠢）將於緊急時候阻止約翰牛擺脫其自己造成的枷軛。約翰牛始終能夠於幾個星期之久麻煩一下俄普二國底海上商業。那時我們就有機會看見彼得堡和柏林那些外交家拉長面孔了，以及我們那些愛國派底拉得更長的面孔了。冷眼看看罷。

敬向伯爵夫人和小弗蘭慈問好。

你的卡·馬

再者：你能寄我溫托斯特（註二）在國會的各種演說稿麼？

第四十四號信

倫敦，一八七一年二月十四日

親愛的柯格爾曼：

從你最近的信，知道你的身體又不好了，我的心裏很難過。至於我，則秋天和冬天那幾個月中，我的身體是相當好的，雖然上次在漢諾威作客時感染的咳嗽至今還在作祟。

我會寄給你，登了我的信的那一期每日新聞（註三）。大約被扣了，同以前寄的東西一樣。這回我剪下來寄給你，此外還有總理事會底第一次宣言。

免責王舌，我即討論了耳聾以下各月的書報，且因七月廿七日重刊七卷。

你知道，我對於那些資產階級英雄的認識。但朱爾·法佛一夥人（自從臨時政府和加外雅克時代以來就著名的）却超過了我的意料。他們一開始就允許那個『正統的佩刀』那個『愚蠢軍人』，——布朗起很正確地稱那個特羅秋，——得以實行他的『計劃』。這計劃就是在於把巴黎底消極抵抗極端延長一直到沒有飯吃的時候，同時又限制反攻於『伴戰』範圍之內，於『拍拉圖式的突圍』。這并非我的簡單的猜想。我見到了朱爾·法佛自己寫給剛必大的信，信內，他訴苦說：他以及被圍在巴黎的其他政府大員，都不能推動特羅秋認真採取攻略。特羅秋始終回答說：那時，巴黎那些『煽亂分子』就要佔據上風了。剛必大回答他說：『你自己宣佈自己的罪狀了』。特羅秋倚仗他的布列壇衛隊——他們服侍他，正如科西嘉人服侍路易·邦那巴——不去打普魯士人，寧願來鎮壓巴黎紅黨。這便是戰敗又戰敗之真正秘密，——不僅巴黎如此，法國各地都是這樣，各地資產階級都是遵照同樣的原則行動，與地方政權的多數派聯同一致。

特羅秋的計劃實行到了頂點之後，巴黎被迫非投降即餓死，此時朱爾·法佛一夥人應當乾脆地追隨土爾要塞司令官的榜樣了。他不投降。他祇限於向普魯士人宣布：糧食缺乏，迫得他不能防守，祇好打開城門，讓他們為所欲為。

但朱爾·法佛正式簽了投降書還是不滿意。他宣布了，他自己，政府同僚以及巴黎，都是普魯士國王底俘虜之後，他還那樣荒唐，出來代表整個的法國。他知道，巴黎以外的法國是怎樣呢？絕對一點也不知道，除非是俾士麥施恩通知他的。

註二：溫托斯特 Ludwig Windthorst (1912—1991) 德國工會反

對俾斯麥派之領袖。

註三：每日新聞登載的馬克思底信 按一八七一年一月六日馬克思致倫敦每日新聞一信，該報加以『德國之言論出版自由』之標題登載出來。信內，馬克思借俾斯麥抗議法國壓迫言論和選舉一事，而列舉普魯士種種壓迫自由的事實，如：逮捕伯爾爾和李卜克內西，控告布倫斯威克社會民主黨委員會，解散工人同情於法國的集會，頒布全國戒嚴令，

二步也即反馬克思論。

不止此哩。『普魯士國王這些俘虜先生』，還進一步，聲明說：法國政府逃往波爾多而至今尚自由的那一部分人，已經失去全權了，須得與他們一致才能行動，即須得與『普魯士國王這些俘虜』一致。既然是戰爭俘虜，他們祇能依戰勝者意旨行動了；那麼事實上他們就是宣布普魯士國王為法國底最高權威。

路易·邦那巴自己，在綏丹投降之後，還比較知恥一些。他回答俾士麥底提議道：他不能參加任何談判，因為做了普魯士俘虜，他在法國已經沒有任何權力了。

朱爾·法佛至多可以有條件地接受法國全境的停戰，即以波爾多政府（註四）批准這協定為條件，——惟有波爾多政府有資格和權力，同普魯士簽訂這休戰條款。如此，就不會容許普魯士人將東戰場屏於停戰之外，而且如此有利地擴大他們的佔領線了。

他的那些俘虜盜竊了權力，以俘虜資格仍舊冒充法國政府，以此俾士麥就趾氣高揚起來了，他毫無拘束地干涉法國內政。這個貴族，他抗議剛必大頒發的關於國民會議選舉的命令，藉口說這命令妨害了選舉自由。事實上剛必大也可以回敬他一個抗議，反對戒嚴法以及取消德國國會選舉自由的一切。

我願意俾士麥堅持他的議和條件！賠償軍費四萬萬鎊，有英國債務底半數了！資產階級自己將明白這個！他們也許終能明白：繼續抗戰下去，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形下，他們也有所得的。

民衆，知名的或不知名的，祇能照外表，照皮面，照眼面前的成敗來判斷。在二十年之中，民衆奉路易·邦那巴為人世間至高無上的尊神。在他的最榮顯時期，我也就揭破他的假面，顯示他是個『凡庸的流氓』了。對於俾士麥，我也有同樣的認識。然而我以為俾士麥若是在外交上不受他人拘束的話，決不至如他表現的那樣愚蠢的。這個人給俄羅斯相府羅在網裏了，惟有獅子能扯破這網，而他不是獅子。

譬如俾士麥向法國索取二十隻最好的戰艦，以及在印度的碰狄舍里殖民地。這種念頭不會出於一個真正普魯士外交家的。他一定明白，碰狄舍里割歸普魯士之後，不過是英國的東西暫寄在普魯士罷了；英國也隨時可以捕獲這二十隻戰艦（普魯士的），在牠們開入波羅的海以前。這類的需索，從普

魯士觀點看來，祇能有一種不合理的目的，即在普魯士人未出『法國森林』以前就惹起約翰牛底猜忌。但俄國正有利益造成這個效果，為得更加固結普魯士底附庸地位。在英國資產階級底和平觀念之中，這類需索確定激起了完全的改變。所有的人都大呼主戰。這個對英挑釁，威嚇牠的利益，甚至使資產階級瘋狂起來。爲了普魯士這種『明智』，格拉斯東一夥人多半會被踢出政府門外，而代之以對普魯士宣戰的內閣的。

他方面，在俄國，前途是不甚令人放心的。自從威廉搖身一變，做了皇帝之後，舊莫斯科黨，反對德國的，以皇太子為首，完全重佔上風了。這黨有輿論做後盾。她不贊成戈恰可夫底機敏的政策。所以俄國皇帝也許要完全改變他的外交政策底方向，或者也要像他的前代亞歷山大第一和保羅彼得第三那樣被人篡弒了。

倘若在英俄兩國同時發生那樣的政治變化，那時普魯士怎麼辦呢？那時的東北和東南邊疆都沒有防備，而德國底武力也竭盡了。不應當忘記了，普魯士屬下的德國，從戰爭初發時起，就送了一百五十萬人到法國來，現在祇剩下七萬人調動了。

表面上雖然相反的，法國情形却很可樂觀。但願法國堅持着，但願牠利用停戰機會來改組牠的軍隊，最後給予這個戰爭以一種真正革命的性質。——這個狡猾的俾士麥盡他的能力向這方向做去，而新生的『普魯士日耳曼帝國』一定要出乎意外受人一陣鞭打而代替洗禮的。

敬向伯爵夫人和小弗蘭慈問好。

再者：有一次你信上說起哈士克陶生底一本書，關於魏士發里地方地產繁榮條件的（我想是這樣）。你將這書寄給我一定使我喜歡的。請你將附寄之件寄給雅可比博士（昆尼斯堡），但爲避免麻煩起見，須將郵資付清。

請你的夫人將雅可比博士底地址寫在附寄之信上。

小燕妮求我代問格特柳德，弗蘭慈和溫色斯拉士問好，我就代她問了。

註四：波爾多政府 按普法戰爭，法國戰敗，即遷政府往波爾多，政府領袖剛必大也在波爾多，而留一部分人在巴黎；巴黎留守政府首腦就是朱爾·法佛，特羅秋則爲城防司令。

「法蘭西內戰」(書報介紹) 君衡

馬克思著 恩格斯序 郭和譯

上海金星書店經售

『法蘭西內戰』與『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乃是馬克思應用他自己唯物史觀方法來解釋事變的兩部名著。而尤以前者在理論上的價值，更屬偉大。列寧關於國家與革命的全部學說，就是發揮了馬克思在該書中所表現的思想；而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就是此種思想的體現。當此大戰與內戰行將交織的時代，此種思想更具有實際的意義了。因此，我要把這本小書，介紹給一切認真想把握住馬克思分析歷史的方法的人。

『法蘭西內戰』是馬克思代表當時的工人國際，為巴黎公社而發的一篇宣言，後來恩格斯又加入了馬氏對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而發的宣言兩篇，並附一長序，構成本書。牠在形式上雖然是宣言，但內容却決非簡單的鼓動。誠如恩格斯所云，這些『均為顯示著者可驚的才能的最好標本』。

要把『法蘭西內戰』書中的全部思想，以及著者處理事件的方法，加以說明，那不僅為這一短文所不能，亦且為本文作者所不勝，所以在這篇介紹裏，祇能把該書中某些重要思想，在目前發生的大事變中，加以零碎的觀察吧了。因此，本文以其說是『介紹』，倒毋寧說是『讀後感』還要適當些。

要預見歷史的進展，必須懂得唯物史觀的方法，否則等於瞎子算命，沒有不被事變所打擊的。恩格斯在他的序文中，稱述馬克思關於普法戰爭的

宣言有先見之明，但是他自己的先見却更遠，他在一八九一年的序文上說：『這一戰爭，將置全歐洲於一千五百萬以至二千萬武裝人們的劫掠之下，而且牠之所以尚未爆發，祇因為即使對於那軍事強國中之最勝者，亦屬全難預料牠最後結果的緣故。』(內戰第四頁)

二十三年後，這樣的大戰果然爆發了，再過二十五年，並且還爆發了第二次這樣的大戰。

帝國主義者誠然不能預料到戰爭的最後結果，但牠為什麼竟敢一再從事戰爭呢？這就不得不感謝那些『馬克思主義者』的幫忙了。他們用了革命的名詞，欺騙民衆，以社會愛國主義與陣綫論等胡話來麻醉人們，分裂世界的工人階級，使全世界『幾千萬武裝人們』甘願去替各『自』的統治者充砲灰。

這些社會愛國主義者與陣綫論者的最大不幸，就是忘記了，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所發揮的國家學說。據他的意見，國家是什麼？『國家祇不過是這一階級壓迫別一階級的壓榨機，這在民主共和國或君主國(現在應該說成法西斯——衡註)裏都是一樣的。』(內戰二五頁)

但現在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以民主對抗法西斯，(現在雖然一下子拋棄得干干淨淨了)，而且還號召一切被壓迫者起來為統治階級的『壓榨機』而作戰，即保衛一切資本家的『祖國』。

不過雖然如此，管理着這架壓榨機的各國統治者，却是明白這個階級理論的，所以在『階級統治不能以民族的制服來加以掩飾時』，『各個民族政府當牠們在反對無產階級時』，便變成了『一體』！(同上一六七頁)

反之，『馬克思主義者』替統治者把工農的手

足縛住，已經沒有革命的威脅時，帝國主義便進行分割世界的戰爭了，一直到戰爭把民衆從社會愛國主義的迷夢中喚醒，他們才再由戰爭走向聯合，向世界任何地方的革命火燄進撲。當德法聯合鎮壓巴黎公社，協約國聯合進攻初生的蘇聯時，都是這一真理的證明。

這樣看來，要終止統治階級的世界大戰，唯一的方法就是各國民衆聯合起來行動。第一國際對德法戰爭所取的態度就是如此。當時工人國際的巴黎會員號召說：『法國，德國，西班牙的工人啊，讓我們的呼聲在反對戰爭的一致呼聲中團結起來……有些免除血稅負擔的人，看見大眾的不幸又是新投機的源泉，我們——需要和平，工作，與自由的我們，特提出抗議以回答這種人的愛好戰爭的歡呼，德國的弟兄們啊，我們的分裂，將不過造成萊恩兩岸的專制主義的完全勝利……我們……無分界域，僅向你們表示法國工人的好意與敬禮，作為不能分離的團結的保證。』德國工人響應說：『……我們歡欣鼓舞來握法國工人伸給我們的友誼的手……各國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啊，永不忘記這一國際工人協會的標語，我們永不忘記各國的工人都是我們的朋友，各國的暴君都是我們的仇敵。』(同上一三五頁)

由德法戰爭產生出來的巴黎公社，是工人階級為打破階級統治而奪取政權的第一次嘗試，十月革命是踏着巴黎公社工人的血跡前進的，後者，承受了前者的經驗，完成了前者未竟的事業——現在蘇聯的官僚層雖已墮落到與法西斯攜手，但戰爭的後果將超出希特勒和史大林的預算——復興蘇聯，與爆發歐洲的工人階級革命。

在這思想混亂的時候，研究馬克思分析巴黎公社的專門著作，作為反對世界戰爭與革命策略的指針，這是最迫切的任務了。

俄國革命軼史(續)

維多·綏奇作
林伊文譯

誣讒，這毒物！

七月四日(一九一七年)夜間，蘇維埃機關走廊內發生一種神秘的謠言。——你知道什麼新聞麼？是的，列寧和托洛茨基賣國的證據已經發現了。一些確實無疑的文件，從德國參謀部弄來的，就要公佈了。一些已經譯出的電報。一些簽了字的收條。他們收過了好幾百萬了。

全世界報紙大字標出：布爾塞維克黨人是德國收買的密探！

陰謀之線索引到斯托哥爾摩去，那裏有一個德國偵探機關。克倫斯基認爲已經有了『非常嚴重的證據』。人們公佈一封信，據說是某處郵局檢查出來的，信內一位德國男爵『慶賀布爾塞維克黨人，爲了他們的行動，』而且預先見到『柏林的人將要歡喜的。』人們記起了，列寧，季諾維埃夫及其他二十幾個俄國社會主義者，當初是坐在『鉛皮車箱』內，經過德國回到俄國來的。(在途中，列寧拒絕見客，尤其不肯見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他說：『若是李卜克內西來，則極願接見！』)自由派總長米留可夫說起了德國黃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開始進行偵查了，結果雖然不起訴，歷史也不容許其結束的。俄國從前防止間諜活動機關底一個探員，指教我們說：『那些偵探，在訪案時候，常常自己偽造證據，』但接着，出人意外的，他證明出：不僅布爾塞維克黨人是賣國的，連反對布爾塞

維克的人也是賣國的。照他的意見，祇有防止間諜活動機關底探員不賣國，但他們的時間都耗費在偽造賣國證據上面……

這個烏士雷諾夫寫道：

『防止間諜活動機關的報告，關於列寧過去的活動，關於他與德國參謀部的關係，關於他收受德國黃金的事實，——都是實實在在的，應當立刻處他死刑。』

克倫斯基絲毫沒有照這話做，因爲他自己就是『人所共知的』賣國賊。

我重提這些事實，乃是因爲誣讒，這毒物，有一種奇異的命運透過俄國革命，而我們看見牠今日又在俄國以同樣方式復活起來了。一九一七年，德國黃金的神話不久就銷聲匿跡了；在社會鬥爭底可歌可泣的幾年中，誣讒無所施其技；直到十年之後，一九二七——二八年間，牠才又出現，而且從此時起，牠就飛揚跋扈令人駭怪了。

走向政權

一九一七年九月，哥尼洛夫將軍底叛變悲慘地失敗了，於是形勢完全改變。現實是比那些依據『雙偵探』機關所偽造的證據而造成的誣讒人的神話更加有力的；現實指示出：誰是革命的，誰是空談的，誰是演滑稽戲的，誰是反革命的。克倫斯基政府露出真面目來了：原來是搖擺於兩種可能的專政中間的一個幽靈。或者那些將軍，他們在反動方面

是惟一能明見的，而且操有武力，——在社會不安定時期，一個副官也知道威權對於有錢人有什麼好處的，——或者他們明天再開始這個把戲而得到成功，而革命又上了拿破崙主義的老當；或者工人，兵士，農民，蘇維埃，布爾塞維克黨，用暴力手段奪得政權，既然沒有其他的手段。在軍人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中間，有什麼共同解決方法可想呢？

列寧和托洛茨基看得很清楚，他們提議，催促，命令並進行奪取政權。一個做黨的首領，打破了障礙，終於說服了黨；一個做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首領，在蘇維埃組織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分配武器給工人，運動革命的衛戍軍不服從臨時政府並離開首都。這事實上已經是暴動了。

這兩個人，面對面時，往往帶點憂慮互相望着。他們太迫切自覺得缺一不可了。

『我們二人，』一天，列寧問托洛茨基說，『若是被殺了，你相信布哈林和斯衛德洛夫擔負得了這責任麼？』

從前，我曾以如下一段文字描寫這二個人在一九一九年的狀況，現在我覺得沒有一點需要修正的：

『專門家出去了。二個人還留在「最高會議」中間，這會議，就牠的憂愁面目說，就牠的蓋滿專門數學的紙張說，確然極像一個虧空極大的企業底經理部會議。負的方面：布達佩斯特的白色恐怖，漢堡的失敗，柏林的消沉，巴黎的消沉，約翰·朗格底猶豫，奧勒爾的喪失，圖拉的威嚇。負的方面：我們這裏甚麼都沒有，我們正從貧困，黑暗和不斷失敗之中出來。正的方面：意大利來的電報，杜靈地方的罷工，西比利亞森林遊擊隊的戰功，華

盛頓和東京間的敵對，塞拉雷和布里松寫的論文。正的方面：科學，意志，無產者底血。還有正的方面：肋膀受了戰傷的文明驚人底衰落。在宣傳上說，被芬蘭白色恐怖屠殺的一萬一千人，可以算入正的方面去……

『在這頃刻，在羣衆底靜寂和辛勞當中，辯論取決於二顆頭。這就是到處懸掛大家鑒見的二幅肖像：在人家中，在辦公室中，在俱樂部中，在報紙中，在阿諛人的照相館的玻璃窗中，在公共建築物底大門中。有一次，在煤礦收歸國有大成功之後，這二個人興致極佳，曾用嘲諷的口氣論及這個肖像崇拜說：「不知道消費了多少肖像哩！你說，你不以為是過分了麼？」——「這是人心擁戴的反面，我的朋友，這是那些投機分子，那些蠢才，故意誇大的。」他們二人都是善於譏刺的，但性格不同：一個是和悅可親的人，光禿的寬闊的額頭，兩頰微聳，鼻子很大，鬚鬚微帶赭色，顯出健康，樸素和機警。時常愛笑，笑時眼睛縮小，充滿了綠色的火花。這時他的大額頭有點突出，嘴吧張大，現出一種愉快的表情，看見他的人會覺得有點亞洲人底相貌夾雜在這個歐洲人底相貌中。——另一個，則是猶太人，有時現出鷹一般的醜陋在那生着有力兩唇的嘴角皺紋之中，眼光裏露出一種銳利的聰明，一種人類領導者底頭部姿勢，一種內心的確信，淺見的人也許以為是舊式的驕傲，而且在他的笑中又好像戴着一個糜非時特式的面具，因為這個人還能感到那種青年人底快樂，在他們看來，整個生命正在待他們去佔取的。他們嘲笑他們自己的肖像。一個說：「但願我們能多活幾時，阻止這些肖像的複印！」另一個說：「但願我們能多活幾時，免得被

人家奉爲神明！」他們明白，非依靠在最古老的岩石上不能轉翻世界的。」（註一）

這二個人，並不是自從有了Duce, Grasse, Fisher, Chet Genial等稱呼以後那樣意義下的領袖。他們的受人擁戴，並不是人爲的或強迫的，而是自成的，由於他們應得的信任。人家公然議論他們的言行。不僅如此，人家還反駁他們。若是敵人，他們就一面聳肩，一面回答；若是勞動者，他們就平心解釋，人家也常常使得他們的主張祇有少數人贊成。這是同志中的兩個人，那些有危險性的蠢才要把他們抬高於同志或黨之上，是要受他們嚴厲責罵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無時無刻不是過着一種集體的生活。黨內辯論着，種種傾向不時發生又不時消滅。而且，在國內，反對派分子——這是不可以同反革命派分子混爲一談的——不停息地公然活動着，在整個國內戰爭時期，即是說直到一九二一年。到了一九二五——二六年，反對派分子才完全看不見了。當一切黨內生活完全消滅時候，而且正因爲這個緣故。列寧當初曾邀請他的老政敵，孟雪維克領袖，馬爾托夫和但，來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辯論。無政府主義者是這個委員會中一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初時參加政權至好幾個月長久。他們祇因企圖暴動，而且一九一八年七月間在莫斯科街上開放大砲，才被驅逐出政府以外。沒有人想到爲一個至高無上的國家而拚命的，人們是爲一個新的自由，而奮鬥，而死。布爾塞維克主義向羣衆和世界宣告一個前所未見的自由勞動者民主制，而得到勝利。斯衛德洛夫起草的第一個蘇維埃憲法，保證勞動者一切自由。譬如說，當時絕不是想，在暴動勝利之後取消出版自由，而是要『廢除

資產階級對於出版物之壟斷。』爲此緣故，必須禁止反動的出版物。這些東西本是誣造謠言底慣家，但托洛茨基說：『每個公民團體得自由使用印刷機關和紙張。』列寧有個計劃，規定每個公民團體，有一萬或一萬五千勞動者擁護的，若是願意，則有權出版一份日報。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勝利（註二）

應該時時刻刻提醒一件事，即是：關於俄國革命所用的字眼，如領袖，黨，蘇維埃，羣衆等，都完全改變意義了，一般說來，都變成與希望和勝利那幾個偉大年頭所用的剛剛相反的意義了。必須細心改造過初期全部歷史，而且還不止此哩！在十月暴動時候，所謂領袖不過是最前列的；說話最有人聽的，最够資格的戰士而已；所謂布爾塞維克黨不過是最能表示羣衆感情的政治組織而已，牠的行動是受人擁戴和有定數，便是由此而來的。

在緊急關頭那幾天，這個行動，我們試借助若干罕見的稿件，描寫一個輪廓。布哈林在一九二二年發表的一個文件中，這樣敘述：

『……這是在彼得堡，當民主會議時候：你試想像冬宮，還有在那裏的克倫斯基，——他剛從莫斯科回來，他在莫斯科召集一個不幸的政府會議，莫斯科工人用總罷工來迎接他，甚至「首都飯

（註一）維多綏奇——被征服的城。我這頁書是在列寧格勒寫的，所以沒有寫下二人名字，怕的『黑局』不肯放過我的稿子。

（註二）即俄國舊曆十月二十五日。

店」底僕役也拒絕服侍那些代表老爺……這裏先說一說此時我們黨內底一件秘密事。列寧藏起來了。克倫斯基召集的民主會議快要開會時候，我們的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我們的策略是很明白的。在羣衆中鼓勵和宣傳，準備那即要爆發的暴動。我剛走進會場時，彌柳廷即趕到我面前來，告訴我：「收到了一封信，布哈林同志，一封短信。」

這信說：「你們如果不立刻遣派布爾塞維克黨人到工廠中去，你們如果不包圍和逮捕民主會議那些流氓，那你們就是渾蛋和叛徒。」全信都是用這種口氣寫的，而且充滿了恐嚇。我們大家都說一聲「啊哈！」從沒有人這樣粗暴提出問題。大家不知道怎樣辦才好。以後終於成立一個決議。這恐怕是黨史上僅有的一次：中央委員會一致決議焚毀列寧的一封信。這事情沒有公開出來。那時我們是站在列寧底右邊；你們曉得，列寧并非每次都教人慎重和見機的，他能夠向左跳躍，——而且錯誤……我們否決他的要求，因為我們以為奪取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兩地政權，並解散民主會議，固然毫無疑義可以成功的，但在俄國其他地方則我們的地位未能鞏固。但我在民主會議中看見一幕小小的戲，很能夠表示羣衆的精神狀態。克倫斯基演說之後，托洛茨基上台發言。克倫斯基一夥人有好多水兵圍繞着，那是克倫斯基調來保護會場防止布爾塞維克甚麼攻擊的。我看見托洛茨基說完了話，從演說台上下來，於是我們都到那些水兵羣中去，他們揮動槍上刺刀向托洛茨基：使用這傢伙的時候，是不是快到了。臨時政府底薄弱隊伍已經給我們爭取過來了。」

這是九月中旬，即暴動前六星期發生的事情。

暴動發生於蘇維埃第二次大會開幕之日，在彼得格勒的勝利沒有遇到甚麼困難，在莫斯科的，則頗艱苦。其他好多地方已經自發的暴動起來而且勝利了，譬如在卡贊和在塔什干，那裏蘇維埃和軍隊沒有等待上頭的訓令。好久以來，克龍斯塔德和波羅的海艦隊就已自由行動了。克龍斯塔德很受布爾塞維克和無政府主義者影響；艦隊則服從黨的指揮。

安東諾夫·奧夫先珂，現在是蘇聯駐巴塞倫那的總領事，他曾以如下的話敘述攻佔冬宮的情形：

『我坐着汽車馳向參謀部去。我們穿過百萬街我們的崗位；冬宮週圍零亂的槍聲，好多軍人投降過來了。黑暗。步槍機關槍底聲音。沿着街道，一羣的海陸兵士和赤衛軍奔赴宮門去，接着又退回來，傍着牆邊退，當一些躲在柴堆障礙物背後的志願兵開槍時候。最後，大砲沈重地響了。響而又響。這是尼瓦河對岸彼得保羅砲台在說話。「不可以叫他們投降麼？」楚諾夫斯基提議說，他剛領帶巴佛洛夫團的人走來，他仍像平時那樣勇敢而多話的。我答應了。大砲的聲音是有效力的。娘子軍投降了。她們啼哭着說：『她們再不敢了！』軍官學校投降了。那些志願兵把槍一束一束架在人行道上，走開去，有人護送他們。楚諾夫斯基要還他們的槍，但我不肯。其他的志願兵還抵抗了一個鐘頭。從一個狹隘的螺旋形樓梯攻擊他們，是很困難的。他們好多次逼得羣衆後退。但他們終於屈服了，叫人告訴我們說他們不抵抗了。我同楚諾夫斯基上樓去，到皇宮房間之內。殘餘的障礙物，牀墊，兵器，毛被，麵包屑等，狼藉滿地。一羣異樣裝束的人跟我們背後。我們攻進各層樓房，志願兵投降了。我們忽然來到一個寬大的廳堂，一隊青年人

橫着長槍守着一個門。他們遲疑了一會。我們走近臨時政府這最後的衛隊跟前去，我和楚諾夫斯基；他們呆得同木雞一樣。我們很不忍心奪去他們手中的槍。「臨時政府在這裏麼？」——「在這裏，」一個志願兵很巴結地說，接着低聲告訴我：「我是你們方面的。」舊俄羅斯最後的資產階級政府就在這裏了。這十三個人，——因為克倫斯基早晨已經逃走了，爲的去「請救兵」，——圍坐一張桌子，嚇得臉無人色。我們將他們逮捕起來。大家要當場把他們斃割了，但我們派一隊人護送他們到彼得保羅要塞監牢內去。」

距離幾百公尺，停泊在尼瓦河中的巡洋艦曙光號，上面有些革命黨人正在等待對冬宮開砲的命令，——他們已經開過幾響空砲了。

『我們正待發出最後的命令，這個命令一實行，那些「民主的」總長和那冬宮都要沒有命的。我們決定等待一刻鐘，本能的覺得局勢會改變的。果然不錯。最後幾分鐘快過去了，忽然直接從冬宮來了一個信差：「冬宮已攻下來了。」我們快活了，這次是雙重的快活，因為我們正要開砲，而這個不知名的水兵却是冬宮的救星，——當時沒有想到問他的名字。

我立刻和一個同志坐汽車到斯摩尼去。汽車是水兵們弄來給我們的。在此地經過的資本家和官僚乘坐的汽車，給他們扣下五輛來。

彼得堡的街道，是平靜而寂寥的，毫沒有暴動底痕跡。一些革命的兵士在十字街道烤火，他們並不留難來往的汽車。我們還看見燈光明亮的電車，裝滿了乘客。總而言之，沒有一點革命底痕跡。在斯摩尼，大會代表們剛剛散會，初步討論過蘇維埃

共和國政權機關，這個共和國是如奇蹟般瞬息間造成的。一切都辦好了，我可以回船睡覺去了。

第二天，我們決定洗清一點空氣，並且把我們的革命刺刀顯給資產階級雜種看看。水兵巡邏隊出發到中心區去，奉令解散密聚的羣衆。水兵巡邏隊有平定奮昂空氣的效力。他們常常帶回來武器，手槍，佩刀，步槍，以至於炸彈，作爲擄獲品；他們也捕得嫌疑份子：軍官，醉漢，舉止闊綽的資產階級先生，衝鋒隊的兵士。我們非常寬厚待遇他們；問了幾句口供，就放走了。若是兵士，我們就勸他們快點穿起裙子來，這一切都是大聲笑着做的。我們拿罐頭給醉漢吃，以後就送他們在一間大房子睡覺。如此款待這類主顧，不久就傳開了，我們的船上很快充滿了醉漢。於是水兵們想出了另一種待遇方法，這在秋天是很難受的：即是將他們浸入河水中去，他們立刻甦醒了，而我們也很快解除他們的纏繞了。」（註三）

傑克沙都十月二十六日（即十一月八日）寫給法國國會議員阿爾伯·托馬士的信，這樣說：

『我的好友：——這是暴動的日子。今天早晨，我到特使館去的時候，看見人家從穆依卡河撈起圖曼諾夫底屍首，他是陸軍次長，昨夜兵士們逮捕了他，用刺刀戳死他。人家開玩笑，把他的屍首安置在一架矮車之上，送到無名待領的停屍所去。』

消息是有利於布爾塞維克黨人的。冬宮先受砲擊，後被劫掠了。一切藝術品，織氈，傢俱，圖畫等，都被殘暴地搗毀了。保衛冬宮的娘子軍，成了俘虜，被人送到一個軍營強姦去。其中好多是資產階級少婦。臨時政府大多數閣員都被捕了，克倫斯

基在逃。軍隊落入於革命黨人之手。」

沙都這裏說的搶劫冬宮的事情，不是實在的。無疑有些兵士未曾受到戰敗者應享的待遇。但一般說來，差不多沒有甚麼過火的事情。同一信中又說：

『我又會見革命黨底諸大領袖。我認識了列寧和托洛茨基。……早晨一點鐘休息的時候。我和托洛茨基說話很久，幾分鐘之後他就要被選爲外交總長或外交人民委員了。』

第一，要問他對於暴動的意見麼？

整個革命是有牠的命運的，成敗不能逆料，但成功的可能性很多。暴動經過極細心的準備。組織普遍了全俄國境，成立了一千多個委員會，軍隊從此差不多全部運動過來了。農民羣衆將爲大地主土地之沒收所引誘。有這二種份子擁護，運動應該能成功的。祇消一掃帚，便可掃除那些當權的庸碌人和軟骨頭。」（註三）

在莫斯科，巷戰經過了六天長久，發生了一些駭人的事情，譬如克臨靈宮兵工廠工人被那些保衛民主政制的人所屠殺。暴動發生之前日，穆拉洛夫就去研究暴動底技術問題，——他是布爾塞維克黨一個英雄，二月間就帶領幾個兵士去佔領公共機關了，舊都帝制政權就是這樣場台的。他寫道：

『我尋覓一本小冊子，巷戰策略，那是本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但我尋不着。這書，某次檢查時候失掉了。我祇好憑頭腦去記憶，并設法與認識的軍官談論這個問題。』

穆拉洛夫打仗好像一個魔鬼。當蘇維埃戰士覺得一切都完了的時候：

『砲兵開來同我們的步兵聯絡了，我們又振作

起來。我忘記了那時有幾尊砲，但我們的砲兵首領佛拉底彌·斯密諾夫大概還記得的。』

於是我去查考斯密諾夫底著作，我找到了有一頁極生動的描寫，關於這件事情：

『當我走去通知那些兵士，說我們已受包圍，而革命委員會要我們撤退時候（那是在夜間，他們疲倦得要死，正在睡覺），他們滿不在乎地回答我說：「我們不走！」』

第二天，我們在一點上採取攻勢，有相當成功，鼓起了我們的勇氣；又第二天，我們的一隊人佔據了斯特拉斯特乃耶修道院底塔，那裏本有志願兵帶着一架機關槍把守的。這天夜裏，我奉令同二個同志到霍登卡砲兵旅去，攜來二三尊大砲，安了一尊在斯特拉斯特乃耶廣場上，爲的轟擊前總督底邸宅。祇消幾砲，就把一隊學生軍打得落花流水了。當他們被解往蘇維埃去的時候，我們費了許多力氣才能說服護送的兵士勿把他們殺死。革命委員會於是決定一個總攻擊，我奉命去請求第五十五團步兵來增援。我們坐在一輛紅十字會車內，門窗都緊閉着。我們路上給軍官學生捕住了，送往亞歷山大中學去。人家搜查我們。五十五團一個青年軍官認識了我，一把抓住我的領口，嘴裏喊道：這是一個布爾塞維克，應該立刻槍斃。我在那裏過了一夜或二夜。以後一天晚上轟了一響大砲，他們把我們大約八十至一百個俘虜放出來，由軍官和學生護送到克臨靈宮去。護送隊長特魯伯斯哥依親王叫兵士：「俘虜若回頭看，儘管將刺刀戳進背後去。」到了克靈臨宮，軍官們辱罵我們。（接第二十八頁）

（註三）弗列洛夫斯基底迴憶錄。

讀者通信

編者

編輯先生：

從書店裏買來一份『動向』的創刊號，回家翻閱後，正如張道同先生所說的，我驚得好似在漫無邊涯的沙漠中發現了綠草與清水一樣。

『動向』的價值，我不想用許多累贅和華麗的詞藻來形容牠，因為事實上的證明將比我所讚美的更有力得多。但我仍不能不說，在目前這個烏烟瘴氣籠罩着一切的孤島上，能够運用馬克斯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以無所顧忌的態度來探討各種問題，並從而指出真理所在的刊物，除了『動向』之外還有誰？

我深信『動向』有牠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假如不受到外來的阻礙和壓力的話，『動向』的飛躍的發展是必然的，『動向』的將爲一切愛好真理的人士們所接受和擁護更是毫無疑義的。我慶賀『動向』的誕生並祝福『動向』的前途。

末了我對於『動向』有幾點小小的意見：

(一)『動向』無論在內容或形式方面，都別具一種清秀而明朗的獨特風格，這種優點希望以後繼續保持下去。創刊號幾篇文章都很精彩和均勻，像『日本經濟發展的特點』，『新啓蒙運動的檢討』，『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文學』（代表經濟，社會思想運動，文學批評三類）等，皆爲難得可貴的作品。

(二)『動向』是月刊，月刊的內容雖然富有

伸縮性，但應儘可能地登載有時間性的稿子和着重各種現實而迫切的問題，如對於國際局勢的變化及世界大戰危機的剖視（『世界動向』很好，但太簡短），中國抗戰形勢的檢討，上海物價高漲問題的批判等。

(三)除開經濟，政治，藝術，科學等外，有時也不妨談談青年問題，婦女問題，讀書問題等。最好每期闢一通訊欄，溝通編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

(四)內容方面還可通俗化和趣味化一點。創刊號內有一篇『政治家的演變』，雖然寥寥數字，但含意十分警闢而有力。以後如有生動的漫畫或木刻等，也可以登載。

(五)定價最好低廉一些（一角或一角二分）以使普遍化，目前雖因百物高漲，雜誌成本增加，但『動向』可以公開向讀者募自由捐。

不知你們以爲怎樣？

致最熱忱的敬禮！

一個讀者震元上

八月三十一日

震元先生：

謝謝你對我們的鼓勵和提議。我們一定要儘量依照你的意見來加以改善。關於國際局勢，這一期裏已經有好幾篇文章；至於其他現實問題，以後也要多多注意，不過我們同時還要保持『動

向』的基本態度，即偏重於思想學術的批判。因爲我們深信：在這個歷史車輪逆轉的時代裏，一切都有待於澈底的批判。

定價已無法再低，最近紙價漲到三十元一令，恐怕我們的『動向』也快要難以爲繼了。『募捐』是很難的，這中間的苦痛也許你不能知道。不過我們希望愛護『動向』的讀者諸君，多多訂閱，這對於我們也是一個經濟上的援助。以後請多賜批評。

編者

編輯先生：

興奮地讀完了『動向』的創刊號及第二號。覺得貴刊的批評態度和不人云亦云的作風是難能可貴的。

貴刊是目前大家的明燈，指出真理，剝掉一切歪理的『真理外套』。但你們的出版日期相隔太久了，希望貴刊能變成半月刊或週刊。

關於內容，我覺得有必要增加漫畫。其次作者們應盡量把話講得通俗，少裝些四六句八股式的字眼，少用文言成語，少用深奧的費思索的文字，因爲這些都是不必要的，可以用通俗白話代替。

除了名詞和術語之外，一切都應該通俗化。

讀了報上的『莫洛托夫報告德蘇訂約經過』，再看看德國從訂約後即掀起世界大戰的事實，我下面幾個問題：

(一)蘇聯供給德國食糧石油及其他工業原料品，是加強德國的戰鬥力。換句話說就是拖長世界大戰的時間，也就是加長全世界工農互相殘殺的時間。這對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不是一個重大打擊嗎？爲什麼蘇聯以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格，倒反不顧

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利益呢？

(二) 莫洛托夫說：『蘇聯之利益，乃與各國民衆之基本利益相符。……』但各國民衆（不是統治者）的利益在於和平，而德蘇立刻促成了大戰，這裏沒有矛盾嗎？

(三) 蘇聯從前殺掉了無數的『德國間諜』和『法西斯走狗』，而莫洛托夫現在反說『吾人則歷來實主張蘇德兩國人民應互相友好……』，這不是明明說出那些人並非真的德國間諜，也不是法西斯走狗嗎？

(四) 德國大批工業品輸入蘇聯，會不會破壞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

(五) 蘇聯有沒有和德國訂立軍事同盟，加入大戰的可能？

還有最後，鳳岡先生在第二期所云『美國共黨之拒不參加反納粹大示威……』是怎麼一回事？

以上這些問題希望有個答復。敬祝
撰安！

讀者青流上。 九月五日。

青流先生：

文字通俗問題，『動向』的幾位撰稿者也已經痛切地感覺到。不過有時因為所談問題的性質關係，文字上似乎不得不稍稍艱深一點。

你提出的第一第二兩個問題，請參閱本期育才君的『德蘇協定引起了世界大戰』。

第三個問題。歷來的蘇聯黨案，本來都是些莫須有的冤獄，美國杜威博士等曾組織專門委員會加以研究，結果斷定『被告』們的『罪狀』都是假的。欲知詳情，可購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莫斯科審判案的真相』，『蘇聯黨獄的國際

輿論』等書。

第四個問題。如果單就這個問題來說，蘇聯向外國購買機器自然不妨礙社會主義的建設；但假使所輸入的是工業品，那意思就等於把一部分的關稅壟斷對希特勒取消了，這自然會有害於較弱的蘇聯的輕工業。

第五。蘇聯進兵波蘭，已經答覆你的問題了。

第六。本年二月二十日（即美總統華盛頓的生日），美國的法西斯派——德國同盟在紐約的馬迪遜廣場集會。美國的工人社會黨（所謂『托派』）便號召各個工人政派舉行反示威，那天法西斯黨集會者約二萬餘人，參加反示威者有十餘萬人，紐約市長動員五千餘警察維持秩序，仍然不免於衝突。當時美共黨請各黨員『留在家中』，不可參加示威或反示威。上期本刊鳳岡先生所謂『美共黨拒不參加反納粹大示威』，即指此事而言。

編輯先生：

在目前，能像貴刊那樣從廣大羣利益的視角去觀察，分析與把握事物的刊物是萬不一見的，……茲特抱着赤誠的心情，對貴刊有如下這兩點意見：

(一) 當前最嚴重的問題無疑是帝國主義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大屠殺問題，一個要為『廣大讀者自己的刊物』的刊物，對該問題必須多方面加以採集與揭露，使廣大的讀者在這嚴重的局勢中有所指南。

(二) 以後各期希望能多發表關於中國抗戰之

文章，使廣大的讀者更能充分的明瞭過去與認識將來。

以上兩點鄙人認為是最重要的，一切文章都應以此為討論的焦點，但不知先生高見以為如何？

動向讀者陳偉堅上

九月十八日

偉堅先生：

首先請你原諒，因為把你讚許我們的話略去了。

你所提的兩點，從這期起我們就已在遵辦。以後還請你多給我們批評與指示。 編者。

編者的話

本期可說是關於世界大戰的一個專號。其中幾篇專論，至少在觀點和方法上，是為時下一般雜誌報章中所不易找到的。故敢特別介紹給動向的讀者。

翻開目前流行的報章來看，滿眼是關於大戰的文字，然而可讀的，容我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鳳毛麟角還要稀罕。

這原因並不在於文章的技巧或學問的修養，而完全在於作者的觀點和立場。如果利用一些抽象的美名，去替某一方面的帝國集團服務，那憑你文章寫得多麼花巧，『學問』賣得多麼駭人，結果都祇能麻醉一般人的意識，不會給讀者以半點好益。

在這方面，本刊自問是可以無愧的。願動向的讀者，也要從我們文章的這一點精神上去加以了解。

老最子牌年餘十六業創

鐘 表 眼 鏡

亨得利

召號偽虛尚不是求事實

意滿實切客顧何任求務

口路龍華路飛霞行分 而對新新路京南行總

本刊第一期目錄

發行者的話

卷頭語

世界動向

西南經濟建設的瞻望

日本經濟發展的特點

對於「新啓蒙運動」的檢討

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文學

馬克思的情詩

安那其主義在中國

窮巷的一年

我們怎樣參加西班牙的內戰

白克孟

同人

鳳岡

陳育才

梁石生

南冠

雙山

三男譯

張道同

謝少翁

克利維次基作
劉素英譯

本刊第二期目錄

世界動向

羅曼·羅蘭新論

日本政治結構的發展

怎樣爭取經濟戰的勝利

評葉青的哲學傾向

分析與結論

社會主義大師們的藝術觀

哲學上一個舊案的重提

Out of the Past

馬克思給柯格爾曼的信

囚徒們的旅行

俄國革命軼史

鳳岡

野老

梁石生

育才

南冠

木君

雙山

三男

白克孟

林超真譯

君奇著

維多·綏奇著
林伊文譯

和豐油行
茂豐油行
廣豐油行
新豐油行

聯合經售

上海麥根路武定路口念五號

電話三二八二〇號

上海極司非而路一一八八號

電話二二五七七號

上海法租界平濟利路三二一九號

電話八四三八一號

本號代客定購青島烟台各地

生油荳油品質務求優良定價

格外公道電話購貨隨接隨送

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LIVING AGE

新亞

第一卷 第四期

目 要

俄國革命軼史	飢餓綫上	史大林為何勝利？	抗戰中知識份子的浮沉	抗戰與思想	日本社會運動之史的分析	關於大戰的種種煙幕	世界動向
--------	------	----------	------------	-------	-------------	-----------	------

華盛頓印刷出版公司

The Alexander Publishing and Printing Company.

目錄

第一卷 第四期

世界動向	鳳岡
關於大戰的種種煙幕	南冠
日本社會運動之史的分析	梁石生
抗戰與思想	木君
一 關於精神總動員	
二 評所謂『中國化』運動	
抗戰中知識份子的浮沉	育才
希特勒獲得波蘭戰利品的大部分	鳳影譯
闢謬論	張道同
史大林爲何勝利？	君衡
奉答我們的『批評家』	三男
馬爾勞論(續)	杜比作 小邨譯
馬克思致柯格爾曼的信	林超真譯
飢餓綫上	謝少翁
俄國革命軼史	維多·綏奇著 林伊文譯
讀者論壇	
一 三種流行的歐戰觀	元笑
二 誰是『惡作劇』的製造者？	曲舞
讀者通訊	編者

動向

(每月三十日出版)

第一卷 第四期

民國廿八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者 動向社

發行者 白克孟

出版者 美華盛頓出版印刷公司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 零售每册二角
預定全年二元

(本刊工部局登記證C五八四號)

再解一個『謎』

在上一期的『世界動向』裏，我曾提出了好幾個所謂『不可思議』的問題而不及予以解答；所以這回先要來試解這幾個預約了的『謎』。在那幾個預約了的問題中，最主要的一個是：『爲什麼英法對德宣了戰，可是西線實際上還沒有打得起來？』其他的問題是比較從屬性的。我們現在就從這一個主要問題談起。

英法之所以宣而不戰，有些人認爲是軍事的原因，這就是說，因爲馬奇諾和西格斐防線築得太好，兩方都無法進攻，所以在正式大戰之前，不得不有較長時期試探性的前哨戰，藉以偵知對方的弱點而利於進攻。這雖不能說不是一個原因；但決不是重要的原因。重要的原因爲何？簡單地說來，有內政的與外交的。茲請先談內政的。

帝國的內憂

若以英法相較，英國是更感覺到內政方面的棘手。所以英國此次赴戰的態度，也似乎沒有法國那樣的堅決。法國雖然也是一個殖民國家；但宗主國既然是一個相當獨立的單位，她對殖民地的依賴也就比較的小。故法國的政策可以由二百家族的心中——巴黎來獨斷獨行。可是不列顛帝國的情形却沒有那麼簡單了，如果除去了愛爾蘭，四自治領，

印度，埃及，以及其他的屬地，那未贖下來的英倫三島，簡直連單獨的存在都會發生問題。

大戰之前，倫敦憑她財政與海軍的力量，已足以完全控制這個世界帝國；然而四年苦鬥的結果，不僅各個自治領，甚至在印度，埃及等殖民地中，也都形成了與宗主國相當對立的資產階級，他們的翼毛比較豐滿，對倫敦的態度就沒有以前那樣地順從，他們時時表示着離心傾向。

加拿大雖經喬治陛下的巡幸，對德宣佈了極有限度的戰爭狀態，但牠擁護『母國』的態度，是受着華盛頓政策的限制的；南非聯邦經過了史末次將軍的『政變』，總算擁護倫敦的政策了，但內閣討論對德宣戰的決議，僅以一票的多數纔得通過的！澳洲聯邦很久就宣佈過不能像上次大戰時那樣地援助英國，現在雖得王弟坎德公爵的督領，但牠助戰之勉強，還是無可掩飾的。愛爾蘭的態度仍舊那樣『頑強』，徵兵法案始終沒有得到全愛的接受，而『共和軍』的炸彈，也還並不因『母國』之危難而有所珍惜；埃及雖已對德宣戰，然而一九二九年後暫被鎮壓的獨立運動是否會乘機復燃呢？這是很顯然的；巴勒斯坦的局勢始終無法安定，阿拉伯族對英的反感時時有被柏林方面利用的可能。這一切，都是使張伯倫先生不得不在過去曲意『綏靖』，在目前宣而不戰的重要原因。不過最使倫敦紳士寢饋不安的，却是宗主國內部民衆之厭戰，以及印度的問題。

在十月十九日的大陸報上，轉載着美國紐約泰晤士報的一篇倫敦通訊，題目是『英國的嚴肅任務』，在這篇通訊裏，這一位斐烈潑爵士告訴我們目前和二十五年前倫敦青年的兩種不同的景象。斐烈潑爵士是目睹了二十五年前英國青年赴戰的情景的。他回憶着當時：人們簡直瘋狂了，每一個人彷彿感覺到一種解放的心情，咖啡店裏擠滿了人，各人的臉上都浮着一種希望的微笑，到處見有旗幟的揮舞，滿耳是『上帝佑我王』的歌聲，青年的漢子們唱着『It's long Way to Tipperary』的情歌去赴戰，全國的子弟都爭先投効，惟恐錯失了這個浪漫英雄的時機；年輕姑娘也興高采烈地從廚房裏走了出來，代替那些男子們所留下的工作。但是現在，却是一幅完全相反的情景，倫敦簡直成了死寂的城市，咖啡館冷落得可憐，見不到旗幟，聽不到歌聲，青年們的臉上找不到笑痕，姑娘們則更是憂容滿面；因爲受過了上次四年悲痛的教訓，人們已經知道戰爭並不是好玩的冒險行爲，而是整代生靈的毀滅了。據斐烈潑爵士的論斷，這現象並不能證明英國的青年們已經消失了二十五年前他們父輩的勇氣，而是一種可喜的『嚴肅態度』，這證明他們將以大無畏的精神來履行母國所加於他們身上的『嚴肅任務』。

但是，不管紳士們對這現象做出了怎樣的『論斷』，英國勞動階級子弟之對戰爭保持一種不熱烈的態度，却已由這篇通訊描寫得淋漓盡致了。關於這，我們還能找出兩件事情來加以證明。當上次大戰時，誰只要對戰爭保持一個消極見

解，那他就坐牢的危險，可是這次呢？宣戰才及一月，而上次主戰的首相路易喬治已經公開發表他主和的言論，并發起了一個較大規模的和平運動。還有我們那位幽默大師蕭伯納先生，也公然倡議和平了。試問這一位好戰而又狡黠的政治家，這一位聰明易感的大文學家，如果一般民衆沒有厭戰的表示，怎會發出這樣的言論與運動來呢？這情形，我們那位現實主義的首相自然是知之彌深的，結果就影響了他對德作戰的態度。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民衆厭戰，何嘗是英國的特點？一切受過大戰教訓的國家都是如此。這原本是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一切統治者都怕民衆的厭戰，更怕他們由厭戰而變成反戰，但他們好像爲某種超自然力所束縛似的，他們又不得不戰；英國的統治者自然不是例外。所以英國在目前之還不能堅決作戰，在內政方面是還有別一原因的，這就是印度問題。

基石的動搖

歷來最有名的印度總督克仁勳爵說：『印度是帝國的基石』。這句話的正確性，不僅適用於大英帝國的『和平建設』時期，同樣也適用於她爭生死亡存亡的戰爭時期。上次大戰英國之所以能打敗德國，一百多萬印度人之効命疆場，以及印度對於『母國』二千四百萬磅軍費的輸將，並不是一個不重要的因素。

印度那時捨了這許多命，出了這許多錢，當然不是沒有目的的，即是要換得英相路易喬治那一句諾言的實踐：『印度自治』。爲了這，不僅那些受英廷厚恩的印度王公貴族們竭力鼓吹助英，就是爲印度獨立奔走呼號的『聖人』甘地，也出來募集志

願軍，要爲『母國』的正義而戰。結果『正義』是戰勝了，印度人期待着流血與獻金的代價，代價終於也付來了，不過牠並不是『自治』諾言的實踐，而是一部『謀叛法』的實施。這一個慘痛的教訓，如果對『廣被皇恩』的印度土著統治者並無絲毫影響，那末至少對於印度的民衆是不曾白過的呀！

現在，二十五年前的舊事在重演了。甘地『聖雄』馬上又發表了爲『正義』而戰的號召。然而印度的大衆已不是一九一四年的大衆了。我們根據不易透露的消息來看，孟買的八十家工廠中，已有三十二家的工人五萬人，於十月二日罷工二十四小時，表示反對印度參加戰爭。而國民大會中的大多數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大會社會黨人』，已公開出來反對助英作戰。這一來，連甘地先生都不得不『左』傾起來了，於是再度發表演說，認爲英國如果想印度『助戰，必須允諾印度的獨立』。這比『正義』宣言似乎『左』了一些，然而更危險些，因爲『允諾』是不費錢的，上次大戰中路易喬治首相不已慨然『允諾』過印人的『自治』嗎？不過在這裏，我們決不想和甘地先生爭辯，我們只想從他老人家的『左』傾中，看出帝國這塊基石的動搖來。假使再經四年的苦戰，這些『賤民』們恐怕已不能用『謀叛法』來對付過去了。關於這一點，我們這位現實主義的首相自然是知之彌深的。這是張先生目前還不堅決作戰在內政上之又一原因。

不過所有這些原因，最多祇能叫唐寧街的紳士們對戰爭有些顧慮，決不能阻止戰爭，當然這也不僅英國如此，一切資本國家的統治者，對於戰爭的態度無一不是如此。他們誰都知道戰爭會引起內部的恐慌，且也門准都沒有力量來避免戰爭，在言罷

戰而同時又不得不戰的矛盾中，各國統治者的唯一辦法，就是企圖獲得戰事的勝利，而勝利的重要保證之一，則爲外交上的成功。因此，在軍事的決戰之前，現在交戰的兩方都還在從事於外交戰爭。

交戰集團尚未確定

在這次戰爭的現階段上，交戰兩方的主角，與上次大戰中的主角是一樣的，即一方面德國，另一方面英國——法國事實上是英國的附庸。其他國家，除美國因許多經濟與政治原因，一定站在英國方面之外，其他國家的態度，都是些未定因素。英德兩主角爲要保證戰爭的勝利，便在全世界的各方面尋找與國。近來列強縱橫捭闔的外交戰，總括說來，都是爲了這個目的。在本年八月之前，英法和德國所互爭的一個與國是蘇聯，結果史大林投入了希特勒的懷抱，這是德國外交戰的一個重大勝利。德蘇協定的直接結果雖然引起了戰爭，但實際上英德間，更確切些說，英法與德蘇間的鬥爭，還是着重在外交戰上，即還着重在互爭與國的外交戰上。這時所爭的主要目標，則爲歐洲的意大利，近東的土耳其，以及遠東的日本。

德意軸心，據里賓特洛甫說是『鋼』一樣堅固的聯盟；然而『盟友』希特勒的砲彈剛在波蘭走廊上爆炸，莫索里尼先生却馬上宣佈了『中立』，這對於一般講『信義』的道德家們，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不過具有歷史眼光與國際知識的人，却早已看透了：『意大利是未來戰爭中一個最不穩定的因素，她會像上次大戰一樣地倒德國的戈』，（見『斯內世界大戰之前』，）言當然不是或爾斯式內

預言，而是由科學分析得來的。因爲一，祇有最無救的蠢才纔相信法西斯主義是國際性的；二，德意並沒有政治上與經濟上共通的重大利益；三，在英法的挾持之下，再加以美國的壓迫，意國不敢幫希特勒的忙；四，英法爲要取得意國的中立或贊助，很能自動地予意國的要求（突尼斯等）以滿足，那末莫索里尼何必要和希特勒一起冒險，去向英法爭取那可以用和平方法得到的要求呢？

因爲這些理由，所以意大利打破了『鋼的同盟』，保持着『嚴格的中立』，不過戰爭的擴大與延續，意大利的『中立』終於會證明是不可能的，將來如果希特勒不能對英法取得迅速的的重大勝利（這很困難），那末意大利多半還要參加在英法方面的吧！

從土耳其說到日本

英法與德蘇外交互爭的第二個主要目標，我們已說過是近東的土耳其。一月來蘇土談判的決裂，與本月二十日英法土互助協定的簽訂，無疑是英法外交戰的一大勝利，這不僅表示英法在近東屬地上的利益得以確保，英國前往印度與遠東的生命線可望無虞，同時能增強羅馬尼亞以至一切巴爾幹國家的地位，並可保證東地中海的優勢，而更重要的，牠或將增加意大利對於英法集團的傾向。英法土協定既有這樣大的意義，亦無怪阿特里等『反對黨』的領袖們，要對張伯倫先生大申其賀意了。

目前英國外交戰中所遇到的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大概要算是日本了。這乃是太平洋上的關係過於微妙之故。太平洋上三個主要國家：英美日的相互關係，據我們在本刊第二期『世界動向』裏的分

析是這樣的：

英國：在暫時或部分的問題上，擬聯美以使日本就範，但在總的方向，則欲和日以對美。

美國：一方面利用日本的侵略來削弱英國在華的勢力，另一方面則欲利用中國的抗戰，同時也利用英國的抵抗，藉以根本消滅日本，而建立以『美國經濟爲基礎的新中國』。

日本：暫時和美以對英，企圖屈服英國，藉以根本摧毀中國抗戰的力量，建立『東亞新秩序』，最後與美國作太平洋上的爭霸戰。

上述關於英美日三國在太平洋上的基本態度，雖然到現在還不見得什麼過時，但是歐戰發生，至少已經影響了他們的態度；再加以德蘇協定簽訂之後，蘇聯的一般對外關係，已由消極的保守，轉而爲積極的進取，這也不能不使太平洋關係愈趨複雜的。

遠東的新局勢

德蘇協定突告成立，日本一時似乎做了被洋情人遺棄的『蝴蝶夫人』；然而這位日本孀的失戀是極其暫時的，希特勒先生固還不會盡忘前情，而經了這次風波之後，不僅那以前一再追求過的張伯倫首相，并且那位北方大漢史大林『同志』，也都來參加這個島國姑娘的多角戀愛了。

『蝴蝶夫人』一見了求者盈門，便決心不再像以前那樣的愚『貞』，而向各方面敷衍起來。她在『不干涉』的名義之下宣佈了博愛主義，並提出了她選擇愛人的唯一標準：『助她建設東亞新秩序』。換句話說，誰假使想爭得她做遠東的與國，必須助她壓迫中國屈膝。張伯倫先生和史大林『同志』自

然是很了解這點心願的，於是爭着來滿足她的條件，史大林（一部分代表着希特勒的意思）便於九月十五日和日本簽訂了諾蒙亨的停戰協定，並進謀解決日蘇間的一切懸案，甚至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企圖調解中日戰事的謠傳都風行過，這當然首先引起了倫敦的不安，於是寇爾大使便在上海積極行動起來，於十月六日到了重慶，十月十一日英國駐日克來琪大使訪日外相作長談，據說要發表一個共同宣言，『對日作廣大讓步』，十月十二日法屬安南不願宋子文氏的疏通，仍不許軍火過境；十月十七日，鼓浪嶼的諒解宣告成立。這一聯串的事實都表明張伯倫之急起直追，有已超過史大林之勢。

究竟英日『協調』到何種地步，我們雖無從測知，但鑒於蘇聯之突然停閉上海，天津，張家口等領館，中蘇軍事同盟的傳說，以及本月二十一日關東軍宣佈的諾蒙亨談判的停頓，那末可以看出史大林同志的醋意是很深的。

在目前的情勢看來，日本似乎準備與英法妥協，藉以『結束中日事變』。但是這個美夢是否會實現呢？那將應之以難，難，難！

首先是美國不肯，昨天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在東京發表的坦白演說，大概最感覺不快的還是在重慶『探詢和平可能』的寇爾大使吧。英國爲要求得美國在西歐的援助，是否能不顧美國的意思，逕自拆那『間接爲美國利益而戰的中國抗戰』（孔院長語）的台呢？這是不必多說的。

其次是中國方面，中國雖說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她在許多方面得依賴於強國的政策；但是誰假使以爲她沒有半點獨立性的話，那他也將陷入與日本同樣的『認識不足』之中。中國大多數民衆之

決心解脫一切束縛，那是不用說的，就是拿那與列國的統治者具有較密切關係的我們的政府來說，恐怕也不會無條件屈膝的，尤其在湘北大捷之後，我們的當局一方面固然想把這個時機來和，但另一方面當然更不願依日方的條件來講和了。

由我們政府的幾位要員，如王外長，孔行政院長與張羣秘書長最近所發表的演說看來，如果英國真的迫得太甚，中國不能再戰，那末也是寧願在美國的調停之下來完成和平。究竟此種態度之爲是爲非，我在這裏不想加以批判，因爲對於抗戰的基本態度，讀者諸君可以在本誌其他的專論中看到的。

最後還有蘇聯，她既失歡於東京，自將轉向於重慶。經過了波蘭事件與對日追求的初步表演後史大林政策自然祇有那些最無望的人，才會把牠解釋成『援助弱小民族』的了，如果牠真的爲與英國競爭而繼續援華，則其目的亦不過是對日追求不遂的一種要挾。不過無論如何，祇叫牠採取這樣的立場，那至少在客觀上是有利於中國抗戰，而打擊着英日『解決中日事變』的計劃的。

因此，我說英國目前最感到棘手的一個外交問題，大概要算是關於日本的了。

大戰可能的發展

上面我們說了這許多話，牽涉了這麼多的問題，歸結一句話，還只是要解答我們在開頭提出的那一個『謎』：『爲什麼英法到現在還是宣而不戰』？這個『謎』，我們現在總算已經解答了。然而跟着又來了新的問題：宣而不戰的局勢會不會和平解決？倘長期作戰能有怎樣的變化？

第一個問題，張伯倫和達拉第的演說已經給答

覆了，我們再沒有加以說明的必要，現在英法土公約既經簽訂，英法的作戰態度當然會更加強硬起來。所以我們這裏祇簡略地談一談第二個問題。

國際局勢複雜錯綜，瞬息萬變，誰如果要大膽發展作一個詳細明確的預測，那是愚不可及的。不過根據着此次戰爭的基本特點，以及各交戰國的內部情形，那末戰爭一般的發展途徑，還是可以指示出來。

關於戰爭的兩個可能結果，本刊第三期的各篇專論早經指出，這裏不再重覆，我現在所要說的是戰爭在第二階段上可能發生的交戰主角的變換。

現階段上的主角是英德，這是誰都知道的，但是始終會如此嗎？這次難道會完全重覆上次的故事，必須把另一主角打得一敗塗地，讓她內部發生革命，并讓蘇聯始終逍遙於戰爭之外嗎？這在目前形勢看來，似乎是很可能的；然而這是膚淺的觀察。各個資本國家的統治者決不會那樣蠢，同時蘇聯只要還保持着生產工具與土地之公有制；那任憑史大林怎樣放棄國際革命的政策，隨他怎樣卑恭地匍伏於希特勒的膝下，資本國家與蘇聯之間的根本矛盾還是存在。各國統治者還是要將她視作最主要的公敵的。

過去英法之拉攏蘇聯，銳利的觀察家早經指出過：牠的目的在於利用莫斯科，藉以逼使柏林與英法妥協來反對蘇聯，現在希特勒之勾結史大林，其意義亦復相同，即欲利用莫斯科以逼英法承認德國反蘇聯的霸權。因此，這次戰爭的主要目的，雖係殖民地之重行分配；但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乃是英德互爭反共十字軍的領導權。張伯倫的四強公約，其含義即是要以英國爲首來組成反蘇十字軍，而希

特勒的羅森倍計劃，則是要以德國爲此種『神聖』事業的領導者。

目前所謂歐洲盟主，牠的主要意義就是反共十字軍的領袖；所以有人假使以爲英德所進行的歐州爭霸戰與反蘇聯的陰謀無關，因此沾沾自喜慶賀史大林避戰政策的成功，那是糊塗至極的一種見解。

明白了這層道理，我們便能推測大戰可能的轉變了。在目前，英德的爭霸必須由戰爭來解決，但戰爭之可怕結果，即本國勞苦羣衆的叛亂，却縈繞在所有交戰國統治者的心中。她們固不願自己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同時也不願見敵人變成這樣的一個國家，故目前以英德爲主角的戰爭，將來打到某種程度，多半是會適可而止的。至於『適可』的程度是什麼？那就是：一方遭受相當失敗，能承認對方爲反蘇十字軍的領袖的時候。到那時，恐怕戰爭的主角，將變爲蘇聯與其他的資本國家了。到那時，真能站在蘇聯方面的，恐怕只有各國革命的兵士與勞動者，沒有一個資本國家會替蘇聯效勞。

現在史大林放棄了這將來唯一可靠的蘇聯戰友，而從事於絕不可靠的外交拉攏，這在我們看來，彷彿是極蠢的一件事。不過假使替史大林先生設想一下，那末也是無可奈何的，因爲他既生息在一種反對十月革命遺產的勢力之上，國際勞動者的興起與蘇聯工農的覺醒，同樣要犧牲以史大林爲代表的蘇聯統治層的。史大林先生爲要避免這一種可能的轉變，或許會事先把十月革命的唯一遺產，即生產工具的公有制完全摧毀，以圖澈底加入交戰的某一方的吧？不過這是太遠的預測，蘇聯工人和世界革命者一定會起來阻止這個最不幸的可能的。

十月二十二日

關於大戰的種種烟幕

南冠

這次世界大戰究竟爲了什麼？我們在本誌前一期中已經指出：在本質上還是同上次世界大戰一樣，不過是帝國主義爲了重新分割世界，爲了搶劫對方領土，爲了宰制弱小國家，總之，爲了重新分割贓物——這本來有如青天白日一樣明顯的事實。

可是，帝國主義者及其傭僕們，對於這樣的事實，無論如何是不肯坦白地承認的。他們不但不肯承認，而且還要編造種種謊言，放出種種烟幕，來掩蓋，歪曲，粉飾這一事實。因爲只有這樣，他們才能騙取人民大眾馴伏地替他們的利益去犧牲；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防止民衆不致很快地走向反戰的道路，走向國內戰爭的前途。

但站在民衆的利益上，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首要的任務却是要盡量揭露這些人們的種種謊言，種種烟幕，把戰爭的真實性質，把各強國爭奪贓物的事實，赤裸裸地放在每一個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面前，讓他們有充分的機會去認識事實，從認識中作出自己的結論，最後讓他們用自己的行動去結束戰爭，去消滅戰爭。

希特勒侵波與英法參戰的藉口

這次戰爭的爆發，直接是由希特勒對波蘭的進攻所引起的。但希特勒進攻的理由是什麼呢？據他說是由於「波蘭在政治經濟海關各方面繼續壓迫日耳曼人」。因此他戰爭的目的是：「在要求三種問題之解決：（一）但澤問題；（二）走廊問題；（三）德波永久和平問題」（見希特勒九月一日在德國「議會」上發表的宣言）。但實際上這只是希特勒企圖征服波蘭，並進而劫奪東歐南歐各小國以及英法等殖民地之一種藉口而已。而且現在的事實已經證明：希特勒並不以「拯救」波蘭境內的日耳曼人爲限，不以「收回」但澤與走廊爲限，而且把整個的波蘭推毀了，把波蘭來同史大林瓜分了！希特勒這種無恥的強盜行爲，還不十分明顯嗎？這與弗利茨約瑟和威廉第二之

藉口奧皇儲斐狄南被刺而進攻塞爾維亞，而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英法方面，對參加這次戰爭最直接的口實是「反對侵略波蘭」，「履行保證波蘭獨立的約言」。說這是出於「正義」。我們姑且不追溯印度，埃及，安南和摩洛哥的獨立如何，但只問：爲什麼英法對於莫索里尼之侵略阿比西尼亞，日本之侵略中國，以及最近希特勒之佔領捷克，莫索里尼之吞併阿爾巴尼亞，不採取同樣的「反對」行動呢？何以牠們的「正義」只限於對待波蘭，而不能廣施於其他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呢？事情十分明顯：英法，特別是英國這次之毅然起而作戰，僅僅是看到希特勒的德國又恢復到了一九一四年以前威廉第二德國的那種地位和傾向了，牠們爲了保衛牠們在歐洲的霸權，爲了保衛牠們的殖民地，便不能不與這個兇猛的競爭者決一死戰。在這一點上，同牠們在一九一四年之藉口援助塞爾維亞，反對侵犯比利時的中立起而作戰，不是前後如出一轍嗎？

不錯，英法對德戰爭還提出了更遠大的更堂皇的理由，如說：「爲保衛文明與自由而戰」，「保持世界秩序與和平」（英皇九月三日告民衆書），「保衛祖國與自由」，「保衛文明及正義」等等（達拉第九月三日向全法人民廣播演說）。然而這也不過是上次大戰中的陳腔爛調。

在上次大戰中，「保衛祖國」，尤其是「保衛文明與自由」是叫得最響的，這在表面上自然是冠冕堂皇之至的。因爲有了這些冠冕堂皇的口號作糖衣，於是極殘酷極兇猛極卑劣的戰爭實質，得以有所掩蔽了，於是千百萬的人民大眾馴順地走向戰場了。但實際上，這些口號經過了無數的歷史事實，尤其是上次大戰的史實之證明，早已原形畢露了：所謂祖國者，不但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藉以剝削和壓迫其他弱小民族，搶劫他人殖民地的工具，而且是剝削和壓迫本國勞苦大眾的工具。如果當這一工具變成不適合於資產階級的目的時，他們就立刻可以走到完全相反的方面，走到與敵人聯合起來攻打

『祖國』的一方面，普法戰爭中的第爾們是如此，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米留哥夫及克倫斯基們也是如此。所謂文明，也僅僅限於資產階級所愛好的及所能利用的一點而言。如果文明超過了資本主義的範圍時（如社會主義的文明），資產階級是不惜採用任何手段來摧毀的。他們在下次大戰末期及戰後之對於社會主義運動的殘酷壓迫，就是顯例。何況戰爭根本就是無限制地破壞現代文明及其基礎（生產力）哩。所謂自由，更明顯地只是資本帝國主義剝削和壓迫本國民衆的自由，侵略弱小民族的自由，劫奪別人領土的自由。在民衆看來，戰爭首先就是把他們放在軍法的統制下，把他們原有的一點自由去充當戰神的犧牲。現在英法資本帝國主義的代表們，所宣揚的保衛祖國，文明與自由，除了重演上次大戰中的欺騙作用外，還有什麼別的意義呢！

至於英皇所特別着重的『保持世界秩序與和平』，其意義更屬顯然，不過是保持大英帝國統治及影響下的『秩序與和平』，換句話說，即保持大英帝國的世界霸權。關於這一點，張伯倫和邱吉爾在最近的演說中已完全招供了出來，說英國的作戰不是單純保衛波蘭，而是反對希特勒的『武力稱霸』。所謂正義，是達拉第最愛宣揚的口頭禪（達拉第在開戰後的每一次演說都提出正義來作幌子），但我們只問一句：法帝國主義在摩洛哥，在安南以及在其它殖民地上所幹的一切，究竟是否合乎『正義』呢？達拉第及其夥伴們能够解答這個問題嗎？

現在一切事實都擺在我們面前：希特勒這次之所以冒險侵入波蘭，發動戰爭，爲的只是掠奪弱小民族及英法的殖民地；而英法之所以決然應戰，也只在於保衛牠們的衛星，保衛牠們的殖民地，保衛牠們的已獲贓物和霸權——這便是這次戰爭爆發的真實理由，也就是這次大戰的真實內容，其他一切冠冕堂皇的宣言和口號，都不過是掩蔽這種真實內容的烟幕而已。

和平的烟幕

當希特勒藉着克里姆林主人的幫助，很迅速地摧毀了波蘭，并攫取了波蘭最好的工業地帶，最肥沃的土地，最豐富的資源後，於是破題兒將『和平』問題提出來了。據希特勒本月六月在德國『議會』上所發表的『和平演說』看來，子與也重也之各史前，其史也前，其史也前，其史也前。

爲了『剷除和平的障礙，建立永久的和平』。他甚至於說：『波蘭懷抱佔領德國疆土之野心……波蘭取得英法兩國的保證之後，雖未受任何威脅，猶悍然向德國挑釁，希冀實現其野心』等等。現在『懷抱侵略野心的波蘭』，妨礙和平的波蘭既然被他摧毀了，被他與史大林共同瓜分了，於是戰爭的目的達到了，戰爭就應該停止下來。於是他向英法伸手來要求『和平』。他并宣稱：他對於歐洲任何國家。尤其是對於英法，再沒有土地的要求。不過，附帶一個條件，『德國的殖民地必得返還』。最後并且『鄭重申明』：『余決採取和平談判之途徑，倘竟至失敗，則其責任并不在我。』這不禁令我們又想起了上次大戰中的故事來。

在一九一六年冬，正當德國在東西戰線獲得最大的勝利，差不多佔領了整個的波蘭，大部份的比利時以及法國許多土地，同時又感到繼續戰爭要陷入最困難的境地時，於是代表德帝國主義的威廉第二政府便大聲宣言，『戰爭已沒有意義了』，『應當立刻重建和平』，并正式向協約國提出了和平照會。且希望中立國，尤其是美國起而促進和平運動。但如果協約國拒絕和平，繼續戰禍之責便應由協約國擔負。現在希特勒的『和平運動』，不是上次大戰中這一故事之再版嗎！

實際上，一九一六年冬威廉第二所發動的和平運動，其目的是這樣的：如果『和平』僥倖成功，他便可以由此獲得最大的勝利，俟休息若干時再來戰爭；如果被協約國拒絕時，牠就可以將繼續戰爭的責任歸之於協約國，藉此重新激怒本國業已厭戰的民衆，再去繼續最殘酷的戰爭。但威廉第二的和平建議，結果是乾脆地被協約國拒絕了，於是德國便進一步採取了最兇殘的潛艇戰爭政策。現在希特勒所提出的『和平建議』，其作用也正是如此。如果英法接受他的『建議』，不但大半個波蘭安穩地入了他的掌握，而且還可以『暫時休息一下』；如被拒絕呢？則『繼續戰爭的責任不在我』，現時已經厭戰的德國民衆并可以因此諒解他，可以替他去繼續犧牲。這真是『左右逢源』的如意算盤啊！不過希特勒這如意算盤，不見得比威廉第二的有更多的成就吧！

現在張伯倫和達拉第的態度顯然還是同當時路易喬治和白里安的沒有什麼兩樣。達拉第首先就鑿穿了希特勒德國的和平建議『之唯一目的，僅在促

即便『鄭重申明，吾人決定繼續作戰，直至獲有最後的安全保障為止』（達氏本月十日廣播演說）。張伯倫則更公開地說：『吾人所謀之和平，必須為真正安定之和平……目下為此種和平之障礙者，即為德國政府。』（本月十二日張氏在議會的演辭）這就是說，『只有打倒希特勒的政府才有議和的可能』。像張伯倫與達拉第這樣答覆希特勒的『和平建議』，站在英法帝國主義的利益上，自然是對的，但從英法及全世界民衆的觀點看來，這顯然又是一種欺騙。因為在上次世界大戰中威廉第二政府確是被打倒了，但『真正安定的和平』在那裏呢？這次的大戰就是最好的答覆。要想獲得『真正安定的和平』，在帝國主義繼續存在的條件之下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不但希特勒的『和平建議』是一種欺騙，就是張伯倫的所謂『真正安定的和平』也顯然是藉以騙取英法民衆替帝國主義去作大量犧牲的一顆烟幕彈。

陣線論的陰影

多方掩飾着帝國主義從事戰爭準備工作的，如果在一九一四年前是海牙和平會議（俄皇尼古拉第二所發起的）及其圍繞在四周的一羣和平主義者，則在這次大戰前扮演這種作用的便是幾年來甚囂塵上的『陣線論』，及其影響下的許多和平主義的集團與和平會議。湊巧這也是發源於尼古拉第二的故鄉，不過不是冬宮，而是克里姆林宮。

克里姆林宮的主人，自從一九三三年以其特有的孟塞維克主義葬送了德國的工人革命運動，把希特勒扶上了政權之後，即驚慌失措地從『第三時期』及『社會法西斯』的理論，轉到『陣線論』，企圖以此去挽救他那已經完全破產了的『權威』。

根據陣線論的新發明，彷彿我們這個地球上的帝國主義國家可以分成爲本質上完全不同的兩大陣營：法西斯主義的與民主主義的，或侵略的與和平的，并且把德意日派在前一陣營內，把英法美派在後一陣營內，而以新發明家自己所操縱的蘇聯爲後一陣營的中心。由這樣的陣線論出發，於是蘇聯加入了國際聯盟（列寧會稱此聯盟爲帝國主義的分贓機關），向英法美要求組織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民主陣線或和平陣線，并下令各國共產黨在本國內與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集團或個人（連各宗教團體，貴族，牧師等都包括在內）組織『人民陣線』，以爲國際間『反侵略陣

線的核心』。在克里姆林宮的主人看來（甚至屢次宣稱），這是制止兇殘的萬惡的法西斯主義侵略的唯一妙法，也就是消滅戰爭的唯一途徑。如果有人敢於懷疑或甚而批評這種主張，那就是法西斯的走狗，希特勒的代理人。

其實，無論是德意日或英法美，都是屬於同一範疇，是一樣性質的國家。前者之所以特別表示要向外『侵略』，僅僅因爲牠們所佔有的殖民地已被剝奪（如德）或是太少（如意日）。而後者之所以需要『和平』，只因爲所佔領的殖民地太多（如英法）或本國的富源與市場較大（如美），而且到了和平無法維持時，還是不惜決然採取戰爭手段的。至於所謂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僅僅是現代帝國主義這個徽章的兩面花紋。自然，『法西斯主義』這一面，比起『民主主義』那一面來要猙獰兇惡得多，要殘酷可怕得多，但這不過是帝國主義之一種最露骨的最瘡癩的表現而已。把『法西斯』的帝國主義與『民主的』帝國主義絕對地對立起來，并領導民衆無條件地去擁護後者，而反對前者，那就無異於替後者服務。至於說『和平陣線』可以制止『侵略陣線』，可以『消滅戰爭』，那更是在民衆中散布幻想，讓他們當戰爭真正到來時，張皇失措，聽任帝國主義去驅使，去犧牲。可是克里姆林宮的黨徒們幾年來都詛咒此種見解爲『離經叛道』，爲污蔑他們所倡導的神聖的和平陣線或民主陣線，爲替法西斯主義，替劊子手希特勒，莫索里尼及日帝作辯護。正因爲如此，他們會罵抱持此種見解的人們爲『法西斯主義的急先鋒』，爲『漢奸』。

但是結果呢？不但民主陣線或和平陣線是一陣幻想，是一個騙局，而且發明和力倡這種陣線的克里姆林宮主人首先就脫離了這個陣線，拋棄了這個陣線，而走到完全相反的方面，即走到與法西斯陣線，侵略陣線的創始人，『劊子手』，『強盜』（這些字眼，都是克里姆林宮的徒黨們以前所加於希特勒的）握手了，就是說完全滾到法西斯陣線，侵略陣線的泥坑中去了。『德蘇協定』，就是鐵一般的證據。正因爲如此，正因爲克里姆林宮這位新盟友的幫助，希特勒便乘機實行『侵略』了，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因此爆發了！

在另一方面，張伯倫和達拉第，這兩個被克里姆林宮徒黨們近年來詛咒爲對侵略陣線的『屈服者』，民主陣線的『叛徒』，現在却『堅決地』站在『民主陣線』上實行反抗起希特勒的『侵略』來了！可是克里姆林宮的徒

黨，特別是法國的多萊士和英國的巴利特們怎麼樣了呢？他們除了在昏亂中（未得到莫斯科的命令）曾一度表示擁護達拉第和張伯倫的『民主陣線』以反對希特勒的『侵略』外，隨即便在莫斯科的指使之下一跳而轉到同情希特勒（贊成希特勒的和平建議）一方面去了。這樣，克里姆林宮幾年來所倡導的所堅持的陣線論，現在所餘下來的只有一個『陰影』，而且拖着這個陰影走的還不是克里姆林的黨徒，而是張伯倫，達拉第，特別是萊翁·卜倫和阿特里，格林武等所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徒。

這些在上次世界大戰中叛賣社會主義一切原則，叛賣無產階級全部利益，一直轉到狹隘愛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徒，這些在上次世界大戰中及戰後用盡全力以絞殺本國一切工人革命運動，替資產者維持和平秩序的社會民主黨徒，現在在張伯倫和達拉第的指導下來擁護戰爭，來反對希特勒的『侵略』，來保衛他們的『祖國』，是無足深責的。因為他們不過是依照他們的歷史傳統，實行他們在思想上在政治上一貫的邏輯而已。不待說，他們的思想，他們的行動，是極端卑鄙的罪惡的，是替帝國主義者們的污濁利益服務的，但他們比之克里姆林宮的徒黨們還要言行一致得多，前後一貫得多。克里姆林宮的黨徒們，曾經有一時期稱他們為『社會法西斯特』，隨後又拉他們建立反法西斯陣線，但還埋怨他們（特別對於阿特里，格林武等）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態度尚不堅決，現在他們是『堅決』起來了，『行動』起來了（如格林武在議會上所表示的：『世人須知，英國工黨此種反侵略之態度，實為不可動搖』），可是克里姆林宮的徒黨們呢？他們一轉移間却站到了法西斯方面，而替希特勒大作其義務律師！歷史如果是公道的話，將來大概不致把社會民主黨的評價放到克里姆林宮黨之下吧？

希特勒的幫兇與律師

現在只要對於真理稍微具有一點良心和對於事實不閉着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出這次希特勒之所以敢於發動戰爭進攻波蘭，主要是由於從『德蘇協定』取得了莫斯科的援助；而希特勒之所以能於短期內摧毀了波蘭的抵抗力，得以佔領波蘭大部份的土地，主要也是由於蘇聯的出兵，與之東西夾攻。這一事實，這一真理，便證明了以前把希特勒當作死敵的人，現在竟成了希特勒的幫兇。

不錯，希特勒對於助他支解波蘭的幫手，也『慷慨』地酬謝了一部份土地，但這部份土地比起希特勒所攫取的來真是『不毛之地』，何況在希特勒的心中還不過是暫時讓克里姆林宮保管一下而已。可是克里姆林宮的徒黨們，都認此為蘇聯的偉大收穫，無上勝利：『蘇聯的地位從此鞏固起來了』，甚至於說：『戰爭的範圍由此縮小了，和平有着保障了，蘇聯與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勞苦大眾在精神和政治上取得聯繫了』（見『歐洲戰爭與中國』一書中的大意）。人們在這裏所表現的荒謬與欺騙，比起以前的陣線論來，真是小巫見大巫！

實際上，蘇聯這次進兵波蘭，與希特勒共同瓜分波蘭，雖然分得了『一杯羹』，甚至因此而擴展了牠在波羅的海沿岸小國中的勢力範圍，然而這却是以十月革命的全部精神遺產，以蘇聯在全世界工人和被壓迫民族面前的整個信譽，特別是以紅軍的整個傳統聲望作代價的。以前，當蘇聯企圖指導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以圖改造資本主義世界時，人們稱蘇聯為『赤色帝國主義』，自然是一種毫無根據的惡毒的污蔑；可是，自從史大林這次與希特勒攜手共同瓜分波蘭之後，帝國主義的頭銜對於蘇聯就很難解脫了。雖然蘇聯的經濟基礎，主要的生產機關，還是社會主義的，但牠的上層建築，克里姆林宮的邦拉巴特主義，却已顯然走到了帝國主義的邊際，在對波蘭的軍事行動上已顯然表現了帝國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與蘇聯的經濟基礎是絕對不可調和的。現時在克里姆林中久已形成的邦拉巴特主義頭上冒出來的帝國主義傾向，對於邦拉巴特主義者的『權威』或者暫時有所增進，但對於整個蘇聯的內外矛盾，蘇聯的危機，將必然劇烈地發展起來。這次戰爭如果繼續下去，蘇聯如果不在戰爭中獲得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幫助，將來無論勝利屬於何方，牠將不可避免地成為這次戰爭的犧牲品。正因為如此，克里姆林宮的徒黨們又無條件地追隨着希特勒的和平建議之後呼籲『和平』。

希特勒的『和平建議』究竟是什麼，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過，純粹是一種烟幕。可是克里姆林宮的喉舌（消息報）却認為『該建議實為談判和平之基礎』。並且說：『任何人苟拒絕德國和平建議，即當担負戰爭延續，從而戰爭之巨大犧牲及毀滅之責任』（見本月九日美聯社所傳莫斯科消息報社論）。這種論調，與戈林的機關報所宣傳的簡直毫無二致。在克里姆林宮

的徒黨們看來，好像希特勒之進攻波蘭，破壞和平，發動戰爭，對於此次戰爭都是沒有任何責任的，只有拒絕希特勒的和平建議，才應負繼續戰爭的責任。尤其荒謬的是，他們竟認希特勒的和平建議可以造成真正的和平。他們完全忘記了列寧在一九一六年末所說的話：『如果不用革命手段來推翻資產階級的政府，那末，現在的和平只能是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帝國主義的和平（這主要也是對考茨基等之響應威廉第二的和平建議所發之種種議論而言）。他們更加完全忘記了他們自己以前所說『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是威脅現世界和平的主要障礙』（我們的國際通，克里姆林宮的擁護者胡愈之，甚至到最近還宣傳：『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公論叢書第九集三三五頁），納粹主義不打倒，真正和平便永無實現之可能』。尤其奇怪的是：消息報的記者竟至於站在與他們以前的立場完全相反的方面替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作辯護。我們且把該報記者的辯護妙文抄錄一段下來看看吧：

『據稱英法目前作戰之根本唯一目的為反抗希特勒的思想。因該思想為歐洲乃至全世界發生戰爭之唯一原因，此種論調當然係英法官方立場之反映（但實際上是從莫斯科抄來的——南冠）。然吾人其能昧然加以接受，作為繼續戰爭之理由乎？曰否。夫任何人對於任何思想，自有其擁護或反對之權利，但苟因某某人反對某種思想而即用為屠殺人類的理由，則其荒謬與無意識，與中世紀時代屠殺異端之宗教戰爭又何以異？……對於希特勒主義或任何政治主張，世人自有尊重或憎惡之權，這是一個嗜好的問題；然進行消滅希特勒主義之戰爭，實為政治上的大錯』（見上引美聯社電訊）。

這一段話所包含的理論上的異常荒謬，姑且不論，即就其替希特勒主義辯護，算是無微不至，這是戈倍爾所萬萬辦不到的。但只問一句：這段話與他們從一九三三年起直至最近大戰為止，凡對於反法西斯主義所發表的一切理論一切宣言，一切論文與口號，怎能獲得調和呢？『出爾反爾』，竟然發展到這樣的高度！莫斯科真不愧為全世界詭辯的中心！

最有趣的是，莫斯科的詭辯很快就影響到了法國的多萊士黨。這個黨的領袖們昨天還宣稱願保衛祖國，願擁護政府對德宣戰，願站在前線反對希特勒的侵略到底，而今天却突然向國會議長赫里歐請求討論希特勒的和平提議，主張立刻停止戰爭。無怪乎達拉第『理直氣壯』地說：『共產黨各領袖

曩日對於希特勒及德國軍隊詛咒不已，固矣。但自布爾塞維克主義與國社主義攜手合作之後，此輩即轉變態度，而對彼『背棄和平者』表示贊助，此實難予容忍』（見達氏答覆希特勒宣言）。達拉第在這樣的理由下，於是把法國共產黨實行解散了，并逮捕了其領袖四十餘人。但『罪名』却是『希特勒的代理人』，我們不知多萊士們對於此種罪名將何以自解！但無論如何，這裏已表明作莫斯科應聲蟲的黃金時代是已經過去了。

國際黨的解體及其原因

『戰爭雖然要引起各種的慘慘和災難，但牠也給予多少巨大的利益：牠無情地揭破，暴露和破壞人類的組織中許多腐敗的，陳舊的，死爛的東西。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的歐戰也開始給了人類一種確實的利益：牠指給了文明各國的先進階級看，在他的黨內已成熟了一種可惡的腐爛的毒瘡，而且發着難堪的屍體的臭氣』。這是列寧論『第二國際的破產』時所指出的真理。這個真理，在這次方才開始的大戰中更迅速地獲得了充分的證明。但異常不幸，這裏所證明的已不是第二國際，而正是列寧自己所手創的這個國際——第三國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第二國際內部，特別是其領導層，雖然充滿了機會主義的傾向，但表面上，尤其在斯都加特決議案和巴塞爾宣言的表現上，還有堅持國際主義，堅持以社會主義革命來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的主張。所謂牠的破產，正在於當帝國主義戰爭真正到來時，牠的絕大多數的領袖們完全放棄了以前決議案和宣言上的主張，而乾脆地投到資產階級的懷裏去了。他們以狹隘的愛國主義代替了國際主義；以階級合作，服從資產階級的合法性，代替了階級鬥爭，代替了向資產階級的革命進攻；以加入資產階級的政治府充當欺騙工人的工具，代替了毀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建立無產階級的狄克推多；總而言之，是以國內和平代替了國內戰爭。

至於第三國際的破產，却遠在這次大戰發生之前，遠在一九三三年初叛賣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自從那時起，就指導世界各國革命的意義說來，第三國際不但精神上已不復存在，就是形式上也失掉了其獨立存在的作用，牠不過是克里姆林宮獨裁者的外交政策之一個傳聲機關而已。因而這個國際的各國支部，也就降落為同一外交政策的啦啦隊，叫好團。至於克里姆

林宮的獨裁者，自其發明『一國社會主義』的高明學說之後，即逐漸地將列寧領導世界革命的一切原理，一切政策視爲毒物，惟恐除之不盡，洗之不清。所以他在國內的主要工作是以希特勒與日本奸細的名義剷除了所有創造十月革命的一代老布爾塞維克；而對外的工作則用盡種種方法與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分工合作絞殺一切革命運動；隨後又發明陣線論替民主的帝國主義大肆吹噓；最後則乾脆地投降了希特勒，幫助他掀起了大戰，且以帝國主義的手段同他瓜分了波蘭，并進而命令各國的黨徒替希特勒主義作辯護。在這種情形底下，於是久已破產的第三國際，久已死亡的第三國際各國支部，便一下解體了，連死屍也不復存在了。

現在法國的多萊士黨就是一個最標準的例子。其上層的一部份領袖（也許加香就是主要領袖之一）與絕大多數羣衆已自動脫離該黨而變成了『保衛祖國派』。另一部份領袖，如多萊士等，則因爲其生活一向受克里姆林的支持，不得不仍舊跟隨他們的主人。而其少數的左傾份子則正在尋找新的出路，向革命的國際新黨方面走。此種同樣的情形，在歐洲其他各國內部或速或緩地在進行中。不過在美國的是一個例外。就是在那裏的勃羅達黨，於接到德蘇協定，特別是蘇軍攻波的消息之後，立刻發生了左傾分化的巨潮。從這些不很詳細的事實表現看來，第三國際的解體已是毫無疑義的了，往後發展的事實更將要替這個判斷作證明的。

但代第二國際而起的第三國際，何以竟然走到這樣破產和解體的地步呢？爲答覆這個問題，我們必得把第二國際的破產根源來回憶一下。據列寧說，第二國際的破產，是由於牠從國際革命主義走上了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而『社會狹隘愛國主義乃是登峯造極的機會主義』。至於機會主義的根源，也就是社會狹隘愛國主義的根源，乃是帝國主義在和平發展時期中用殖民地得來的『超額利潤』賄買了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和工人貴族。正因爲如此，他們便『變成爲資本主義的警犬，變成工人運動的破壞者』（列寧）。正因爲如此，他們在帝國主義的戰爭中，在資產階級的危急關頭，不能不採用社會狹隘愛國主義去籠絡工人，去欺騙工人替資產階級的利益作犧牲。

如果第二國際破產的根源是當時的機會主義（以倍因斯坦主義爲代表），則第三國際的破產根源便是『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這一主義乃是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之變種。但其經濟基礎不在於帝國主義的『超額利潤』，而在

於蘇聯官僚層對其本國工農階級的『超額榨取』。至於官僚層之所以能够形成及其所以無忌憚地榨取工農者，又是由於蘇聯工農大衆的消沉——而這種消沉狀態乃是由於俄國工農經過長期戰爭及內戰的痛苦和對於戰後世界革命不斷失敗的失望所造成的。

『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如果沒有國外革命的勝利來加以改變，在本國內不可避免地要發展成爲邦拉巴特主義。邦拉巴特主義達到頂點，就必然在一定的條件下就有可能要冒出帝國主義的傾向來；在國外，牠又不可避免地要與社會狹隘愛國主義合流。因此牠無論對於民主的帝國主義或法西斯的帝國主義，都是可以在一條戰線上合作的。合作的結果，特別是與法西斯帝國主義合作的結果，第三國際當然只有最後走上解體之一途。在這一點上，牠同第二國際因其機會主義的領袖們與其各自的帝國主義者合作而破產，而分解，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反戰的工具

當一九一四年八月初，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在議會上投票贊成威廉第二政府的戰爭預算時，盧森堡即宣稱：『第二國際已經變成死屍了！』當列寧聽到并已證實上述消息爲真確時，也不約而同地喊出：『第二國際死亡了！』他并且由此得結論說：『現在的問題是在創造新的國際黨』，真正的革命領導。但要創造新國際，便必須與資產階級的欺騙，特別是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領袖們的欺騙作不可調和的鬥爭。列寧在下次大戰的整個時期中，尤其是初期，即以全力進行了這種鬥爭。正因爲如此，俄國的工人階級得以逐漸地從帝國主義者及其傭僕第二國際影響下脫離出來，而走上了十月革命。

早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月革命的領導者和第三國際的創立者之一，敘述到第二次大戰的迫近時，即曾經着重地指出：『反對戰爭的鬥爭，首先需要有一個鬥爭的工具——黨。現在無論在各國內和國際上，一個黨還沒有。一個革命的黨必須在整個過去的經驗——包括第二和第三國際的經驗——上創造出來』。在一九三四年時，世界上確還沒有一個革命的黨，可是現在這樣的黨已經成立起來了，那就是去年九月在瑞士召集的大會上成立的。他的名字叫做『社會主義革命國際黨』。牠在成立的那天即發表了一篇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宣言。這宣言早已指出了關於戰爭的各種欺騙，（下接第三十二頁）

日本社會運動之史的分析

梁石生

日本的啓蒙運動發生於明治初期。因爲日本『町人階級』的過度卑賤和荏弱，故參加這一運動的人物沒有一個是第三階級出身的學者，而都是一批開明的貴族青年。這批青年貴胄一開始致力於介紹工作，輸入所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如福澤諭吉輸入美國的功利主義，中村正直介紹英國邊沁，穆勒等人的學說，伊藤博文輸入德國的凱薩主義，中江兆民提倡法蘭西的民權思想等。在啓蒙運動初期，日本對於先進國文明的吸收是雜亂的，多方面的，這也是一切後進國啓蒙運動的特點。但日本資產階級和開明的地主很快便選定一種最切合於『日本國情』的文化：德國的國家哲學。伊藤博文頓然成了明治皇朝的籠子。英美的功利主義只不過是天皇立法的陪襯物而已。但法蘭西革命的民權思想却成了日本皇朝的大患。本來法蘭西的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皇朝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日本資產階級從始便依賴於皇朝的撫育，牠絕不敢認真的玩弄這一武器，結果這一武器落在一批喪失了特權和地位的士族手裏，這些分子或懷着絕望的復辟幻想，或懷着爭權奪利的野心，或懷着模糊的憧憬，不約而同的站在『民權運動』的旗幟之下，攻擊當權的藩閥和新興的資產階級，但他們却又不敢走向農民。這一運動的基礎既那麼脆弱，牠不但不能長久支持，而且還必然成了資產階級鞏固政權的工具。資產階級爲了防止這一危險思想發展到廣大人民中去，牠立即拿出美國式的漸進主義來，組織了一個『改進黨』，希望以開明的立憲來解決這種奇特的，『日本風的』民權要求。另一方面，資產階級也在『自由民權』運動中找到牠的忠實的代理人，如板垣退助之流，準備使這個運動在最溫和的條件之下，作喜劇的收束。一八九〇年的普魯士憲法結果把一切『民主』的喧嘩平復了：資產階級便一次而又永久地埋葬了『自由主義』，再也不准人提起牠。

但初期的『自由民權』運動的天折並不能證明『自由主義』不適於日本國情，牠只是特別不適於日本資產階級的脾胃，同時也不適於沒落士族的掙

扎吧了。近代歷史告訴我們：資產階級愈是畏懼民主主義，則牠愈要轉成爲反對資產階級自己的武器。假如在日本沒落和絕望的士族無法運用這一武器，則無產階級是不惜雙手來接受牠的。

在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前後數十年間，日本的近代產業基礎已迅速建立，無產階級也已成長，牠已在產業的行情變動中，一步一步的學習爭取本階級的利益，同時一步一步的提高牠的覺悟力。極少數參加日本初期自由民權運動的自由黨人現在發覺有一個堅實的（雖然是幼稚的）階級來運用他們的武器——自由主義，於是他們拋棄了古典的法蘭西革命的玄想，把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這種結合，在初期雖然非常幼稚，但牠無論如何却顯示了後進國革命底不斷性：日本的革命必須從民主鬥爭不斷發展到社會主義鬥爭，而這種不斷發展的唯一担当者就是無產階級。

日本初期的社會運動是美國式工會主義與基督教人道主義的混合物，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是感情的，道德的。從德富蘇峯的『國民之友』到片山潛的『勞働世界』，從『民友社』到『社會問題研究會』，我們找不出一點科學社會主義的成分。一八九八年片山潛還率領八百多工人向官城呼唱萬歲。這件事最清楚的告訴我們：日本初期的社會運動家是多麼軟弱和落後，同時也證明，明治維新的漸進主義思想對工人覺醒的阻力多麼大。但日本初期的社會主義運動即使十分溫和，在資產階級的眼裏仍是非常難於容忍的，因爲日本資產階級對工人和農民的驚人的奴役與最微小的自由和改良也是不可調和的。一九〇〇年二月資產階級皇朝第一次向工人宣戰，發表了一道『治安警察法』。以後，所有社會主義者走向政黨組織的企圖都遭受橫暴的壓制。

一九〇〇年的鎮壓給了日本無產階級一個初步的政治教育，使他們逐漸從感情的，漸進的，人道主義的基督教義轉向科學的社會主義。（雖然這個過程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在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中，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第一步分裂是在反戰問題上。所有社會運動家都捲入反動的戰爭裏去

了。只有幸德秋水，堺利彥等保持反戰的立場。於是在『非戰』的旗幟之下，成立了有名的『平民社』，出版『平民新聞』。他們現在開始介紹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但他們中多數還抱着基督教的人道主義觀點來參加反戰活動。『反戰問題』只是日本社會運動分裂的開始，這個運動不久逐漸發展成爲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人道主義，亦即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劇烈鬥爭。本來感情的，空想的基督教義的影響只是階級鬥爭不發展的反映，等到無產階級的覺悟力在實際經驗中逐步提高時，牠自然而然的擺脫那種不中用的教義而吸取更有效的鬥爭方法。日本『平民社』的分裂就是日本階級鬥爭發展的結果。一九〇六年『平民社』的人物分裂成爲兩派：以堺利彥和幸德秋水爲代表的唯物派及以德富蘆花爲代表的唯心派。前者的機關報是『光』，後者的機關報是『新紀元』。後來，唯物派還組織了一個日本社會黨。但當時的唯物派思想還是非常不發展和樸素的。日本社會黨的第一條綱領就是：『本黨在國法範圍內，主張社會主義。』這條綱領證明，日本的社會主義者雖然擺脫了基督教的感情主義，却沒有擺脫資產階級的國家至上主義。他們揚棄了道德律却没有觸動法律。嚴格的說來，日本初期的所謂『馬克思派』還距離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很遠。他們只是盡了一種啓蒙的作用（主要的工作是翻譯），在思想上和實際行動上，他們還沒有從日本資產階級的那種特別狹隘的國家觀念——島國的偏狹性——中解放出來。

但日本無產階級所處的半奴隸的生活狀態與資產階級的普魯士法典是不相容的，尤其是（在歷史上和血緣上）與工人特別接近的農民，他們從明治維新中所得的是雙重的銹蝕，因此他們對『開明』的專制政府懷了雙倍的憎恨。日本資本主義在本世紀初經過兩度戰爭勝利之後，表現得特別繁榮，但牠越是繁榮則日本工農的地位越是悲慘，而在週期恐慌中所受的磨折也越大。日本工人對資產階級及其警察法的仇恨混合着他們從農村中帶來的對專制皇朝的傳統的憎恨，便自然而然造成了無政府主義發展的條件。無政府主義滋生在以日本天皇政制之下正如滋生在西班牙的阿爾芳梭皇朝之下一樣，牠同是『開明』君主專制的諷刺畫。一九〇八年，『平民社』和『平民新聞』等復活，許多著名的社會運動家，如幸德秋水，堺利彥，西川光次郎，片山潛等都聚合起來。但不久『平民社』又在新的基礎上醞釀着無政府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這一鬥爭在一九〇八年的日本社會黨第二次大會上正式暴

發出來。幸德秋水成了無政府派的健將，主張直接行動，田添鐵二等則主張維持原有的議會政策，日本社會黨的內部鬥爭直接反映日本無產階級的戰鬥精神已驚人的生長，他們已傾向於和整個資產階級皇朝決裂。但日本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能給無產階級指出一個明確的遠景，他們沒有勇氣把民主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把合法的鬥爭和非法的鬥爭連繫起來。結果只有助長日本無產階級內部的無政府主義的精神。幸德秋水只是發展這種精神的最好的代表吧了。日本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這種危險的傾向非常警惕，牠從社會黨的內部爭論立即嗅出未來的危機。牠首先解散社會黨和封閉『平民新聞』，並大批逮捕社會黨人。後來又利用無政府派的盲動事件爲藉口，殺害了幸德秋水等一大批革命家。

一九一〇年日本資產階級的恐怖政策，使許多社會運動家入獄，被害，消沉。但在社會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同受迫害的反動局面之下，却生長了一種國家社會主義的傾向出來，這種傾向以高島素之爲代表。日本的國家社會主義遠在社會運動初期曾一度發現，但不久夭折。這就證明這種思想只有在階級鬥爭不發展或極端反動的條件之下才能滋生。因爲把國家界限來拘束社會主義根本就是一種反動的空想，這可以說是日本底普魯士式軍國教育的副產品。高島素之後來之崇拜莫索里尼和仇視蘇聯並不是偶然的。這與佐野學從史大林的『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走到以天皇爲本位的日本帝國社會主義同一道理。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和日本經濟的突然繁榮重新喚起無產階級的鬥爭，尤其是因物價問題而暴發的糧食騷動，使全國的工人和農民第一次走上街頭與資產階級皇朝的警察巷戰。這次大鬥爭提高了工人不少自信力。但牠到底是自發的，無領導的，牠天然成了無政府主義的營養品。一九一九年是工人運動飛速生長的一年，同時也是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盛行的一年，這並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日本無產階級剛從基督教的人道主義中解放出來，現在又受了新的空想的無政府教義來支配了。但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絕不會在日本工人中空過，假如社會民主主義沒有能力征服無政府主義和滿足日本工人的政治慾望，布爾什維克主義却絕對勝任這一工作。一九二〇年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不但隱伏了無政府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過時的鬥爭，同時也隱伏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與上述兩種勢

力的鬥爭。正因為這樣，日本資產階級便又轉過來對付這一新生的更可怕的敵人。牠在解散了『日本社會主義同盟』之後，立即檢舉所謂『曉民共產黨』了。這是年青的日本布爾什維克黨人所受的第一次打擊。

日本無產階級一方面受十月革命的影響，一方面受天皇政府的連續打擊，牠逐漸了解無政府派的無能。於是日本工人開始走向布爾什維克主義。日本的老社會運動家如片山潛，堺利彥，山川均都先後加入第三國際。無政府派和布爾什維克派的鬥爭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到處發生衝突。布爾什維克主義極力吸引工人注意政治的鬥爭和工會的民主集中制，結果牠迅速的戰勝了無政府主義的盲動和工團主義傾向。但布爾什維克的影響擴大又引起日本資產階級的新的驚慌，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又發生了第二次『共產黨事件』，所有著名社會主義者都遭檢舉了。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大地震，更加深了日本的反動局面，資產階級害怕這次天災引起社會的騷動，因此牠立即找到朝鮮人和社會主義者做牠的代罪羔羊，到處組織『自警團』，虐殺朝鮮人和左傾領袖及羣衆。結果發生了震駭一時的『龜戶事件』和『甘粕事件』。著名的無政府派領袖大杉榮全家被殺。天皇政府這種殘暴的手段，和沙皇政府之利用『黑色百人團』殘殺猶太人和革命家，出於同樣的社會意義。

大杉榮的被殺同時表示日本無政府主義派的完結。但在日本有長久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却保有很大的潛勢力。當布爾什維克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鬥爭時，社會民主主義躲在前一陣營內。等到新的反動局面到來時，社會民主主義者便公然排斥一切革命的手段。這個時候，恰好是西歐社會民主黨復興的時代，一九二三年英國第一個工黨內閣的成立更給了日本孟什維克及可能主義者一個很大的鼓勵。於是在日本工人運動內部又爆發了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孟什維克主義的鬥爭。這一鬥爭在地震過後，工人運動重新抬頭時轉趨激烈。日本勞動總同盟之開除『關東地方評議會』派表示兩派已正式決裂。天皇政府爲抵制工人的革命思想，巧妙的利用了工人內部的分裂，牠一方面頒布『過激運動取締法』，打擊『過激派』；一方面却通過了『普選法』，給了社會民主黨人一個極大的幫助。『普選法』頒布使所有的黃色工會領袖，孟什維克，自由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政客都向天皇謳歌了。他們極力向工人宣布天皇的恩德，彷彿他們一下子戰勝了『過激派』。這是日本工會運動家和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墮落爲最反動的社會帝國主義者的開始。因爲，我

們已經說過，日本資本主義本身的條件是絕不能容忍國內的『改良』和『民主』的，天皇政府的『普選法』只是緩和工人鬥爭的一種應急政策吧了，牠始終還要訴諸牠的傳統辦法：向外侵略的。假如日本的『社會主義者』拜倒於資產階級的應急政策之下，他們將來也必須擁護天皇的帝國主義侵略（他們的政綱完全排斥了『民族自決』的口號，這不是偶然的）。後者是前者的報酬。布爾什維克派怎樣對抗這種可怕的墮落傾向呢？按照他們的傳統政策，他們當然要利用議會的鬥爭來揭破資產階級皇朝和孟什維克的欺騙。但不管在任何民主鬥爭的場合，布爾什維克要想澈底揭破敵人的欺騙，他們必須清楚的指出民主鬥爭與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指出『普選運動』必須勇敢的越過資產階級的財產界限才有出路。可惜日本的『布爾什維克』只是史大林主義的偽裝。牠不但沒有認真把十月革命的教訓告訴日本工人，而且還從頭到尾執行孟什維克的機會主義政策。當一九二五——二六年日本的社會民主黨人組織幾個工農黨來從事『普選』的投機時，日本的『布爾什維克派』並不根據獨立的政綱公開爭取羣衆，他們却和改良派政客競賽，埋頭於實現他們的『工農黨』路線。他們的唯一口號是『建立包容廣大工農羣衆的無產政黨』。結果，他們整天和社會民主黨人吵架，爲的是互相指責：『破壞統一』。但他們從來沒有從政治上揭破社會民主黨人的欺騙，對四個工農黨的大同小異的政綱（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他們從沒有公開批評過——爲的是爭取他們組織上的統一！日本共產黨從始便放棄了獨立的政治活動而變成社會民主黨的附庸並不是偶然的。因爲牠一貫就認爲日本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牠從『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擴大爲『人民陣線』的公式，從『第三時期』走到提倡與社會大眾黨及『自由主義者』的聯盟，完全是繞着這個神聖的軸心走的。那末，牠又怎樣能够走出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比社會民主黨人走遠一步呢？

本來，自一九二〇年以來的長期的經濟恐慌已造成了日本革命爆發的機運。尤其是一九二五——二七年，日本革命的危機已達頂點。這個時候日本只有兩個前途，或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乘着民主鬥爭的浪潮走向政權之路，或者讓資產階級對外舉行新的軍事冒險來緩和或消滅革命。但我們上面已說過，日本沒有一個黨敢於觸動資產階級的法律和財產。結果一九二七年田中內閣出兵山東，利用對外的勝利來實行他的國內鎮壓政策，（下接三十一頁）

抗戰與思想

木君

(一) 關於精神動員

自從抗戰達到了『第二時期』，即放棄了武漢以後，中國抗戰的領導者忽爾注意到精神和思想方面來了。第三屆國民參政會通過了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並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運動。這種因軍事頓挫而引起的精神與思想運動，當然是值得我們充分注意的。

抗戰不單是一個軍事問題，同時又是一個思想和精神的問題，這意見當然是千真萬確；尤其在弱小民族反抗強國侵略的戰爭中，精神和思想的因素，尤其顯得重要，因為弱小民族既無優勢的武器可恃，所恃者祇有那較為前進的思想與較為堅決的精神罷了。為此，對於目前中國抗戰領導者所提倡的精神運動，就牠的注意的本身說來，那是無可非議的。

但問題決不限於注意的本身，而最主要的還在於他們所注意的那種精神的實質，以及他們所提倡的那種思想的實質。正確和前進的思想可以導成軍事的勝利；而反動或錯誤的精神却能使抗戰敗亡。

在這篇短文裏，我就想大略研究一下此種思想與精神的實質。

根據『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說：

『……國民精神總動員之涵義應為集結全國國民之精神於簡單共同之目標，使全國國民對自身皆確立同一的救國道德，對國家皆堅定同一的建國信仰，而國民每一份子皆能根據同一道德觀念為同一的信仰而奮鬥犧牲是也……』

『救國之道德，實為我先民所固有，亦即總理所倡導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八德……中國民族之昔日綿延光大，實賴有此道德，今日之衰弱式微，實由喪此道德。故非要求吾國民一致確立此救國道德不可……』

由此看來，國民黨所倡導的精神運動已經很明白了，牠是要『恢復中國

的固有道德』，尤其要恢復『忠』，『孝』這兩大美德；因為據說『唯忠與孝，實為中華民族立國之大本』，倘國民人人能『對國家盡其至忠，對民族盡其大孝』，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了。

這段話如果照表面上的意義去加以接受，似乎是醫治目前抗戰危機的一貼萬應良藥，可是過細地加以研究，却又不得不令人懷疑的。

首先我們要問：我們抗戰的領導者為什麼要在軍事頓挫，即所謂『後期抗戰』的時候，特別提出『固有道德』來，要求國民盡其『至忠』與『大孝』呢？這當然是有牠客觀的背景與需要的。

在這次偉大的抗戰中，兵士與民衆蒙受了最大的犧牲，但是一般貪官污吏却仍舊在盡情搜括，富商巨賈則乘機漁利，再有一些達官顯人則更從事黃金，外匯或食糧的投機，獲利無算；迨自武漢及廣州失陷以後，即走入了抗戰的所謂『第二時期』，大多數的官僚，政客，財閥與失意軍人，更是公然替敵人服務，助紂為虐起來，甚至追隨國民黨總理垂數十年的黨國要人，也都做了日帝的公關代理人。這樣一來，一切參加抗戰的軍民，以及為抗戰受難的老百姓們，自然要怨望到抗戰領導者的政策上去了。

國民黨的領導者一方面為要『激勵』那些不道德的官員，富商與顯貴人等，即中國社會中的所謂士紳等級，使他們顧全抗戰大局，不要為虎作倀；另一方面要緩和與防範那些漸露不滿的軍民大眾，使他們不致走入更激烈的行動起見，乃提出了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綱領。這是此次精神運動的真正目的與意義。

不過吸吮民血的貪官污吏，乘機漁利的好商詐賈，以及一切認賊作父的政客軍閥，是否會因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八德之大昌而『悔過』，而停止作惡呢？這當然是一個莫大的幻想，聰明的抗戰指導者大概也不會不懂得這點淺近的道理吧？

因此，我們便不得不說『精神綱領』的第一個目的，縱令不是偽善的，

那亦必是幻想的。

關於第二個目的，即欲緩和與防範那些不滿的軍民大眾，使他們不致走入更激烈的行動，這倒是具有真實意義的。所以綱領上說：『八德之中，最根本者爲忠孝，』因爲忠孝本來是封建等級社會中的主要紐帶，牠們的特點，就是要下等人對上等人之絕對無條件的服從。君父要臣子去死，臣子不得不死，這就是忠孝的實質。忠孝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一種優越的權利，牠們對統治者自身是並無半分約束力的。在上者可以爲所欲爲，甚至可以倒行逆施，可是爲臣子者却祇有絕對服從，如果稍有批評，或竟敢表示反對，那末忠孝這兩種武器立刻就加在你的身上和心上了。所以忠孝是歷來統治者的一個主要武器，同時却是真正民主政治的敵人。

這樣講來，那末在這必須集合全國民衆的心力，充分檢討失敗教訓，藉以謀取抗戰勝利的時候，這種反民主的封建道德，似乎是應該反對而不應該提倡的；因爲要想抗戰勝利，必須得軍民大眾的熱烈擁護，而欲得他們的擁護，那就必須讓他們有充分發表意見，自由批判領導政策的權利；如果不合時代的道德教條，以『至忠』『大孝』等片面要求來鎖住他們的口，使他們祇能做『不得不死的』『臣子』，那末這個政策即使成了功，也不過使民衆都變成爲消極服從的一羣，不會有益於整個抗戰的好轉的。

不過說到這裏，有人也許會出來反駁道：『依你之見，現在應該叫中國民衆不忠不孝，叛國事仇嗎？』對於這個問題，假使我的反駁者並不是一個冥頑不靈的道學家，而是一個暫時糊塗的青年，那末我是很願意答覆的。

一般人對於道德的了解，總把牠當成一種超階級與超時代的東西，並且只把牠看成一種抽象的個人的爲人態度，譬如說『忠』是誠實的意思，而『孝』則但指子女對父母的愛而言；如果僅僅這樣，那末這樣的『忠』『孝』自然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實際上，道德從來不會，而且也不能限於個人的事情，道德之所以成爲道德，即在於牠是一種社會的關係，因而也是一個政治的力量。換句話說，道德始終不能不具有政治與社會的意義。

倘然我們把道德作一番歷史研究，那末我們可以知道：無論什麼道德，（尤其是忠孝）都是某一特定時代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一個工具。歷史上無論那一個時代的統治者，都要倡導出一種道德來叫小民遵守。因爲道德的拘束力，普通要比法律和武力的拘束力爲強。好比『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的

『忠』，比『繩之以法』的『誅』當然要有力得多。所以中國歷史上的一切『真命天子』，每次實行了『大不忠』，即推翻了或篡奪了前朝的江山之後，第一件的大事，總是尊孔，就是要過去和他一起不忠過的民衆對他盡起忠來。元清以外族入主中原，却也尊崇了這位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之道的『聖人』，結果到末帝『遜位』之時，也還有許多漢族人士來効忠於他們的社稷。

這樣看來，中國的固有道德，（尤其是忠孝），乃是一切統治者束縛奴隸的一種桎梏，甚至是一切侵略者奴役被侵略者的一個武器，難道還不明白嗎？我們目前的侵略者也已明白了這個道理，他早已在努力尊孔，並且命令北平和南京的『統治者』在提倡我們的固有道德——忠孝了。這些事實是具有最重大的意義的，一切民族革命的戰士們，決不可輕易放過了此種精神上的總攻！

然而我們抗戰的領導者，竟也想以奴隸道德來做解放戰爭的『精神』，這是我們不得不萬分引爲遺憾的！這種道德非但不能阻止人們『叛國事仇』，而且正是叛國的人們，想用這些道德桎梏來強迫中國的大衆事仇呀！

中國民衆如果真想謀得解放，那不僅要在軍事上與其他行動上，予侵略者及其所有代理人以無情的打擊，並且要在精神上棄絕一切壓迫者用以奴役民衆的舊道德與舊文化，他們應該激發起對壓迫者的『大不忠孝』，發揮出對一切侵略者的『大不仁愛』，因爲要使侵略者放下他們的屠刀，要使貪官污吏，奸商詐賈，政客官僚不再害民，不圖私利，乃至不叛國事仇，那末唯一的辦法，祇有對他們進行『不道德』的嚴厲鬥爭！空洞的道德說教，那只有幫助敵人，反而麻木民衆的戰鬥意識！

假使我們因這『精神綱領』的提倡，養成了一種對侵略者講『和平』，對事仇者談『仁愛』，對小民專責以『忠孝』的風氣，那末容我說句放肆的話，這樣的道德是於抗戰有害的。

（二）評所謂『中國化』運動

本年二月間，國民黨提出了『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綱領，接着，中國共產黨也發起了一種運動，就是所謂『中國化』運動。這兩種運動不僅在時間上

是連續的，同時在精神上也是一貫的。據中共的外圍理論家柳湜君在一卷三期的讀書月報上說：「中國化」這一口號的提出，我們要從當前的政治實踐所反映於文化的要求上……去找牠的根據。抗戰進入第二階段，奠下了抗戰建國的基礎，樹立了我們對於勝利前途的信心……同時也對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這意見和『國民精神綱領』上所說的『後期抗戰，精神尤重於軍事，』是完全一致的。

我們既研究過『國民精神』的本質，請再檢討一下『中國化』的意義。

『中國化』的內容

究竟什麼叫做『中國化』？我們在一切與中共有關的雜誌上，很難找到一個明確與一致的意見。這裏且把幾種可作代表的意見錄在下面：

(一) 柳湜的：『它是綜合我們這個偉大民族數千年歷史和世界的歷史，它是我們一切優良珍貴的傳統以及國際的一切優良的傳統的一種交流，是代表今日人類最進步的立場，創造世界新文化一環的中國新文化爲它的任務。這是它的內容。』——見『論中國化』。

(二) 潘菽的：『歸納起來，所謂學術中國化的意義，就是要把一切學術加以吸收，加以消化，加以提煉，加以改進，因以幫助解決新中國的建設中所有的種種問題，而同時也就使這種學術構成了新中國所將有的最進步，最高水準的生活和文化的有機部分而成爲中國自己的，但因爲如此，也必將對於世界學術開始有寶貴的貢獻，而同樣是屬於世界的了。』——『學術中國化問題發端』。

(三) 潘梓年的：『開展學術中國化運動……第一，要有科學化運動；第二，要接受我們自己優良的民族傳統；第三，要闡發舊道德中好的部分；第四，要有中國的新文學與新藝術。』——見『新階段學術運動的任務』。

(四) 『理論與現實』創刊辭：『三民主義是……中國化原則之下理論研究的總準繩』。

(五) 『讀書月報』一卷五期短評：『孔夫子永遠是我們的導師』。

其他關於『中國化』的名作雖然還有許多，不過在內容方面，大概

是逃不出上述意見的，所以我們儘可以把牠來做討論的根據了。

舊事重提

在沒有批判到『中國化』運動的本身意見之前，我先要回顧一下過去，自從清末帝國主義的大砲與商品，打開了幾千年中國閉關的壁壘以後，中國知識者對於西洋文化的態度是經過了好幾個階段的。約略說來：

土地貴族階級的：開始以腐敗的自大態度，蔑視一切西洋文明，後來打了幾次敗仗，承認了西洋人的堅甲利兵，於是發生了張之洞等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論，企圖採取西洋遠較進步的技術文明；但是吸收一種文明是不能僅限於某一點的，所以逐漸地，君主立憲那種『危險』思想也跟着火車輪船到了中國，土地貴族着了慌，結果則產生了戊戌政變，再後則更產生了義和團的反動，終於排斥一切西洋文明。

布爾喬亞階級的：康梁的維新，相當反映着中國新起而微弱的布爾喬亞階級的利益，他們很懦怯地接受了德、日式的君主立憲的政治思想。後來梁啟超更趨向於法國大革命時吉龍特派的溫和共和思想，最後成爲中國一部分金融資本家的政治代表。孫中山所倡導的民族革命運動，那是更多的受着西洋文化的影響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與社會改良政策，形成了他的三民主義；他自來就代表着較爲激進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

不過無論梁啟超或孫中山，雖然他們的政治主張都取自西洋，確切地說：即都取自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說，但他們這一輩的先進分子的整個人生觀與宇宙觀，却都還受着中國的傳統文化，亦即封建文化的束縛。所以他們對於西洋的哲學思想，尤其是超過了資產階級範疇的辯證唯物論，是採取排斥態度的。

小資產階級的：這階段開始於五四運動，即以新青年雜誌爲代表的那種運動，牠所倡導的思想，雖然反映着歐戰期間中國新興的進步的資產階級的要求，但明確而勇敢地把這些要求提出來的，却是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分子與學生羣衆。新青年派不僅竭力要把西方布爾喬亞的『德先生』（即民主）請到中國來，而且還拼命提倡着『賽先生』（即科學）。他們不僅像梁啟超孫中山那樣地接受西方的政治學說，並且還吸收其他方面的文化，而更重要的，他們還以全力破壞中國舊有的文化與思想，拼命搗毀此種思想大本營——『孔家

店」。

工農大眾的：由小資產階級知識者倡導的中國布爾喬亞的新文化運動，逐漸因中國社會關係的變動而發生了分化。一部分完全投入布爾喬亞的營壘，思想上與梁啟超等合流起來（如胡適之），另一部分（陳獨秀，李守常）則轉變到工農大眾方面去了。隨着五卅後工農大眾的興起，西洋勞工運動的先進學說，尤其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理論與實際，立刻成爲中國一切青年知識分子的精神食糧了。他們不僅在行動上打擊中國一切舊的勢力，並且在思想上反對中國一切固有的文化。他們認爲中國事件是世界事件的一環，而中國的學術與文化，亦將成爲世界文化的一環。

歷史的逆轉

上面所講的四個階段，可說是近數十年來中國思想界與西洋文化接觸之後，所發生的一個前進的路程。如果歷史發展是依照着一條直路走的，那末中國文化至少已經是世界文化中一個相當可觀的部分了；可惜歷史的步驟時常是盤旋曲折的。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實行了軍政之後，中國的統治思想便退到了我們上述的第二階段，甚至還退過了第二階段！封建思想的典型大師孔老夫子又給請出來坐定了尊位。讀經救國的四六電報，又在報章上時髦起來。等到訓政確立，爲了反對一切危害國家的異端起見，於是中國固有道德的提倡更見積極，終於在文化界產生了一種「本位」運動，其實這在本質上是回到了我們所說的第一階段，亦即曾國藩張之洞的時代去了。

不過這種「本位」運動，非但沒有爲社會主義者所接受，甚且爲一切進步的自由主義者所反對。結果那運動便祇得以「十教授」的一紙宣言，以及幾期「文化建設」而寂寞地告終。一般青年大眾，也始終還是到什麼「克思」，「諾夫」或「斯基」的著作中去尋找學問，並不願到「子曰」「詩云」裏去建立「本位」，這倒是中國文化運動史上的一件喜事。

抗戰發生，本該是思想運動轉向前進的一個良機了；然而，也許祇能說歷史的不幸吧，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却於戰爭發動之初就自動放下了思想的旗幟。等到抗戰轉入「第二階段」，當領導抗戰的另一大黨提出其本質反動的精神綱領時，中共非但不予以批評與糾正，竟至變本加厲，相應着提出了「中國化」的口號，並高呼着「孔夫子永遠是我們的導師」！這可又不得不

使一切熱望思想進步的人士，表示痛心了！

「中國化」的反動性在那裏

但照我們上面摘錄的「中國化」的內容看來，彷彿牠並不含有多大反動性質。這是什麼緣故呢？這裏的原因很簡單，即在於他們的理論，是用一些絕對正確的部分意見，狡猾地和一個完全反動的基本精神混合而成的。

絕對正確的部分意見，有如：「反對外國學術理論之公式主義與教條主義式的使用」。「要使世界學術理論的最新成果，應用於中國各種現實問題之解決……」等等。——見「理論與現實」。

至於完全反動的精神，則可分爲下列諸點：

（一）否定了歷史發展的一元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卷一的序文中說：「產業較發達的國家，不過對產業較不發達的國家，預示了它們將來的形相」。又說：「一個國家，應該從外國學，也能够從外國學。」這兩句話的正確了解，即是：各國雖然有經濟與文化的特點，但從歷史發展之基本力量，即生產力的觀點來看，各國却並沒有特殊的「國情」，各國的「國情」不是本質上的不同，而是時間上不同的幾個發展階段。因此，落後的國家應該拋棄那些落後的經濟方式與文化，「應該從先進的外國學，也能够從外國學」，但是我們的「中國化」論者是什麼個意見呢？他們要把「我們一切優良珍貴的傳統和國際的一切優良傳統交流」起來（柳湜語）換句話說，就是要把我們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腐肉，和資本主義的宿菜，與社會主義的鮮果混和起來，這將是一味多麼難吃與有害衛生的雜燴！

（二）國際主義之完全放棄 否定了歷史的一元論，則必然要放棄國際主義，他們雖然竭力聲明「中國文化將成爲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但完全放棄國際主義這一個事實，却還是十分明顯的。因爲所有這些人的根本意見，是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利用世界學術最進步的成果，藉以創造中國人自己的文化」。換句話說，就是要「中國爲體，世界爲用。」這個意見裏至少包含有兩個重要的錯誤：

第一，他們把「中國」了解成一個沒有階級的集團，把「中國人」了解做一個不會分化的整體，因此所謂「中國文化」，也就了解成一種超階級的「民族文化」了，其實這是不會有，而且也不會有。譬如拿孔子學說來講，

這是公認的『中國文化』，然而牠也能成爲入主中國的蒙古人與滿洲人的君王的文化，且能成爲侵略中國的日本統治者的文化；另一方面說，孔子這種『中國文化』却從來不曾真正成爲中國貧苦農民的文化，因爲這些『難養』的『小人』是不能『分沾化雨』的。再拿馬克思的學說來講，這該是『德國人的文化』了，然而希特勒先生却罵牠是野蠻主義，把牠『根絕』了，反而『中國的小人』倒接受了他的思想。這樣看來，中共的理論家們要創造一種『全民族的各社會層精誠團結的……中國文化』（柳湜語），那是辦不到的，實質上不過去接受中國統治階層的固有文化吧了。

第二，他們忘記了中國是世界財政資本統治下的一個半殖民地，所以忽視了中國民族的獨立，乃是整個世界反對資本統治的一個部分鬥爭。中國解放戰爭的領導者，如果不從世界鬥爭的見地來觀察中國事件，那末他便不能把這戰爭引導到勝利的道路，由此推廣開去，則在學術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中國的知識者祇能站在世界最前進的，即捐棄國界的那個階級的文化觀點上，來建立部分的中國文化；換句話說，祇有『以世界解放爲主體，以中國解放爲手段』的立場，再換句話說，祇有站在世界立場上來看中國，而不是坐在中國的井底來看世界，那才能創造出一種中國大眾的文化來。

然而中共的理論家告訴我們道：『中國化』原則之下的理論研究，是以三民主義爲總準繩的。既然以民族主義爲『總準繩』，那還談什麼要把中國化』成爲『世界文化的一環』？還不是與『本位文化』玩着同樣的一套把戲嗎？

(三) 對國粹派的屈服 『中國化』運動的第三個反動精神，就是對於『國粹』的屈服。這本是放棄了國際主義的必然結果。譬如潘梓年之所謂『闡發舊道德中好的部分』以及讀書月報上所說的『孔夫子永遠是我們的導師』，都是最好表現。在這些理論家的意思，大概以爲着重了那個『好』字，就不會有什麼毛病了，他們又許會用一句西洋俗語來對你說：『傾倒浴水，不要連小孩都倒掉』。可是這些理論家的最大不幸，恰恰又忘記了道德是最具有階級性與時代性的，你決不能在前資本主義時代統治階級所專利的孔家道德的髒水中，取出一個『好』的『小孩』來，使他從事於目前中國大衆的鬥爭。關於這一點，我已經在論『精神動員』中分析過了，這

(四) 混淆抗戰現階段的真正要求 抗戰到了『第二階段』，本來每一個不願自欺的人，總得承認軍事的頓挫，與國內外環境之愈加困難，這時一個真想謀取抗戰勝利與真正代表民衆利益的政黨，在文化上自應愈求接受和消化西歐各國革命，尤其是俄國革命的理論與經驗，藉以澈底批判兩年來抗戰領導者的錯誤政策，實行革命的路線，以便大多數民衆興起，成爲抗戰的主力，並與各先進國的反戰反資本鬥爭，以及其他殖民地的解放鬥爭聯結起來。這就是說：抗戰『第二階段』所反映於文化的要求，應該是中國之拼命『世界化』，亦即應該拼命研究世界各先進國家與各先進階級的鬥爭理論與經驗，藉以挽救目前抗戰的危機，並爭取牠的最後勝利。

不過說到這裏，『中國化』論者一定會回答道，『這正是我們的意思呀！』難道這正是你們的意思嗎？請看你們的文化領袖潘梓年先生的話吧：『要開展學術的中國化運動』；他叫中國的知識者『用科學方法去研究經史，子，集』去『整理國故』，又叫人家去『闡發舊道德』，最後，他還叫人家『從水滸，金瓶梅裏去學習中國的新文學與新藝術』！嗚呼，這算是抗戰『第二階段』『反映於文化上的要求』！

爲什麼要提倡『中國化』？

『最前進的』共產主義者，爲什麼要提倡這種本質反動的『中國化』運動呢？我現在就要來試行解答這個問題。

中國共產黨既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那末牠的全部政策與主張，就都與第三國際的態度有關，而第三國際的態度，則誰都知道是蘇聯官僚態度的反映，自從史大林一九二四年開始採取『一國社會主義』之後，便逐漸放棄了國際主義的精神，再因一九二六年後世界各重要國家革命運動之相繼失敗，他就趁勢逐盡與殺絕了整代革命的老布爾雪維克，使蘇聯更加轉入國家主義的軌道上去。至於其他國家中第三國際的支部，則因實行『人民陣線』政策，即受命擁護本國統治階級的結果，也都墮落到國家主義的泥淖中去。現在史大林從『人民陣線』跳進了『法西斯陣線』，乃最後完成了分裂第三國際爲各個國家主義政黨的過程。中國共產黨提倡『中國化』運動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反映着這一共產國際的互解過程的。

命，結果使中共一方面喪失了全數優秀的領導者（一部分被殺，一部分轉入共產主義運動的左派），另一方面失去了整個產業工人的基礎，以致一九二八年以後的所謂『中國共產黨』，差不多完全建立在農民的基地上的，至於最上層新起的領袖們，則大多是莫斯科官僚訓練所中造就的一些『職業應聲家』，其中固不乏真正革命的幹部分子，但他們處在『鐵一般』的黨制之下，終於是無能為力的。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基礎和『一國社會主義』的官僚領導聯在一起，就推『中共』墮落於『國家主義』的陷阱。

抗戰後中共之公開宣佈改信三民主義，乃是此種墮落的澈底完成，以後一切在『中國化』名義之下提出來的反動思想，不過是這一政治總轉向的具體表現吧了。

然則，他們爲什麼要在抗戰的『第二階段』才提出這個運動來呢？這還有一個原因的：中共是此次領導抗戰的兩大政黨之一，爲要掩護自己兩年來的錯誤與失敗，爲要將民衆的不滿與批評導入洩氣管中，他們便不得不和一切其他的統治者一樣，叫青年人和抗戰的大衆，鑽進孔夫子的道德魔囊裏去了。

結論

話已經說得太多，雖然我還沒有把『中國化』的謬誤充分批判，也沒有把自己的意見完全說明；不過爲顧到『動向』的篇幅起見，祇得將未盡之意留待以後有機會時再說了。現在且把上面的大意作一個概括：

『中國化』運動的本質是否定歷史發展的一元論的，是民族主義的，階級調和的，對封建道德屈膝的，因而是反動的；不過牠很狡猾地附麗着許多完全正確的部分意見，例如『不可生吞活剝地接受西方先進的思想』；『要應用西洋學術最新的成果來研究中國具體問題』等等。但是正因爲有這些絕對正確的枝節意見作掩飾，牠反動的本質將更加有害於中國的青年。

我們認爲：中國是在世界財政資本統治之下的一個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民衆爲要從國際帝國主義，尤其是從東鄰帝國及其中國的代理人的束縛之下解放出來，並且想建立一個進步意義的國家，那末首先得從世界先進國家中的先進階級去學習他們的『文化』，因爲祇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做到『抗戰必勝』，才能『建國必成』，才能使『中國文化成爲世界進步文

化的一環』；不過爲要澈底學習先進階級的先進文化，首先必須根本破壞中國落後統治階級的，如今已成爲帝國主義代辦們的『固有文化』，要破壞這種文化，則首先得打倒此種文化的中心代表——孔夫子！

誰如果想和侵略者，壓迫者以及一切反動勢力去『爭奪』孔夫子這個『永遠的導師』，那他自己就是這些反動勢力的擁護者！

『人民陣線』斷送下的西班牙現狀

大奇

如果歐戰發生了，西班牙很願處在戰事圈外。主要的理由是這個國家已經完全耗竭了。死於內戰者約一百萬人。傷者不計其數。無數家庭全毀滅了；工廠都破壞了，或荒廢了，或過分用壞了；鐵路與火車幾乎須全部修理之後，才能活動；樹林都被斬伐，無數羣的耕牛都遭宰殺；全國各處的耕地、榆林與橄欖林，全成了荒蕪一片。

人類的相殺，以天天處決的方式仍在進行。所謂『赤化分子』者，只要一發現，不許分辯便行斬盡殺絕——凡有對共和派服過務的嫌疑的人，無論參加的是民事或軍事職務，也無論參加的等級有多麼低，都在『赤化分子』之列，一被發現，如果幸而不被殺掉，也要處十五年或三十年的監禁。但被捕者的極大多數都遭了鎗斃。

這樣屠殺並不僅是在所謂『賣國賊』的名義之下進行——這大都是報仇行動。在全國的大部分地方，『赤化分子』都是狼狽地，像老鼠一樣被追捕。但在某些山區或困難地域裏，他們仍然抵抗並常能給敵人以兇猛的打擊。

不僅是圭尼加的遭毀壞，就是國民軍的砲隊與德意的轟炸機對於馬德里、巴色洛那、及其他一切地方的蹂躪——總之凡是內戰所留下的災殃，都毫不遲疑地加在『赤化分子』的頭上，好像這些城市之被轟毀都不是他們自己的大砲與炸彈造成似的。政府宣傳機關對於每一點破壞遺跡，不管是在什麼地方，總是說：『赤化分子幹的！』

（譯者按：本文係節譯自本年八月十八日『滿哲斯特保衛報』所載西班牙通信。）

抗戰中知識份子的浮沉

育才

抗戰兩年多來，中國社會發生了許多有歷史意義的變化，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浮與沉，可說是這些變化中的重大變化之一。

『七七』以前，北方有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抗日運動，全國許多地方有救國會的抗日組織。『八一三』抗戰發生後，知識青年的救國運動更擴大，更普遍，只上海一隅，以知識分子為中堅的抗日救國團體，在兩三個月之間就產生到百餘個之多。青年救亡團，前方服務隊，救護隊，宣傳團，救亡歌劇團，種種公開與半秘密的團體名稱，就是當時最熟悉於這種運動的人亦弄不很清。這些團體，有的忠忠實實地在日人的砲火下努力救亡，有的腳踏實地到內地農村去作抗日宣傳。至於內地各省的知識分子救國運動比抗戰以前亦更熱烈，更擴大，更深入民衆。有的投筆參加游擊隊去了，有的到前線用筆桿作宣傳教育工作。那興奮，那狂熱，使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血手與火藥氣，更顯露了我們民族為爭取生存之戰鬥精神。

然而隨着我軍之退出上海，上海知識分子的救國運動表現了陡然的退潮。幾個月前的爭先併發的救國團體，一個個地消失了，不甘退伍的積極分子大部分隨軍或繞道退往西南，其餘仍留在孤島的大部分則忍受惡勢力的壓迫而趨於消沉。在抗戰的兩年延續中，不僅上海一隅及各淪陷區是如此，即西南各省的知識分子亦表現了同樣趨勢，四川有了許多救亡劇運的青年會因當道者之或明或暗地阻礙

他們活動而歎氣消沉，即是這種趨勢中的一個例子。我並未忽視各地青年至今還有人去參加新四軍或遠趨陝北，但一年半以來滇越鐵路的南下車中之常常滿是由西南歸東南或出國去的知識分子，則亦是事實。我並不忽視後方各地的報紙與刊物上，至今還常載着充滿抗戰情緒的通信與文藝作品，但各地報紙上描寫抗戰通訊之大量減少，已無可否認地表示知識分子的抗戰筆墨已疏懶許多了。我也決未忽視有許多作者至今還在前線打游擊，但上海兩年來談經濟政治問題雜誌的銷路比較戰前無不很壞，則亦是事實。總之，我這裏所論的，不是那些個別分子，而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般傾向。這傾向無疑地不是浮起，而是沉落。

抗戰兩年來，如果我們要在民族鬥爭洪流中尋找自發的民衆力量的話，那當然只有各地的救亡歌聲，演劇運動，學生講演，戰地服務，壁報以及各種刊物中所表現的文字宣傳等，換言之，即只有知識分子之助演式的跳躍，這種跳躍既向來未為領導抗戰階級所倚重，亦未在抗戰中發生重大作用，可它是可寶貴的惟一自發的民衆力量，對於抗戰自有其相當作用。然而——我們為了抗戰的最後勝利計，無庸諱疾忌醫——目前的這點民衆力量的可憐表現，已比『八一三』前後沉寂得多了！

為了達到抗戰的澈底勝利，我們得研究一下知

識分子這樣浮沉的原因，以便對其消沉加以補救。『一二·一二』以後他們浮起的原因，我們知道了——他們是民衆中感覺敏銳的份子，他們所先一步表現的抗日情緒代表一般民衆的抗日要求。至於他們消沉的原因，則最好叫他們自己的文字來答覆，而這種文字，只要你留意，是俯拾皆是的。這裏且俯拾兩則。

當南北抗戰已發生後的三個多月，有一篇題作『我們這裏』的開封通訊，報告當時開封學生下鄉宣傳的：從城中去的學生們『大家環繞着村子走了一趟，排着隊，唱着歌，敲着鑼，多少人帶着一臉煤烟……但不了解這些人苦心所在的農民們，却絲毫不為鑼鼓所動，男的在種地打牆，望望又低頭做去，女的伸頭望望，很快又把身子都縮回去。大學生中學生幾十個人一趟環繞遊行的辛苦號召，收成只是幾十個赤肚露胯的孩子，和農民提出的叫他們蹙眉頭的問題：『先生說的好是好，譬如我們去打日本，一家老小怎樣活法呀？』宣傳者在黃昏時分回到了開封城，這時日軍已渡過了漳河，所以滿街是逃難的氣息；一到學校，同學間亦滿是學校就要搬到嵩山去的議論，然而學校這時還在公佈獎學規程，仍想用此法籠絡學生。於是這通訊表示憤懣道：『知識分子，這裏是滿滿一城。如果有計劃的編制一下，傾瀉出這死城，讓他們去組織民衆，使民衆能不致一見自己的軍隊就跑，使民衆能不致為敵人的三毛錢就做嚮導，不行麼？但却不行，有些人一聽見他們的脚步聲就橫着大脊樑站到前頭，擋住去路，有時則指出一個隻身也容不下的小門，叫他們輾轉在公文章則中，立正等待。砲聲近了，時候到了，於是裝箱圖書儀器。』（見廿六年十一月

十四日上海大公報)

這些話表示出在抗戰開始時，阻礙知識分子前進的是兩種障礙：一是當局的干涉與限制，二是民衆對於他們工作的冷淡。這兩種障礙，一直發展下來，消耗了青年知識分子的脆弱的情緒，造成了他們的煩悶的情緒。原本不想工作的人遇到這種境地時怎樣，那無須說了，就是願意在後方擔負一切艱苦工作的人，到了抗戰兩年的最近，也竟而如另篇文字所表示的，已昏昏倦倦『望着許多工作，但自己却拿不出可以叫做力量的力量』來了。這篇文章繼續說：

『就在這樣的心境下面，我掙扎了無數次，拖着我的昏昏奮鬥，但說來慚愧，每次都是全軍覆沒地敗北了。……假如不願意只說些空話，要對現實有所披示，那當然得本於痛切的見聞，且爲着鞭策，但我覺得，無論是熱罵或泣諫，那只能是蚊蚋在巨象身上的一刺，不會有什麼反應，而且這聲音是否有出去的可能，豈不是也毫無把握嗎？……所以每次對着白紙的時候，總喚不起自信的心緒……爲了求救，有時試向朋友探問：

『——怎麼樣，工作得很好吧？』

『——哪裏啊，倦得很，手都抬不起來呢！』

或者：

『——工作？悶得吐不出氣來呀！』

於是這位知識分子就更加被『昏昏』拖住了。

他想到自殺，但他不願自殺，他憧憬於在俄國革命中間，那些詩人們迎着那暴風雨之高歌狂舞，沉醉於『那被巨大的羣衆底光景所騷動，被羣衆底熱忱和那互相口傳而擴大的口號所撼動的革命底詩人。』但中國目前並無這樣暴風雨，於是這位知識

分子『對於將會覺醒過來的人民底力量底色采，底呼吸，底衝激，就不能不感到渴望了。』（胡風：『寫在昏昏裏』，見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香港大公報文藝）。

試想，從抱着滿腔救國熱忱而跋涉到西南，而失掉了對於自己工作的自信，而煩悶，而昏昏，而歎息於『改變自己底工作心境要比攻取幾千個巴斯諦獄還難』，最後則寄托其渴望於全國人民之真正起來。這個從高浮到沉落的過程，應當不是那個知識分子的特有過程，而當是凡是在我們後方消盡了熱誠而歸到東南的知識分子，所同歷的過程吧？應當不是那一個人的獨感，而當是在抗戰初起時勇於執筆而現在則手都抬不起來的人們，所共同感到的吧？這樣心情下的產品，難怪少有不是『抗戰八股』的了！

知識分子在這樣原因下所產生的煩悶與昏昏的心情，是不難了解的。

他們有的是火一般的熱情，他們本能地要求痛快發泄的機會。但他們不了解這個社會根本上分許多層，他們把牠看成一個完整的個體。因此，他們的模糊的意識認爲，在抗戰這個神聖事業上，大家當然有充分自由活動的機會，他們當然可以狂歌歡舞到氣盡力竭。然而事實所給予的，並不是允許你自由活動的環境，而是處處擋住你的去路，至多也不過是給你一個連身子都穿不過去的窄門。這樣一來，他們那先天脆弱的感情，便如遇到了冷水潑頭，溫冷了，於是他們的性情煩悶了，工作精神昏倦了。

加之，抗戰的神聖性及時流宣傳已在他們的模糊意識中造成了限制他們脚步的粉筆圈：他們覺得

應該忍耐並尊重統治者層的這種窄門與公文章則，因之他們沒有要打出這個粉筆圈的意思。但到處這樣灰色終是與他們的自由要求不相合的，於是他們除了夾在冰冷現實與自由要求之間而煩悶與昏昏之外，便只有憧憬於十月革命後俄國知識分子的狂歌歡舞的情景了。

假如他們的意識還沒有染成只知道金錢女人的黑色，或只知道盲目崇拜的紅色，假如他們還有胆量認真看一下中國民衆現在正處在怎樣生活條件下（『先生說的好是好，譬如我們去打日本，一家老小怎樣活法呀？』），那麼，他們就會了解，他們所憧憬的，在他們所能望見的前途中命定地要落空。這樣，他們除了更被昏昏拖住而想到自殺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在人類進化史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起過的最炫赫的最神聖的作用，大概是他們在法國大革命中的作用吧？代表他們的甲可賓派左翼，以所向無前的勇猛與驚人的恐怖手腕，把法國封建勢力掃蕩得一點殘餘都不留，爲法國資本主義奠下了最鞏固的基石。在這一時期裏，他們的狂歌歡舞真可算是達到最高峯了。但那時革命營壘一方面的階級關係怎樣呢？新踏上歷史進步輪齒的資產階級，在初期表現了最高的革命性，牠不僅不阻礙小資產階級的狂熱，並且還允許他們發泄，還常以最新進的姿態領導他們去發泄。牠又並不很害怕民衆（至少在初期是如此），而讓民衆在小資產階級後面自由活動。這樣，小資產階級得到了大資產階級與廣大民衆的支持，而得以表示了他們的最高作用。但在今日的中國，形勢完全不同：資產階級不但害怕民衆爲蛇蝎，始終壓制着不許動彈，（下接第四十二頁）

希特勒獲得了波蘭戰利品的大部分

鳳影譯

譯自密勒氏評論報

(編者按：這次德蘇共分波蘭，一般人都以為利於蘇聯，但問題如果不僅限於面積的大小，而更在於質量的好壞，那末得到大便宜的却是希特勒。一般人的此種意見，其實是上了英法宣傳機關的當，因為過分宣傳史大林的『勝利』，是更易激起世界反動者對蘇聯發生恐懼的。所以我們很願意把這篇文章翻譯出來。)

本文寫作時，華沙之戰尚未完結。德軍已進抵波蘭首都的近郊，但還有大批波蘭軍隊在英勇地繼續守衛着這個光榮的城市。華沙缺乏一切天然的屏障，甚至還缺乏外圍的防衛工事，但波蘭人這次顯然是想重演西班牙底馬德里和上海底閘北的英勇的例子，而這一次還是抵抗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力量哩。華沙也並不是完全孤立的；在城之西北，在布格河下流及維斯都拉河之間的區域，仍給波蘭人把守着，而這一帶區域則由布格河與維斯都拉交流處的摩德林大砲台拱衛着。要不是受蘇俄的入侵，波蘭軍是能够堅守這個區域至數月之久的，但德軍三面環攻於前，蘇軍又乘於後，波蘭的防守就顯得無望了。無需多少時候，德蘇的軍隊就會完全控制公元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先生和史大林先生在波蘭的第四次瓜分中指定給他們的領土了。

他們在波蘭佔領地帶的分界線，大略是根據於四條河流的方向的：從東普魯邊境沿比薩河而下，到那勒甫河，沿那勒甫河到布格河及維斯都拉河，上溯維斯都拉河到散河口，上溯散河直達喀爾巴什山脈。不管在德蘇掌握中，波蘭的暫時的命運如何——不管成立傀儡政府也好，夷為保護國也好，不客氣的合併也好——上述的分界線大概總是德蘇在該國劃定新勢力範圍的境界了，或許在某一點或別一點上尚有些微修正而已。這條界線並不是地理的境界；該國的地理構造，在這條線的東部和西部恰好是相同的。這條界線大略相當於四百五十年前中世紀時代波蘭和立陶宛間的舊國界，而今則仍然構成西部和東部的分界，西部居民為絕大多數的真正波蘭人，而東部則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這是一條人種和民族的疆界。

表面上看來，好像蘇聯得到波蘭戰利品的大部分。蘇聯佔有約二十二萬五千公里的波蘭領土，而德國祇佔有約十五萬方公里。然而德國所得的，較之蘇聯所得的要無比的有價值。在前者有二千萬以上的居民，反之，後者祇有一千三百萬人左右。在十一個擁有十萬以上人口的波蘭大城市中，德國將統治其中的八個，而蘇聯祇得到三個。波蘭最有價值的經濟產業是位於德國的部分，俄國所得的，差不多在各方面都是特別貧窮的。

波蘭在維斯都拉河以東的農業是極端落後的，平均每畝的收穫祇及西部的一半。畜牧業是落後的。東部波蘭的農民，差不多都是貧困得令人難以相信，比許多中國的和日本的農民都貧困些，而且一般都是文盲。在蘇聯部分內有極有價值的森林，那就是蘇聯本國也很富於林產。關於工業，曾訛傳蘇聯得到波蘭所有的油業。實際蘇聯祇得到波蘭產油區的東部罷了，波蘭油區被散河分為差不多相等的兩部分，德國得到西半部的管理權，在這一半油區中多年來有許多公司（連美孚油公司在內）都很活動。此外，蘇聯祇得到幾家製糖廠，幾家大的鋸木廠，以及在林柏堡區域的某幾種雜碎工業吧了。

波蘭的煤油業是該國不重要的工業，最近幾年各種煤油的出產品不過五十萬噸，佔全世界產量的百分之〇·三。波蘭三十家煉油廠，僅僱有工人三千名。祇有白蠟的出產，波蘭在世界市場上佔有有力的地位，在國際白蠟出口中佔百分之十。波蘭的大工業是鐵，鋼，鋅，煤和紡織業。所有這些大工業都落在德國部分。獲得了這些工業，同時統制了佔波蘭出口幾及百分之四十的波蘭西部所產的豐富的農業副產（鹹肉，裸麥酒，蛋，糖，大麥酒），事實上就是增強了德國的經濟力量。

波蘭的上西利西亞和鄰近的唐百老娃盆地構成強大重工業的所在地。在那裏，波蘭每年經常出產三千五百萬噸煤，她把其中的三分之一輸出國外，在許多外國市場上，為英國煤輸出一個嚴重的勁敵。她的煤產量約佔世界煤產量千分之三十五。而且德國所佔領的波蘭，每年出產一百萬噸以上的鋼，每年十萬噸以上的鋅，這數目佔世界鋅生產額的百分之十一。在洛次的波蘭紡織工業中，有歐洲最大的紗廠和最大的亞麻編織廠。所有這些大工業和許多近年來才發展的小工業，現在都任德國隨意處置了。

真的，德國佔有這些貴重的戰利品，同時也獲得了好多的困難和麻煩。在她的波蘭新征服地中，在戰事之前，住着不到一百萬的日耳曼人，但波蘭人却有約一千八百萬，並且還有近乎二百萬的波蘭猶太人。這一千八百萬的波蘭人將證明比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六百五十萬的捷克人更難於統治。在一九一四——一八年大戰前一百二十五年，德國會想把西普魯士，波森及上西利西亞的三百萬波蘭人歸化過來，但此舉却落了空，所有一切努力的結果，祇是更加激起波蘭人的憤怒，以及激增他們的民族意識。在波蘭組織一個親德的傀儡政府，是極端困難的。畢蘇資基派是波蘭唯一沒有明顯反對德國的政治集團，但牠的權力於最近已被德國的波蘭戰役摧毀了。在野的三個領導黨——農民黨，國家民主黨和社會黨——都是激烈地反對德國的，牠們多年來都在嚴酷地攻擊畢蘇資基政府，因為它有親德的傾向。

但蘇聯在她的新佔領地內，也碰到嚴重的問題。那裏他們必須要對付的祇有一百萬的波蘭人，一百五十萬波蘭猶太人，二百萬白俄羅斯人，但祇有七百萬以上的烏克蘭人。這些烏克蘭人既不是親俄的，也不是傾向共產主義的。尤其是在東加里西亞的烏克蘭人，過去九十年來發展着一個強大的愛國運動，他們要建立一個獨立的資產階級的國家，這運動從散河一直擴展到頓河。這一運動雖受波蘭人壓制，却絕對的受德國人的援助，並且在烏克蘭農民羣衆中有一個強固的基礎。此外蘇聯還要處理波蘭東部從前沙俄時代遺留下來的根深蒂固的殘餘。該國是舊俄東正教會在全世界唯一尚能保殘守缺的區域，牠每年派出千千百百虔誠的香客到著名

的 Poczajow 寺院進香去，目下該寺院已掌握在紅軍部隊的手中了。另一方面，俄人對付那些無足輕重的少數波蘭大地主是容易的，他們多數是些高級貴族，保有中世紀規模與結構的大地產。

波蘭猶太人對德蘇都將是一個非常感到棘手的難題。這些猶太人在波蘭西部的許多城市中，形成爲有力的少數民族，他們在華沙，洛次，克拉科的居民中計佔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在維斯都拉河以東的各城市，他們也佔着絕大多數，靠近舊俄邊境的城市中，他們居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之間。在那裏猶太工人和知識分子之中，雖然有着強大的共產主義運動，但大部分的波蘭猶太人很顯然是屬於資產階級的，並且很熱心於摩西正教和猶太復國運動。猶太人祇佔波蘭全人口百分之十強，但他們差不多主宰了全國的工業，商業和財政的一半。

就以上所列舉的德蘇瓜分波蘭的情形來觀察，德國顯然獲得了很實際的利益，蘇聯雖然在這次波蘭的戰利品中，得到了廣大的幅員，可是並不很動人。爲了這一點子她不值得完全轉變她的對外政策，並且從蘇聯給予德國及時的援助看來，這祇是一個細微的代價。但獨裁者史大林相信是完全知道這次援助是值得的，並且到現在還是值得的，而且相信他還決意要去取得這次援助的最高的可能的代價，因此我們必得承認，蘇聯從波蘭的贓品中所得的一分兒只是蘇聯馬上或不久得到報酬之一部分而已。波蘭的摧毀已在波羅的海國家和巴爾幹國家中，給一個『新措施』開闢了一條道路。

波蘭外交政策，在其最野心勃勃的日子當中，就是想在波蘭的領導之下，和那些多少有點同盟和聯合關係的國家，築成一道巨大的防禦線，從北冰

洋直伸至黑海，把德國和蘇聯隔離開來。但這些計劃的實現都證明不可能了，波蘭在這方面所成就的只是和羅馬尼亞締結同盟，這是以對付萬一蘇聯向該兩國的進攻的。同時也和愛沙尼亞締結了政治，外交，軍事上的友誼。波蘭瓦解後，剩下這兩個國家都要不幸地爲蘇聯和德國所干預了。羅馬尼亞已完全不理睬她的波蘭同盟者，她毫無理由的藉口波蘭是首先受德國，後來才受蘇聯進攻，所以拒絕給予援助。愛沙尼亞打發她的外交部長到莫斯科去懇求史大林的慈悲，顯然的，柏林或者已經告訴了愛沙尼亞，他們正在商議要把她投入蘇聯的新勢力範圍中。羅馬尼亞仍在彷徨中考慮着：她要投靠的是蘇聯或德國，抑或是她們倆。

布加勒斯特政府對法西斯鐵衛團暗殺運動的強硬處置，自然並不阻止牠和德蘇妥協或是最後屈服。鐵衛團即是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以及德國國社主義的仿造品，但他們在羅馬尼亞至今尚未獲得任何實際權勢方面的後援。一九一四——一八年大戰後，大地主制度很快就崩潰了，往後這個國家爲大工業，穀物貿易，官僚，宮廷和君主的聯合政府所統治，至今已已有二十年，這個聯合政府抵敵鐵衛團的迅速和簡捷的行動，結果主要是國內的行動，很少牽涉到外交方面。如果希特勒先生和史大林先生同意向這個擊潰鐵衛團的政府提出條件，那末在最近的將來，牠會和柏林並莫斯科好好地談判的，這些條件一定會犧牲羅馬尼亞的主權領土和資源，但牠却仍讓聯合政府的統治權留存着，以便統治在羅馬尼亞的殘存部分。到了羅馬尼亞統治者的存在受到威脅時，那他們就多半寧願戰爭了，而且還記起他們不祇是波蘭的同盟者還是法國的同盟者了。

目前，在國內國外的大砲聲裏，都參有要求『和平』的呼聲。在國外，最能引人注意的是莫斯科發出的『和平』論。在國內，『和平』論的代表是資產階級的某一派。這固然是兩種不同的戰爭，因而也是兩種性質不同的和平。但目前許多人對這和平聲却都發生逆拒的感覺。

關於史大林和希特勒合唱的和平論，本期裏已經有了南冠君的批評，似乎已經沒有再說的必要。我這兒祇談到咱們本國的那一種。

我們國內的抗戰，與西歐正在進行的戰爭完全不同，牠乃是弱小民族謀解放而進行的反帝戰爭，因此，國內那種『和平論』之叫人厭棄，也是具有完全不同的理由的。現在我想從這種『和平論』的基本認識，其所企圖達到的目標，和達到此目標的方法這三點來加以批判，並指出牠絕對不能接受的理由。

根據這一派的主要文件看來，我們主和的基本出發點有三：（一）中國對日戰爭已戰到不能再戰的地步，過去所以敢開戰者因為依仗着會有國際的援助，但現在事實表明國際援助已不可恃，而且歐戰發生後更不可恃，也不必恃，故必須和。（二）日本方面已經發表了近衛宣言，聲明願尊重中國主權而與中國議和，此宣言應當信賴；中國議和既可『無損於主權』，又何必再戰。（三）中國已經戰敗，然日本亦知統治中國辦不到，所以此時講和尙是時機，如再戰下去，則其結果，對方條件必將很

苛，故此時須和。這三點可說是他們的基本認識。和議成立之後，他們想在中日之間建立怎樣關係呢？他們所理想的關係是：獲得中日兩國的『平等合作』，以圖實現東亞的真實和平，而建設進步的東亞。這可說是他們的目標。但怎樣達到這個目標呢？他們也很怕日本方面無誠意，但他們認為須先由中國方面表示了誠意再說；他們也知道在和的方法上有許多困難，如日本撤兵問題，中國軍隊組織問題，南北偽政府的一致問題等，但他們認為和既然是必需的，那這些方法上的困難只有力圖解決了。

假如我對於這一派主和論的認識無大差（我相信無大差），那麼我便有權利指出他們的主和論認錯了三點，第一，他們只看見統治者的抗戰力量之消長，及英美蘇之援助不援助，而不肯着眼於怎樣發揮民衆的力量。目前中國的抗戰無可諱言是軍事上失敗了，但這只是政府領導下的軍事的失敗，而絕不是民衆力量的竭絕。民衆力量是我們民族此次爭求解放之最可靠的力量，牠豈但並未竭絕，而且還根本未曾動用哩。第二，他們未認清此次日本之侵華，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及日本國內矛盾之當然結果；因為前一點的理由，所以牠要求獨霸東亞，到戰事進行了兩年的現在，牠決無輕易撒手而讓中日平等共存共榮之可能。英帝國如果無有印度這個倉庫應該早已衰敗了，而日本現在就是正在找尋這樣的可以養育牠的倉庫。這一點無可否認的歷

史特性，將必然使主和論的中日平等和平的幻想落空，至於近衛的宣言不過是日本想找一個可靠的駕御中國的傀儡之表示而已。第三，他們未認清這一次的中日戰爭是日本企圖獨霸東亞與中國民族求解放的決鬥；現在就承認失敗了嗎？就從此撒手不戰了嗎？如果這樣，日本之是否能建立其東亞霸權固須待此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來決定，但中國之將成爲日本殖民地則確定了。

所以這些主和論者的中日平等和平論只是一種欺騙。假如他們的和議實現了（當然是屈辱的），則中國當然只有他們的統治而更加速成爲日本的殖民地，而且在最近將來的必然來到的日美戰爭中，中國民族當然還要成爲日本對美爭霸的可憐砲灰，中國人民的物產當然要被徵入日本的軍用倉庫。在這種情形下，人民所受痛苦不能少於繼續抗戰的痛苦。

這樣地有利於日本，而將陷中國民族於更痛苦，更難翻身的地位之中日和平論，同時又連帶地陷日本，朝鮮，台灣，東北民衆於奴役地位之中日和平論，當然是一切真正民族革命者所不願接受的！

三種主義

假使有人說：齊趣林的外交是『浪漫主義』，李維諾夫的外交是『現實主義』那末史大林與莫洛托夫的外交便是犬儒主義。

史大林爲何勝利？

君衡

史大林與希特勒的攜手，使向來同情蘇聯的人士，一下子失去了依據，而不得不懷疑着：「究竟蘇聯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如果史大林認爲保障世界和平的條件，昨天還是集體安全與民主陣線，而今天則相反的是與法西斯勾結瓜分波蘭，那麼蘇聯這種翻雲覆雨的外交政策，是不是代表由十月革命創造出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則？這種問題是懶於思想的人們，所難以回答的，但一種現成的回答：「不管蘇聯的外交政策怎樣，牠的目的在保護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全，這一點牠總是成功了；另一種進一步的證明則代替了回答：不管反對史大林的人們怎樣說，史大林在蘇聯統治的穩固，反證了他政策的正確，假如他是錯的，他就不會保持他的勝利地位了。」

拜倒於現實權力之前的人們，總愛用「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一個公式，以證明史大林勝利的確實，但史大林因何能勝利，在國內的以及國際範圍內，這種勝利的前途怎樣？這是有待於歷史條件的具體分析的。

歷史的綜合發展律（註一），使俄國得在落後的經濟基礎上面，完成了最進步的社會主義革命，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之所以能比歐洲各先進國家較早爆發，並不證明社會主義可以建立在薄弱的生產力上面，而只證明俄國晚起而幼稚的資本主義，在國內外的環境中，要解放其生產力，只能用社會主義的方法，才能前進一步。俄國的落後條件，對於此

後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依然還是巨大的障礙，這不是一個國家以內可以完全解決的，提高蘇聯的生產力到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水準，或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水準，這都有待於西方先進國家的幫助的，所以蘇聯社會主義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有不可分的連繫。蘇聯十月革命以後的財產關係的變革——土地及生產工具之國有，祇是替社會主義建設安置下必需的先決條件，牠國內的落後性，對於社會主義的建設所起的反作用與影響，時常是更大的，而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對於無產階級國家的仇視，更從外部增加對牠的壓力，這兩種矛盾：國內的落後性，與國外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促使蘇聯的黨，蘇維埃政府走上了官僚主義墮落的歷程。

蘇聯革命成功以後，在饑荒，內戰，與協約國的軍事干涉中奮鬥了三年，生產力的破壞達於極點，爲了恢復經濟的活力，列寧便不得不向資本主義成份讓步，在農民的俄國，小資產階級的俄國，換句話說，生產落後的俄國，這種讓步是提高生產力所必需的，軍事共產主義取消了，市場關係恢復了，新的資本主義份子抬起頭來了，新經濟政策的成功，同時便增加了階級的分化和矛盾，給蘇維埃政制的官僚化造成了基礎。

蘇聯的無產階級，在連年不斷的革命鬥爭當中，已經陷於疲憊，生活的困難，與起於工業破壞的失業，嚴重地壓迫他們，更增進了他們在革命緊張後的意氣消沉，另一方面城鄉小資產階級則在恢復

的市場關係下面，逐漸的發生了希望，和獲得了自信，他們勇敢起來了，當初本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官僚層——蘇維埃的公務人員，專家，技師，有權位的人——這時便自覺是各階級的仲裁人而日益取得了獨立，社會矛盾越增長，就需要有一個中間的獨立的官僚階層平衡於其間，蘇聯的官僚主義是城市與鄉村間，無產階級與農民間，農民與工人的各階層間，消費者的各派之間，以及最後整個蘇維埃國家與四週資本主義環境之間那種社會矛盾的產物。官僚階層高踞在勞動羣衆之上，調整着這種矛盾，並藉此種作用，加強他的統治，他成爲社會的主人，至高無上的主人；牠不受監督，不受統制，由此更使新的矛盾積壘起來，造成蘇聯內部更大的危機。

以上就是蘇聯官僚階層產生的社會背景。官僚階層的本身是同樣反映這種社會的矛盾的，於是就發生內部紀律的需要，產生了個人統治與永久領袖的習慣，這一官僚階層的人的體現者，便是史大林，他有老布爾塞維克的聲望，倔強的個性，狹隘的眼光，照列寧的批評，粗暴而不忠實，他的黨書

（註一）這是社會科學中一個最重要的定律；是由產業發展落後的國家中求得的。簡單的意思：生產比較落後的國家，因一開始就利用了先進國家技術上的最新成果，故發生許多與資本主義經常發展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反映到社會關係上，即使最前進的階級與最落後的勢力立於尖銳的對立地位，並使工人階級代替布爾階級完成牠的歷史任務。至於詳盡意義，待下期專文解釋。

記的地位，又與政治的機關有密切聯繫（列寧在遺囑上說：史大林作了總書記，把大權攬集在他的手裏，但我不敢確信，他是否常常知道怎樣審慎地行使那權力。）於是他便成爲官僚階層的化身，他是官僚階層的神。

官僚階層既然是平衡階級矛盾的中間份子，他本身的領導便具備中派的特色，在新經濟政策成功之後，官僚階層取得了穩固的地位，於是便聯合代表富農傾向的右派，摧毀了代表工人階級革命傳統的左派反對派，這種鬥爭使富農的勢力大大地加強，這時的統治理論是『面向農村』，和『由富農生長到社會主義』，後來這種富農勢力回過頭來打擊中派了，中派才慌忙拾起左派反對派的武器，向右派進攻，走上五年計劃工業化的道路。凡是留心十餘年來蘇聯政治鬥爭的人，都可以懂得史大林中派官僚主義的左右盤旋與領導無定。

官僚主義是民族自保的，他害怕有革命的震動，他把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世界革命運動分開，國際無產階級連續的失敗（一九二六年的英國總罷工，一九二七年的中國革命，一九三三年的德國希特勒的勝利。不消說蘇聯的官僚應負這種失敗的主要責任。）也使蘇聯的羣衆減低了對於世界革命的信心，埋頭建設『一國的社會主義』，這是大幫助了官僚階層在蘇聯地位的穩固的。

但蘇聯官僚階層所憑藉的，還是十月革命所產出的社會變革，因此，他的存在意義，便帶有二重性：他騎在無產階級的身上，浪費國家財富，成爲無產階級社會的寄生贅瘤，同時又不得不依據無產階級的勝利條件，替無產階級保持革命的成果——土地，生產工具的國有。

蘇聯的官僚階層是藉國家經濟力量之加強以吸取營養的。五年計劃之成功，主要祇是證明社會主義生產方法之優越性，即使在落後的蘇聯，有官僚階層的墮落與浪費，計劃經濟還是能有最高度的完成，十月革命之成爲人類歷史的轉變點，其意義便在這裏。但這種經濟上的成功，同時使無產階級獲得地位改善的自覺，同時也開始在政治上要求發言權了。向來牠含默地順從，受官僚主義的驅迫，不敢批評，給牠什麼便拿什麼的，現在牠有了新的自尊的感覺，一般的經濟文化的提高，使牠對官僚主義的腐化，顛覆，專橫，無能，漸漸的不能容忍了。這是損害官僚特權的。官僚主義所害怕的是『批評』，來自下層的『批評』，史大林爲保持他的特權，不得不用清黨流血的手段，去消滅，遏絕這種隨經濟的成功以俱來的批評精神。

在蘇聯經濟建設的過程當中，不得不借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以刺激生產力的提高，所謂史塔罕諾夫運動，便是用計件工資制（一種最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制度）刺激工人在工作上的競賽，這種制度使蘇聯的工人階級發生分化，增加相互間地位的不平等，形成一部份的勞動貴族。官僚階層是想直接依靠這部份勞動貴族做牠可靠的基礎的，可是社會矛盾却因此越發增長了。

新的矛盾的積疊與經濟上的成功正比例的發展，民衆自覺的高漲與官僚階層勢力的削弱則反比例的發展，史大林專橫的統治，是靠用邦拉巴特（註二）的方法維持的，但這種統治既建築在社會矛盾之上，牠便會成爲這種矛盾的犧牲。世界無產階級的失敗，新的世界大戰之不可避免，更增加了蘇聯的危機。史大林過去竭力用任何手段覓取國際的

和平，以及此次勾結法西斯瓜分波蘭，爲的都要維持他的統治。史大林想避免牽涉在戰爭之中，主要怕的是由戰爭引起的革命震動，同樣能使蘇聯無產階級掙脫官僚主義壓迫的枷軛，有一天會對他加以『武器的批評』。而在某種條件之下，能不經大的戰爭以取得無產階級對外的一致，這也是暫時緩和國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但蘇聯的參與瓜分波蘭，已使牠再沒有可能避免牽入人類的廝殺，用輸出蘇維埃的方法兼併土地，又帶來了一聯串民族，經濟和政治問題的困難。史大林勝利的統治，已因這種澈底叛變革命的行爲走入終結的階段了，這一點，將來一定會違反盲目崇拜史大林者的心願而到來。世界革命的成功與蘇聯的復興，將開關一個歷史的新時代。

（註二）指法國魯易·邦拉巴特的制度。據馬克思的定義：牠『是在資產階級已失去統治能力，工人階級還不能獲得這種能力時的一種唯一可能的政府形式。』但蘇維埃的邦拿巴特主義却是倒過來的，即工人已不能保有，而資級尚不能獲得政權時的一種官僚專政。

本刊第二期勘誤

第三頁下三排『美日戰爭的可能』小標題左數第十一行至十二行『換句話說，中國祇成爲美日兩國所追逐的鹿了。』一句應緊接第六行『……祇贖着美國和日本了。』之下。

第十一頁上排第五行『……首先』下脫漏『要看美國是否有即時作戰的決心，照我觀察，美國』等字。

動向創刊以後，我們就焦灼地期待着英雄們對我們的『圍剿』，可是一期兩期地下去，我們却始終找不到半點影子；這回英雄們所採取的戰略大概是『沉默的陰謀』吧；不過這『陰謀』終於是保持不下去了，或許是『請客』失了效（這典故祇有英雄們才懂得）的結果。在最近出版的『文藝新潮』上，我們到底找到了他們的回音了，題目是責罵我們的『肆無忌憚』的。我很高興地在報攤上讀完了那篇短文；然而失望得很，原來給我們送過第一顆子彈來的不過是一名『廖化』之流，英雄中之『將星零落』，於斯可見，亦無怪其保持沉默也。

那位常棗君的文章很難叫人讀得懂，因為寫得太『高明』，『革命的術語』又太多，令人看了有墜入五里霧中之感；不過大意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即：

（一）動向誣讒高爾基，顯然與蘇聯『托派』之毒死高爾基同謀；（二）西龍忽視了『貧農革命的傳統』；（三）動向誣謗羅曼·羅蘭，羅蘭的『超階級的立場與共產主義的最高目標相符』。其他的文字，那只是些漫罵字眼的堆砌了。

在第一期動向裏，我們說：高爾基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但不是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裏本沒有絲毫褒貶的意思，不過把高爾基的真實價值敘述一下吧了；誰知道也會觸犯英雄們的感情，並且還給他看出我們是高爾基的『謀殺犯』來了，這真不知從那裏說起，我不曉得這位常棗君除了讀幾

篇漢譯高爾基的小說之外，還讀過一點俄國革命的歷史不呢？一九〇五年以後，高爾基所贊成的『造神論』是什麼回事？在十月革命中，高爾基所領導的『新生派』採取了怎樣的立場？革命後他老先生的態度又怎樣？後來又爲什麼上意大利海濱去，一直休養到一九二八年？對於這些史實，大概常棗君是不會知道，而且也不願知道的；然而假使他想以青年人的『指導者』自居，那是應該知道的。

我們說高爾基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決不含有半分誣讒他的意思，恰恰相反，我們還以爲：高爾基之不是一個『百分之百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者，並無損於他之成爲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革命文學家！『譽之使其爲神，毀之使其變狗』的文學批評，以及把文學絕對附屬於政治路線的企圖，祇有史大林先生及其信徒們才愛玩的把戲，我們是絕對排斥的。

講到蘇聯『托派』之『毒死』高爾基，據說是希特勒『同志』指使的，（見布哈林案的記錄）然而現在，常棗君的『最高領袖』不是和希特勒『同志』睡在一床嗎？這證明是誰『毒死』了高爾基呢？（關於整個莫斯科審判案，既經常棗君提起，我們將在下期動向裏作一充分研究。）常棗君的短文裏充滿了反對『誣讒』的文字，可是對於這三尺童子都知道是誣讒的罪名，却還要拿來厚誣那些被史大林先生枉殺了的革命元勳們，這個常棗君到底生了常人的心臟沒有。

關於西龍的豐塔馬拉，曾記得在上一期的文藝新潮裏，該誌主筆錫金先生還做過一篇頗帶恭維的介紹，說牠『那種沉痛裏的尖酸，實在是最深切的農民口吻』，並且還說要『研究和理解農民』，『是正該從這種言語入手的。』但是現在，常棗君忽然發見西龍的『缺點』了，據說他『忽視了貧農的革命傳統』；究竟能用『最深切的農民口吻』來發言的人，是否會『忽視了貧農的革命傳統』呢？好在該書已經譯成中文，有心的讀者們是可以自己判斷，不須我來饒舌的了。

動向第二期上，野老君說羅蘭是一個曙光期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這本不過替這位文學家指出了一個階級立場，以及他思想的根源；但是這也激動英雄們的義憤了，又說我們在『誣讒』，在散布『毒素』，那末要怎樣才不算是『誣讒』呢？難道得稱羅蘭是普魯階級的思想家嗎？大概常棗君的意見是如此的。他所持的理由是：『超階級的理想，正是全人類最高的理想，正是無產階級革命最終目的，因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和專政的目的，也就是要消滅階級』呀！太高明的理論！原來一切主張階級合作與調和，或根本否認現社會有階級存在的人，都是刮刮叫的共產主義者！據此推論，一切奪人錢財的貪官污吏與巨盜積賊，都是最有資格的共產主義者了，因爲他們的行爲是與『各取所需』的原則相符合的！算了吧，『廖化將軍』，願你讀一讀馬克思主義的A·B·C，別再叫人笑掉了牙齒！

A·馬爾勞論 (續)

杜比作
小邨譯

第一，他底『世界』裏的諸要素已經搖亂，而且把牠們放攏在一個新的圖案中了；舊模型中若干更重要的特性也在新的模型中隱掉了。『希望』的世界爲人民陣綫的總和所規定，牠並不包含右左這兩個極端。佛郎哥全能主義的魔障是承認的，牠的破滅也已經在『希望』的原則中假設好，而『希望』在一切人物看來都一樣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法西斯派並沒有被繪入這部小說底內在的道德計劃中去；他們是抽象的敵人，悲劇的作者，超然的牽線人，僅此而已。這種資本家——因爲法西斯派就是資本家呀！——的除外，就是人民陣綫主義的一種表現，而人民陣綫主義則因爲必須抹煞資本主義的存在以維持和『自由』資產階級的關係，故排除了法西斯黨人在人類社會中的物質基礎并把他弄成爲從火星裏來的怪物。固然，馬爾勞也借了他的頑固的預言者——加爾西亞的口，把法西斯的政治學歸之於『屈辱的崇拜』，因而給法西斯黨人以一種渺茫的心理學上的立足地。但是因爲他并不准在這部小說裏實行這種崇拜，所以我們便不得不拿加爾西亞的話來代替牠。如此，你假使把『人之命運』的包羅萬象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右派，左派和中派通通出現，且他們的歷史任務均有適當的估價——和『希望』底狹窄的世界，即以一種短促和倒霉的政治聯盟爲背景的世界一較，你便可以找出兩種不同的實際：一種是設計和判斷得很好的實際，另一種是由反動教條的曲折鏡歪曲了的實際。

但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却更其甘脆地被除去了道德的存在。首先，他們被抹煞了。馬克司主義統一工黨只在一個純粹統計的地方提過一次；第四國際也經過一個小人物提過一次，這個小人物從前是『贊成托洛斯基主義』的，但後來已唾棄了牠。第二，他們的主角却由人民陣綫本身來充當，人民陣綫是被假設着要儘可能快來造成革命的——和共和黨人，天主教徒與諸色人等一起！這回史大林派的宣傳機關好像教會一樣，有牠的特殊的寬容，也有牠的特有的禁忌。凡是以黨底結論爲目的的作家，那是可以自由經由他所

高興的任何道路抵達目的地的。而且假定他不描寫人民陣綫底神聖的全能性中的根本矛盾，他便可以隨便談談革命和反對派問題。在西班牙的場合中，他可以自由追隨着官家的理論，照這種理論說來，戰爭是法西斯主義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間的鬥爭（這條路綫，當他向自由派人說話時，他照例是遵循的），或者假如他是向『左傾的』智識分子的聽衆講話，那末他可以以人民陣綫描畫成爲一個革命的集團，這個集團之所以躲在保守的口號後面，爲的是『不要叫中等階級害怕』。而『希望』顯然是向左派智識分子說話的。馬爾勞是在各種各式急進派中享有盛名的作家，尤其他是一個接近過托洛斯基主義的作家，所以他這作品，及其苦心設想出來用以維持左翼現狀的理論，對於那增長增高的反史大林主義運動是很有影響的。因此他的人物才被准許去擔當革命；而且他還可以不把反對派呼爲『瘋狗』或『佛郎哥的代理人』——官家的名詞不見容於這部小說的文雅的氣氛——祇簡單地把他們從圖畫中抹去了。

但是一種全能性，不管牠多麼神聖，却總使戲劇式的文學材料陷於貧乏。於是馬爾勞模糊了超於協調之上底鬥爭的真正意義，并抹殺了整個革命的反對派之後，他在無政府主義者中找到了一個政治上無害的等價物來代替戲劇式底衝突的要素。結果他把無政府黨人當作陳和喬的直系遺裔。他們已吸收了死的苦惱，『犧牲的崇拜』，孤寂英雄的情感——所有這些無用之物，這種無用之物與一種歷史上過時的個人主義是同生共死的。我們碰到幾種自由主義者的幾個例子。首先，我們碰到一個智識分子，他和共產黨人討論革命的意義，與政治行動相反的倫理行動的問題，而且他之出現儼然就是一個革命底同情的，但分明又是孤寂的基督。（我們很有理由猜度：在這些爭論中，紀德，雪龍及其他反史大林主義的智識分子是在受一種關於『布爾什維克主義』底牧師式的教訓）這位自由主義者把馬克司主義和史大林主義等量齊觀，而他的史大林主義的政敵則引證馬克斯主義的學說來辯護這位自由主

義者所悲嘆的官僚主義底墮落的象徵。這些談話雖然活潑，富於創造性，且充滿理念的幽靈（假如不是牠們的實體），但牠們却和人物自身一樣的抽象；牠們很少涉到西班牙的任何真實問題；牠們發生在一種感情的歡樂的氛圍氣中，而這種氛圍氣却隱蔽了矛盾的真正核心——甘脆說一句，牠們是給弄得『鷄零狗碎』了，是馬爾勞兩面同時一手玩弄的棋局陰謀；牠們的目的是給一個故事以一種內部反映的形像，及一種經過衡量和試驗底價值的意義，而這個故事實際上却是派別報告的一塊獨石柱。

小說中人物們底道德自由的幻想又由這一件事實毀壞：即種種不同底哲學上的流派，不斷遇到了牠們政治上的等價物，而且就是在實踐的平面上所『暴露』的也是一樣。其實，『希望』的自覺的目的似乎是代史大林主義底教練隊的獨斷家肅清歧途百出的世界。而且正好似共產國際的政客設法把人民陣綫的策略施行於各國而不管牠們國內需要如何一樣，『希望』也展開一個戰爭的局面，這個局面要求一些例外底行動方式，隨後又把這些方式擴大為普遍的價值。這位自由主義的智識份子，無論如何，却非常有意義的被他政治上的副本，這個卑屈的無政府黨的下級黨員所反映着。我們已經在巴塞侖那的行動中看過他，但是等到反調協的危機愈來愈緊張，他便愈來愈減少他的同情，在托萊杜的幾幕裏，他走到他的最低點。他漠視軍事學，在紀律之下，他是陰鬱的，在嚴重關頭，他又變得『醜惡』了。他懷疑他的上級人員的叛賣，但他却在他自己的組織內包庇間諜。他一時勇敢到發狂，轉瞬間他又跑掉了。我們懂得這種典型：他已洩露了維多·雨果底『暴徒』場面之一了。

根究自由主義的道德價值是一會事：馬爾勞在做這件事時，他只是暴露一種陳舊的意識而已（不管用怎樣簡單的方法）。但是偽裝了無政府黨工人又是一回事，因為他在這裏正在攻擊西班牙的無產階級自身了。在這種無政府主義者底輕蔑的諷刺畫後面有什麼真正的特質呢？他們的『懷疑』只是被出賣多次的那一個階級的警惕性而已。他們之憎惡『紀律』是工人接受資產階級人民陣綫時所取的溫和的憎厭態度。而他們的『犧牲崇拜』——這是最醜怪的遊戲文句——除了是被剝削者底本能的戰鬥性又是什麼呢？

警惕性，戰鬥性——對這兩者，對這些革命底重要的德性，馬爾勞却提出『謹慎，嚴格，紀律』來對抗。在第一章裏的青年共產黨人馬奴哀爾恐怕

是『希望』底全能道德的最好的例子；而他實際上，依照象徵的意義，却由馬爾勞本人來代表。馬奴哀爾在戰前是一個智識份子，他的過去似乎已很清楚的揭露他的心境。因為他之寫入希望中，是充作一個已唾棄了智識階級底妄想的軍人。他已拋棄了『異議的崇拜』而代以『行動的崇拜』。他已以理想交換意識。他已丟掉他的苦惱而穿上一套制服。而且他於短短的數星期內從共產黨的下級爬到共和軍的副團長職，藉以繼續證明他的轉變的緊張性。但關於馬奴哀爾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他并非從他的同志那裏而是從他的上司內衛團的一個團長那裏獲得新智識。這位天主教的和警察的首腦，多年來便在鎗殺工人，他只是爲了幾項含糊的理由便投機加入共和政府方面。我們猜想，他已給人民陣綫底『驚人的博愛』感化了，這種博愛，馬爾勞慣常拿來代表一種溶爐，在這個溶爐裏面，種種不同的政綱，哲學和利益通通溶合成爲一種人道主義式底希望的溫和湯羹。馬奴哀爾於是從那位團長那裏學會『謹慎，嚴格，紀律』。而那位團長從馬奴哀爾那裏知道……共產黨人情願向資產階級，甚至向一個警察長領教。這一點實際上也說明了那種『驚人的博愛』的神話。人民陣綫中的資產階級份子容忍羣衆的理想；但羣衆則學習仿照資產階級的行爲，並因此而按照他們的利益做事。

那末，馬爾勞終於拋棄了死的苦惱——拿無政府黨人做犧牲！——並當即出現一個機械的共產黨人，馬奴哀爾，當作復活的象徵。或許他企圖把加爾西亞，這個那樣富於理論化的人，來補足馬奴哀爾，猶如把超自我補足自我一樣。真的，加爾西亞本人并不和共產黨人接近，他自認對他們的野蠻的黨和學理的虔敬不大喜歡。但談到這些虔敬的內容，這些社會和倫理的關連，他便提不出一個問題來。在他自己的特殊水準上，他是積極主義的重要辯護者，又是智識份子底重要的被追放者。在實際生活中，他好像那些非正式的史大林派的預言家一樣（他們會用，例如字義發展學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東西，來代替正統的爭論），他只是用心理的方式來代替政治的方式；他用他一己底嗜好的系統，他底易於招怨的犧牲，異議等的崇拜，武裝起來，他和那些政客一樣，安排着要一網打盡那些游錯了方向的魚。加爾西亞因此博得了某一社會模型（無疑是短命的，但牠祇叫苟延一天，却總是確實的）的榮譽，這一模型就是共產國際底自由黨外活動家的模型，牠是人民陣綫主義底奴役政治學草率砌成的。

『希望』，也是在那種頭腦之下產生的。

——完——

馬克思致柯格爾曼的信

林超真譯

第十二號

倫敦，一八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親愛的朋友：

謝謝黑格兒（註一）和小女士。

我要趕快回答你，關於所有諸點。

恩格斯現在在丹麥，本月裏他將拜訪你一日。提起恩格斯，那麼你一定記得曾對我說過：你們的漢諾威統計局那個人（名叫孟克，如果不是我記錯的話）稱讚我那部在頓克書店出版的著作。我把這事情告訴恩格斯了，我騙他說孟克對我稱讚他的『工人階級底地位』。這個張冠李戴的手段，我用過好多次了，用意都是要逼迫恩格斯去準備出版這書底第二卷，關於一八四五年以後至現在的事情。我終於取得他肯着手著作的約言了。倘若這次同那位統計家的談話能落在本問題上時，那麼請你不要戳穿我！

我的太太底旅行是完全不一定的，而且不能決定，我的三個女兒都照原來計劃到波爾多去了，住在老拉發格家裏。

我不贊成你到巴黎去。在這巴比倫城裏，在這紛亂的人羣之中，不能研究無論甚麼學問，除非能在那裏住六個星期以上。但那費用是很大的。

我的書篇幅甚多，約有五十頁。你看，在篇幅這方面，我當初估計得如何不準確。幾日之前，我寄了一點補充到萊普齊去，標題叫做『價值底形式——第一章底增補。』（註二）你知道，這計劃是誰倡起的；這裏我爲他的提示表示謝意……

請你原諒我不再寫下去。此時人家送校樣來校對了。

請代致意你的夫人和小女士。

你的卡爾·馬克思

下次寫信時，我將附寄會員證給柯格爾曼和騰格夫人。（註三）一位夫人勞太太已經加入我們的總理事會做理事了。伊列奧諾爾誠心感謝那些郵票。照片呢，以後才有。

第十三號

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親愛的柯格爾曼：

首先，多多感謝你給我的兩封信：你有時間就寫信給我，這使我十分快樂。但請你不要以爲我也有這麼多的信回答你；我種種方面都要維持關係，通信很多，我的時間還不够用哩。

未曾談起我的書，先說幾句閒話。我害怕波爾涵（註四）會陷害了我，雖然不是出於他的本意；他把他的日內瓦演說用法德英俄四種文字印刷出來。他還添上一篇莫名其妙的，乾燥無味的而又繁徵博引的序言。我們私下說說罷，爲了黨的利益，我應當坦白同你說：波爾涵是一個有才幹的人，也是一個聰明人，但他拿起筆來就觸霉頭了。一切機智，一切美感，甚至一切不可或少的基本教育，他都缺乏。他好像那種野蠻人，把種種最觸目的顏色塗抹在面孔上，就以爲是漂亮的了。他自頂至踵充滿了庸俗和可笑；他的每一句話都本能地要惹人恥笑的。

他如果不是那般愛虛榮，則我可以阻攔這演說的出版，而且使他明白：人家在日內瓦沒有聽完他的演說，而且祇明白了其中的幾點，這對於他是何等的僥倖。但他方面，他出頭干涉伏格特事件時，我欠了他的情，他又是我的私人朋友。在他的演說裏，有幾句話是剽竊我特有的思想而加以附會的。

（註一）黑格兒——馬克思對柯格爾曼的戲稱。

（註二）價值的形式——馬克思住在柯格爾曼家校對資本論，柯格爾曼讀了原稿，認爲書中關於價值底形式說得太簡單了，難於瞭解，因勸馬克思多發揮一點。馬克思回倫敦後便寫了這篇『增補』。資本論再版時，這增補就合併在正文裏面了。

（註三）騰格夫人 Madame Tenge——柯格爾曼夫人的密友，一位大地主太太，鋼琴彈得很好，馬克思來做客時每晚彈給馬克思聽。

（註四）波爾涵 Sigimond Borkhein（一八二五——一八八五）——也是一八四八——四九年的革命戰士，後來亡命瑞士和倫敦。一八六七年九月九日至十二日日內瓦開『國際和平大會』，柯格爾曼也參加的。波爾涵演說時，會場騷擾以致他的話沒有說完。

這將是我的仇敵的好機會（伏格特已經在新楚里赫新聞上硬說我是這演說底匿名著作了）：他們不來攻擊我的書，却來叫我替波爾涵先生底蠢話和個人攻訐負責。如果有這事情發生，那你應該托瓦涅波德等人設法在有關關係的報紙上發表些短文，揭破這種詭計，文內不要有什麼傷犯波爾涵的話，祇明白地說：惟有惡意或糊塗才會把這種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混為一談罷了。波爾涵停止說話而拿起筆來的時候，我們的思想就在他的腦袋裏反映成種種怪異的和紛亂的樣式；這事自然給了那些報棍一種難得的機會來發動攻擊，甚至可以被他們利用去做間接破壞我的書的手段。

但如果報紙對這事情保持緘默的話，——那是我所不敢希望的，因為波爾涵把他的大作小心封寄到各報編輯部去，——那你千萬不要打破這莊嚴的緘默。

波爾涵如果不是我的私人朋友，則我可以公開批駁他。你明白我的地位如何難處，我的心情如何不快。我千辛萬苦著成一部書貢獻於世人（恐怕沒有一部其他的著作在比這更困難的條件之下寫成的），為的儘可能提高黨底地位，而且以表現底方式來解除凡庸人底武裝；然而在同一個時候，人家看見本黨底一員，穿着瘋人衣服，拿起小丑短棍，緊靠在我身邊，當着公衆面前拋弄臭蘋果和臭蛋，這些東西會落在我的頭上，甚至於黨的頭上！

你在日內瓦作弄伏格特，我很滿意。我很高興，我的書能得你喜歡。

關於你問的事情：厄爾內斯特·瓊斯（註五）應當以黨員資格在愛爾蘭對愛爾蘭人說話；在那國裏，大地產既然是與英國在愛爾蘭領有的地產有同樣的意義，那他就應當宣傳反對大地主。在英國政治家底選舉演說裏，我們不應當去探求甚麼原則，其中所有的乃是可以為最切近目的所利用的東西。Peonage（註六）乃是一種為未來工作預支報酬的制度；這種預支制自然成了普通的高利貸，勞動者不僅終生做了債務人，即終身做了債權人手下的強制勞動者，而且這個條件還傳給他的家屬，他的兒孫；他的妻子事實上屬於債權者所有的。

我的第二卷書能否完成，大部分依賴於第一卷書之成功與否；必須第一卷成功，我才能在英國找到一個出版家，否則我的物質條件仍舊是如此困難，如此艱苦，使得我沒有專工和餘暇來迅速完成這第二卷了。

這些自然是不願意讓邁斯涅爾書店老闆知道的。這第二卷還須多的時

間或少的時間才能出版，可見現在全靠德國黨內我的那些朋友底手段和活動了。從朋友或仇敵方面發出來的嚴正的批評，須是一步一步來的。如此巨大的而且一部分又如此難懂的著作，需要相當時間讓人家去讀去消化。但并不是堅實的批評能造成最初的成功，而是，——坦白說罷——聲譽，鑼鼓，迫得仇敵自身出來說話。

目前絕不是人們說的「不相干」的時候。尤其不要耽誤時間！

我把你的最後的信轉給恩格斯了，要他供給給你必需的解釋（註七）；他比我更能够解釋我的書。我的最親切的敬禮致你的夫人。不日我將寄她一張如何讀我的書的秘訣。

你的卡·馬

再者：第一卷書在德國發生的影響，請你完全告訴我。

保羅·斯屯普（註八）（梅楊斯城人）寫給我一信，把波爾涵底演說說做是我的演說；我此時沒有功夫寫信給他，那麼請你寫封信給他罷，同他說明白這事情，叫他當波爾涵那本小冊子出版時候不要做聲。斯屯普自己一拿起筆來也是一場糊塗的，——這話是我們兩人私下說的。

第十四號

倫敦，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五日

親愛的柯格爾曼：

不要寫信給波爾涵。而且這也是徒勞無益的，他的大作已經印在書店的

（註五）厄爾內斯特·瓊斯 Ernest Jones（一八一九—一八六九）

英國無產階級詩人，憲章運動左派之代表者。

（註六）Peonage——這字是從西班牙文 Peon（日工）導出來的，

這是一種因欠債而生的奴隸制度，盛行於墨西哥。

（註七）恩格斯底解釋——按馬克思寫信之前一日曾有一信致恩格斯，說：『這裏附寄的柯爾格曼來信，明示你活動的機會已經到了。你可以寫信給他關於我的書，你寫得比我好得多。』

（註八）保羅·斯屯普 Paul Stumpf（一八一七—一九一三）——

德國革命戰士，曾參加拉薩爾運動，也曾參加第一國際運動，常和馬克思恩格斯通信，死時仍是社會民主黨員。

目錄裏，而且已經由夏白里次書店出版了。此外波爾涵此時在波爾多。你寫這樣一封信給他，沒有別的效果，除了使波爾涵變成我的一個敵人。

生米已成熟飯，不去管他了。受了夜間勞動的刺激，我當初誇大了這事情底惡影響。實在說：我是自食其報。我們那個朋友要在日內瓦那些可尊敬的俗人中開鬧出笑話，——這個念頭，起初我覺得很有趣。但我沒有預見『書本』方面的效果。然而我應當明白波爾涵在擬定他的計劃時，自然是超過了我信中給他規定的那些明哲的限度。現在唯一應取的政策，就是：我們的敵人既不說話，我們也保持緘默。他們一經說起話來，而且要叫我負責，那麼我們就應當做些惡意的玩笑，說：他們是不得不把波爾涵底玩笑戴在我的頭上，為的免得回答我的書。此外還需善意待遇波爾涵，因為把他的著作虛榮撇開不說，他總是一個熱情的人，充滿了良好的意志，而且是一個很可尊敬的行動家，當他不要手段的時候。

你現在大概收到恩格斯底解釋了。我正與李卜克內西和貝克（註九）兩人通信。

我所謂『書底成功』，唯一是指牠迅速銷行在英國造成影響而言。

法蘭西郵報（現在是巴黎最引人注意的報紙）和布律塞爾自由報，都登載了我的序言底法文譯文，并附了幾句讚美的按語。

紐約有個名叫訥克默的人自荐替我譯成英文。沒有辦法！

李卜克內西在柏林的態度，使我十分歡喜。我從此地寫信給他一些方略。

可憐的貝克走到了這個田地，將近要非放棄一切政治的和著作的活動不可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無法援助他，是多麼可惜的事情！

你的卡·馬

我的最好的敬意致你的夫人和我的小女友；我多多感謝你們，為了她的照片。

（註九）貝克——這裏說的，顯然是馬克思底朋友，在日內瓦居住負責國際德國支部的約翰·菲力·貝克，而不是馬克思的仇敵，繼承拉

（接第十頁）

揭露了各種烟幕。牠的結論是：

『在反法西斯主義，反帝國主義大戰的不懈的階級鬥爭中聯合起來！』

『為爭取殖民地人民的自由，以及反對帝國主義的暴君政治中聯合起來！』

『在唯一正義的和神聖的——在反對壓迫者，剝削者，反對他們在工人階級裏面的無恥的代理人的戰爭中聯合起來！』

以上的結論對於我們現在還是極生動的。因為這正是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提出之那個著名的『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通俗解釋。這是揭穿對於目前大戰的各種烟幕之最有效的武器。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六日

（接第十三頁）

給日本工人第一步打擊。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範圍的恐慌與日本多年來的經濟危機配合起來，推使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東三省，並捲入長期的中日戰爭中。日本資產階級一九三一年對外侵略的勝利最後的消滅了國內的革命運動，共產黨整個被壓毀，社會民主黨人則急忙統一在社會大眾黨裏，成立『大亞細亞主義』的合唱班。

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老一代已完結了。共產黨總書記佐野學已宣布贊成國家社會主義。山川均和堺利彥已和草木同腐。片山潛在生前和死後都已成了克林靈宮的點綴品。河上肇已退休。高橋龜吉已做了日本軍部的清客。安部磯雄，克松赤磨，麻久生，室伏高信之流則干脆成了天皇的走卒。這些人不管是『布爾什維克派』也好，社會民主黨也好，都從沒有勇敢的做過革命的結論，現在他們都倒到歷史上該去的地方去了。也許今天在日本的牢獄中和地下室尚有不少懷着陳舊見解底貞潔的革命家，但我們却胆敢預言：日本下一代的革命家必然是第一批認真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他們將與過去（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史大林主義）澈底決裂，他們將大胆的做出結論：只有日本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從民主鬥爭走上社會主義革命，亦即建立無產階級狄克推多才能保證日本革命的勝利。

饑餓綫上

謝少翁

洪生這幾天的工作，特別緊張，三四個同事和兩個學徒，在白天要應付川流不息的顧客，這些最不受歡迎的顧客，大都是『江北豬糞』，他們好像來自一個無比大的窮人窩，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是同一個祖宗生的，同樣的性格，同樣的會偷會罵，尤其是他們同樣的窮和污糟。

晚上，停市之後，他與全體同事和學徒，在老闆的督促下面，幹着抹殺良心的勾當——向米裏參進石粉，泥砂，稗草，稻，糶糠，麥，碎米，霉米和水。這幾天再加上更費勁的事——把十分之九的米搬上樓。

每天十五六小時的工作，使他們的性情變得非常暴躁，最近晚上的過度體力勞動，是在老闆允許年底多發花紅的誘惑之下拚命硬撐持的，他們的性情因此更壞了，再加上那些江北人的無數辱罵惡咒，雖然這些咒罵並非夥計們的份，但他們是朝着夥計們罵的，這促使他們一看見『江北豬糞』就虎着臉，常常報以更野蠻和粗卑的咒罵，甚至動手毆打。

一個老太婆，黑布衫右肩上的補綻已褪了色，重新破了一塊，頭髮又亂又髒，一副討人厭的黑瘦多縐的鬼臉，沒有牙齒的嘴，吐着不堪入耳的非江北人聽不懂的『上海話』，唾液普普普地從那寬鬆的嘴唇中四處亂噴，雞腳爪似的手，東撈一撈，西摸一摸，洪生叫她不要動手動腳，她只當不聽見，仍舊那樣可厭地摸着撈着，噴着口唾，並且氣憤憤地胡罵。洪生得當心她偷米，又得應付別的主客，還不時提神傾聽老闆有什麼新的命令。當他把米袋遞給她時，她嚷着一定要再加半升，他回頭看看老闆，見他把手向外一揚，洪生就瘋狗似的狂罵起來：『豬糞！沒有錢吃什麼大米，去！餓死了不過多麻煩一次普善山莊，一塊錢給你三升米，還不心滿意足，別人只有二升半呢。看你窮得可憐才多給你一點的，死老×！錢拿去！』他一面罵一面把米純熟地倒還米櫃，鈔票擲到老太婆的臉上，米袋丟在店面前行人道上，他用全身氣力怒喊：『去去去！你不走我叫巡捕送你行裏去啦！』他喊到『啦』字，通紅的臉上漲出無數條青筋，正像他頭上頂着一袋米上樓時一樣費勁。

光，籐鞭，牢監』的代名詞。老太婆嚇住了，忍氣彎下腰拾起米袋，揭起前襟，把鈔票藏進口袋，指手劃腳咬牙切齒地走幾步回頭罵幾句。

老闆冷冷的從鼻孔裏發出一聲『嘿！』重新埋頭去思索：『總有一天，總有一天他們會來這裏搶米的，明天叫木匠來裝木柵欄，晚上提早兩點鐘——六點鐘打烊……』思索到這裏，他抬頭向時鐘一看，正是兩點半，他神經質地拿起電話，嗡嗡嗡嗡……，他連撥了五次，很快聽得鈴聲響了，對方就有人『喂』的來接。

『喂，是同泰嗎？吳老闆在嗎？……我嗎，我是順康姓陸。』

『喂，豐元兄嗎？我是光祖，市價多少？……喔！兩點鐘漲到四十六啦？……』他馬上掉臉向夥計，喊道：『洪生！四十六塊一担。』接着又向電話談了幾句，才喜洋洋地掛上了。

他的老婆這幾天也用全付精神注意米價的上落，並且每天早中晚三次到觀音娘娘面前燒香叩頭禱告，求求菩薩把米漲到五十塊一担。她這時正在灶間裏管煮點心，忽然聽得一聲『洪生！四十六塊一担。』急忙跑到前面，等不及丈夫掛電話就問：『四十六塊一担了嗎？』待得對方點頭後，他便喜不自禁的合上了雙手，喃喃地說：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菩薩真靈！明天怕要五十出頭了，阿彌陀佛！』他一壁說，一壁在臉上露出那種過了時的嬌態，嫵着嫵着上樓去了。

『觀音娘娘：今天米漲到四十六，如果娘娘保佑我們再漲四元，我一定買十盒錫箔燒化給娘娘，我的大女兒和小兒子都拜娘娘做乾娘。』她禱告完畢，鄭重其事地叩九個頭，兩手合掌作了無數個揖，然後跑下樓端蓮心百合湯給她的男人。

菩薩對他總是『有求必應』的。她很怕，如果窮人也和自己一樣的恭敬菩薩，米價或者會跌下去。好在窮人並不這樣做，窮人買不起十盒錫箔，也供不起觀音堂。

老太婆大狗寶媽媽一路走着罵着，不時踹腳跟拍大腿，離開原地方太遠了，她的罵聲差不多近於自語。

『婆婆！米買不着嗎？』一聲尖利的喊聲從右邊行人道傳過來，她知道這是小三毛等吃飯的。

『小鬼！餓一頓都餓不起嗎？今天不買米了，去拾去！拾不到好東西不要回家！』她頭也不抬地回答她。然而，小三毛餓得太無力了，把頭鑽進垃圾箱找東西就兩眼發黑，耳朵叫起來，她不回答婆婆，也不聽她的命令，只是想跟她回去睡覺。

米太貴了，一家六口只能吃些大米和麵粉煮成的薄糊粥，她們二十幾天沒有吃過飯，陰曆年初到現在八月初，從不知道肉味，清明節和七月半祭祖宗只燒三碗素菜，本來早十幾天就預計買兩毛錢肉的，但到了那天總是沒有錢。活了六十七年，今年還是第一年，難怪大狗寶媽媽天天打大罵小，爲了黃豆般大的事就和別人吵架。她的臉上多年不見笑容了，她恨自己太老，恨工頭在十四年前把他開除出廠，她恨現在的紗廠老闆不講道理，她常說：『從前的老闆總比現在的好，做上十年二十年的老夥計就不大好意思開除，但是現在的老闆不興了！他們連面都不和工人見一見。』

她生大狗寶時是三十一歲，那時死鬼老頭子和她都做工，除了吃用開銷，一月還能積聚幾塊錢。四十七歲那年，老頭子給機器打斷了腿骨，廠裏的整脚醫生不會醫，立刻送進了濟世醫院，如果上夾板，住院四個月就可以恢復原狀的，可是廠方只肯拿出三十元醫藥費，還給工頭扣去了五元。醫生知道窮人付不出四個月的住院費，醫藥費和手術費，於是把老頭子的腿鋸斷了。一個月後出院時，他們已用去平生積蓄的二分之一，這並不打緊，要命的是今後每月少了十八塊錢收入。大狗寶才十七歲，抵不來他爸的收入，於是忍痛把十四歲的女兒二狗寶送進細紗間做養成工。一面再竭力托人想辦法，把大狗寶薦到廠裏做措車或加油小工。

第二年，她的積蓄已全部完蛋了，並且拖欠了十八塊印子錢（廠裏看門阿三的），好容易把大狗寶薦進廠，但十一月初五老頭子又去世了。鋸腿時流血過多，出院後沒有好的食物補養，木板房子沒有窗，空氣惡濁過冬時冷得天天咳嗽，夏天悶熱得生了一場大病，腿骨常常隱痛，尤其在陰雨天，痛得成天成夜在床上打滾呻吟。虛弱，楚痛，肺病，和經常的鬱悶，終於讓老頭子早早脫離了這人世。

老頭子的死，對她是莫大的打擊，印子錢從十八塊增加到九十八。但她還存有未來的希望，希望娘兒三人幾年中刻苦做工，省吃省用還清債，慢慢再積蓄起來，再討媳婦嫁女兒。

一年一年的過去，到第三年清明節前，她的債全部還清了。而他們比較值錢的衣服手飾，連她出嫁時的金戒在內，全都當得一乾二淨。

日夜工磨得她不像個人，她自己也害怕照鏡子。她滿想從此三個人刻苦幾年就有出頭日子，但兩個小鬼都作怪了！二狗寶要鑲金牙齒，要買臘脂香粉雪花膏，要買花洋布，要……，大狗寶放工以後不回家，在廠門口和女工吊膀子，同女工去看戲，吃館子，買衣料，開房間。十八歲的女兒在男女關係最隨便的紗廠裏，誰不想打扮？誰不想找個稱心如意的男人？二十一歲的小夥子，天天混在小姑娘淘，每天措車吃飯洗手洗臉之外，儘有工夫和女工糾纏不清。老太婆也想替他們檢兩個中意的對象的，但一提起婚姻就給錢打了回票，她總不敢托別人做媒，也不會有人給她做媒。

可是用不着老年人費心，年輕小夥子儘有本領自作主張自選意中人，沒有錢結婚就爽快同居，要是家長反對，女的出走，男的到外面去租『小房子』。老太婆逃不出惡劣的運命，她的兒女也逃不出普通窮人的『自由婚姻』。終於年底二狗寶一去不返，而第二年春天大狗寶也帶回來一個女人。老太婆悲喜交集，走掉一個親生女兒，來了一個媳婦，在賺錢方面說，是每月比從前要多幾塊的。

命運總是和窮人搗蛋，她盤算在五年十年之間再造成一個小康之家的，她的媳婦來了七個月就生孩子，以後接連每隔二三年一個的生下兩個。老太婆年邁力衰，工作做不快，從前一天做到七毛，現在只賺四毛幾分，她媳婦要管三個小孩子，要燒飯，要洗六個人的衣服，不能再去做工了。有幾年孩子斷乳後，媳婦做工，老太婆在家照料一切，每月可以多收入四五塊，但他的肚子一隆起來，老太婆又得去做牛馬。

終於日夜憂懼的事到來了，老太婆給工廠開除了。從此，她不再有什麼希望，僅只切望着自己早些死了，然而閻皇老子有意和她開玩笑，叫她現世現報的活受罪。媳婦生的四毛頭才得兩週歲，兩年來一家人維持生活全靠大狗寶一人每天賺的六七角錢。大狗寶已三十七歲，他老婆三十四。大毛頭在翻砂廠當學徒，還差八個月滿師，滿師之後也只有十四五元一月，自己供膳食。二毛頭在細紗間做養成工，小三毛每天背着破麻布袋和鐵絲做成的夾鉗去翻垃圾堆，拾些破布，洋鐵罐頭，破玻璃瓶，破鞋，繩索，木片……賣些錢，長斤又加合各重各業內氏頭可去堯反。大狗寶老妻更到口已三週歲

了才能去做工，如果一年之中她的肚子又大起來，那又一切都完蛋。

老太婆非常擔心她媳婦再生五毛頭六毛頭，有一晚她竟干涉兒媳之間的「樂事」了，她咕咕噥噥的罵：「開心什麼？狗婆！一養一個，一養一個，飯都沒有吃了還要尋開心，哼！……」媳婦不做聲。老太婆也知道罵是多罵的，但她恨媳婦川流不息的那麼會養孩子，累得全家挨餓。

從前，她走路時遇見熟人彼此總打個招呼。「飯吃過啦？」「上工去啦？」「今天夜工啊？」「今天停工啊？」……拉這麼的一套。現在，她再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了，有一天，她家裏沒有米，隔壁小老虎老婆問她一聲「飯吃過啦？」給她罵得狗血噴頭，有冤無處伸。此後，全弄的人們看見「古怪老太婆」就敬而遠之。

媳婦看見她拿着空米袋回來，一聲不響抱着小孩去睡覺，接着，小三毛和她也睡去了。窮人對付飢餓，除了睡覺之外，只有跪在地上求討。然而三四個月來銅元絕跡，百物飛漲，人人自顧不暇，那裏肯捨得一分錢。即使討到一分錢，也買不到什麼，一個大餅得再加一分。後弄有個乞丐，每天早出晚歸，以前一天能討兩毛多錢和一二頓剩飯的，現在他常常空着雙手回來。

三回聲後半點鐘，二毛頭先到家，揭開鍋蓋看看，摸摸爐子，嘆一口大氣，一骨落爬上床陪着媽媽睡覺了。大狗寶回來時，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人呢？有一塊錢爲什麼睡覺呢？」他有些咆哮的樣子。

「小鬼，一塊錢，一塊錢，一塊錢，你曉得一塊錢買幾升米？二升半！你說怎麼吃法！一塊錢，現在一塊只抵從前一角了！……一角也抵不到，只抵得五分。」她比兒子更大聲地咆哮，一面說一面氣憤憤地突然一骨碌坐起來。

「廠裏大家說玉佛寺有賤米賣，不是大米，也不是秈米，叫什麼平米。婆婆我去買好嗎？」二毛頭怕明天沒有早飯吃，上午做不動生活，不帶飯去下午只好「打鐘頭」——早退。她回家屢次想說，總是怕婆婆罵，爸爸回來才壯了她的胆。

「喔，那是平糶米，兩塊錢買一斗，是洋秈米，只能燒飯，煮粥就不興。你帶了錢去看看再說。」他在廠裏也聽說過的。

二毛頭貓一樣地跳下床，一口氣跑到玉佛寺，大門開着，不見買米的人，也不見賣米的人。當她跑進大門不知向那兒問去的時候，迎面走出兩個和尚，「大師父，這裏有米賣嗎？」她抬頭等他們的回答。

「今天賣完了，你明天一大早來等在門口，排起隊來，九點鐘起買票子，拿票子到米店去領米。」

她說聲「謝謝」，快快地往家跑。在路上，她看到一個米店夥計頭上頂一大袋米，服服貼貼跟着一個漂亮的女人走着。她歎羨地看了幾眼，止不住地想：「她多福氣！我們一輩子的窮，聽說有錢人不大吃飯，專門吃些大魚大肉，……廠裏那個東洋賬房就肥得像隻豬，兇起來像老虎，我們野狗般一天餓一天飽地受罪，天天忍氣吞聲受打罵，眼淚往肚裏嚥，……」這種念頭她是常常轉的，可是她覺得除了自怨自艾，和歎羨別人外，想不出有什麼方法讓自己過得好日子。

「賣完了！爸爸，要一大早去排隊，先買米票子，再到米店去領米。」她回家後懶洋洋地說。眼睛盯住爸爸的黑影，一會兒又接上一句「爸爸！明天上工沒有飯了。」

「報上說的，上海米多得很，有錢的和開米店的把米囤着，有意抬價，有意搗蛋，有意要窮人的性命！什麼鬼平糶米，洋秈米各處都賣二十五塊一担，平糶米不過便宜五角錢一斗，從前洋秈米不是十四塊一担嗎？……我操他媽的×，這又是八—三以後那樣的鬼把戲！等到別人買不起，搶了！他們這些狗雜種才弄些平糶米來賣，騙窮人。……」他並未回答女兒，獨自一聲高一聲低地罵着。

「他們有錢呀！動不動總是「叫巡捕」，「行裏去」，他媽媽我明天叫幾百個人去搶！」老太婆的一口氣直到現在還沒有消除。

「搶？那麼容易！米店有木柵欄鐵柵欄，還有電話，一個電話一打，紅車子馬上就來了，要不了五分鐘。前兩天昌平路那家米店真黑心，米堆在樓上不賣，麵粉堆在下面，零碎賣不肯，起碼買一袋，等到人合好了去賣時，他那狗養的短命鬼老闆要漲價四角，漲四角就罷了吧，婊子養的他還不甘休，賣了幾十袋不賣了，店堂裏滿滿的堆着幾千包。問他什麼道理呢？他說：「要打烊了。」於是大家光火起來，一聲喊「搶呀！」就動手打進去，搶走二百多包。後來紅車子來了，捉去三個人。」

『還有呢，小沙渡路有另米店，昨晚門口站了五六十窮人，先和老闆講道理，要出秬米價錢買大米，那個『蠻子』（江北人稱江南人爲『蠻子』）不肯，他一面搖頭不答應，一面打電話給巡捕房，大叫：『小沙渡路××路口××米店快要搶米了！我要五十個巡捕！快快快！』大家聽了又想動手又不敢，到底肚子餓了沒法，還是動手打木柵欄，剛打進去，紅車子就開到，大家四散的逃走。後來老闆給巡捕每人五塊『香烟錢』。』大狗寶覺得窮人搶米不是個好辦法，今天搶了，明天他多叫幾個巡捕日夜守着，價錢還是那麼高。現在窮人簡直沒有什麼辦法叫米價跌下去。他媽聽了之後，不作聲。其實她那裏敢去搶，不過說說氣話罷了。

『爸爸，今天買一些貴米吧，明天再買平糶米好嗎？爸爸！』二毛頭嘗過無數次飢餓的滋味，尤其是冬天的飢寒交迫，真受不住。

『我身邊有一角三分錢，明天上工時買兩團茨飯在中上吃，晚上回家就有吃了。……不要急，爸爸有吃你也有吃，我餓死了就隨便你，你死也好，跟男人也好，偷雞橋去賣×也好，……唉！』他講到這裏，二毛頭先哭了，他自己的眼淚也像從油壺裏倒下來的一樣。『男子漢大丈夫』，從前他也是的，但是現在，他常常暗地裏哭泣。

他們的火油燈三個多月不發光亮，他摸索着爬上床，冰冷的淚珠，滴落在他老婆的臉上。

『哦！……你又哭了，……』她抱住男人的頭頸，鼻子根一酸，也跟着哭起來。

二毛頭哭着跟爸爸爬上床。老太婆聽他們鼻子塞住了在暗泣，也哭了。她本來想罵罵媳婦出出氣，媳婦太可憐了，她不忍再使她更痛苦些。於是他走進回憶裏去領略那甜酸苦辣的過去。身旁的小三毛早已入睡，她在夢中偷到一大袋米，在半夜中驚喜得醒過來。

第二天太陽沒伸出頭來，父女倆已動身上工了。老太婆醒來時，小三毛也走了。牠今天覺得與往常有些異樣，想起身又很懶的樣子，耳鳴比往日更響，稍微有些口渴，四肢無力，腰背酸痛。她竭力撐着兩手坐起來，伸手摸摸額角，才知道餓成虛弱病了。頭的四週有一架磨子在輾動，腰背一陣陣地痛，再隔一會，金星紅星在眼前迅速亂轉，接着是一片墨黑。她像黃浦江余着的木頭似的緩慢地不由自主地躺進被窩，和善地對媳婦說：『大毛頭娘，

我爬不起，一塊錢在檯上第二只碗裏，你馬上去吧。』

可憐的女人走過來摸摸她的頭，一聲不響地走了。她變得那樣子不喜歡說話，從前廠裏人人羨慕最活潑最健美的她，隔不了幾年完全換了個樣兒。現在的她，臉相比過去大狗寶的媽還老，三十幾歲的人，頭髮稀疏枯黃，高聳的乳房僅割下兩層皮，小孩子吃不到乳，全日全夜的啼哭，哭疲乏了倒在母親懷裏，醒來時吮吮癆乳頭重新乾號。

她心裏恨不得三脚兩步就跨到玉佛寺，可是她的脚死牛似的拖着，力不從心。肚皮的空叫一陣利害一陣，看看吃飽了的人們那種愉快的臉容和高昂的步伐，她的鼻子根又酸了，咬着牙根，好容易躅到目的地，半死半活地走來想插進隊伍，剛走近隊伍差五六步，沉重的皮鞋脚飛到她無肉的屁股上，一陣麻辣辣的楚痛從屁股往上直鑽。

『豬糞！懂規矩嗎？後頭去！』外國三道頭又舉起籐鞭打來，她連忙沒命的跑，背上吃到一鞭半，第二鞭只打着鞭頭。她哭喪着臉問山東巡捕買米怎麼買的，他簡單而不情願地回答：『轉彎，後面去排隊，先來先買。』她從檳榔路轉到戈登路，站在隊伍的尾上，一會兒後面又挨頭排上了。她一眼望去，前面有四五百人，再加上檳榔路的一隊，起碼有六七百人，回頭一瞥，後面已跟上六七十人。

等着等着等着，屁股和腰骨由麻木而劇痛，人家站着，她也只好站着。坐下去屁股不答應，後面的人也不答應，後面的人增加多少她回頭已數不清，人越多後面的擁擠力越大，她肚子緊靠在前面一個老太婆的身上比較好過些，但肺部被擠壓得透不出氣了。站到膝和腰像要折斷的時候，她已給推到轉角上。希望來了！米快到手了！

大門前，黑炭，外國三道頭，山東大漢，靠着鐵絲網，揮着木棍和籐鞭不斷亂打，人們越是走近大門，越擠得起勁，她身上的汗乾一陣出一陣，這時她很費勁地喘咳了！

老太婆的病，小孩的哭，三毛頭在家裏等吃飯的那副可憐相，二毛頭和大狗寶的成天工作，愁慮，和昨夜的痛哭，……一幕一幕在眼前浮現又消滅，消滅又浮現。擠壓，肚子空叫，她繃緊眉頭，掙扎着，中午暮秋太陽，曬在她的頭上猶似一盆炭火，她的頭膨大起來，一倍，兩倍……

（下接第四十二頁）

俄國革命軼史(續)

維多·綏奇作
林伊文譯

偉大的幾年

偉大的幾年便從此開始了。我這裏且不描寫勝敗交替悲喜互變種種情形。我祇限於列舉重要的時日和顯示全體的面貌就够了。奪取政權之翌日，政府各部都是闐然無人的；公務員，專門家，企業經理，老闆和資本家，發現了一種爲自己利益的罷工，怠工。工人組成的赤衛隊，拿着槍，到各部重要的公務員家裏尋人，把他們關了好幾個，其餘的也就情願去辦公了……這個鬥爭，最初幾個月都沒有甚麼過火，也沒有什麼恐怖。彼得格勒及其近郊，醞釀一個反革命陰謀，但很容易就被托洛茨基破獲了，上校謨拉維也夫幫助他，卜——謨拉維也夫後來也因叛變被殺了。差不多沒有逮捕一個人，逮捕來的不久也放走了，譬如哥薩克騎兵隊長克拉斯諾夫和反猶太人領袖普里尸克維趣，——克拉斯諾夫就利用這個機會到頓河區域去開始國內戰爭。列寧和他的政府同僚，并未準備將大生產全部收歸國有，寧可說是要實行一種很切實的工人監督，和社會主義國家漸進的參加混合托辣斯，資本家在此托辣斯之內仍佔有一個位置。

第一個待決的問題，就是戰爭問題。兵士是不要戰爭的。『他們舉腳來表決，——他們走開了。』列寧開玩笑同那些要他繼續戰爭的人說，——『不錯這次是革命的戰爭了。蘇維埃提議全體和平，但惟有中歐帝國答應進行談判。杜霍寧司令拒絕向敵國提議停戰，就被水兵們所殺死了。』(從此之後就成了一句俗語，叫做『送你到杜霍寧司令部去』，意思是說：送你到陰司去。)中歐諸國原則上答應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但在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會中，澤爾寧伯爵，豐爾爾曼和霍夫曼將軍，竟強迫托洛茨基和越飛答應割讓廣大的領土，美其名曰『解放』。這兩人於是粗暴地訴之於民衆，甚至離開了會場。蘇維埃停止戰爭，同時拒絕簽字於一個屈辱的條約。托洛茨基就是主張這個解決方法，爲的試探德國革命底可能性；他想，敵國從社會觀點上看，再不能進攻俄國革命了。他錯了。奧大利確是如此，但威廉第二一味蠻幹。在德國進兵之下，列寧建議中央委員會簽字於一個更苛刻的條約，因之犧牲了芬蘭和烏克蘭底革命。他：『讓去一點地面，爲的多贏一點時間。』索可勒說爾尼可夫，中央委員，連看都懶得看，就簽了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條約。

協約國認爲這個單獨媾和是『賣友』，雖然列寧和托洛茨基曾經表示接受英法底幫助以保衛這新興的共和國。『接受帝國主義強盜的武器』，列寧在一張紙頭上塗寫過這幾個字。在俄國內部，中等階級強烈的民族感情也受了刺激，給國內戰爭以滋養料。國內戰爭爆發於南方，那裏組織一些小規模的民族軍，稱爲『白軍』，在反革命旗幟之下；捷克斯洛伐克隊伍經過伏爾加區域向西比利亞撤退，這事也給協約國利用去，協同社會革命黨來推翻蘇維埃。諸大都會中軍官們的陰謀接踵而起。某次白黨暴動，曾有一個時候佔據了雅洛斯拉夫。一九一八年夏季，是很可怕的。饑荒，彼得格勒虎列拉，陰謀，暗殺，參加政權的社會革命黨人暴動。圖拉·卡卜蘭在某工廠會議散會出來時候，射了幾彈在列寧胸膛內。(列寧堅持不要槍斃她；雖然對外宣佈她已槍斃了，但我有妥實理由，相信她并未曾槍斃，以後好多年她還活着。)於是宣告實行紅色恐怖了；這一部分也是人民委員會方面要藉此來監督那各地自動開始的恐怖，并使之合法化的。反革命爲質者，軍官，資產階級分子，殺死了好幾百。俄羅斯革命也有牠的『九月日子』，牠的傅季葉·挺維爾，牠的卡里葉，他的約翰·列邦，牠的傅綏，——那些傅綏尤其有成功的希望(註一)。相距一百二十五年，在不同的兩個國家內，同樣的歷史狀況發生同樣的影響，并產生出同樣的效果，這就是：將革命的一切精力集中在一條近於無望的出路。

初期的紅色隊伍時常遇敵即敗，卡贊失守了，那是伏爾加底鎖鑰。托洛茨基，伊凡·斯密諾夫，還有一隊戰士，正當這大失敗之時專車趕到，這專車來的人單獨在斯維亞斯克打了一仗，得到一個決定的勝利。第二天，托洛茨基自己到卡贊碼頭一隻砲船上，在那裏把白軍小艦隊放火燒掉了。

命運轉過來了，軍心振奮起來了。托洛茨基簽發這個命令：

『工農紅軍兵士并非流氓，也不是懦夫。他們底故事。』

要為勞動民衆的自由和幸福而奮鬥。倘若他們放棄陣地或戰鬥不力，那就是指揮部和政治部之過錯。

我警告：如果一部隊撤退了，就先槍斃政治部主任，後槍斃指揮軍官。

勇敢的兵士，將論功行賞，而升為指揮軍官。

那些懦夫，那些叛徒，那些投機分子，是逃不了槍斃射擊的。我對紅軍負責。」

好多戰士反對用這種方式行事和說話，列寧却非常贊成的。確定的事實，就是失敗狂潮停止了，卡贊奪回來了；紅軍從一無所有中成立起來，一天更比一天強大，幾乎是每戰必勝，不管西方強國怎樣技術上幫助白軍。

舊時有產階級，由於發動國內戰爭，而喪失一切；因為鬥爭自有其邏輯的。城市因為饑荒，不得不實行限制食糧，和向農村徵發，因而激起農民反動。經濟漸漸成為應付戰爭之需要了，大生產收歸國有終於擴大為一切生產收歸國有了。有些企業領袖自己要求收歸國有，否則不能生活。一九一九年秋季，海軍上將哥爾恰克底白軍統治了西比利亞；烏克蘭成立『最高政府』，由登尼金將軍指揮着，準備進攻莫斯科；北方，由於英國軍隊維持，也成立一個略帶社會黨色彩的政府，以老柴可夫斯基為主席，他是最初反對帝制的老戰士；優德尼希將軍準備佔領彼得格勒，那裏人們餓死在街上，那裏倒斃的馬匹堆積在大歌舞劇院前面……蘇維埃祇剩有莫斯科區了，而那裏又是很危險的。於是在一個月之內，成功了一個真正的奇蹟。優德尼希就在彼得格勒城下戰敗了，那是托洛茨基自來防守的。登尼金在奧勒爾北邊吃了一個敗仗，就完了；他的軍隊

背後受窘於馬哈諾和黑軍，就瓦解了，在諾伏洛西斯克登船那次慘敗就完全完結。伊凡·斯賓諾夫領導的一支紅軍，在烏拉山打退白軍，同時紅色遊擊隊也在廣大的西比利亞舉行無情的運動戰。再過幾個月，海軍上將哥爾恰克也被顧全自己性命的同盟軍官交出來，一天夜裏，月光中，在伊爾庫茨克郊外執行死刑，同死的還有他的一個淚流滿面的總長。人們在安加拉河冰上戳一個洞，將他們的屍首丟下去。

一九二〇年，英國兵從阿汗格斯克撤退了，法國兵前一年也從敖德撒撤退了；一個革命委員會，以伊凡·斯賓諾夫為主席，組織蘇維埃的西比利亞；『捷卡』——即『非常委員會』，施行恐怖的機關

——底首領熱爾仁斯基提議廢除死刑，已蒙通過，恰在此時，舊日波蘭社會黨的恐怖主義者約瑟·畢蘇斯基，認為用他的軍隊去進攻基輔的機會到了。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將要開會時候，波蘭人攻佔了基輔。不過那時紅軍差不多有二百萬人。俄國已經瞥見了一下和平了。在這侵略之前，民族精神如此表現出來，連舊時將軍如波金萬諾夫和布魯西洛夫也號召舊時軍官來同波蘭人打仗。托洛茨基底火車在前方奔馳。波蘭軍被逐出基輔，退回本國了。列寧立刻定了一個進攻華沙的計劃，使波蘭蘇維埃化，以此來破壞凡爾塞和約，他不久之前才攻擊這和約要產生不祥效果的。一個波蘭革命委員會成立了，有馬哈列夫斯基和熱爾仁斯基參加，杜哈契夫斯基和斯密加統帶第六軍向華沙突進，不管托洛茨基如何反對，——托洛茨基認為這個大規模的作戰是太過冒險了。波蘭底工人和農民沒有起來，這又加一次證明：不能用刺刀送革命到外國去的。畢蘇

斯基得到外剛的贊助，在華沙打了一個勝仗。俄國失掉了一個與德國相共的疆界，德國也失掉了一個革命的機運。

這幾次大規模的努力，使得國內緊張到最高的程度。整個制度都建立在黨底紀律，城市有組織的儉約和農村底徵發之上。一九二〇年底和一九二一年初，農民底暴動使人覺得徵發的惡影響。最嚴重的，是湯波夫區農民暴動，農民軍達到八萬人，受舊日小學教員名安東諾夫的所指揮。在烏克蘭，馬哈諾圍着古萊波烈設立一個無政府主義政權。布爾塞維克黨內反對的傾向長大起來，不滿意於黨底中央集權制。克龍斯塔德底水兵們起來暴動了。

以上種種事變，我是很接近地經歷着的。我認為無疑容易及時採取一些辦法來補救許多的惡現象。克龍斯塔德事件也比較容易調解，容易免除革命內部無必要的屠殺。當前的危險使得中央委員會鐵面無情，而這危險，老實說，是足以致死命的。俄國精力竭了，若是失敗，將沒有力量再起革命。人們看得很清楚，接着克龍斯塔德水兵們走來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人物，是農民反動的一些領導者。一九二一年三月用大砲解決了克龍斯塔德事件之後，列寧明白了應當改變道路，就提議實行新經濟政策。徵發停止了，穀物可以自由買賣，外國資本家得到讓與權，小商業，手工業，甚至私人小企業也容許存在。

不到一年之後。國家沒有戰事，脫離了饑荒，裏好了瘡痕，又以信任的眼光望着未來了。

第三國際

共產國際早在一九一九年成立於莫斯科。兩個

法國人參加牠的第一次會議，一個以通敵罪被判了死刑的，另一個正待被判死刑：亨利·季爾波和傑克·沙都。德國人厄柏來邱，奉斯巴達古士黨命令來此要求延期成立國際，因為羅莎·盧森堡和他的朋友們認爲時機尚未成熟（此時羅莎剛在柏林與嘉爾·李卜克內西同時被謀殺了。）一個土耳其人蘇卜喜代表他的國家，——不久之後，基瑪耳派就把他謀殺了……

……今天，我是初成立的共產國際指導部做事諸人中，唯一倖存的。季諾維埃夫從彼得格勒第二區調我來國際辦事，我本在第二區担任幾種職務。

那晚上，聽過我教課的那些民兵護送我穿過那漆黑的街道，爲的免得人家搶去我身上帶的一磅黑麵包。我在斯摩尼學院一間空闊的房間內，遇見一個清瘦的大孩子，看不出有多少年紀，身上穿一件褪色的兵士短衫；——我則偶然穿一套很漂亮的奧大利軍官制服：那時衣服是很不易得的。他有一個高額頭，戴一付眼鏡，有點苦行人的情態，極端嚴肅之中又含有點笑意。他自己介紹說：

『佛拉底彌·馬真（李希田斯塔德），以前是麥克西馬爾派，在斯柳塞堡牢內坐了十年。你呢？』

『在三個國家過了十三年戰士生活，五年徒刑，十九個月禁閉，等等……』

人們可以工作。我們是當權的；而最近一場雨後產生的那些革命家，已經填滿了辦公室，他們準備下次大雨時轉回來反對我們，他們每人都要求一小份政權，一份特別的糧食，鯊魚和烟草，一有機會便坐汽車。我們的交換履歷，可見并不是沒有作用的。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此時不過名義上存在罷了。季諾維埃夫包辦一切，有時請教列寧，但較常請教拉狄客和布哈林，他們二人常常在我們中間作短暫的出現。我和馬真兩人，是顧問，是差遣，是秘書，是編輯，是印刷人，是組織者，是指導者，又是其他許多職銜。發生了些悲喜劇，譬如有一次季諾維埃夫叫我到他家去（我們的家相離很近，是一架機關槍所防衛的），很迅速地對我說：

『英國兵大概明天要登陸，我們也許會打敗了，但仍須做點工作。你懂得英文，請你給我草幾張傳單……』

『但是，格黎哥里·耶夫塞衣趣，我的英文并不好……』

『啊？不幸得很，——但是沒有關係。就你所曉得的寫去就好。有個英國人關在「捷卡」牢內，我爲了他麻煩得要死，我們可以叫他來起草的……』

馬真是一個具有希有的精神品格和罕見的聰明的人，我一生遇見的最完美的人中之一。一九〇六年炸燬司徒賓別墅那批恐怖分子中，他是最後的倖存者；革命從斯柳塞堡苦役監中救他出來，在那裏與鄂終尼基宰同室居住。他今天睡在列寧格勒演武場大花崗石之下；他是在保衛本城時候戰死的。他對我說過：『我們操有他人生死之權，這是應該的，因此我們應該做榜樣給別人看。』他做了榜樣。在牢內，他關於哥德寫了一本大書。

共產國際初期充滿了勇敢的親愛的精神。人們在無限制的希望中過生活。革命在全歐洲怒吼着。馬奴衣斯基從法國回來，不明白他在那裏所見的，他對我們說：復員就是表示革命開始了，——他拿

某次示威運動做證據，這次運動確是他在法國所見的最盛大的。里德爾（他已經死了，我可以說出他的名字），從意大利來，則沒有那般樂觀；他說：在意大利，革命瀰漫於靈和物中，但沒有找到人。惟有一個人敢斷定革命是可能的，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馬拉志斯塔。社會主義者害怕革命。莫索里尼和他的一夥，願爲革命服務，可以接受他們麼？夏布林——後來在保加利亞被謀殺了——很有把握地說：『我們甚麼時候願意，就甚麼時候拿到政權！』在摩尼黑，在布達佩斯特，蘇維埃取得了政權。柏特爾海因博士想在維也納做一個冒險，但人們趕緊攔阻他。

死人也和活人夾雜在一處的。列維納在摩尼黑被殺了。提波·詹穆利，我們剛在莫斯科聽他的演說，也在逃出匈牙利時候自殺了；紅色的匈牙利，不僅是失敗，而且受了老克列蒙梭所欺騙，他叫柏拉坤停止一個有勝利把握的總攻擊……哥爾文被絞死在布達佩斯特。穆那從捷克斯洛伐克來；說那裏一切都要爆炸了。柏拉坤從維也納來，爲的到克里米去主持一場大屠殺，這是俄國革命中最殘酷的和最無謂的屠殺；他給列寧在一次會議中連罵了二十聲『蠢才』，因爲他在柏林鼓勵了一個不合時機的暴力企圖……芬蘭人辣希亞秘密地越過國境來來往往，不久之後他就給自己黨內同志槍斃了。美國人約翰·里德，體育家，從芬蘭監獄放出來……他一九二一年死在莫斯科。

以後勝利了，跟着就大大地發展，我的意思是說：共產國際大走紅運了。好多人奔赴於牠，覺得牠成了一種勢力。俄國人於是當心防止政客，投機家和行險僥倖份子混進來，遂有加入國際二十一

條件之規定；爲此條件，法國統一社會黨在都爾大會上分裂了，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在哈爾大會上分裂了，意大利社會黨在里文大會分裂了。人們看見，出現在克臨靈宮的，革命者之中雜有政治家政客。馬塞爾·嘉爽不久之前還是愛國主義者——根本上他始終是愛國主義者——如今差不多改信戰鬥的國際主義了。佛洛沙陪伴他，帶着極優雅的態度。波爾底加有着眩惑人的聰明，一有機會便要指斥列寧的機會主義，但晚上，他領着一隊人唱着歌，在各代表旅館遊來串去。印度人羅意來尋找理論和軍火，以爲在印度鼓動之用，他似乎在一位墨西哥女子懷抱裏找到了幸福，那女子同他一樣細長，同他一樣美麗，但有一頭光亮的金黃色頭髮。美國人弗萊那似乎是一個密探。匈牙利人盧德梁斯基不久就背叛了（人家告訴我說：他現在在索洛維埃斯基島上）。一些意大利人，其中有老拉查理，塞拉雷·安格里佳，巴拉班諾瓦，代表意大利社會主義傳統；有青年志拉西尼，代表新制度報。一些英國人，西爾維亞·邦古斯特，卡拉采，以後紐波德。一些荷蘭人，溫古卜，斯尼夫立特。一些法國人，萊芒·列費夫勒，思想家和詩人，冥想着『革命或死』，無政府主義者勒普雷，一個強壯的小夥子，凡爾熱，五金工人，羅斯麥，不作聲，愛工作，人們一開始便覺得他有一種絕對的忠誠和正直，費蘭·羅里奧，四十八歲的鬍子，大戰時的革命戰士，波里士·蘇瓦林，尖利的，苛刻的，帶着命令的態度，不斷地提出些爲難的問題。一些德國人，保羅·列衛，樣子像一個青年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安格爾·佩斯檀那代表西班牙『全國勞工總會』來加入。稍後，有一天，加泰隆一個小學教

員，帶着嚴肅的面孔（喬幹·穆稜）和另一個眼睛帶金圈的愛笑的小夥子（安德列·賽），來到莫斯科。伏牙·伏尤維趣才二十五歲，已經是個老『革命職業家』了，勇敢而伶俐，很輕鬆地跨越全歐一切國境。

在國際主席台上的俄國人，有簡單樸素的列寧，有身體挺得很直，穿一套白制服的托洛茨基，他四處奔波偶然於此出現，有狡猾的伶俐的猴子相的拉狄客，這是最能使人顛倒的論辯家，有柔軟頭髮的主席季諾維埃夫，有布哈林，在他身上科學成了有趣而青春的。

初期的第三國際得到人們擁戴，人們爲了牠而鬥爭，而坐牢，而死；牠事實上成了一種精神的和政治的偉大的力量，不僅因爲戰後全歐工人革命潮流高漲起來，幾乎在好多個國家得到勝利，而且因爲牠集合了熱忱，誠實和忠貞，集合一羣人，願與共產主義同生死。在這羣人中，那些竊賊，那些投機份子，是沒有地位的。這羣人今天那裏去了呢？

拉查理，塞拉雷，羅里奧，是死了。保羅·列衛被開除了，而且在害腦膜炎時自殺了。列費夫勒，勒普雷和凡爾熱，溺海死了（註二）。志拉西尼關在意大利牢內多年了。羅意已被開除，現關在印度牢內。巴拉班諾瓦已被開除，現在國際社會主義隊伍中奮鬥。波爾底加已被開除，在意大利享受一種極端受限制的自由。始終忠實於自己信念的，有蘇瓦林，羅斯麥（同他們一起，還有彼得·孟納特和傑克·默尼，都是法國最早的共產主義者）。伏牙·伏尤維趣，現關在俄國維爾赫內烏拉斯克監獄中。俄國同志別處再說。西班牙『馬克思主義統

一工黨』底創立者喬幹·穆稜，爲正式共產黨所開除和誣蔑，業已被殺了；安德列·賽，當嘉泰隆自治政府司法顧問，被開除并逐出蘇聯，天天受西班牙史大林派報紙所攻擊，指爲『國際法西斯底密探』（註三）。西爾維亞·邦古斯特，紐波德，都被開除了；永不倦怠的斯尼夫立特也被開除了。共產國際浪費了力量，輕視了自己能力，拆散了，驅逐了，迫害了那些誠意的人，他們從世界四面八方奔赴而來，爲牠服務……

新經濟政策與反對派

不到幾年，新經濟政策就給俄國一種繁榮的景象，但這景象有時是人所厭見的而且使人憂慮的。社會主義政權保持着所有的發號施令的槓桿，而且以革命的工人和智識份子組成的人才很靈巧地運用這些槓桿。至少八分之七的工業生產是收歸國有了。全國喘一下氣；人們開始生活得稍微舒適些，自由主義的氣息在統治份子當中吹噓着。著作家們享受的自由，在現在看來，是要被人詫爲奇聞的，所以當時產生一些真正的傑作。加美涅夫，當時是

註二——這裏我再駁斥一次那種可惡的傳說，意在關於這三個人之死加上一種猜測。我是很知道他們動身時的情形的。我是他們的伴侶，當他們在俄國最後逗留時候。我知道他們的死祇因爲他們自己的急躁造成的意外事件。譯者按：這三人從法國偷往俄國，經過黑海回來，在海中失蹤了。

註三——譯者按：穆稜被佛朗哥所鎗決；賽則被西班牙史大林黨捕去殺了。

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又兼勞動和國防最高會議主席，曾經說起要容許一個無黨派的日報出版……普通工資水平稍微超過戰前，普通消費水平則稍微不及戰前。

我們共產主義者中間發生了一種難以排解的憂慮。我們忍受革命帶來的必然事件，連最殘暴的和最可痛心的在內；我們自尋煩惱，自加種種最苦痛的限制，因為我們期待能够提高收穫。以後，克龍斯塔德屠殺——我們的最悲慘的回憶——之翌日，列寧發出了退兵信號，說：『我們要進資產階級學校！我們要學習商業，我們甚麼東西都要賣，除了酒和神像！』（註四）此時，我們差不多全體都同意於他，因為原來的辦法，如農村徵發，如分配全部由國家辦理（這是戰爭所產生的，而非出於預定計劃），顯然是行不下去的。於是乎，我們當權的城市呈現出一種奇怪的景象；於是乎，我們覺得漸漸被掩覆了，被包圍了，被麻痺了，被腐化了……金錢生油膩了，使得一切輪機都生了銹，如資本主義的舊機器一般。有一百五十萬失業工人被救濟，在諸大城市中而且救濟得很不好。賭場直開到半夜後三點鐘，還在兩首都底中心區哩；賭場裏，賭錢，吃喝，做着種種陳腐的醜事。我們知道，在那裏耗費的金錢，大部分是從我們偷去的，這樣方法或那樣方法偷去的；是那些中介人或腐敗官僚侵吞的國家公款。塗脂抹粉的女人在浴室和旅館附近徘徊，同倫敦巴黎的妓女沒有兩樣。階級在我們眼前再生起來了：最低層是每月領二十四盧布的失業業者，最高層是每月領八百盧布的工程師，二者中間有每月領二百二十二盧布的黨內辦事人，但後者有好多東西可以免費使用的。某些人舒服和某些人

貧困之間，劃了一條鴻溝，自殺者的遺骸就是拋棄在這鴻溝裏面，有人提出擴大遺產權問題，史大林提議，以差不多沒有遮掩的形式，為富農利益恢復土地私有制。『貧困』是愁苦的和醜陋的，現出在我們的新社會上，彷彿人身上的癩疥瘡；『舒服』則是傲慢的和滿足的。我們的社會主義民兵將賣蘋果的窮苦女人拖到局所來，因為她忽略了納稅；那個肥胖的店主則站在旁邊很高興地看着，覺得事情終於是上了舊軌道了，他是以投機價格販賣社會主義工業製造品而致富的……青年人喝酒，老年人喝酒，醉酒成了一種社會病症。最壞的，是我們已經認不得舊日的革命黨了。往時的戰士，有坐牢經驗和尊重思想觀念的，一千個黨員中祇有幾個罷了，他們而且佔據些足使他們與底層隔離的位置。國內戰爭時的戰士在後來的人羣當中，也有滄海一粟之感，在那些要津的人當中，在那些新的附和主義者當中；——工人革命底未來如何，根本上是他們所最不關心的。他們祇要求不須歷史而舒舒服服地生活着；他們本是近視的，而又愚蠢的，同所有小鑽營獲利者一樣，他們不明白這就要引到最壞的歷史。

我們的憂慮是由國家底這種污垢和蘇維埃社會資產階級代表這些最初徵兆所引起的；這個憂慮，不用說，並不是感情用事，而是經過深深思考，而且且有經濟統計來證明的。列寧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死了，死前就抱有這個憂慮，表示於他的最後著作和最後演說裏面。他自問道：『國政之舵，是否脫離了我們的手呢？』在病中，腦受了傷，他還使用他的所有的最後的力量來找尋武器以攻擊最不好的和最直接的弊病：即黨內的官僚主義污垢

那時官衙已經代替了黨；工人，戰士，已經沒有一點說話權利了。人們覺得官吏無上威權底來臨。有些人宣佈：無產階級專政已讓位於書記處專政了。（蘇瓦林底話）死前不久，列寧曾向仇視官僚制度的托洛茨基提議，共同為黨的民主化而行動。在總書記處裏，喬其亞人史大林利用他的技術地位遍植私人，因而漸漸得勢起來，——在內戰時他是不甚知名的。就是他做了衰病的列寧的障礙物；佛拉底彌·意理趣臨終時口述的一封信，就是與史大林絕交書。

用經濟學上的話說來，問題是由工業和農業間的關係來表示的。農業恢復得比工業更快；農民儲藏了好多麥子，因為麥價太低不肯出賣；而麥價之低是因為工業製品供不應求因而抬高價格。人們是走向一個沒有救藥的經濟危機，這危機將激起一萬二千萬農民反對社會主義政權，迫得社會主義政權去大量輸入——是賒欠麼？甚麼條件呢？——外國工業製品，因而受外國資本的支配。應當有先見之明，而且及時補救。那時還是可以補救的時候。

有三個解決方法：

第一，黨底民主化，為的使工人和革命者底真實影響能在黨內表現出來，并洗清國家機關；這是一切經濟設施能有成效的明顯條件。

註四——這裏，他料想錯了。他死後不久，政治局除了他的寡妻克魯普斯該雅和托洛茨基二人反對以外，都決定恢復那大戰初起時尼古拉第二所廢除的酒稅。伏德加酒之售賣給蘇聯預算以一筆可觀的進款，但國家因而受了很大的損失。

第二，採用一種工業化計劃，使得幾年之內顯見工業發達起來。

第三，為尋求工業化的必需的資源，強迫富農交付麥子於國家。

一般是：限制發財，限制享特權的人，攻擊投機，縮小官吏的權力。

以上總括起來，應該是黨內反對派底綱領。由此生出牠的口號：『打倒市儈，打倒富農和打倒官僚！』

自從一九二三年，反對派就找到一個領袖，托洛茨基；官僚派也開始化身為史大林了。

自從一九二三年，就有一種無限強暴的鼓動，反對托洛茨基，隨時隨地宣佈托洛茨基是反對列寧，是黨的惡鬼，是布爾塞維克傳統底對頭，是農民的仇敵。他舊時，從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間

同列寧不協，遂被那些無所不為的論戰家利用來製造一個『托洛茨基主義』，一種莫明其妙的思想系統，把來當做最有毒害的邪教異端。他雖然以光耀

的文筆，深刻的思想，寫成了一些東西，但是沒有用，官方底動輒印行幾百萬份的出版物，三番四覆以自造的理由來攻擊，遮掩了他的聲音。這回攻擊

的內幕，我們以後知道了，而且明白：無論拿一時誤解或感情激昂，都不足以解釋那經過商量和上頭

命令的偽造事實和思想之實際情況。關於偽造『托洛茨基主義』之事，已有好多簽名負責的證明文件

（不錯，簽名的人有好多個，最近已被槍斃了。）

紅軍底創立者，幾個月之前尚被真理報譽為『勝利的組織者』，當攻擊開始時還是最高軍事會議主席，在軍隊中和全國人民中都受擁戴的，他本可以來一箇武力政變而必得成功。但如此，則是以

軍人政制代替官僚政制，而使社會主義革命走上以前資產階級屢次革命所有的軌道。問題不是在玩拿破崙把戲，即使是出於好意。反是應當阻止拿破崙主義。反對派之施行其內部改革政策，并非依靠武力政變，而是按照常用的社會主義方法，即訴之於勞動者羣衆。托洛茨基離開了軍隊司令地位，毫不抵抗讓人免職，而以黨員資格繼續奮鬥。一切是最後依賴於國際形勢的。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失敗之後（欣尼茨會議，漢堡暴動，撒克斯工人政府被武力解散，馮塞克特將軍專政），一種退潮漂過俄國，於是官僚政治得意了三個年頭。

（上接第三十六頁）

她分辨不出人了，眼前只是一堆黃色的制服，肚子還是空叫着，但她不覺得苦痛。後面的擁擠極度的加劇，擠得她好幾分鐘吸不進一口氣，籐鞭木棍，雨點般的落下，她像戴了個木頭帽子，只聽見挨打時的聲響，不感到挨打時的疼痛了，青黑色的窮人和穿黃色制服的巡捕老爺都消失了，眼前被一座金黃燦爛的大屏風擋住視線，她更張大些眼，那屏風漸漸變紅，紅得像殺豬時冒出來的血，之後再慢慢變成紫色，最後很快由紫色變成漆黑一片。她微微感到馬路旋轉着向上傾翻，馬路翻到她的頭上，她的木帽子受了最後一次笨重的打擊，在鉅大的騷動聲中，她只聽得一個人的大聲叫喊：『唷！乖乖！倒了……！』

第二天，報紙大字登載着慈善平糶的成績，附帶報告：死了幾個不守秩序的老婦和小孩子。

（上接第二十一頁）

就是對於知識分子的蚊蚋般的小聲音，也不讓輕易泄出。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然而過去兩年的事實教訓，該已使他們得了某種歷史意義的啓示吧？

過去兩年間知識分子的行動，表示了他們願意站起來的願望；然而在上層既無有澈底革命的資產階級的領導，在下層又無有狂風暴雨般的民衆力量可以追隨，於是根本上不能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獨立作用的小資產階級，便表現了力量的衰退。繼續抗戰是民族求生存的惟一出路，而抗戰勝利的靠山是廣大民衆的力量。知識分子的力量雖然有限，總是民衆力量的一部分，所以牠的衰退，當然是抗戰的一種損失。然則怎樣挽救牠的衰退呢？

在帝國主義趨於沒落的時代，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已無以澈底前進姿態領導他們的可能了，過去兩年中既無，今後更不會有。知識分子要想叫自己的力量不耗滅在消極的煩悶與昏倦裏，那他們只有依附於廣大民衆的力量。民衆力量的興起是抗戰達到澈底勝利的唯一道路，同時也是知識分子實現其盡情狂歌歡舞的理想之惟一道路。可是民衆力量不是任何空洞口號（神聖的民族戰爭最後勝利……）所能引起來的，要想民衆起來必須無畏地澈底地拿事實答覆他們在如下問題中所表示的要求：『先生說的好是好，譬如我去打日本，一家老小怎麼活法呀？』

二種流行的歐戰觀

元笑

世界大戰是一切政派的試金石。由某派對戰爭所採取的態度，可以看出該派的整個立場。在中國，目前最流行的有三種歐戰觀：

第一種人的態度表面上似乎很『左』。他們竟可以承認『這個戰爭是帝國主義再分割殖民地的戰爭』。甚至把蘇聯稱為『帝國主義的新型』。他們主張對這個戰爭旁觀，他們既『不同情德國這邊的戰爭……也不同情英法的參戰』，可是他們由此所得的結論却是『右』到不知那裏去了！據說如要『把東亞從歐戰隔離出來』，必需『結束東亞現成的僵局』，而『結束僵局』的不二法門則是：加緊『中日直接妥協。』

這是日本阿部首相的『不干涉主義』在中國所起的回聲。為獨立而戰的中國民衆當然應該加以最輕蔑的唾棄。

另一種人抱着不同的觀點。他們隱隱然把英法這方面的戰爭描寫為『正義』的或反侵略的，拚命把中國民族的解放戰，自動地解釋為替英法，尤其是美國在遠東利益所作的戰爭。他們準備把中日戰爭變成爲世界大戰的一部份，他們現在之沒有公開主張派兵赴歐參戰，祇由於美國目前還沒有插足在戰爭的漩渦中。而另一方面，他們也同樣希望『結束東亞的僵局』，不過不是『直接妥協』，而是請羅

斯福總統出來『利用機會』。

這種人的態度似乎在目前是爲抗戰打算的，但是發展起來，則對於中國民族之真正解放，也不會比第一種觀點較少害處。

第三種人的『理論』最多，最『深奧』，層出不窮，千變萬化。他們自稱是『站在民族解放的利益上，站在世界革命的利益上』說話的。

他們認爲，『英蘇談判失敗以後，世界的正義和平已成過去，帝國主義重分世界的不義戰爭開始了。』因此『這次歐戰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在這次戰爭中，最壞蛋的是英法，因爲牠『在反蘇的積極性上說，在暗中出賣弱小民族的陰險上說，其罪惡比侵略國家更甚。』而最有功的是史大林，因爲他與德國訂立協定而縮小了戰爭的範圍，『進兵波蘭而保障了巴爾幹半島及波羅的海小國的真正中立，不至捲入戰爭的漩渦中去，』而且『阻止了法西斯蒂德國軍隊，拯救了烏克蘭白俄羅斯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至於和日本簽訂戰協定，則是『接受了日本的屈服』，間接幫助了中國的反日戰爭。

在中國，他們認爲『目前不需要而不應該捲入歐洲戰爭的漩渦』，『不參加歐洲戰爭的任何一方面，對歐戰保持事實上的中立。』同時應該『加緊與蘇聯美國合作，爭取牠們更雄厚更廣大的援助』，因爲蘇聯外交的根本政策在『堅持援助一

切因爭取祖國獨立而成了侵略行爲的犧牲品的民族』，而美國則『還堅持其一貫的遠東政策，即以遠東利益爲重』云云。

代表這個觀點的那些先生們，昨天還在大談其『人民陣線』與『和平陣線』，還在責罵張伯倫『反侵略』的態度『不堅決』，還在宣佈希特勒是戰爭的『唯一製造者』，還在說『中國的抗戰應該組成世界集體安全的一部分』；而今天却毫無不臉紅地換上一種極端相反的『理論』，我們真不能不佩服這些先知們的臉厚無恥！

這些先生們對戰爭的態度，業已簡單成爲希特勒的說客；對於中國的抗戰，在目前似乎還積極擁護着，但這祇因爲他們的『偉大領袖』——史大林的外交政策，還需要中國抵抗日本，他還沒有和東京的武士取得諒解；如果明天，史先生的外交利益與中國抗戰發生了衝突，那等着吧，保你可以看到這些先生們會創造出一些『親善睦鄰』的理論來！

對於戰爭唯一正確的觀點，在我看來，全中國也祇有『動向』所代表的那一種了。

十月十日香港

誰是『惡作劇』的製造者？

曲舞

據塔斯社訊：英國著名幽默作家蕭伯納氏頃在『新政治家與民族』上發表一論文，殊足注意。蕭氏曰：『波蘭戰爭已成過去。波蘭既已失敗，吾人已無繼續作戰之理由。因此，吾人乃擲去武士之面具，而坦白承認吾人並不關心波蘭，而僅以恢復原

來勢力均衡，摧殘德國為目的。吾人現並名此舉為消滅希特勒主義。苟吾人獲勝，則凡爾賽將再現，不過更為惡劣，而不到二十年，又一戰爭將發生。無論吾人塗以如何濃厚之自由，民主，以及一切吾人本身今已放棄之廢物，戰爭的理由終不能成立。吾人唯有與希特勒及全世界構和，而不再惡作劇及毀滅本國人民」（見莫斯科九日電）。

在這段簡短的論文中，頗有值得玩味的地方。

蕭氏深信在此次大戰中，英國即使獲勝，則「凡爾賽將再現，不過更為惡劣，而不到二十年，又一戰爭將發生」，這是不錯的。誰都知道，此次世界大戰的性質澈頭澈尾是帝國主義爭奪殖民地的強盜戰爭，與二十五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如出一轍，同為資本主義制度罪惡的結晶品；而且我們可以武斷的說，假如在大戰的進程中，沒有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內戰和遠東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及時興起，那麼大戰的結果將使人類全部歷史及文化倒退數千年，那時不問孰勝孰負，凡爾賽的再現是不可避免的，而第三次的世界大戰又將更緊張地在廢墟上準備起來。

蕭氏又認為無論英國「以如何濃厚之自由，民主……戰爭的理由終不能成立」，這也是不錯的。目前有人以為英法是「民主」的，愛好「自由」的國家，因此他為了維護世界的「正義」與「公理」，才不得不掀起「懲戒」希特勒的戰爭；其實，這些都是無稽之談。不管英國塗了如何濃厚之「自由」和「民主」的色彩，這次德國進兵波蘭後，英國紳士立刻抹去了「懦怯」的笑容，毅然決然地對德國宣佈開戰，却赤裸裸地揭露了帝國主義間爭奪世界市場的陰謀和醜態。事變的演進，已將

「正義戰爭」的歌頌者和「陣綫論」的擁護者迎頭痛擊了。在今天，世界上如果還有陣綫可以劃分的話，那麼一方面便是布爾喬亞及其走狗，而另一方面是普羅利塔列亞及全世界的被壓迫者，前者與後者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其深刻性和不可調和性比諸「和平陣綫」與「侵略陣綫」間的矛盾和衝突，無疑地要真確得多了。

但令人嘆息的是蕭氏以為要終止這齣「惡作劇」，唯有與希特勒「構和」；在蕭氏的眼中看來，也許希特勒是引導世界大戰爆發的禍首，因此「解鈴還是繫鈴人」，認為向希特勒乞和是唯一的出路吧？然而事實不然，大戰既已爆發，要它半途自動地「和平」解決是不可能的。操縱現在世界大戰的幕後人，既不是希特勒，也不是張伯倫，而是德意志銀行的股票底持有者和唐寧街上的金融家，更適當的說，是現存的千瘡萬孔的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制度是產生萬惡的總淵源，是扶植戰爭的搖籃，是製造各種「惡作劇」的大本營。這樣，蕭氏不從根本上着想（即粉碎資本主義制度），而向和平之神「屈膝」，當然是徒勞無益的。

作為幽默大家的蕭伯納，在這篇論文中沒有半點幽默。他在第一次大戰時是一個寫諷刺劇的「反戰作家」，這次雖以同樣的姿態出現，但却做了路易喬治的「同路人」，這位退任的首相數星期前剛在巴力門中發表了他的「英國必須慎重考慮和戰問題」的演說。

列寧時代聯共政治局委員的命運

小邨

政治局是俄國共產黨的最高權威，舉凡一黨之戰術和策略及蘇聯之內外交策均由牠來創建，故參加政治局的人員都是全黨中的最優秀領袖。現在我試把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列寧時代政治局委員之命運表列於下，未知讀者作何感想？

列寧——幸於一九二四年一月病死。

托洛茨基——一九三六年八月被史大林缺席判處死刑，罪名：「勾結希特勒企圖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托氏現亡命墨西哥）

齊諾維也夫——一九三六年八月被史大林槍決，罪名：「勾結希特勒企圖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

加米涅夫——一九三六年八月被史大林槍斃，罪名：「勾結希特勒企圖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

布哈林——一九三八年三月被史大林槍決，罪名：「勾結希特勒企圖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

賴可夫——一九三八年三月被史大林槍決，罪名：「勾結希特勒企圖恢復資本主義。」

史大林——現存蘇聯獨裁者，一九三九年八月與希特勒握手！

編輯先生：

『動向』首三期一起在書店裏看到，我一口氣把牠讀完了。在寂寞的香港，這個雜誌不能不說是一個新奇的東西。有的朋友對這個雜誌恭維，但也有些朋友大罵貴刊的言論是不正確的。但對於我個人，貴刊確乎是一個啓示，因為很多過去疑惑的問題，現在似乎是明白了。

不過還有幾個問題，希望先生給我解答。

(一) 我看到一本名叫『新知』的雜誌，關於蘇聯與德國訂立同盟這事情，該刊說完全與蘇聯的基本政策相符，即是爲着『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利益。同時該刊又說援助中國抗戰是蘇聯與德國訂立協定的『主要含義之一』，並且由是用以說明蘇聯現政府并未放棄世界革命，因爲蘇聯可經過援助弱小民族的反帝鬥爭而推動世界革命云云。而莫洛托夫在外交報告中，也說『吾人對待非蘇維埃國家之外交政策，隨時均依照列寧關於蘇維埃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並存之著名原則』。我真不明白這是什麼回事。照理講，世界大戰發生，各國的勞動者必然互相殘殺，德國的革命黨人，必然會因爲史大林與希特勒同盟而擁護後者，因爲史大林說這同盟能够『保證和平』。而民主國的革命黨人，因爲過去蘇聯提倡人民陣線叫他們同資本家的政黨同盟，現在他們當然也跟着資本家去同德國打仗，那末，這些不同國度的革命黨人不是互相殘殺同志嗎？而

另一方面，蘇聯又與弱小民族的中國的鬥爭對象成立初步的妥協，即是說，連『新知』雜誌的那位作者所說的用以推動世界革命的僅有的橋樑也不『經過』了，那還談什麼世界革命呢？先生，我太不明白：蘇聯現政府與德國妥協而直接促成了世界大戰是不是爲着『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利益？那末『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是一個事情呢，還是兩個矛盾的東西？『動向』第三期所說的『革命的不斷論』是不是與托洛茨基主張的『不斷革命論』是一個東西，而這東西與『世界革命』有什麼不同呢？列寧爲什麼說出『與資本國家和平共存』的話來呢？既然這樣又有什麼『世界革命』可言？

(二) 貴刊第三期的『世界動向』裏面說蘇聯這次出兵波蘭，爲的是軍事上的需要，即預防『納粹黨的雄師直逼邊疆』，而『危及蘇聯的安全』，是以『史大林不得不以保護『同胞』的名義，向波蘭要求『寸土』』。但另一方面貴刊又說這次蘇聯進兵波蘭是錯誤的，完全與一九二〇年時候的進攻不同，但是問題又來了：難道史大林應該讓希特勒直迫邊疆而危及蘇聯的安全嗎？先生，假使你是蘇維埃的領袖，你將怎樣幹呢？而一個愛護蘇聯并贊成馬克斯主義的人，對這事變應取什麼態度？

(三) 有些朋友說，蘇聯進兵波蘭可使波蘭『赤化』，這對於革命是有利的。在報紙上，也看

到波蘭成立蘇維埃的消息。這究竟怎樣了？材料又缺乏，先生能够對這問題作一理論上的推測嗎？

(四) 八月廿七日的路透社與哈瓦斯社的電訊，說駐中國的蘇聯大使要求中國當局停止在重慶公演蘇聯出品之反納粹映片，又說莫斯科城中反法西斯影片書籍已完全絕跡。這是否可以容許的呢？這就是所謂『政治上的投降』嗎？

X X X

矛盾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動力，我極相信這句話。但是近來中國文化界却不幸缺少了這種有生氣的鬥爭現象。雜誌圖書雖多，但完全是『人云亦云』，即使這『人云亦云』的東西是真理，那也是寂然無味的。這種現象不但是中國文化退後之表徵，而且是抗戰中的中國文化界的恥辱。貴刊披着批評鬥爭的衣甲上場，這將在中國文化上留下一個可紀念的痕跡。我希望先生等加倍努力，以使『動向』成爲新的『新青年』，成爲進步的『新啓蒙運動』的前鋒。

寫到這裏，偶然想起一個問題，請先生解答。這就是：爲什麼現階段的文化界缺乏應有的活潑的現象？社會的矛盾仍是存在着，但爲什麼反映這社會一切實質的文化只見到千篇一律的東西？末了，謹致民族解放的最敬禮。

讀者陳子邦於香港

十月十二日

子邦先生：

你所提出的幾個問題，茲擇要解答於後：

(一) 德蘇協定成立後，爲史大林政策作辯

護的詭辯，是太多了，『新知』的論調就是這種詭辯的主要的一種。

說德蘇協定與列寧建立蘇聯的基本政策相符，那完全是說謊；但說與史大林的基本政策，即由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立場發出的政策相符，則是不錯的。因為自一九二四年以來，史大林的蘇聯政策完全與列寧的蘇聯政策成了前後截然不同的兩種方向。『新知』的論調含糊其詞，混同了這種不同。

列寧政策的基本立場是世界革命；世界革命的含義是不自限於一個國家，而要以蘇聯為大本營去發動，組織，指導別國的無產階級，實行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因為他認為只有全世界的，至少是某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革命成功，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才能達到最後的成功，否則蘇聯要想保持其社會主義制度之存在都不可能。列寧的這樣立場，就是經馬克斯指明而由托洛茨基所發揮光大了的不斷革命論的立場，這樣立場在列寧的千百篇文章與講演詞中都表現着。至於史大林政策的基本立場，則是在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名詞的含義是：即使世界工人階級的革命不成功，只要資本國家不對蘇聯實行軍事干涉，那末社會主義的社會即令在蘇聯一個國家之內也能建設成功。這思想是列寧死後，一九二四年才發生的。後因各國革命相繼失敗，更增強了史大林這一種自信，他要以任何代價來建設蘇聯的『一國社會主義』，甚至以各國革命來和各國的統治者做買賣，藉以易取蘇聯國境的安全。過去的『人民陣線』，以及最近的德蘇協定，都是史大林這種理論的表現。這樣看來，史

大林政策與列寧政策是根本違反的。

莫洛托夫說，德蘇協定是『依照列寧關於蘇維埃國家與資本主義和平並存之著名原則』而成立的，這話根本就是一個彌天大謊。列寧從來沒有定下過這樣反動性的『著名原則』，反之，列寧曾千百遍指出社會主義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之不能兩立性。至於說德蘇協定的『主要含義之一乃是要援助中國抗戰』，這更是胡說八道。如果史大林拉不住日本，而不得不仍舊援助中國抗戰的話，那也只是外交上的必要，並不是什麼『經過援助弱小民族的反帝鬥爭來推動世界革命』，什麼是世界革命？這對於史大林政策的決定，早已不起絲毫作用了，即使退一萬步說，史大林還是想『推動世界革命』的，難道可以使英法的共產黨全被摧毀，使德國的工人階級擁護希特勒，而一方面却『經過』弱小民族來『打擊帝國主義』的嗎？如果史大林真像『新知』這位糊塗編輯那樣想法，那簡直該送進瘋人院去了。

(二)本刊第三期『世界動向』裏說，最近蘇聯出兵波蘭是爲了保護邊境而不得不然云云，是就史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政策之後果而說的，史大林的傾向於閉關自守的鴉鳥政策，已經把希特勒的軍隊引到蘇聯邊境了，這時依照史大林的進兵波蘭是錯誤，是就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立場說的，因爲這進兵的作用只是史大林想魚肉別的民族以圖自保地位，而不是爲了世界被壓迫民衆的解放，這與一九二〇年蘇聯進兵波蘭完全不同，那時進兵的主要目的在於響應那未被完全鎮壓的波蘭革命，與促起德國的革命。講

到真正社會主義者，如處在蘇聯領袖地位，對於這一問題的態度應該怎樣？對於這個問題簡直是不能回答的，因爲我們如果根據着列寧時代的歷史及其所確定的原則來予以假想的回答，那必須以一個荒唐的假定來作前提，即蘇聯在過去二十年所實行的雖然是列寧的正確路線，但仍不免陷於目前的境地。其實這是必無其事的。目前史大林所處的困難境地，乃是十餘年來『一國社會主義』、『第三時期哲學』、『人民陣線』等破產政策的必然結果。誰如果在過去十餘年間擁護史大林的這些政策，那他在目前便不得不走與史大林同樣的道路。所以祇問在這一問題上，一個正確的社會主義者應該怎樣辦，那是難於答覆的。如果這位『正確的社會主義者』能够執掌蘇聯的政權，那首先必須完全拋棄史大林的政策，清算他過去的罪惡。一方面，設法以兵力保衛蘇聯的安全，以防禦法西斯的侵略，不得已而須進兵波蘭的話，那也必須向全世界尤其是蘇聯本國及波蘭民衆宣佈進兵的意義，叫大家都明白進兵的限度與目的，不至於因此而紊亂了國際革命的陣容。但史大林這次之向波蘭進兵，完全用了帝國主義者的辦法，與希特勒並無二致，這是克蘭林宮官僚們欺騙了蘇聯與世界民衆而蹂躪了波蘭民衆，其結果各國共產黨當然只有莫知所措了。另一方面，立即拋棄對法西斯投降的政策，恢復蘇聯的世界革命傳統，立刻發動德法英的革命號召，以圖根本解除這些國家對於蘇聯的威脅；同時澈底解放史大林對蘇聯民衆的壓迫，叫他們知道蘇聯的危機而羣起合力自衛。第三國際及蘇聯已被史大林政策腐敗了摧殘了十多年，這樣態度的根

本轉變，在國際當然難收一時之效，但在蘇聯國內是可以發動民衆的偉大自衛力量的。處在目前的状态下，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好辦法呢？

(三) 說蘇聯進兵波蘭於革命有利，是很錯誤的意見之一。一國的革命應該由本國的民衆自發，決不能從上面或從外面來『實行』的，當然國際主義的紅軍可以越過國界去幫助別一國民衆的自發革命，但必須當該國發生革命的時候，否則，鄰國的進攻，反而有益於資本家愛國主義的宣傳。波蘭境內的烏克蘭區的『蘇維埃』之詳情我們雖然不清楚，但可斷定那不過是蘇聯官僚層聯合波蘭的一部分社會上層分子在波蘭民衆頭上所玩的一種把戲，這對於波蘭的全部民衆有利益當然是談不上的，你在那國歷史上曾見過民衆不用自己力量去鬥爭而就能被統治者抬到天堂上去的？如果說蘇聯進兵波蘭『於革命有利』的話，說的是可以促進波蘭的經濟與政治進步，那或許可能，但這也不過與帝國主義侵入一個殖民地以後的好一方面的結果一樣，你能因此而就贊成帝國主義的侵略殖民地嗎？

(四) 這當然是政治上的投降。這投降的意義是：史大林爲了與希特勒勾結，而不惜把全世界的反納粹運動摧毀，不惜在各國的反納粹思想上『焚書坑儒』，世界革命云乎哉！

你提出的最後一個問題，我不想再事回答，因爲在本期中有兩篇文章：『抗戰與思想』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浮沉』，已經部分答覆了你的問題了。

編輯先生：

在動向第三期裏我得知史大林治下的蘇聯變化

編者

無常的前因與後果，這是我素來急欲知道的問題。

我一向對於人家叫得天花亂墜的社會主義在蘇聯一國內已完全勝利了，和一大堆『陣線』的言詞都起了疑心，因爲我不相信蘇聯所有的創造者（除列寧自行早死外）都成了破壞蘇聯的法西斯的走狗，而革命的只剩下史大林一個人。也不相信『和平陣線』這個虛偽的集團能够產生真正的和平。但我只是懷疑而已，因爲在發霉的氛圍裏我沒有得到一個清醒的人幫助我理解，也沒得到任何一本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報章或雜誌的指導，使我往往在事情過後，才稍稍明白過去的事情。

大戰發生後，情勢的演變推使我由滿腹懷疑而走向徬徨無主，由徬徨無主而逐漸覺悟起來，現在根本唾棄了那些卑劣可惡的人，即當我說西班牙革命的失敗也許是人民陣線政策所招來時對我刻薄仇視的那些人。

讀了動向後，我完全傾向於動向的觀點，我簡直融化在動向的言論裏。但可惜動向出版的日期相離太遠了，我主張盡可能的縮短出版日期，不然至少每期要多多增加篇幅，我覺得我們現在極需要吸收新的認識和得到新的指導。

末了我有兩件不大了解的問題請問：

(一) 蘇聯進攻波蘭是一種罪惡，而這種罪惡的負責者我認爲不是蘇聯的民衆，而是史大林。假使我是一個蘇聯的人民，那麼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和採取什麼方法加以挽救？

(二) 波蘭已被德蘇瓜分了，我們對波蘭國應採取什麼態度？

這兩件問題，最好請在第四期上對我們解釋。

讀者潘廣勳上 十月十六日

編輯先生：

大戰爆發後，國際情勢演變的迅速和複雜，確

牠們強姦。

編者

廣勳先生：

讀了你的信，很使我們感動，因爲在這個年頭，我們這刊物竟能有你這樣一個讀者，簡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動向』出版的日期誠然太長，但你要知道，替我們這刊物撰稿的人是很少的，這幾位撰稿人同時又得自己去找飯吃。所以一月一期，已經累得這幾個人滿頭大汗了。不過既然我們的呼聲不是落空，我們也深信不會落空，那我們總要盡力來副『動向』愛護者的期望。

你的第一個意見很對，這次蘇聯在波蘭所執行的罪惡政策自然是史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層的，而不是蘇聯民衆的罪惡。假使你是一個蘇聯的人民，無疑地應該反對這種政策，最主要的，應該反對目前史大林所進行的絕對秘密的外交方式，要求在全體勞動人民的監督之下進行一切外交談判。此外當然要清算史大林執政以來的一切罪惡政策，并主張以真正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官僚專政，藉以採取緊急辦法來發展國際革命，來保衛蘇聯。

關於第二個問題，真正社會主義者當然不必關心於希特勒或史大林所設的傀儡國，也無須注意巴黎成立的『波蘭政府』，他的正確態度應該是波蘭民族與烏克蘭民族的自決，應該讓這些民族的勞動大衆決定自己的命運，建立自己的蘇維埃共和國，社會主義者不僅反對德國，或英法吞併這些蘇維埃共和國，同時也反對史大林官僚將

會一時使人難以捉摸，混亂；驚訝與無知的空氣，也一時緊張起來。在這個時候，『動向』的大戰專號，如一顆流星出現了，劃破了黑夜的長空，多麼使人慶幸！

照本人看來，幾篇論戰爭文章，都有其獨特之處，尤以南冠君一文，以唯物史觀的眼光，從經濟的狀況去分析與預測這次大戰的現狀及前途，其穩健，確澈與勇敢的態度，委實『為一般雜誌報章中所不能找到』，令人讀之彷彿如重見天日！其他如別開生面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文學的預測』，意味深濃而有趣的『德蘇協定的東鱗西爪』等，在在都足使人愈讀愈有味焉。

『動向』無疑是充分反映了人羣的要求，其在將必為多人所擁護，但另一方面也免不了要為一部分人所仇視。我敢相信，當『動向』的生命還握在這部分人的手中時，將很有可能而且不難為之斷送，先生不可不預為計也。專此敬祝

撰安

讀者劉世銓上

十月九日

世銓先生：

謝謝你對我們所表示的關切之情。『動向』誠如你所云：是『免不了要為一部分人所仇視的』，而且早已見之事實了。我們在上海遭遇到困難，說起來真叫人切齒，從中國的公共敵人那裏來的威嚇與壓迫，那是無足怪的，因為，希望敵人仁慈的祇有那最沒出息的奴僕。可是一部自命『前進』的文化人，却也在替中國的公敵服務了，這是令人痛心的。『動向』問世以來，這班所謂『文化人』也者從沒有和我們做過一次公開的論辯，而只是鬼鬼祟祟地，躲在陰暗裏，

用許多卑劣手段，想叫本刊不能與讀者見面。這還罷了，最可恨的是香港的一件把戲。本來香港的『動向』，是託某書店獨家代售的，發售以來，頗為香港的讀者所歡迎，但這却使一部分以愚弄青年為專業的『文化人』恐慌了，據說有一位『最有地位的文化人』，跑去『善意』勸告那家書店的老板，請他不賣『動向』，結果壓力奏了效，香港的讀者就買不到『動向』了。

我們是沒有『地位』的，自然不能和這班大人先生抗衡，不過我們相信真理，更相信大眾會認識真理，所以我們要向你，同時也向所有的讀者控訴，試問『動向』對於中國民衆的解放事業是有害？如果你們認為有害，那我們願意自動停刊。如果說是有利的，那末為什麼這班『文化人』不拿他們的『地位』來向那些主張屈服的大批刊物施行壓力呢？我們希望讀者們能主持公道。

編輯先生：

編者

昨天我們剛進課堂，一位同學便拿着兩本『動向』告訴我們說：『第三期動向出版了』。先生，我們引領以待為時久矣！當時我們比得了什麼都還要歡喜。

再三翻讀後，關於戰爭的問題，我們得到了很深刻的印象；今特書此數行，表示我們完全同情並擁護 貴刊對於戰爭所持的態度。

在不久以前，有人會告訴我們史丹林是怎樣一個了不得的革命家，他怎樣配稱為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十月革命的老元勳，除史丹林之外又怎樣的都走向了反革命的道路……等諸如此類的論調，我們曾一時被蒙蔽了而有幾分相信了的。但當

人家還真真實實不屈不撓的在奮鬥時，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却徹頭徹尾的投入了希特拉的懷抱，以帝國主義的手段與希特拉將波蘭『平分春色』了！

這些向羣衆眼中撒沙的論調，現在都在事實面前迎刃而解，這是很明白的，但這只能使我們知其然，及貴刊第三期問世，我們才找出其所以然來。既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了，以後怎麼辦呢？這一點『動向』還未能使我們滿足。……

……現在我們再提三個問題請先生解釋：

(一) 怎樣才能實現一個『永無戰爭』的社會？

(二) 『第三國際已死亡了』是不成問題的，但我們怎樣走向新的領導？

(三) 怎樣才能使民衆奮起參戰，挽救抗戰的危機？

這三點請先生予以答復，以示迷津。末了，我們向先生致三個摯誠的敬禮！

讀者陳偉堅 陳邦耀 張秉誠上

十月七日午

偉堅，邦耀，秉誠三位先生：

你們的來信給我們以甚大的鼓勵。由此我們

更相信左拉的名言：『真理在前進中』！我們的『動向』縱然處在逆流之中，也還不是孤獨的！

來信所說的第一個問題，實在範圍太大，這是要拿全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來答覆的。在這裏我祇能介紹幾本最重要的書給你們：『論世界大戰』(列寧著，亞東書局)『從二月到十月』

(列寧著，生活書店)，『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托洛茨基著，先鋒書店)。

以上三本當然不過是全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一個極小部分。如果你們有志於斯，不妨繼續研究馬，恩，列等人的基本著作。

第二個問題，可參看本刊本期南冠君的論文。

第三個問題，倘編者站在中國人民一份子的立場上說，那我認為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應該是充實並改正抗戰的領導機關，即召集普選平等全權的國民會議，藉以實行革命性的抗戰綱領，其中應以土地問題之解決為重要內容；因為不徹底解決土地問題，那末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大眾是不能積極參加抗戰的；其次，就要徹底改善工人與一切勞苦羣衆的生活，要根本取締奸商，地主，以及不良官吏的欺詐與壓迫。這一切，我當然不能詳答，我希望本刊的撰稿人中，能為這問題寫出一篇專論來。

編輯先生：

在瞬息萬變的時局中，『動向』每期對其變化之邏輯進程之預言，都具有先見之明；德蘇關係問題是一個顯明的例證。德蘇協定前貴刊的創刊號對該問題的估計，至今更表現牠的全部真確性。我們已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真理是屬於『動向』這方面的。

『動向』內容的豐富，已為讀者所週知，鄙人不欲也無需逗留在這一點上。今有兩點問題。這些問題我個人認為在『動向』裏是有加以明白向我們指出之必要。

一，『動向的基本態度』，既『偏重於思想學術的批判』，而『徹底批判』的結果，又得出在史大林官僚把持下的蘇聯，已日漸墮落；大戰的發展，

很有可能使帝國主義聯合起來成為『反共的十字軍』，共同進攻蘇聯……等的結論。那末，我們應該怎樣將蘇聯從史大林官僚的統治下挽救出來？又怎樣去保衛這個工人國家——蘇聯呢？

二，德蘇協定助成了這次大戰，並促進第三國際各國組織的分崩離析。而蘇聯國內將會因之引起若何變化沒有？有則其影響於各方面又若何？

以上兩點願能予以指示！

敬禮！

宇淵上 十月十四日

宇淵先生：

對於你的兩個問題解答如下：

(一) 如就『我們』，即中國的勞苦大眾的立場來說，挽救蘇聯的方法，祇有憑我們本身的力量，假使借用一句流行的話來說，就是靠我們『本位努力』，這話怎麼講？即是努力促成我們抗戰的勝利，完成中國革命的任務，因為中國的勞苦大眾，祇能以自己的解放，來幫助蘇聯工農之覺醒。不過為要完成中國革命的任務，首先又必須盡量暴露史大林的黨羽在中國實行的反動路線。

(二) 史大林這一次一百八十度的急轉，在蘇聯民衆中的反應如何，是可想而知的。這兒我祇想告訴你一件事實，此次德軍進攻波蘭的時候，莫斯科廣播電台用兩種語言來報告消息，德語的報告完全幫希特勒說話，而俄語報告則顯然偏袒民主國家。由這一點，我們已經可以看出蘇聯民衆對這轉變所能表示的態度了，不過牠究竟能發生怎樣的變化，我們還不能加以推測。現在所能預斷的，只有：蘇聯擁護革命傳統的工人大眾與史大林官僚間的衝突將更加尖銳，自發的左

派(即史大林之所謂『托派』)勢力將迅速抬頭；但另一方面，具有法西斯傾向的右派官僚也將從事進攻，企圖徹底完成資本主義的反動。在最近將來，莫斯科恐怕又要導演『張伯倫或達拉第開謀的審判案』了吧？這將是徹底反動的警號。

編者

編後記

編完了第四期『動向』，我個人真感覺到一種難以言傳的痛快。在開始的時候，由於白克孟先生的提議，要出這麼一本綜合性的批評雜誌，請我們這幾個人幫忙，我們自然是欣然應命的；但是仔細想想，又免不了害怕起來。試問在這樣的環境中，能辦什麼雜誌呢？困難既那麼多，阻力又這樣大，寫些不關痛癢的文章吧，我們不願；要真的做到本刊發行人所說的『肆無忌憚』地批判吧，又似乎不能。但是我們終於辦起來了，而且也不見得違反了發行人的期望的，竟辦到第四期了，你想，那是一件多麼愉快的事！

不過這還不算，使我們真快活的，就是『動向』已得到數千熱心的愛讀者了，我們每次接到一封讀者真摯的信，我們便興奮起來，因為在這黑漆的深夜(雖然我們相信牠快近天曉)裏，即令見到一點螢火似的光明都是一種莫大的鼓勵！

可惜一直到現在，我們接到的信還只是一些對我們的簡單稱許，因之『動向』還不得不我們少數幾個朋友寫的雜誌，所以在這裏，我還想表示一次我們的希望：願讀者多多賜稿，多多批評。

國全設遍行分老最子牌

科 學 眼 鏡

亨得利

光驗密精驗經藉憑理學據根

確準度光磨琢淨純料原片鏡

口路龍華路飛霞行分 面對新新路京南行總

本刊第二期目錄

世界動向

鳳岡

羅曼·羅蘭新論

野老

日本政治結構的發展

梁石生

怎樣爭取經濟戰的勝利

育才

拜葉青的哲學傾向

南冠

分析與結論

木君

社會主義大師們的藝術觀

雙山

哲學上一個舊案的重提

三男

Out of the past

白克孟

馬克思給柯格爾曼的信

林超真譯

囚徒們的旅行

君衡

俄國革命軼史

維多·林伊文譯

本刊第三期目錄

世界動向

鳳岡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南冠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日戰爭

梁石生

關於德蘇協定的東麟西爪

木君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文學的預測

野老

中國近代的啓蒙運動與史實

江濤聲

伊里奇若在會說什麼？

達古

馬爾勞論

杜比作·小邨譯

馬克思給柯格爾曼的信

林超真譯

法蘭西內戰（書報介紹）

君衡

俄國革命軼史

維多·林伊文譯

讀者通訊

編者

和豐油行
茂豐油行
廣豐油行
新豐油行

聯合經售

上海麥根路武定路口念五號
電話三二八二〇號

上海極司非而路一一八八號
電話二二五七七號

上海法租界平濟利路三二一九號
電話八四三八一號

本號代客定購青島烟台各地
生油荳油品質務求優良定價
格外公道電話購貨隨接隨送
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昌記新油行

本號開設上海歷有年所信用素著
代客買賣各種油類品質選擇精良
價值格外公道外埠客商委託辦理
裝運迅速取佣低廉如蒙賜顧無任
歡迎焉

本行

地址 戈登路勞勃生路口
電話 三九六八二